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

（套装2册）

《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著

新华出版社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沈大伟 主编

新华出版社

TANGLED TITAN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沈大伟 主编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

丁超 黄富慧 洪漫 译



本书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专家学者和大众读者都能从这部重要著作中得到很多启示。

——亨利·基辛格

新华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纠缠的大国
大国冲突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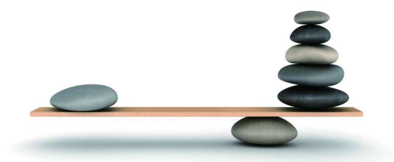
TANGLED TITAN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 沈大伟 主编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

丁超 黄富慧 洪漫 译



本书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专家学者和大众读者都能从这部重要著作中得到很多启示。

——亨利·基辛格

新 华 出 版 社

纠缠的大国

中美关系的未来

[美] 沈大伟 主编

丁超 黄富慧 洪漫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 （美）沈大伟 主编；丁超，黄富慧，洪漫 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66-1511-9

I.①纠… II.①沈…②丁…③黄…④洪… III.①中美关系—研究 IV.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939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243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目录

前言和致谢
第1章 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
“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在中美关系中管理“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第2章 美中关系的演进
1949—1969年：动荡和怀疑
1969—1979年：更宽的视野
1980—1989年：乐观主义
1989—2001年：混乱无序
2001年及以后：新的全球现实
结论
第3章 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
权力转移与自由国际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崛起
结论
第4章 现实世界中的中美关系
中国独特的崛起及其对竞争的影响
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中美安全竞争
结论：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第5章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性影响
后冷战时期——大陆政治风波和台湾民主化的影响

小布什政府
奥巴马政府期间国内因素的影响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现状和前景
结论
第6章 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决定因素的结构性改变
国内体制的变化
社会力量
结论
第7章 外交关系：要旨及过程
各自的目标
政府部门的作用
双边机制
双边外交议程
挫折和妥协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第8章 商业和经济关系
作为榜样的美国经济
幸福的依靠
移动的沙与再平衡议程
争论的焦点
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管理机制
结论
第9章 文化关系
中美之间的文化外交
文化理解的方式
结论
第10章 军事安全关系
新的安全考量
近海和周边地区

中间地带
全球范围
军事冲突的制度性限制
结论
第11章 中美两国在亚洲的交流
地区关系中的中美因素
地区发展
结论
第12章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1949—2000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2000—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
2000—2011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是该有点新意的时候了？
结论
第13章 中美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的互动
欧洲
中东
撒哈拉以南非洲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结论
第14章 美中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中的交流
评估行为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中国与全球治理
中美交流的类型
结论
第15章 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塑造未来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
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成绩
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

结论
第16章 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竞争
对抗关系
结论
编者与作者简介
返回总目录

前言和致谢

本书源于我略有不安，却又日益强烈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因素都已发生转变，两国关系确需重新评估。这种感觉早在2009年至2010年我在中国做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之前便已萌发，但正是在访学期间，这种感觉逐渐明晰起来。

在那一年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许多事情，它们让我认识到，形势正在变化，而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看到，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到访北京和上海时受到冷遇，同时中国政府对奥巴马的每一项日程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与之前历任美国总统访华时受到中国民众和官员的热烈欢迎相比，奥巴马及其随行人员所受到的冷遇显然是不够友好的，这也象征着两国关系的紧张。总统访华前一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那一天，我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庆祝仪式。在长达数小时的阅兵式中，我看到各种先进的武器通过长安街，中国人那新生且极富活力的民族主义展露无遗。在这一年里，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研究。在与中国同人以及普通百姓——从出租车司机到商店店员再到学生——的交谈中，我清楚地感受到，曾经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反感。我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跟我抱怨说，他们已经被中国社会和政府“拒之门外”了。我受邀参加过很多讨论“中国模式”的媒体采访和学术会议，人们标榜这一模式将用来取代伴随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宣告失败的“美国模式”。反美情绪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骄傲在很多场合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在这一整年里，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不断冲击着中美关系：谷歌事件、哥

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报复性关税、中国在亚洲日益强硬的外交等。无论是奥巴马访华结束时两国所宣称的“全球伙伴关系”蕴含着多少期待，它也很快遭到了这些意外事件的打击。

这一切使我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深感不安。连续23年的访华经历使我有机会见证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丰富的经验告诉我，这仅仅是另一个“低潮期”而已，会慢慢过去。但是，2009年到2010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两国关系正在出现一些根本性，甚至是非常消极的变化。中国自身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但并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离京前，我在北京的美国商会作了一次演讲，并撰文简要谈论了这些变化，呼吁美国采取新的对华战略来应对这些新的现实。当然，美国国内的一些痛苦经历同样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变化。金融危机令美国元气大伤，其国际地位受到重大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遗疾久未散去，同时对中国的担忧与日俱增，这包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强硬外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结束访学回到华盛顿后，我同样发现人们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这个“强硬的一年”令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改变了看待中国的方式。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他们在2008年上台时曾希望同中国建立一种全球伙伴关系——的交谈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一条新的界限。在他们的眼中，北京没有行动起来同美国携手处理2009年到2010年间一系列富有争议的问题。可能在美国看来，两国关系的基础十分薄弱。

回到美国更加深了我对两国关系发展轨迹的不安，但同样坚定了我的决心，促使我进一步去理解其中的深层动因，认真考察两国关系的现状。但是，如何对我的工作加以阐释和组织呢？这就需要对这一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重新展开一次深度调查，探究其中的深层动因和推动力量，从不同视角审视中美交往中的不同背景和领域，而且要避免浅尝辄止。为此，2010年秋，我耗时数月思考如何组织这项研究工

作，由谁来参与，到哪里寻找经费。

本书便是最终的成果。它能付梓出版离不开众多参与者和机构的努力和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首先，我要诚挚感谢15位作者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他们都是中美关系领域声名显赫的专家和日理万机的学者，准备文章耗费了他们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不仅对自己的主题作了大量研究和思考，而且每篇文章都是几经修改。面对我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们总是礼貌回复，同时对来自外部审稿人和彼此之间的意见，也都抱着积极探讨的态度。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合作。当初投身该项目时，我们都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但大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自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转变。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需要研究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的最新变化和其中的动因。虽然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主题上是有共识的，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试图去刻意“求同”。

2010年11月，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议程紧凑的会议，目的是以同行评议的方式展示各章初稿并提出意见。华盛顿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拨冗光临，带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参与了不同主题的讨论。这些专家包括：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乔治·华盛顿大学）、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傅强恩（John Frisbie）（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李成（布鲁金斯学会）、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胡达（Michael Yahuda）（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布鲁金斯学会）。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要对西古尔亚洲研究中心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中心主任爱德华·麦科德（Edward McCord）以及研究员马特·格里格尔（Matt Grieger）和克里斯托弗·王（Christopher Wong）。他们不辞辛苦，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国际会议复杂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他们在幕后的辛勤劳动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最后，没有资金支持这样的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尤其要感谢的是福特基金会驻北京代表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先生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对该项目重要性的理解。其次，本书还得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策项目的帮助，要特别感谢的是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理事会成员、校友克里斯托弗·富斯纳（Christopher Fussner）先生对中国政策项目源源不断的支持。没有富斯纳多年来的支持，这个项目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所有对本书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希望本书能够促进大家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只有这样，这两个强大且伟大的国家才能携手构建一个和平积极的未来（虽然不同的分析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希望将此书献给中美两国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各自的社会和政府解读对方，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彼此的工作都没有尽头，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沈大伟

第1章 纠缠的大国：理解中美关系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中美关系被两国官方和学界一致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是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更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推手；它们为全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博士和专利；它们更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仅有的全球性行为体。它们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每天约有9000人穿行于两国之间，约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中国则吸引了约两万美国留学生。两国有38对“姐妹省/州”，更有169对“姐妹城市”，这种关系使双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在中国，有3000万人正在学习英语，而近20万美国人则在为学习中文而努力。

中美两国用上述及其他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最大影响。理解中美关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驱动它发展的动力至关重要。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要素不是固定的，并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使很多之前的研究落伍了。本书试图修正、剖析并解释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在本章之后，本书将分为7个不同部分：历史、理论、国内、双边关系、地区、全球，及其他有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

“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本书的主要论点，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中短期内的主旋律是：两国紧紧纠缠在一起，并存在广泛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这导致了合作与竞争交错的景象，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合作性竞争（coopetition）”。正如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和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在多年前创造了“接触兼遏制（congagement）”来表述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交织的情况，我认为“合作性竞争”一词能够充分体现当前中美关系中相互矛盾的双重属性——也即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常态。下面的章节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诚然，两个国家既竞争又合作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很少有两个世界大国会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历史上，两个主要的大国只会维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而更多地处于非对称的、竞争性的，常常是敌对的关系中。有时，主要的大国可以在一个多国协调机制中共存（如同19世纪的欧洲一样），在这样的机制中，各国共享安全和商业利益，因此两个主要国家的竞争冲动会多少因其他国家而受到缓冲和抵消。但协调机制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在这个机制中安全

困境和战略猜疑会像春雨中的野草一般滋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大国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当两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力量从协调机制中抽离后，一些次级国家的实力将开始迫近两大主要国家，“权力转移”会逐步出现，从而催生一个更为不稳定的战略环境。即便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这样更为经典的两极秩序下，两国的合作也仅限于最小限度并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的是竞争和敌对。

有人认为上述情境也出现在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而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日益增长并成为主要方面，而合作性因素则正在下降并沦为次要方面。两国展开合作的领域正在日益变得狭窄，政府间试图促成合作的会议正变得形式化且日益艰难。两国政府中弥漫着互不信任感，两国的政府中也很难再找到具有强烈的合作使命感的官僚部门（当然教育领域是一个例外）。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既是由两国内在的一些因素所引起的，又是国际事务的系统性变化所造成的结果。中美关系还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机制），它们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实质的双边联系——我称之为“结构性相互依赖”（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结构性相互依赖认为多方面的相互依赖将两个国家捆绑在一起，但是同时，这些相互依赖也激化了两国已有的分歧并催生新的竞争。这导致一种奇怪的“合作—竞争”动态混合状态——在这种关系中，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从前者向后者转移。我将这一新阶段中的中美关系称为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尽管两国仍然相互依赖，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华盛顿和北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谨慎地控制竞争并使合作最大化，这样才能防止两国关系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

上述状况的含义将在本章的最后和本书的主要部分得到进一步的论述。首先，本章余下的部分提供了一系列范式来理解两国复杂的关

系。理论有助于阐明事实，并将之分类。诸多竞相解释当下中美关系宏观动态的理论的存在，本身就是两国关系复杂性的明证——而它们也提供了各自的重要视角并多少具有解释力。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但为了追求简洁，本章将先后采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以及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来解释当下的中美关系。

历史和文化的方法

第一种看待当今中美关系的视角结合了两国各自的现代历史和文化。尽管不易概括，但这些对于理解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心理性和经验性的固有看法非常重要。唐耐心（Nancy Tucker）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阐述了大量历史要素和事件。不过我将进一步补充一些内容。我认为，至少有五大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影响中美两国对对方的看法。

首先，中国对外国势力侵犯中国陆海疆域非常敏感。这是中国人修建长城，并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不断重建长城的原因。在中国前现代历史中，因境外势力入侵而造成的国土破碎是显著的事实。而在其现代史上，尤其是18至20世纪期间，中国仍然因欧洲殖民国家、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惨遭领土分裂。与此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常常分崩离析，且伴随着分合交替。内部的困扰又常因来自外围的入侵而加深。中国人称此为“内乱和外患”。

对内忧外患的担忧影响着当今的中美关系。很多中国人认为华盛顿试图一面在周边给北京制造压力，阻碍两岸统一，一面则通过在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制造不安定来颠覆中国政权。

其次，中国在过去的150年中始终在寻求“富强”之道，并试图重

塑其大国地位。因此，中国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非常简单：它们帮助，抑或是阻碍了中国的伟大使命。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在这方面美国顶多属于功过相抵。但是精明的美国人认为，在1949年之前和1978年之后的两个时期，美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更别说心怀感激了。由于相信美国正在战略、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阻碍中国的崛起，即便美国不再做什么，中国也不会心存感激。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历史性因素：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这两者在中华民国（1911－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时期显露无疑。美国的例外主义认为，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和历史经历以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前提。这些都对塑造美国的自由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内战时期；同时，这也导致了美国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这种帮助，甚至是塑造中国发展进程的富有使命感的欲望充分体现在医药、科学、农业、教育、宗教、政府和军事的组织，以及经济等方方面面。

正如劳泰瑞（Terry Lautz）在本书中所阐释的那样，美国试图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中国的家长式的使命感并没有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而消亡，相反它继续存在：首先体现在美国对逃亡台湾的国民党的继续支持；其次反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1978年之后美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对中国大陆的大笔捐赠上。在这两个时期，美国向中国倾注了不计其数的人力和财力以帮助其现代化和民主化。美国的做法不时（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引发强烈的反响，其结果是很多热切的中国“学生”开始支持美国“老师”的行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堕落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动乱和稳定，这些自由的小插曲都以悲剧收尾。除此之外，美国在对待中国时显现的例外主义和家长式作风在美国人心中依旧根深蒂固。美国寻求以与美国传统和利益相称的

方式在政治、经济、知识、战略上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但中国“顽固”地违拗了美国的期望，这使美国一再感到失望。我感到，美国社会中对中国和援助其发展中家长式的专断态度在近20年中显著消退了。这源于1989年的后遗症，更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崛起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很多美国人颇感疑惑：“中国只会威胁美国，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发展？”如果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处于零和竞争之中——无论是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还是战略上——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

中国的例外主义也在发展。许多观察家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这点我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成为一个大国依旧是它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北京依然将美国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威胁。正如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阐明的：“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对他们来说，美国依旧是反共的。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人权固有的信仰依旧影响着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在美国例外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家长式作风，同中国例外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斗争。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始终存在，但更大的战略利益会掩盖这一分歧。不过在缺乏更大的战略共性的今天，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再次从幕后来到台前。

第四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问题。“给面子”意味着给予对方地位和尊重。中国人注重给他人面子，维持自己的面子，避免丢脸。这原本是一个国内社交上的习惯，但却变成了外交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待像美国这样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时。中国官员渴望他国以大国礼仪来对待他们，强化他们的形象；同时，他们竭力避免在国际上陷入窘境。当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中方关注的事宜主要

集中在：白宫南草坪上将鸣放多少礼炮，东道主会以工作午餐还是国宴来招待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谁会得到宴会邀请，在机场迎接的官员是什么级别的，美方是否会提供有特工保护的车队，是否会有示威游行，他们是否会在发布会上遭遇即席提问等。美国官员则恰恰相反，他们更渴望切入主题，并在艰难的谈判中达成协议，这源于美国人好争论的文化。在谈判中，美国式的不耐烦和对获得实质性结果的渴望，时常同中国式的耐心、官僚主义以及倾向于维护面子的作风产生冲突。对中国人而言，在会议桌（方桌）前相对而坐进行谈判本身可能被视为挑衅，有失面子；他们更喜欢在餐桌（圆桌）上——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达成协议。

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华文化中，冲突对他们来说是严重丢脸的，也是侮辱性的。因此，美国人在人权、人民币升值、贸易赤字、军事现代化等广泛领域中公开与中国对抗的倾向被视为对中国公开的羞辱（而中国只是在斥责或威慑越轨行为时才会使用这种方式）。为了维护面子，中国大多选择“关起门来”讨论敏感问题。在中华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争议应被隐藏，而美国文化则恰恰相反。

最后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因素与地缘有关。具体来说，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自己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另一个是美国“亚太大国”的自我定位。如同美国在西半球所宣示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一样，中国也曾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亚洲局势，建立了朝贡体系和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地区的“天然”秩序，并在中断了三个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强大而重新回归，并将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吸引到它的势力范围内。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即将统治世界。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准确地说是中国衰落的时期），美国成功进入亚太地区并将自己视为该地区的正当行为者和主要大国。近期，奥巴马政府又将战略重心转向该地区。中国似乎并不接受美国的自我定位。中国能够接受美国在亚太的部分存在，但绝不

会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地位和霸权。尽管中国官员偶尔以“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来安抚美国，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厌恶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这种冷淡的承认反映出中国的容忍，而非诚心接受。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给予了美国更多的宽慰，“我们并不想把美国赶出亚洲，这没有必要，美国已经在我们家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从周边地区赶出去？”一位时任外交部高官在一次采访中对笔者如是说。此外，中国大多数的亚太邻国公开或私下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有时“咄咄逼人”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说，这里存在一个战略性的“矛盾”。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是一个新来的闯入者，而中国在地缘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已经在亚洲存在六千年了。但是，正如门罗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美国一样，朝贡体系如今也不可能恢复了，但是这仍然潜藏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之中。

中美历史和文化中的很多方面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并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潜在的宏观因素常常被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忽略。但是我确信它们仍然发挥着有效的影响。接下来的文章运用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并简要地讨论了每个理论如何提供了看待中美关系的不同方面。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的范式。古典现实主义源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研究和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思想家韩非子（公元前280－前233年）的思想。尽管现实主义的每一分支和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将国家作

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强调国家的物质力量；国家固有的不安全感；他国的意图难以把握；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强调结构和国际体系；对权力的追逐；国家以保障安全为首要目标。现实主义者将权力政治视为零和游戏，并认为现有大国和新兴挑战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有人认为冲突可以延缓，新兴的竞争者可以在中短期内被遏制，但是长期来看，对生存的内在渴求会驱使国家陷入长期和危险的竞争中。如同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在第4章里简明扼要地指出的："强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主义者中）唯一的争议在于激烈的程度。"

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的结构视为关键变量，所以他们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极"。他们将大国视为构成体系的"极"，而中等国家和小国同大国或结盟（搭便车）或对抗（平衡）。关于单极、两极、三极还是多极，哪种格局是最稳定或最不稳定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定论。但是现实主义者都认为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转变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这时经常出现误判，紧张关系加剧，导致冲突。这在权力转移理论等新现实主义思想中得到了体现。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同现有大国的实力接近的时期是最不稳定的，也是最趋向冲突的——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将其称为"交替"点。在这个时期，现有大国可能先发制人，以应对新兴国家的挑战，更常见的是，新兴国家会首先发动进攻。这就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的"霸权战争"。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霸权理论的扛鼎之作。在该书及其他的著作中，米尔斯海默教授阐述了他的"铁律"——所有的国家都追求霸权，并对均势不满，中美两国概莫能外。在他看来，这将给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埋下隐患。他进一步说："中国比任何一个美国在20世纪所对抗过的霸权都要更强大、更危险，这使将来中国带来的威胁变得如此令人担忧。"米尔斯海默大胆、明确地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写

到，华盛顿应当毫不犹豫地阻碍和对抗中国的崛起——也就是“先发制人的遏制”。米尔斯海默的论述基于对国家物质力量的评估和所有国家都追求绝对霸权这一假设——在他的分析中，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几乎不产生影响。正因如此，中国所声明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其古老的传统和治国方略、其受外国侵略的经历和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上去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显得无关紧要。

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也同意米尔斯海默关于中美两国争夺霸权的观点，他的分析并不是着眼于权力转移，而是更多地来源于亚洲的地缘竞争。他用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将亚洲的未来同旧时欧洲的对抗作对比，称“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与米尔斯海默不同，弗里德伯格将中共政权的性质作为关键变量和中美两国摩擦的肇因：

> 根深蒂固的权力政治即便不会造成中美对抗，也会使两国走向互不信任和竞争。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显著地加剧了对抗。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不仅成为两国采取措施减少不确定性和抑制竞争的障碍，更成为两国敌对和互不信任的根源美国对中国更为怀疑和敌对，更多的是源于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考虑。

这方面，弗里德伯格借鉴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和评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而其他情况则不然。

米尔斯海默和弗里德伯格的阐述代表了那些“危言耸听”的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但是，这些预言中美冲突难以避免的著作并没有什么破绽。现实主义者往往只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和军事变量，而忽略了使它们陷于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文化因素。这些看法多数会将美国看作一个仁慈霸权，而将中国视为一个咄咄逼人、蠢蠢欲动的国家。因此，他们将中国视为“扩张”和“修正主义”的国家，而美国则被看作不得不对中国的崛起和挑衅作出“回应”的“现状”国家。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挑战当时霸权国家的典故常常被拿来与中美关系作类

比，特别是19世纪末德国挑战英国的故事。对此，现实主义者的建议是：美国需要通过平衡和两面下注（strategic hedging）的策略，同它在亚洲的盟友一道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

这些看法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中美之间权力的不对称，以及因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而导致的权力转移。阿什利·特利斯在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但是，并非所有支持权力转移的学者都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

除了均势的相对变化之外，“安全困境”也在现实主义者的分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概念假定，即便一国纯粹是为了防御性目的而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己的实力，其他国家仍会担心，这些行动可能是带有进攻性和威胁性的。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使这个概念广为人知。当下，中国在海军、网络战、反卫星和弹道导弹现代化等项目上被认为适用于“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境。上述的每一个行动都被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是不稳定，甚至是富有进攻性的。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在本书中完美地描述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两国关系中潜在的危险和千钧一发的冲突。

其他观察家则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在面对安全困境时，一个国家最好的选择是保持克制或者寻求合作。国际安全学者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指出，中美之间无论是常规层面还是核武层面上的安全困境都并不严重，有的甚至仅是空穴来风，因为两国有理由感到安全，他们能够在两极格局中共存，同时两国有足够的空间来采取措施以增强互信，减少战略上的不信任。一些研究中国的安全问题专家，如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充满信心地认为，两国在战略上的竞争是可控的。尽管有人认为竞争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本书中对两国关系的“斗而不破”表示乐观。葛来仪（Bonnie Glaser）和杜孟新在本书中详述了两国政府之间现存的广泛的外交机制，以此减少不信任和错误知觉，并

促成战略合作。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章节中罗列了两国在亚洲需要处理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进行的研究同样认为，当两国都保持克制并避免刻意挑衅对方、破坏对方的核心利益时，控制竞争就是可能的。最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危险在上升，建议两国采取“合作的方式保持克制”：

> 它们需要认识到一些竞争是与生俱来且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被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它们应当限制竞争的范围。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军事冲突则可以避免，否则，两国的紧张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两国的外交有责任探索有效控制的空间，并将之扩大，以防止两国关系被战术或者国内需要妨碍。

陆伯彬（Robert Ross）和朱峰领导的研究小组探讨了权力转移理论对中国崛起问题的适用性。与在信奉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中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在新兴国家与原有霸权国实力接近的阶段，两国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不同，这些学者认为，在权力转移阶段，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可避免，“包括全球的单极格局、地区的两极格局、地缘和武器系统在内的结构性的变量，将使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和对战争的预期得到缓和”。

上文展示了在中美关系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从数量上看，没有一个范式能够像现实主义一样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产出如此多的著作。由于现实主义中存在许多流派，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会有多种多样的分析、对策和判断。不过新现实主义普遍认为，当下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依然会以战略竞争、地缘对抗和可能的军事冲突为特点。

本书的读者和中美关系的观察家应该明白，现实主义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同美国对大战略、大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分析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关注两国关系的其他维度——正如本书所尝试的

——我们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旦运用别的理论，关注其他层面的分析、变量和行为体，便会得到不同，至少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危言耸听和悲观的结论。

自由主义

另一个盛行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是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源于启蒙运动，以及孟德斯鸠、洛克、康德、亚当·斯密的思想。自由主义基于社会进步、理性、道德价值和伦理，因此，自由主义者相信对权力的追求可以得到约束，普罗米修斯式的精力可以被导向社会公益。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观念和价值、国内政治、市民社会以及制度同样重要。

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并不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的，也不是一味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实际上，它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深化国家间的联系，并通过制度化的规范和法律约束行为。现实主义者认为决定国家之外的系统性因素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但是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从国家内部和社会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个人解放和自由被视为进步（进步观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和现代化的基础。代议制和受约束的民主是自由的信条和规范的体现。自由主义同现代宪政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自由主义者信奉“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领域存在竞争，但是它们之间不会打仗。相反，他们认为非民主国家天生就是有侵略性的——仅仅因为它们不对民众负责。另外，自由主义者也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

在强调国家内部变量的同时，国际制度、国家的外部约束和所谓的“全球治理”都成为新自由主义关注的维度。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缺少全球性的权威；与此不同，自由主义

者则认为国家的达尔文式的倾向可以被结构、法规抑制，全球治理也是可能的。

相互依赖理论源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也是对现实主义仅仅关注国家间关系所作出的回应。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70年代极力推动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强调跨国性的关系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它也成为全球化理论的先驱。于是，相互依赖理论被长期用于分析国家间以及次级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诸多变种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得到了大量应用，其中有三个领域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本质。考虑到美国自由主义者对西式民主的偏好，他们对中国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可被称为“共和自由主义”。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对中国家长式的作风也根源于自由主义。这也是国民党溃败后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失落”充满焦虑的原因。而在随后的几十年，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以对抗大陆。

自由主义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贸易。这也就是所谓的“商业自由主义”。这是美国在30多年中不懈地将中国拉进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关键要素。其预期是中国将因此按照国际商业规则行事——特别是中国将打破壁垒和补贴，并将经济规模和比较优势最大化。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相信，贸易将给中国带来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变革性影响。

第三个领域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有关。这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和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他们的章节（分别是第3章和第14章）中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个问题。艾肯伯里认为，无论是过去30多年的改革，

还是现在，抑或将来，中国的发展都受制于国际自由秩序。他指出，中国已经深深地，且不可逆转地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如果中国想对自由秩序发起挑战，它将面临失败：

> 现有的国际秩序已经牢固确立。这是一个包含威斯特法利亚原则、自由规则和制度的多层体系。这套秩序影响深远。这不仅是一个与美国的权力绑定的政治形态。制约中国打破并重建国际秩序的阻碍和限制很多：中国“模式”作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持续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行为可能会导致自我孤立；打破旧有秩序的机制——大国战争——已经不存在了。

艾肯伯里进一步为中国辩护——即便中国想要用自己建立的秩序来代替现有的自由秩序，它也将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

如同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著作《中国、美国和全球秩序》中阐述的那样，她撰写的章节拓宽了分析的角度。福特教授同其他几位学者有一样的观点，她认为中国乐意并已完全融入了国际秩序，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状国家。尽管中国已融入其中，但是，其对于自由秩序仍存在矛盾心态，同时对一些过于独立的组织感到不安。福特的结论与安·肯特（Ann Kent）和格雷戈里 陈（Gregory Chin）等学者的结论相互辉映——中国仍存在矛盾心态，并有策略地在特定的国际机制中进行合作（特别是安全和人权领域）。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这是40年中美国和欧洲对华战略的关键），但它仍未完全融入该秩序中的根本自由规范。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以及中国同西方打交道的经历，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委身于自由秩序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意愿。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在用来考察中美关系时，也产生了很多令人不安的结论。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担心中美之间潜在的冲突会被激发，因为他们高度赞赏自由的国际秩序在约

束和塑造中国的选择和行为方面的能力。不过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它对全球贸易规则半心半意的顺从，以及北京对基于自由原则的国际规范和机制的保留态度表示担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同美国在很多全球议题和全球责任上有共同语言，例如地区与全球安全、环境、跨国犯罪、能源供应、自由贸易和投资、核扩散等。这些跨国议题构成了中美合作中的核心议程。中美间的首脑峰会和一年一度的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即为两国开展双边合作制定议程的明证。两国的合作制定的议程不仅清晰可见，而且意义重大。葛来仪在本书中罗列的支撑中美合作的广泛议题和机制便是铁证。这也引发了关于中美伙伴关系或中美“G2”共治的猜想。

这些都说明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将持续。关键在于，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与控制问题。

建构主义

与强调物质性因素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作用——观念如何被建构，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中或不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构造、社会化、个人和国家认同的转变是建构主义者分析的重要步骤。尽管建构主义源自国内文化和社会，但是它同样“跨越国界”，影响国际社会中行为的塑造。建构主义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知识社会学，在冷战早期的国民性研究中得到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伊恩·赫德（Ian Hurd）、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等人的推动在国际关系界盛行。在后冷战时期，建构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很多建构主义的文献也在研究规范的社会化及其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下的传播。

美国和苏联专家都试图探索在这两个敌对的社会中（主要在科学和军控领域）建立“认知共同体”以促进两国关系的缓和，这成为建构主义在冷战后期的一次重要体现。有人认为，如果两国在专业领域建立联系，两国将更容易找到互相都可以接受的行为规范——这可以稳定两国关系。美苏尝试建立“认知共同体”的经验也被用于中美关系，这次涉及的专业领域更为广泛。正如美苏一样，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国大批科学家和军控专家启动了一系列交流（尽管中美两国没有进行军控谈判）。而非政府的“二轨”外交也促成了两国大量国际关系学者、安全专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

与美苏的情况不同的是，在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在教育领域有着广阔交流机会（其实，笔者是第一个被获准在中国大学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和外国学生）。很快，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建立了三个在国际关系、法律和经济方面管理和资助两国交流活动的专家委员会。有人认为，这些委员会的存在有助于通过培训中国学生和学者，向他们灌输美国（也是世界流行的）观念，同时也可以在两国之间建立“认知共同体”。美国国家科学院及其他专业机构也涉足其中。这也是上文讨论过的“塑造”中国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很多学生和学者参与了这些领域的交流。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专业领域的合作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尽管有时候中美两国的专家和学者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但他们往往会有一些相近的看法——这也印证了建构主义所说的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的联系。尽管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安·肯特（Ann Kent）等学者对中国及其官员在国际组织中的社会化问题有所研究，但至今仍未看到有关中美之间“认知共同体”的系统研究。罗斯玛丽·福特和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的著作探索了中美在多个全球机制和全球治理议题中的互动（见福特教授所撰写的章节）。

在中美关系中管理“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

通过前面的阐述，我试图展现历史性因素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尽管它们都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学者在分析时必须借鉴上述四种方法。实际上，还有很多理论——如英国学派、理性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决策理论等——都为分析中美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和视角。运用这些理论，观察家将看到一个更为清晰的中美关系全景。两国关系不止是数据、事实、事件、行为体和互动等因素的简单集合，上述的理论所产生独特而明确的模式使这些独立的现象串联在一起。

尽管有诸多理论可供应用，但本书后续的几章均表明，“结构”和“相互依赖”依然是当下和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它们都认为国际结构（安全结构、外交结构、商业结构）对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国际安全结构促使两国竞争和敌对，而国际经济结构和规范机制则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约束两国的竞争。就均势而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在全球许多领域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两国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可能加剧。

不过，本书的其他章节也认为，中美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两国由于大量双边和多边的互动、政府间机制和两国的社会联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葛来仪介绍了两国的政府间的互动后，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和劳泰瑞在他们的章节里分别详细叙述了两国间密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约翰·艾肯伯里和罗斯玛丽·福特则指出了为数众多的

国际制度和机制对两国政府的影响。多边或双边层面的官方交流的制度化能够有效防止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震荡和偶发性破坏。不过，相互依赖同样会造成摩擦（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另外，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本书中指出，尽管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看上去比较稳定，似乎已经不再是中美之间的中心议题，但它依旧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两国关系呈现出了这些“双重性格”，因此，它日益表现为“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尽管两国尚能共处，但日益显示出竞争性。本书的很多作者（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近年来，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在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安全和地缘方面均有明显表现。两国出现了更多利益、手段和政策上的分歧。很多人注意到，两国明显缺乏战略互信。很少能看到两国通过多边或双边机制进行合作和协调政策的努力，尽管有众多制度性机制可用来促进合作。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竞争的力量已经威胁到了合作的努力，但是两国制度化的合作努力经常是短暂和间歇性的。实际上很多机制在创建时以促成合作为宗旨，如今已经成为讨论分歧、控制竞争的论坛。在两国政府间各领域的60余次会谈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实质问题。这些对话更多的像是磋商，将各自的偏好和政策与对方通气，而不是真正地促成合作和协调。在这些政府间对话和高层外交活动中，双方竭力展现一种浅层次的合作与和谐的交流，但是在这些对话之下——甚至是整个中美关系——都显示出双方的互不信任。有时双方的分歧会罔顾外交礼节而浮出水面。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的处理方式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两国的国内利益也制约了它们解决双边问题的能力。中美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观点，并因此陷入斗争：美国希望扩大自由秩序的范围（包括增加自由国家的数量），而中国则对自由秩序怀有矛盾心态，甚至抱有抵制心理。总之，这是两个纠缠的巨人。

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而言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就是

当前的现实，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持续。当竞争的领域扩展时，合作的范围自然会减小。基辛格认为，两国应当努力扩展合作并限制竞争。必须明白，这些不是相斥或零和的领域，而是共存的。合作和竞争是同时存在的。处于变化中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有时合作更为明显，有时竞争则会增加。如果简单地以“冲突”和“和谐”的两极光谱来考察中美关系，那么居于中间的则是竞争与合作。如今的中美关系则正处于光谱的中央——处于“竞争”与“合作”之间，既没有触及冲突的危险，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谐。

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和结构性问题正日益突出，在缺乏能够促使两国合作的全球威胁之下，这样的趋势也将延续下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中美再也没有面临过能促使双方合作的共同威胁（除了共同反对“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缺乏这样的共同威胁，两国的合作会减少而竞争会增加。基辛格表示，缺少共同目标和一致认可的约束规则，对抗会出人意料地升级。



图1.1 中美关系的变动范围

因此，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在于对竞争的控制，避免使之发展到冲突的边缘，同时真正地扩展合作（当然，完全的和谐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设想了两国之间的共同发展，也希望能实现，但他也承认这需要“智慧和耐心”。这也需要两国的务实，相互接纳和容忍。我不清楚两国各自的政治文化、现有政治体系、国民意识、社会价值以及世界观是否会促成一次战略“大妥协”，就像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推动的中美缓和一样。

这两个纠缠的巨人会发现，它们越来越难以共存——但它们不得不那么做。无论多么复杂和令人担忧，这是一场不能拆散的婚姻。中美关系中有一点早已是老生常谈：两者的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

哪儿去，它总是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只要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中国和美国就应当继续经营它们这段复杂的关系。两个巨人将继续纠缠下去。

第2章
美中关系的演进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

一个多世纪以来，让国家强大起来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的雄心抱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令人难忘地宣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认为，中国的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随着中国摆脱这场浩劫，中国将再度成为"伟大、勇敢、勤劳的民族"。

不那么明显的是，中国强大起来——统一、繁荣、安全——也是美国在与中国结交的大部分时间的目标。1979年，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访华时，令人们想起西奥多·罗斯福，目的是让接待他的中国东道主对华盛顿的良好意图感到放心。

> 如果任何国家变得稳定繁荣，能够维持境内的和平，强大到让外界不敢侵略它，那么这对其他国家就是有利而非不利。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取得进步，迄今为止，通过和平且合法的手段，我们将竭尽其能地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

中美愿景的重要差异是，美国假设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应该并且将对美国友好，甚至与之结盟。

要看清楚这一点，先理解中美互动的历史十分重要。在1949年之前，美国人把他们对中国强盛起来的支持看作行善，这一姿态可以便利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外国列强的掠夺。正如历史学家韩德（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打造了美中“特殊关系”的神话，这种关系包括“美国人大发慈悲、中国人心存感激，相互间存在良好意愿”。美国人祝贺自己没有试图改变中国，相信通过把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而使中国变得更美好。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崩溃，担心如果中国出现混乱，就会让外国列强争先恐后地将其殖民化，从而造成秩序紊乱。但是对华盛顿而言，直到20世纪末，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欧洲的更广泛、更认真的博弈中的有用兵卒。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中国为“四警察”之一，在二战后维持和平——但是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这只不过是罗斯福通过变相合法手段取得投票权，从而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翻云覆雨。虽然美国人哀叹中国的疲弱，但中国还没有重要到能够招致认真补救行动的地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虽然美国人或许不像英国人或者日本人那样贪得无厌，但他们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对遏制中国遭剥削毫无益处（除非他们要保护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此外，随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美国与毛泽东的对手并肩作战，称他们是“自由的中国人”——尽管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专制、腐败和无能。历史学家杜维明认为，“美国人是科学和民主化身”的早期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形象是：贪婪、暴力的国家，千方百计地要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北京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华盛顿决意要遏制和改变中国大陆，使其疲弱不堪、四分五裂。

所有这一切今天还引起特殊的反响，因为美中关系已崛起为21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从经济上、战略上、环境上和政治上

而言均如此。正如罗斯玛丽·福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所展示的那样，美中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不同，在国际体制中竞相制订各自的标准。中国的崛起——其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许还是超级大国——对美国人来说是否是件好事还未可知。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和行为作出必要且无可避免的调整，而且还要求中国人分担美国为世界事务承担的责任。今后几十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华盛顿愿意优雅地后退，而中国有能力承担这些任务，而又不会试图利用其实力来主导东亚乃至全世界。

1949—1969年：动荡和怀疑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它决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且繁荣的国家，这一决心在美国普遍引起不安。美国鼓励中国改革和现代化，但是“新中国”展示的实力却构成了威胁，因为意识形态倾向让它与苏联结成盟友。华盛顿担心，中国日渐增强的力量将被用来进行破坏稳定的干预行动，引发革命——并最终演变成军事对抗。美国认为，与其鼓励中国强大起来，还不如确保中国仍然疲弱。

敌意或许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意识形态、文化和私利使得敌意难以避免。比起和解，对抗更适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目的。对中国人来说，要消灭帝国主义，动员庞大的人口支持革命，击败和消灭国民党，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民族自尊，煽动反美情绪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方面，美国政府、传教士、商人和军人提供了几十年的援助被弃如敝屣，中国撤退到“铁幕”后面。

华盛顿对“红色中国”的成功感到沮丧，但这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的腐败无能持有的天真态度。美国人已发现，蒋介石的部队在抗日方面表现差劲，国民党政府对困扰着中国人民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麻木不仁。一些人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更

受欢迎，他们盛赞它能够更加奋勇地抗日，更致力于为中国数百万人谋福祉。华盛顿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更接近于抛弃该党，与北京建立关系。事实上，总统哈里·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预料蒋介石的政府将会倒台，中国的内战将会结束，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分道扬镳，1950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时期将是与中国展开贸易和外交交流的好时机。

朝鲜战争拯救了蒋介石，建立美中关系的任何主张都被搁置起来。华盛顿立即向韩国伸出了援手，并且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尽管杜鲁门政府本打算临时蹚一下浑水，但事实证明进去容易出来难。195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向美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场上的血腥令此后二十年双方难以实现和解。北京为中国的安全感到担忧，而华盛顿则得出结论认为，它在亚洲的所有朋友和盟友在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人面前不堪一击。

打朝鲜战争的艰苦程度出乎美国的意外。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人与无能的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并且看着他们在内战中被迅速击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美国人并没有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果实，而是将其视为国民党的失败。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半岛上横扫千军之时，美国人感到极度震惊。中国共产党军人英勇善战，意志坚定，提升了人们对中国实力和威胁的估计。华盛顿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禁运，北京则驱赶或者监禁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最后的美国入侵者，并且主要与共产主义国家达成外交协议。此外，除了朝鲜半岛冲突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之外，战争的残酷性重新在美国点燃尖锐的种族主义（在对付日本的斗争期间，种族主义十分猖獗）。

朝鲜战争也在美中两国的国内事务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在美国，它激起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令人不齿的运动，攻击哈里·杜鲁门和他的政府在中国和美国政府中培育了共产主义。麦卡锡围捕外交官、军人和学者，罪名是他们曾经准确预言共产党人会取得胜利，从

而让美国人暴露在无法想象的危险之中。在美国，中国共产党人令人们焦虑不安，从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描述了耸人听闻的形象，从而令暴露在共产主义面前的危险清晰明确：你会受到虐待、利用，甚至被洗脑，最终成为被操纵的傀儡、间谍或者刺客。

在1953年朝鲜停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似乎致力于孤立和动摇中国。杜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蒋介石反攻大陆，与台湾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派驻军队。但是，当代的政治、流行文化和历史文字作品描绘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僵硬的中美关系。例如，尽管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将不再通过防止国民党的反攻来充当“中国共产党的盾牌”，但这个政策被错误标注为来“让蒋介石腾出手”，美国当局立即施加限制，以防止他试图“光复大陆”。

联系依然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有可能被视为令人厌恶，但美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无法推翻它——它是蓬勃发展且团结一致的，将会持久下去。犹犹豫豫地使用权宜之计周期性地发生。但是，这样的建议从来没有同时抓住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的想象力的实质。例如，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开始于1954年，协助释放囚犯，保障定期沟通，偶尔化解爆炸性的紧张局势，但在关系方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官员们尝试着可能的举措，特别是在中苏关系集团开始瓦解的时候，例如艾森豪威尔主张承认中国，给予中国联合国席位并与中国开展贸易，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超越国内的政治反对派。

双方之间的联系更经常地来自对抗。在1954年和1962年之间，三场台海危机引发了战争的幽灵。中国的内战仍未完全结束，内战余波中发表的主权声明引发了冲突。台湾控制的离岸岛在大陆的视线范围之内，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派驻那里，意图骚扰和颠覆共产党政权。蒋介石成功地争取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在战火中支撑他的部队，但他不能说服华盛顿支持他“光复大陆”的行动。

越南战争比台海危机对美国来说更关键，越南战争增大了美方对中国提升能力和它的意图的焦虑。华盛顿认识到，中国正向胡志明提供宝贵的支持。北京鼓励利用这场战争来消耗美国的资源和人力。但美国害怕朝鲜战争的血腥冲突再次上演，因而尽量减少越境袭击中国军人。与此同时，北京送去物资和人力来保护其脆弱的前沿，巩固意识形态同胞的力量，破坏美国的遏制，建立其作为对阵美国和苏联的“第三世界”领袖的国际信誉。正当美国的国家团结和国际影响力由于越南战争而遭到破坏的时候，中国朝着更为毁灭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迈进。中苏分裂减缓了北京加强国力的努力，迫使它变得更加自立。但是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当证据开始堆积起来，表明中苏同盟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华盛顿才慢慢接受其真实性。一直到1960年，美国的《国家情报评估》还在断言，在未来五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会公开决裂，美国的陆海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同这一评估。政府和学术界分析师相信，中苏之间的争论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如何最好地应对美国方面产生分歧。

美国人认为，正是中国施压才促成赫鲁晓夫鲁莽地在古巴安置了导弹。他们还怪罪中国军队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虽然这次袭击是新德里挑起的，而且许多人判断中国作出了有限的谨慎回应）。

随着北京研制核武器，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观点似乎更可信和更令人震惊。由于苏中关系受损，莫斯科拒绝给中国这样的原型弹，并且撤出了技术人员。然而，美国人并不了解中苏核合作的细节，他们紧张不安地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就会令中国更有影响力，更具威吓力。正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中国在1964年引爆了核装置，令北京在“第三世界”赢得尊重，特别是赢了海外华人的尊重。华盛顿为将中国的成就最小化而付出的努力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或华盛顿打算对对方使用核武器。

自始至终，在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时，美国还务实地与大陆打交道，这令两岸都感到懊恼。这项政策对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的胃口，他们认为它既符合逻辑，又具现实意义。他们的继任者坚持该政策，尽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认可它，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抗议美国干涉其内政。

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慢慢地走向与中国改善关系。民意也缓和了——在这个十年之初，支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人占53%，反对的占32%。国会听证会警告说，孤立中国是没有成效和危险的。肯尼迪总统曾暗示，他计划向北京伸出手来，但私下里承诺会否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对中国研制核弹忧心忡忡。到了1966年，约翰逊总统公开呼吁“合作而不是敌意”，国会听证会探讨了实行“新政策”的主张——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称之为“遏制而不孤立”。华盛顿不那么担心中国会直接卷入越南战争，他们成功地就限制这场战争与北京交换了信号。

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会实现什么样的突破将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干扰了它。它大大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在国际上形象受损。“文革”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变成反对一切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排外言辞。英国驻北京大使馆遭到冲击；美国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它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一个代表处。

1969—1979年：更宽的视野

在20世纪60年代，美中关系发生了足够的变化，因此到了这个十年结束之时，华盛顿和北京都谋求利用双方反对莫斯科的共同立场，而不是继续制衡对方。通过关系正常化，美中均可以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获益匪浅。中国预计美国会结束对蒋介石的支持，让台湾与大陆

统一。正常化将有利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美日同盟对北京而言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抵御日本未来入侵的保障。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分裂后，美国能够站在中国这边，从而令莫斯科不敢攻击中国。在中国国内，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让毛泽东能够腾出手来，加倍努力防止资本主义卷土重来。

经过多年来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之后，美国领导人再次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自信、繁荣和安全——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试图利用中国，使莫斯科回应华盛顿的优先事项，担心其安全，因而并不太愿意在“第三世界”采取冒险行动。华盛顿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并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尼克松还认为，向中国开放会赢得喝彩，甚至赢得他从前的自由主义者敌人的喝彩，并帮助确保他成功连任。

乒乓外交，基辛格1971年的北京之行，以及1972年“上海公报”的签署，完成了尼克松追求的大部分目标（除了结束越南战争之外）。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承诺将美军撤出台湾，不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不支持“台独”——所有这一切都没向北京施压，要其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但是，在隐瞒这些让步的情况下，尼克松访华创造的兴高采烈席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食品、服装、家具和医药（针灸）热情高涨。中国获准加入联合国。1973年，美中两国建立联络处，以代替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

但是，尽管掀起了中国热，但美中外交关系并没有很快到来。水门丑闻令尼克松和福特不可能与仍在试图保护台湾的反共产主义/保守的共和党人抗衡。在中国，在最初的急躁过后，随着苏联的威胁减弱，中国领导人觉得与美国建交没那么紧迫了。美国反对苏联的政策减弱了，尼克松主义表明美国将减少在亚洲的驻军。

一直到吉米·卡特在1976年当选，并通过《巴拿马运河条约》，华盛顿才偷偷地恢复了对外交关系的推动，对帮助加强中国的力量抱

有信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像基辛格一样，意在针对苏联打“中国牌”，他对这个游戏投以更大的热情，并且终身对莫斯科抱有恶意。布热津斯基不想要简单的外交和解，他想要军事关系。因此，卡特政府向北京出售武器和技术，如果美国无法出售，布热津斯基就愿意找到一个欧洲的供应商。美国政府还向中国提供关于苏联军队的部署和军事设施的情报，并寻求中国的同意，在新疆建立一个监测站，取代在伊朗革命中失去的设施。一个强大的、合作的、反苏的中国将促进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北京也有复杂的动机。首先，邓小平追求自强的新时代，寻找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推行多层面、激进的经济改革。北京需要美国作为市场和技术来源。此外，邓小平希望美国抗衡莫斯科，他需要的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太多了，以至于他不情愿地默许美国（在中断一年后）恢复对台军售，并且当美国国会在1979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时也没有中断中美关系。这一法案令邓小平怒不可遏，而且感到难堪。它提供了机制，以便能够继续美台互动，维持对台湾的防御性武器销售，而且一旦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有可能向台湾提供援助。最后，虽然北京得到了华盛顿重申《上海公报》，承认台湾海峡两岸采取“一个中国”的立场，邓小平却无法让美国明确接受它。

1980—1989年：乐观主义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但这没有消除两国间的所有分歧，不过华盛顿可以祝贺自己拥有一个友好的中国，而它强大到足以给苏联制造麻烦。当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燃起了冷战，这点看上去尤其幸运了。先是吉米·卡特，然后是罗纳德·里根，都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相形之下，中国发现阿富汗事件不那么令人不安，反而更有利。美国的军事集结以及它积极反对莫斯科的态度让北

京放下心来。

中国看到了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的机会。它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又无须害怕华盛顿会破坏中美关系。结果成就了1982年8月17日的公报，北京通过它谋求减少并最终取消美国的对台军售。有关该协议的谈判十分艰苦，特别是由于里根政府中形形色色的职员都对台湾抱有同情态度。里根总统本人曾在竞选期间谈到了恢复外交关系。中国最终在1982年获得了一项联合公报，但美国的对台军售并没有显著下降，因为美国官员使用财政和其他机制来绕过它。此外，里根给了台湾“六项保证”——其中包括华盛顿不设定对台军售截止日期，在对台军售前不与北京磋商，也不会向台湾施压要其与大陆谈判。另外，里根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声称“愿意减少对台湾的军售，但前提绝对是，中国将继续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只有在美中两国携手合作挫败苏联时，一个强大的中国才会对华盛顿具有吸引力。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中国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提升其教育机构，恢复其法律制度和促进文化交流，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但是当中美双方的利益在像波斯湾这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这一蜜月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开始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从而放大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分歧。尽管美国公开称赞和解的前景，但如果北京与莫斯科结盟，那么对美国而言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远远不可取了。戈尔巴乔夫决定终止与中国有时是暴力的，往往是恶性的自相残杀，他于1989年5月前往北京，与邓小平举行峰会，这成为备受瞩目的分水岭事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蜂拥至北京报道这一重大事件。

1989—2001年：混乱无序

随着中苏关系的和解，美中和解的战略理由土崩瓦解，留下了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关系——“战略胶水”，而这能够抗衡双方在文化、政治和安全上的积怨。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冷战随之结束，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加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对强大中国的热情蒸发得无影无踪。

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害怕在新环境中，美中关系可能破裂。他偷偷派出代表到北京。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遇到了出奇平静、自信但态度抵制的邓小平，后者认为，商人们会迫使外国政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不仅不负责任的美国媒体煽动了中国的反革命分子，而且美国国会的错误行动制造了美中关系问题，所以华盛顿将必须要“解开这个结”。但是，美国人被老布什的“磕头”态度激怒了，他们宁愿实施严厉的制裁。因此，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赢得了大选，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谴责现任总统过于溺爱中国。

因此，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常常被华盛顿忽视的人权议程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当然，往年也曾有过失望的爆发。例如，中国对精神污染（1983年）和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的攻击，引发美国人——尤其是国会——谴责中国的行为。在1990年和1994年之间，美国国会试图把经济政策与改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但失败了，而且徒劳地通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中国。中国认为这一切都是虚伪和利己的。事实上，中国大陆迅速与日本和台湾地区恢复了商业联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增长的吸引之下，到了1993年，美欧投资者重返中国。2000年，美国国会就是否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展开争斗，人权问题再度威胁到双方的贸易关系。但邓小平相信私人利益会阻止有效行动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早在1989年就已经预言，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外国企业根本无法抗拒它的诱惑。

在20世纪90年代，其他大大小小的冲突搅乱了中美关系。1993

年，中国“银河号”货轮从中国驶往伊朗，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它运载着一大批用于化学武器的元件。北京拒绝美国的指控。虽然美国军舰如影随形地跟着它，但它在抵达中东时船上并没有化学物质。该事件不仅损害了美国情报的信誉，还使中美关系紧张起来。1996年，有关克林顿竞选连任非法收受捐赠的指控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台湾和亚裔美国人身上。“捐赠门”余波持续到选举后，有人声称克林顿总统利用了非法资金。然后又有了间谍指控，涉及盗窃美国高度机密的核武器设计让中国有效复制了精密的微型弹头W—88。

台湾问题令所有这些纠纷相形见绌。台湾一如既往地成为分歧、沮丧和危险的源泉。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仍缺乏用于攻占这一海岛的军事能力，但是加速的军事现代化使得这一目标成为可能。美国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中展示了尖端的技术，再加上美台关系的变化，这一切刺激了北京的紧迫感。

美国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了积极的非正式关系，但美国人对这一关系的热情下降了。然后在1992年，由于被困在一个针锋相对、即将输掉的总统大选之中，现任总统老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先进战斗机。自从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以来，老布什一直对中国大陆友好。他解释说，对台军售对他获得连任（这些飞机将在选票丰富的得克萨斯州制造）至关重要。

中国重提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的美国政策。当时在上海，克林顿发表了所谓的“三不”原则：“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两个中国’。我们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李登辉也不甘示弱，在1999年7月抛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然而，到那时，美中关系已显著恶化。1999年5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华盛顿坚持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故。中国政府谴

责美国的袭击，拒绝接受美国的解释，中国人涌上街头进行抗议。对许多评论家来说，这似乎只是美国努力使得中国保持弱小和分心的一个新篇章。

2001年及以后：新的全球现实

21世纪的局势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其中包括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在军事上远远强大于中国，但其多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分裂削弱了该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使得世界各地的评论家都在预测美国的衰落。同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方面大大提升，获得了相当大的钦佩和尊重。中国跟1949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时的它面临着贫穷、混乱和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官员也不再经常抱怨“百年屈辱”，要求赔偿遭受的帝国主义剥削了。相反，中国对自己“影响世界的能力”引以为傲。中国问题分析师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观察到，通过信息革命，中国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成倍扩大”。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新的挑战，它付出努力，确保中美友好，或者至少防止敌对关系变得更重要。在小布什执政之初，固有的困难显而易见。小布什在竞选时反对溺爱中国，他称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远离了克林顿所吹捧的战略合作伙伴。像如此之多刚刚走马上任的总统一样，小布什认为他的前辈对当时被视为拥有成问题的价值观和机构的中等大国让步太多。2001年4月，美国一架侦察机闯入中国南海领空，并将中国战斗机撞落，中国飞行员丧生。在小布什对台湾授予庞大军售，并公开宣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之后，美中关系更是急转直下。

甚至在“9·11”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之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力图扭转双边关系受到的损害，这些严峻的事态发展促进了和解。中国

对“反恐战争”提供支持，特别是通过打击洗钱、共享情报、加强港口安全以及在塔利班被击溃后帮助重建阿富汗。美国欢迎中国的行动。但与此同时，中国认识到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国土安全以及小布什打响伊拉克战争给它带来的好处。虽然华盛顿专注于伊斯兰教和中东，但亚洲的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已经离弃了他们，而中国利用经济慷慨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了朋友，从而成功实施了一个地区软实力战略。

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也令人们在想中国将如何使用这一力量。2005年，美国把这些预期在2005年付诸言辞。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向中国发起挑战，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抛弃狭隘的民族成见，遵守国际规范和支持国际机构。其中一些更广泛的关切，如维持和平和经济稳定，很容易就与北京的国际优先事项相符。其他一些则令中国人不悦，并令他们质疑“利益攸关方”概念背后的意义和动机。再一次，根本的不信任感导致一些中国人把华盛顿的劝告解释为一种机制，给中国造成过重负担，并破坏其上升。

在现实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来颠覆对方。不管好坏，双方的经济已经深深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将中美间的亲密拥抱称为“中美国”（Chimerica）。显然，中国的出口和创汇，美国的消费主义和美国的债务相互关联的动能放大了普通的经济摩擦。中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截至2008年，北京的外汇储备中有70%是美元，并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债权方。因此，它对华盛顿拥有巨大的潜在杠杆作用。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毫无疑问，中国会“将其美元储备武器化”。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使用这种力量，因为出售任何美元资产都会降低中国保留的资产的价值。相反，北京敦促美国人少花钱，多储蓄，正确地坚持认为，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要怪罪美国国内的政策和做法。在另一方面，美国人指责中国造成美方损失就业机会，并威胁要征收惩罚

性关税。

但是，尽管有这些问题，积极的贸易和投资还在继续。美国工业仍然争先恐后地利用中国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熟练的技术人员、价格低廉的土地和薄弱的环境法规，它们掏空了美国的工厂和城镇，把转让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中国企业急切地寻求在美国大量投资，由于在像能源这样的敏感部门以及购买某些高科技产品方面受到的限制而恼怒。

从2008年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被压垮之际，北京成功地应对了全球经济衰退，形成了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更自信的行为。在东海和南海，中国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在水底资源、分散的岛屿和包括捕鱼、监视和导航在内的海洋权益方面发生了争执。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连串的局势发展中，海峡两岸局势则成了重大例外。马英九在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保证说他接受“一个中国”，只保留“一个中国”的定义，两岸之间展开了对话，带来了十几项协议。华盛顿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因为它似乎是相互需要和经济上互惠互利的。国际观察家预计，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减少，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其海岸部署导弹，维持军事威胁来阻挠台湾谋求独立的活动，并且获取能力来防止美国的干预。

但是，中国令人们难以判断其意图。北京继续声称，将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方针指导决策。中国境外的分析人士在北京的意图方面产生分歧。中国是继续坚持华盛顿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落实到位的国际体系，还是会寻求重写规则？中国是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不稳定上面，还是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野心？像哈佛大学的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这样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可能“希望变得更富有，更强大，但并没有把（这一希望）转化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努力，以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此相反，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在内的其他人则看到一个好战和野心勃勃的中国，它想要“通过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破坏美国的联盟，并最终把美国逐步赶出亚洲，从而将自身打造成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瑞黎明（Dawn Murphy）在本书的各自篇章里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挑战之下，2012年华盛顿开始重新调整其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优先事项，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所谓的从大西洋世界、中东和恐怖主义的支点转移引发了政治和安全举措，以便安抚朋友和威慑潜在的对手。此外，这就意味着美军的部署更加醒目，包括在澳大利亚派驻军队，并派遣海军在中国周围海域举行演习，尽管美国的国防预算日益萎缩。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谴责。他对记者们说：“中国（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我们不希望他们利用美国。”意料之中的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拒绝了这一美国的支点，并坚持说，美国看到中国对其霸权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美国的战略东移的目的实际上是牵制和遏制中国，抵制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深入参与该地区以制衡中国。他们不寻求新的冷战。事实上，今天即使有可能，他们也不会支持遏制中国的努力。他们不认为华盛顿应该把中国视为敌手，以免它真正成为一个敌手。但他们不希望被横扫进中国的轨道上，或者为了保持自主性而展开新的军备竞赛，也许还包括核能力竞赛。他们希望能够在商业上获利的同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要促成这样的结果，他们指望美国。但是他们想要从华盛顿得到的东西既不是对立，也不是美中共管。华盛顿与北京在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场合进行的对话没有造成困扰；更紧密的合作会造成困扰。从2006年开始，关于用“两国集团”作为解决问题的更有效方式的建议在美国成倍增长，尤其是在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开始倡导这一点的时候。然而，这个想法令其他国家感到惊惶，他们认为美国高估

了中国的能力，即使是在中国人的眼里也是如此。

结论

在美中两国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中，直到21世纪前夕，才有了一个两国可以同时宣称强大、繁荣且具有影响力的时候。双方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依存，中国也很少能够对美国的权力和主导地位构成哪怕是初级的挑战。美国仍然领导着一个中国普遍而言会遵从的国际体系，但它可能会与之渐行渐远。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事后诸葛亮——已成为新时代关注的中心。

面对这些改变的现实，仍然会有一些关键的连续性能够预知未来。华盛顿仍然是灵感和知识的源泉。中国人仍然争先恐后地涌向美国接受教育和培训，虽然回国的人数增大了，但他们也是带着对中国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技能回国的。美国人继续寻求改造中国，但是，由于各自国内的政治因素，双方在共享的目标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消息不灵通或者不怀好意的利益浪漫和妖魔化了对方，夸大了期望，放大了威胁。但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互不信任感挥之不去——阻碍了合作与进步。美国人抱怨中国不透明，中国则坚持认为，美国仍然寻求遏制中国。

北京和华盛顿能否而且会否找到共同点仍不得而知。美国人对中国抱有的流行观点和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流行观点是相互矛盾的。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公司2011年秋季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虽然4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但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扩张对美国而言是坏事，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构成中度或者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人则同样对美国抱有戒心。在2010年和2011年之间，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好感下降了。这看上去似乎是，接连不断的互动和相互依存已经不能有效地减轻紧张和猜疑。

在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方面，美国人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但中国人自己也在努力应对这个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影响。中国还未调整其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愿意接受伴随国际领导地位而来的许多职责。普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和意图是温和的，他们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害怕他们。有关中国具有挑衅性和对抗性的指责被解释为破坏中国的声誉并遏制它的阴谋的一部分。

此外，在未来几年，中国强大起来，美国变弱一些，人们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两点。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认为，“中国要么即将取代，要么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而且，皮尤世界民情项目证实，“这个观点在西欧尤其普遍”。因此在2011年，欧洲求助于中国解决其经济危机，而不是求助于美国。在20世纪，经过二战浩劫之后，华盛顿利用“马歇尔计划”帮助重建欧洲。然而，今天，欧洲人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帮助他们。

中美关系很少可以说是好还是坏，总会有乐观主义者歌颂新的亲密性、更广泛的合作和共同利益，或者悲观主义者警告脆弱性、仇外心理和孤立主义。甚至在中美两国更好地相互理解，更需要对方的时候，根本性的战略和经济差异仍然存在。美国将仍然是亚洲重要的参与者，拒绝有些人提出的建议——“华盛顿读一读长城上的文字，开始减少在亚洲的存在”。无论是中国超过了美国，还是美国维持了其影响力，在今后几年，这两国都将占据主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进程曾多次被中国的弱点和力量塑造，这就是未来以及过去的现实。

第3章

中国的崛起、美国及自由世界秩序的未来

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如果近期的发展势头继续下去，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早会在2020年赶超美国。目前，中国是多数亚洲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机、进行投资。尽管中国的军力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在几个世界大国中，中国军力的发展是最迅速的。美国依旧是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中国则是唯一一个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并对其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不夸张地说，相比其他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更可能决定21世纪的世界政治走向。如果中美两国陷入地缘斗争、军备竞赛或是零和对抗，那么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将岌岌可危。中美若能求同存异，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领域找到更广泛的共同语言，那么亚洲，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前景都将得到增强。

那么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将会呈现何种态势？这一问题涉及两个大国逐步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中国同二战后美国所领导的、带有自由倾向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作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一直游离于美国所领导的这个世界秩序之外。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呢？中国是会选择融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还是会寻求改变？中国的崛起——广义上是亚洲的崛起——预示着一种非西方的、对抗性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抑或仅仅意味着一群新的利益攸关方试图在现有的世界体系内寻求更大的权威和领导权？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全球体系内的实力和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实力重新分布之后，全球政治秩序将何去何从仍未可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会接受现有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特征，还是会寻求新的规则和制度？

显然，很多学者认为前路荆棘丛生。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转移——正如当前中美之间的情形——充满危险。一旦权力转移，西方与亚洲大国兴衰交替，那么稳定的秩序将受到考验。缺乏安全、竞争和冲突——即便在全球权力变动并不激烈的时期，这些因素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话题——将威胁旧有秩序的稳定。美国将感受到崛起的中国带来的威胁，而中国也将更大胆地将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影响力和领导力。除此之外，中美关系将日益呈现对抗性，而世界将变得更加无序和分裂。这些现实主义者的论调会有多大的可能成为现实呢？

本文认可现实主义的这些论断，但将以自由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它关注的重点是通过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外交接触塑造中美关系、加强稳定与合作的方式。本文并不会无视对抗和竞争的现实根源，但是会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那些力量的对抗及压力，通过这样的视角能够清楚地判断国际层面的积极因素，以及能够缓和两国全面敌对和安全竞争的条件。这样的视角同样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共同的弱点、规范制度和

外交来影响和限制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还会关注全球自由秩序是如何为中国崛起以及国家兴衰和规则斗争营造时代背景的。

对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观察家往往关注的是中国本身。中国想要什么？它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将怎样把实力转化成目标？这些都是“由内而外”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反过来问：现有的西方自由国际制度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会在限制和影响中国的选择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存秩序的吸引力是什么，对它的阻碍又有哪些？这些就是“由外而内”的问题了。崛起的国家会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但同样，崛起的国家也会发现现有的国际秩序也在塑造和制约着它们自己。

在探究中国的崛起将如何影响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也在关注现有秩序会如何影响和引导中国的崛起，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我认为，有理由相信，现有秩序能够对中国的崛起施予广泛的制约和影响，也能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相比以往的崛起大国，中国所面对的“旧有秩序”大不相同。相比先前的国际秩序，现有秩序的制度更为牢固，功能更为明确，同时全球化的水平也更高。这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秩序，可能对中国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国可以看到它的吸引力、好处和机遇，这些都会鼓励中国进一步融入现有秩序；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影响广泛、根深蒂固的秩序，要削弱或规避它难度不小，这使中国很难反对这一秩序，或提出一个替代方案。

我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比很多观察者所认为的更为持久。中国和其他崛起中的非西方国家并不会无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式的自由秩序的敌人。实际上，这个秩序所蕴含的很多理念既是西方的，也是全球的。现有秩序的替代方案恐怕并不存在。简言之，在过去美国主导的半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规则、制度和关系网仍将构筑通往未来的道路。美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终结，其权力和权威也会在全球体系中转移。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理念、能力和动机去摧毁现有秩序转而建立新秩序。

在本章中，我提出了五个观点。第一，我提出了一种思考中国崛起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方法。将这样的权力秩序大转移看作“权力转移”是十分有用的。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崛起、赢得战争并建立国际秩序，而后又开始衰落并受到寻求统治地位、重建世界秩序的新崛起国家的挑战。然而，国际秩序的特征纷繁复杂，因而权力转移的逻辑也是如此。在对国际秩序的描述中，区分不同层次是很重要的。而对于现代国际秩序而言，其最深层的基石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由国际秩序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该秩序是开放的，且至少是松散地基于规则之上的。这一秩序本身可以也确实有不同的特征。在该秩序中，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组织也许将渐渐消失，但一些更广泛的组织规则和原则将得以延续。

第二，现有的国际制度是一个规模巨大且十分强大的体系。这与之前的崛起大国所遇到的国际秩序大有区别。现有的秩序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进一步，整合度更高，也更加制度化。同时它扎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中。崛起的中国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和西方，更要面对一个规模巨大、分布广泛且仍在不断扩展和整合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全球体系。这一秩序不仅仅同美国的权力相关，而且植根于现代国家体系以及不断扩展的自由民主和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规模甚大、范围甚广的全球秩序为“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的兴衰等简单的概念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

第三，当下的世界秩序并不仅仅是二战后确立的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它应当被视为两个长期而渐进的“世界秩序建设工程”合力产生的结果。“工程”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历经500年发展和演进的现代国家体系的规则和制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独立和主权至上、不干涉、自主决定等原则。另一个“工程”与“自由的崛起”有关。它是自由民主历经200多年从弱势和边缘地位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其间，这些国家不断努力以建设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长期以来，这两项“工程”合力产生了一个复杂和根深蒂固的体

系。

第四，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进入这个秩序——且将进一步融入。中国支持主权原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参与这一秩序——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令它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其吸引力。开放性使它们能够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并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规则以及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框架使它们在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并与贸易歧视作斗争时，能够得到应有的权利和保护。自由国际主义原则下建立的规则和制度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方便它们获得影响力，并在国内外获得正当性。

第五，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不能持久的。替代方案会是怎样的？谁又会加入其中？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中国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所谓的“北京模式”也许能在特定团体、势力范围和重商主义国家间建立起来。但这样的秩序是不自由的，而且这一秩序的开放程度和规则基础会减弱，国家间的关系将是这一制度中的主导性因素。不过如果这一秩序在全球范围内运行，那么它将不能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北京模式”难以提供世界经济得以照此运行的一整套理念和原则，它是一个需要在自由世界体系之中或围绕该体系才能运作的模式。

总而言之，这些观点说明，中国终将发现它是在现有的秩序内崛起的，而不会在崛起的同时挑战这一秩序。中美之间将为权力和影响力展开竞争，但是它们的竞争会在自由的和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体系所塑造的大环境中进行。大国——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将会继续崛起或衰落，但现有秩序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牢固，任何国家——即使是强国——都不可能操控或颠覆它。这一结构性背景将塑造并制约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美关系的状况。

权力转移与自由国际秩序

全球的权力分布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中国连同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获得财富和权力。物质实力的分布也已经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曾具有所向披靡、史无前例的实力。但时至今日，这一单极的权力分布正在被侵蚀。权力的分布变得更为分散。权力分布的渐变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向多极化的回归”。一些人仅将多极化简单地视为世界权力体系向着非集中化方向的发展过程，另一些人则将多极化视为具有竞争力的“极”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在亚洲，地区性的权力转移也在发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力量、前沿部署的军队、同盟协定和贸易投资关系使美国与东亚国家紧密相连。美国是该地区霸权秩序的中心。美国在此出口安全，进口商品。而中国则多数时候游离于在这一地区性经济和安全秩序之外。现在，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已经出现，这一体系甚至具备了地区均势体系的潜质。这是双重转移。东亚的地理空间已经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美国包含进去。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增长，该地区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增强，霸权色彩则在减退。权力正在发生转移，该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也在变化。

很多关于全球权力转移的论述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时代将要过去了，而权力的转移则会使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变化。随着权力向其他国家转移，围绕美国的权力而构建的“政治架构”正在崩塌。鉴于此，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的全球性对手正在崛起，并在制订改变秩序的计划。美国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实力最强的国家，并凭借这样的实力建立了国际秩序，该秩序反映了美国的意志和利益。如今，随着其他国家实力渐强，它们将寻求机会重建这一秩序的规则和

制度，以反映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在这些论述中，现有的斗争是在崛起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之间展开的。随着美国实力的衰落，中国将对世界秩序的规则和制度提出新的设想。美国牵头打造的自由规则和制度恐将受到中国的挑战。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对各国赖以运行的“政治架构”的斗争。而政治架构实际上反映了领导者的价值观和利益。当权力从一个旧有大国转向一个新兴大国时，国际政治的政治架构也会发生变化。当中国逐渐强大，其重塑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意愿和能力也将大大增强；美国则将抵制这些变化，于是中美之间便会出现冲突和斗争。

这些有关单极体系衰落、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秩序新斗争的争论背后的理论是霸权主义和权力转移。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国际秩序的兴衰提出了经典的现实主义解释。在他看来，全球体系可以被视为历史循环的结果或者是一段段被大国战争分割开来的时代。战争摧毁了旧有秩序——实际上，战争本身已经说明了旧有秩序的失败。成王败寇，权力分布发生转移。新的大国或者国家集团达成和解，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吉尔平说，这些周期性的战争“解决了一个问题：谁来支配体系，以及哪些理念和价值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如1945年那样罕见的时刻，有关谁来指挥、谁将受益这些基本的问题被摆在世界外交的谈判桌上。世界秩序中的制度和规则就这样被敲定了。

这么说来，谈到国际秩序——其兴起、衰落和在特征上的变化——人们都着眼于国际关系的组织逻辑。国家的特点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在该体系的规则和规范中得到界定并扎根其中。国际秩序为很多重要问题提供了既定的答案。国家间的权利和权威是如何分布的？如要促进合作、集体行动、解决冲突、避免战争，那么可遵循的规则和制度又是什么？一般说来，国际秩序是一种功能性的政治秩序——无论它多么原始，多么基于权力，这种秩序都会建立国家赖以互动的规矩。

对秩序的产生和变化的讨论——有关中国的崛起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催生了一些想法。首先，对霸权和权力转移的争论都看重国际秩序——其稳定性和特征——同某个特定大国的关系。这有两层意思：其一，国际秩序的兴衰同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的兴衰相关。一个强国崛起并创建了国际秩序，那么这个秩序的命运就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这个国家衰落了，那么这个秩序也将终结。其二，最终的国际秩序反映的是主导国的利益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和巨变之后出现的强国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原因，它想要建立一个反映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秩序。

第二，国际秩序的性质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是相对开放且基于规则之上的。国家间基于互惠基础上的贸易最能体现它的开放性。规则和制度——多少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作为管理机制而运作。一个理想的自由秩序能够为各国创建一个可参与互惠和制度化多边合作的基础。自由秩序同封闭的、不在规则基础之上的秩序——无论是地缘集团、排外的地区团体，还是封闭的帝国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自由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它或多或少同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规范和制度相关，或多或少是开放的，基于规则的，能被制度化的，也或多或少是全球性的并按等级划分的。

最后，我们可以对国际制度中权力和地位的分布以及秩序中的基本规则和组织原则加以区分。在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下，美国是霸主，它有权利和义务来组织和经营这一秩序。美国也提供了公共“商品”——如开放的市场和安全，而其他国家则与美国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自由国际秩序变成了其领导之下的自由霸权秩序。这一秩序划分了高低贵贱，并听从华盛顿指挥。但是，自由秩序的霸权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它正在迅速消失。这一秩序中的权利与权威正在重新被分配，其他国家则趋之若鹜。但在自由国际秩序内部，争夺领导权和权威的斗争应该同另一场斗争区别开来，即对这一

开放且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深层逻辑和特征所展开的斗争。

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国际秩序的命运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关键在于当下对于国际体系支配权的争夺，其性质是关于权利和权威的斗争，还是一场关于世界秩序的深层原则和规范的斗争。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国际制度的每一个层次都进行细致的观察。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崛起

中美两国不仅视对方为崛起或衰落的大国。两国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背景，它塑造和制约着中国的崛起和受此影响的中美关系。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不仅面对着一个“美国领导的秩序”和一个“西方体系”，还面对着一个更为深远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是数世纪的斗争和改革的产物。这个秩序已经相当成熟，影响广泛，高度整合和制度化，并且来源于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它所具有的特征使其更加完善和持久。它可以同化崛起中的国家，并调和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而蕴藏其中的是一些有望遍及全球并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今天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二战之后美国领导下的产物，而是两项历经多个世纪的“世界秩序建设工程”合力的产物。其中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现代国家体系的创立与扩展。这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其中，各国确立了有关国家主权至上和大国领导的规范和原则。另一项“工程”则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引领下的自由秩序的建设。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在20世纪开始占据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因而这项工程也被推向前台。在许多事件、阶段和历史转折点，尤其是战后的调停和重建时期，都能看到这些有关秩序建设的“工程”。这两项“工程”也在共同运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着力于解决一些现实主义关注的问题，如在无政府状态下创建稳定的、合作性的国家间关系；

而“自由秩序建设工程”只有在大国关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规则和制度使主权国家体系更具凝聚力。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国家主权至上和大国间的关系，其建立的标志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但是其中的规则和制度在此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而该体系的诞生地当然是在西欧。当时的强国、帝国和神权国家在西欧争夺主导权，通过战争及和平协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和制度方才建立起来，并开始逐渐发展。这一系列过程导致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大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规则和规范架构下竞争与合作。在此背景之下，国家的平等与独立，并对其国内的民众和领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

几个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发展为一整套原则和实践，并从欧洲扩展至全球，国家也由此获得政治和法理上的权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反映了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国家是建立合法统治最佳的政治单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发展出的原则和规范——如自决和非歧视等——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组织逻辑，并为体系中的政治权威提供了概念依据。在主权至上和民族自决的大旗下，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反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尽管有人违反或罔顾威斯特伐利亚的规范，但它们仍然是现代最突出、最受认可的规则和原则。

接连几次战后协定——1815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也为大国提供了一些机会，去发展那些能够塑造和更新大国关系运转的原则和实践的。通过战争与协调、学习与适应，各大国在多极的均势体系下运行成为可能。这一秩序的本源仍然是大国间相互竞争和平衡的非集中的国家体系。不过相互竞争和平衡的实践和原则已经逐渐发展，并吸收了限制和调节的战略观念，这也为各大国——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崛起中的还是衰落的——提供了相互理解的机会和处

理它们之间关系的经验。

建设自由秩序的“工程”随之跟进。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体现在英国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和海上自由方面，但它仍是有限的，并不得不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共处。到了20世纪，美国逐步推进自由秩序。一战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为创建以全球性的集体安全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而奔走呼号，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下，各国能够共同行动以维护和平。自由贸易、民族自决以及对世界在改变的观念都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观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大同”的民族国家体系——各国在多边的法律体系内进行贸易和互动，并以此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但是这次创建自由秩序的实验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封闭的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集团。

二战后，罗斯福政府同样致力于建立自由秩序，支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一个能够使大国合作维持和平的世界性组织。战后设计秩序的美国人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借鉴了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 Period）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些更具雄心的有关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想法，这些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得以体现。这些想法实际上带有世界性，但是由于二战后欧洲的衰落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它们逐渐演变成美国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冷战开始后，美国接过组织和经营这一体系的重任，并在经济和安全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实际上成为自由霸权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

建设自由秩序的“工程”扩大了普世人权这一进步观念的影响力，使之被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吸纳。人权革命也在战后构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中生根发芽，此后一系列的公约和条约形成了人们对权利、个人、主权和全球秩序等问题的看法。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国家保护责任”的概念赋予了国际社会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这是从两个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

秩序建设过程中发展出的众多理念、规范、规则及制度中的一个。

威斯特伐利亚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虽然始于西方，但是它们却不是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自由贸易、民主、主权和多边合作现已成为世界性的理念。比如，世界政治应当（至少是松散地）基于法治这一观念已经被绝大部分国家接受。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较量，有的行为体支持并希望扩展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而另一些行为体则希望在势力范围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作性较弱的秩序。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地理意义上，也没有造成亚洲或者西方的分裂。实际上，对于这个松散地基于规则的秩序，在中国不乏支持者，而在美国也不是没有反对者。

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确曾向全球霸主的地位迈进，承担了组织和经营世界体系的责任，并享受着因此而来的特权。美国主导着一个建立在多边制度、结盟、特殊关系和保护国基础上的广泛的国际秩序——一个自由的等级秩序。当这一秩序开始发生变化，秩序中的等级性开始褪去时，而自由的一面仍旧存在。因此，即使中国或者其他崛起大国可能同美国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当下在体系内一场围绕主导国家的权利、特权和责任的斗争正在进行——但更深层次的国际秩序仍然会保持其完整性。即便中国或其他国家有背叛自由的野心，它们也会发现，要颠覆现有秩序并提供一个可靠的替代品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激励和机遇

现有的多层次的自由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大国颇具吸引力，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机遇，同时也激励着它们融入其中，并在体系内运作。这些激励和吸引力包括：会员优惠、发展机遇、制度性保护，以及信用手段。

激励非西方崛起大国加入自由秩序的一大动因在于，作为该秩序的成员所享有的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会员优惠”。自由国际秩序并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简单集合。它是一个具有成型的规则和制度、能够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的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这一秩序可以被视为国际“互助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为成员提供资源和手段以帮助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球性政治社区或俱乐部。其参与者能够获得诸多好处，例如贸易机会、争端解决机制、集体行动的架构、结盟带来的安全保障以及发生危机时的资源和相互援助等。加入该秩序就意味着获得了这些资源、手段和安全保障，而游离于外则会处于劣势。

诚然，中国要完全融入现有秩序面临着一定的难度。中国并不是一个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并不会接纳它——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是中国已经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中国正在采取措施以便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2011年7月，朱民被任命为该组织的副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考虑在董事会中提拔一些来自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官员。中国同样寻求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这样便可以获得在农业补贴、创新政策和科教项目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中国对经合组织的兴趣反映出融入自由秩序的诸多好处：积极参与自由秩序下的多边组织和网络能够增强中国治理经济的能力。

第二，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会有更多直接的发展机遇。这就是在一个开放和松散地基于规则的秩序中运作的好处。开放性使各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并获取他国的知识和政治支持。中国已经深陷这一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尽管中国领导人试图刺激内需，减少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但是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依旧十分关键。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而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开放和稳定世界经济努力了数十年。美国、西欧、日本及其他国家依靠开放贸易取得成功，为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

基础。在中国内部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参与这一自由秩序。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规则和多边合作框架同样意义重大。随着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不断发展，它们可能面临来自国外的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待遇。因此，反歧视、促平等的规则和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现有秩序下最正式、最成熟的机构，一贯奉行这些原则和规范。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争相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为了得到它所能提供的权利和保护。世贸组织的原则——反歧视、互惠、透明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能够有力地保障各国的利益，并保证贸易体系的开放。虽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贸易争端中有胜有负，但这一规则的框架对于中国等新兴国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自由国家希望世贸组织能够成为促使中国开放、更加透明和加强国内法治的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希望世贸组织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制度化规则以减少对中国出口的歧视，同时扩大贸易开放。

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原则同样对它们的崛起十分重要。中国在地区领土争端和反对西方干涉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多次重申了主权原则——包括不干涉、自决、反歧视等。在反对西方的“国家保护责任”时，中国使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其他的规范和理念。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依然进一步融入了现有国际秩序中，而不是避而远之。在这一秩序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系列原则同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正是有了矛盾，才会有抗争。西方民主国家实际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它们的规范和理念也是矛盾的——比如社会公平同自由市场。二者都是具有合法性的规范，日常的政治活动皆与这样的“斗争”相关。

第四，现有自由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对中国和其他崛起国家而言，在展现承诺和公信力方面是有帮助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现行政体有利于其领导人实现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缺乏足够的透明

度和法治的政治秩序会阻碍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其他国家担心中国所作出的承诺有多少公信力——这会导致这些国家之间难以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如果中国希望自己成为全球领导者，那么它就会主动呈现更多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更加开放并加强法制。在这个复杂的秩序之下，中国正在展现其和平的意图，它在暗示，自己并非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对它来说相当有价值的制度，让世界相信它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具备领导能力。

事态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中国试图把自己打造成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大国，那么它就必须进一步向现有的自由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靠拢。有时，中国仅仅是防卫性地利用这些制度来保证主权和独立。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使美国和西方试图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取得联合国支持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有助于中国制造有关“国家保护责任”以及主权和不干涉等原则的国际讨论。一般来说，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国际制度的复杂和密集使中国很难从中脱身，也难以寻找伙伴共同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秩序。

总的来说，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中国家未曾参与战后几十年自由秩序创立时的“大妥协”。但是它们有理由支持旧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它们的利益。它们希望得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主权的保护。它们对主权和大国的权威十分在意，而这些它们所在意的东西恰恰存在于现有秩序中。它们希望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得到保护——这些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规则和规范。它们还希望将这种自由国际主义的规则和制度作为塑造自身影响力、获得国内外正当性的平台。

制约和障碍

如果中国试图用它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实力去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并以完全不同的规则和制度取而代之，那么它将面临巨大的制约和障碍。实际上，这种努力是不现实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现存的秩序已经根深蒂固。这是一个混合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自由的规则和制度的多层体系，也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秩序。它不是一个简单地同美国权力挂钩的政治架构。阻碍和限制中国推翻并重塑国际秩序的因素是多重的：中国“模式”难以作为一种全球体系持续下去；中国实行修正主义会导致“自我包围”；在现有的环境下，推翻旧制度的大机制——大国战争——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很多观察家常常谈及中国模式，最近的经济危机和经济低迷已经打击了西方经济体，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受住了考验。正如中国学者王缉思所说，“在中国精英，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当中，广泛存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它有别于西方的民主和经验。与此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之后，却经历了动乱”。中国模式，或者说北京共识的特征，是构建全方位强大的政治领导，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这与那些出现“颜色革命”进而导致国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权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作为全球性体系，这一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个不用于现有世界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谁又会加入其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不同的秩序——“北京模式”——可以想见是建立在封闭的集团、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及重商主义网络的基础上的。这可能是个不自由的秩序。它不那么开放，不那么基于规则，国家间的关系是这个秩序中的主导因素。但在全球层面上，这样的体系难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北京模式能运行下去的前提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能够侥幸利用开放的市场体系。一旦上升到全球层面，它就会瓦解。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利用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是当每个国家都这么做时，那么这再也不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了，每个国家都会因此受损。

中国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重建世界规则和制度的非自由的霸权国家。它只会游荡于自由国际秩序内外，投机取巧地寻求同资源出口国的交易。这样，中国和它的发展模式才能成功抵制使之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但是如果这种模式并不能吸引其他国家，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要求它开放，并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事。这一论断已现端倪——2011年2月巴西总统罗塞夫（Rousseff）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一道表达了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担忧。中国可以搭自由国际秩序的便车，但它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它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世界。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现有政权的正当性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就业来实现的，而非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支持中国崛起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坦承，“中国在迈出允许人民选择执政者这一大步之前，不可能实现成为发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没有人知道中国离民主改革还有多远，但是来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商业精英和人权团体的压力会一直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尽管老牌和新兴民主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民主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虽然民主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践，甚至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在国际舆论的大背景下，民主政府大体上被视为是恰当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都将民主视为恰当而公平的统治模式——这是其他政治理念无可比拟的。

第二，中国还将面临另一项制约，那就是“自我包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不得不重申它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行动了。在许多政治和军事领域，中国已开始参与地区论坛和制度，以便向邻国相信它抱持的是和平的意图。

中国已经意识到，它的崛起已经使邻国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引发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强烈的制衡和“自我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表现得约束和节制。它会通过参与现有的地

区性和全球性体系来释放这样的信号。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和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所说，“中国的领导层希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一个和平、没有威胁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接受联合国宪章和2005年世界领导人峰会的成果文件等行为都说明，对国际形象的关注是促使中国遵守诸多国际秩序规范的重要原因”。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大国克制和调节的原则和实践对崛起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意义。如果中国希望使邻国确信，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崛起，那么它必须进一步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中。

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现有制度——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以及东亚峰会（EAS）——的参与度，或者与其他地区大国一道建立新制度。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所做的——建立多层次的地区和全球性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并在其中运作，让自己显得更加可预测、更具亲和力，从而防止其他国家结盟对抗或削弱美国。

最后，在当前环境下，中国会发现推翻旧有秩序的经典机制——大国战争——并不存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对1945年之后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在于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旧秩序。二战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同时，当其他国家在二战后衰落时，美国却走向强大。战后的重要“契机”给了主导国家不同寻常且转瞬即逝的机会去重建全球规则和制度。但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契机”——因此中国利用不断增强的实力去重建全球秩序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大国战争的缺失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核威慑以及自由民主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核武器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力使大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它们不会遭到其他大国的支配和入侵，也使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不理性，因此也就更不大可能发生。核武器是把双刃剑，哪怕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力也会受到它的限制。美国或许可以被视为单极大国，但它也不可能发动对其他大国的侵略战争。从这个意

义上说，过去的军事强国也许在物质力量和军费方面不及美国，但它们却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战争的威胁在当时是切实存在的。核威慑的出现消除了战争的可能，也使美国这样的单极霸权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小了许多。大国战争不再可能成为推翻现有秩序的工具，如此一来，现状得到了巩固。美国成为核时代的霸主是十分幸运的，因为这会让妄图推翻美国领导下的秩序的强国处于劣势。潜在强敌经过利弊权衡会倾向于在体系内寻求改变。同样，大国的核威慑同样也会对美国的实力投射形成限制，这有望使现有秩序变得更加包容。核威慑消除了体系内的大国间战争、侵略和征服这些行为，而这类行为在历史上往往成为试图推翻秩序的诱因。

结论

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章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所领导的战后自由秩序之间的关系，这是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势最关键的因素。美国和中国会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展开斗争和竞争，但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决定两国全面关系的是中国将加入现代世界秩序中的规则和制度中，还是会加以反对。中国会融入这一套复杂的规则和制度，并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吗？还是会建立不同的规则和关系，打造一套修正主义视角的全球秩序？

我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崛起中国家正在寻找参与、融入这个秩序的动力和机会，以此来推动和保护自身利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主权的规范会成为中国和其他崛起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贸易和发展离不开一个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为非西方崛起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制度的平台，以便于它们获得影响力并构筑自己的权威。崛起中国家的未来之路必将经历几十年来，甚至是几个世纪以来

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

在关于中国的崛起会对中美关系和现有自由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实力。但很少有人关注自由秩序自身的复杂逻辑和特征。这一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秩序”，它是凭借美国的权力建立起来的，并仍将受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一秩序有其“半独立”的基础和逻辑。它比以往的制度更加广泛、更加制度化，作用也更大。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和西方，更要面对已经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身。

现实主义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看法相当引人注目。美国不但希望保护自由的国际制度，还希望维护它在其中的地位。中国崛起后便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同时也会在东亚和其他地区——如南美、非洲以及中东——寻求扩展影响。一旦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强国，那么一场中美之间的激烈斗争就会出现。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中美冲突有两大动因。其一，随着中国的强大，它会希望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一个更强势的角色，也希望以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方式重建规则和制度。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所作所为。其二，面对中国的进步和挤压，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会越来越不安，因此，美国会增加其在亚洲的力量投射、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随之而来的便会是地缘政治冲突。

毫无疑问，正如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会引发紧张和冲突。但是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忽略了现代国际政治的其他特征。中国和美国不仅是潜在的对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很高，也都依赖于开放而稳定的世界秩序。对那些希望成为唯一的世界领袖的国家来说，它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零和游戏。彼之所得便是己之所失。二者皆不能称王。但是，对那些需要一个合适的国际环境——包括规则、制度、伙伴和合法权威——来发展和保护其利益的大国而言，它们不会陷入零和游戏中，而是可以实现双赢。自由主义的观点要求人们全面看待问题。既存在由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和竞争

结构导致的冲突和猜忌，也存在着因相互依赖和共同弱点而产生的稳定与合作。中美关系取决于这两个大国如何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寻找航向。

第4章
现实世界中的中美关系

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直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技术现代化使中国国力急速扩张，中国如果这样持续发展下去，最终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这种超越尤其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统计数字上。因为这种权力的蚕食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国际政治范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衡量一国国力最简单和最容易识别的方法。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旧时代的回归。

中国也许正在取得上述成就，这进一步使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成为可能。所谓“权力转移”，即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逐渐被新兴的中国代替。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是围绕着现有霸主的利益和价值形成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现存的大国将不断遭受相对力量上升的、不满足现状者的挑战，于是构成了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并不盲目坚持这种理论，但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关键的现实主义视角，那就是，在国际政治中重大的权力转移时期，紧张局势和安全竞赛难以避免，因为现有

的国际体系领导者和新兴力量都在努力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

本章试图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中关系的结构特征。在本文中，政治现实主义是指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即政治是基于对安全不断渴求，围绕权力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斗争。虽然国际政治学范畴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包括诸多范式、方法和公式，但是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

> 即政治行为体如何在普遍存在利己主义和永远存在的被伤害的可能性的环境中寻求保护自己。利己主义的存在意味着所有实体只重视自己；诸多利己主义行为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局面是，每个行为体都试图限制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自由和野心；而竞争则使每个行为体不断地与其他行为体发生冲突，以保护自身权力、提高自身安全。因此，现实主义认为政治主要就是冲突中的相互作用。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在拉卡托斯的术语中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个“研究项目”，而不是一个单一理论。其形而上学的核心集中在“无序的人性观”这一概念，其“正面启发”包含各种公式或理论，假定在混乱中创建出来的秩序在社会、政治和国家关系中如何表现。

因此，最早的现实主义流派，或者被称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流派在理论分析的单位方面是折中主义的：不仅仅只关注个人，还关注社会的整体，如王国、共和国，或更大的国家系统，这取决于利益分析的直接对象。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现实主义出现了两个派别：以修昔底德、考底利耶、马基雅维利、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有资格被分为这一派）和摩根索等为代表的世俗派，和以奥古斯丁和后来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宗教派。

然而虽然这些人构成了不同的现实主义派别，但是他们都相信，

人类的无序创造了社会的冲突，只有规定各级政治活动的秩序的政治统治才能对此加以解决。

现实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结合颠覆了现实主义传统。在系统论逐渐式微后，主流现实主义者将结构主义纳入理论系统，试图模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宏观历史分析以揭示现代历史的周期性趋势。但是这两个学派在关注国家间关系之余，却舍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人类社会对秩序的创造。因此，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在权力平衡中无政府主义和两极化的相互作用。而宏观历史学派，以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和奥甘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将霸权视为竞争激烈的国际政治中自然平衡的结果。

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所有现实主义者享有以下共识，即在政治行为的竞争性环境下，实力是利己的行为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决定手段。现实主义理论不同流派的分歧首先在于行为体的动机问题：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自私自利的举动是基于人类对安全、权力或荣誉感不断追逐的本质，而结构现实主义者则将这种行为视作国际体系结构的产物。传统现实主义者无须与结构现实主义者在此方面一致，后者对社会科学的偏狭研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作出最狭隘的假设——国家行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保护。

在追求安全方面，针对国家如何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生存这一问题，现实主义内部产生了第二点分歧。如果在以情境逻辑来模拟基于最少假设的、任意国际政治层面上的自然竞争，就有可能证明，追求统治的驱动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竞争的自然结果。这一结果产生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宏观历史学派的一致性，也暗示了，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安全变为了一场零和游戏，而所有的理性国家行为体都试图追寻权力最大化。

另一方面，对立的观点认为，权力最大化并不等同于安全最大

化，因此国家行为体的意图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是当前的权力所有者，该国家寻求颠覆国际体系，以及为解除安全困境将其意图示意给其他国家的能力，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这种观点在逻辑上的可靠性，依赖于为缓解自然冲突而引入的其他变量，比如攻守平衡、区域地缘政治等。随之而来产生了与现实主义传统相比较，更肤浅和更乐观的偏狭结论。

无论主流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如何不一致，他们都会同意，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将遵循自然、竞争的进程，他们的分歧歧只在于这一进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放缓或改道。日益增强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争论在于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本章的分析中所引用的“安全竞争”一词的定义主要来自传统现实主义，尤其是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定义，同时采用理性主义的逻辑，将竞争与对抗视为行为体寻求安全和政治独立最大化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这种意图的唯一结果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不断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争取统治权力，因为安全就像权力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总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在托马斯霍布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准确的分析。由此，本章对于中美关系的评估将坚持认为，中国实力的不断扩张将加剧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为美国带来复杂的挑战。因为中美政府的互动行为将自然产生一种对抗和竞争，而这种对抗与竞争则会带来国际体系的紧张，并以不同的方式考验着每一个体系内领导者（以及它们的同盟和中立者）。

中国独特的崛起及其对竞争的影响

与其他现代时期大国的崛起相比，中国的崛起非常独特。15世纪后，主导西方历史的大部分国家通过在本国外的军事扩张和本土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实现国力的增强。这些变化通常伴随着人口

的显著增长、推动全球经济中新主导产业产生的技术创新以及政府能力的提升和政府—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政府不断向社会渗透，并且以国家目的为名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革命性的发展充满了“战争制造”和“国家制造”的辩证，因为残忍的国际政治要么推动国内创新、深化国家权力，要么就是国际政治自身的变化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种实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为冲突和领土扩张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虽然是整个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与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二战后美国霸权主义带来的好处。因此，中国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战争来推动经济扩张。而中国的飞速发展，无疑需要一个成功有效的“国家制造”方法。身处在由美国维持的更大的自由经济体系之中，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像以前那些崛起的大国一样走自给自足的道路，而是可以利用国际贸易体系的相互依存性。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美国为保持它的开放性而投资慎重。

美国在二战后为创造自由市场体系所作的努力是基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动，与中国无关。诞生于本国国内经验的自由主义信念认为开放的贸易体系通过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为促进全球繁荣和世界和平提供了最好的策略。

而现实主义者的算盘，在来自苏联的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也归于一点，那就是，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即使一开始是不对称的——因为为了支持朋友和盟国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更好的经济基础，美国不仅提供了经济援助，还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这种投资使西欧复苏，同时还创造出亚洲第一波的成功，如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较小的东南亚国家的早期复苏。

虽然这些盟友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是却有助于推动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宏伟战略目标——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年中，美国对吸纳中国融入这个遏制系统采取了试探性的步骤。这方面的努力是由需求激发出来的——两国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它们感到莫斯科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都展现出挑衅的姿态，它们需要遏制这种态势的发展。那时冷战是否会以西方取得绝对胜利的结果和平结束尚不清晰。

随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这使得对外贸易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冷战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美国开始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支持北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诉求以加强双方的关系。其物质能力的恐惧重重地压在美国决策者的心头。对传统现实主义者来说，第一个问题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相信，国内政治影响外交政策。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各行各业的现实主义者最容易理解的。然而，为避免在是否应该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身份这一问题上年复一年地激烈辩论，克林顿政府最终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从而为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有侧重的政策选择帮助了中国的国力增长。这一赌注非常成功，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惊人增长已经使数百万中国人脱离贫困，为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为美国巨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创造了稳定的金融来源，并且在亚洲大陆，聚集了一大批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制造、贸易和金融网络。

相应地，亚洲经济奇迹又迎来了第二春，但是这次与亚洲第一次经济腾飞有一个显著不同。在第一次亚洲经济腾飞的时候，遏制苏联扩张的政治需求恰好与加强盟国和中立国家经济联系的渴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牺牲美国的部分经济利益。但是中国的崛起好像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北京的持续繁荣有赖于它对国际经济的参与，而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另一方面，中

国频频卷入与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一些其他邻国一样）的摩擦之中，而且对美国这个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越来越构成军事威胁。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是由下面这一尴尬的现实所带来的：美国支撑的国际经济体系在为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现象在现代史上非常奇特：虽然在一战前也曾经有一些类似的现象，当时英国和德国发现双方虽然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竞争关系，但是经济往来却把它们捆绑在了一起，但是现在，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今时代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在另外一个场合很巧妙地将上述现实形容为“全球共依存”。这个词将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刻画了出来。最关键的是，它并没有消除深层地缘政治对抗或者是紧张的军事竞赛的可能性。一战的经验和当代政治显示，虽然国家之间有经贸往来，但是一国一定会，而且将会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因为安全方面的竞争意味着国家和政权的存在，从这方面来讲，经济往来与其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会因为经济上依赖中国而放弃追求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样，当如防止台湾独立等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处在危急关头的时候，不管将会如何影响与美国的贸易，北京也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因此，可以预见，不管在经济上如何互相依存，即使在枪口威逼之下中美双方都会追求自己的核心战略利益。如果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下去，双方无疑将会小心避免因一时冲动带来任何商业破裂，但如果对方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挑战，任何一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关系放到一边。

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中美安全竞争

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美关系将继续展现出固有的矛盾，即北京的崛起是基于华盛顿资助的国际秩序之上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最终成功目前尚不能确定。事实上，中国很可能将无法维持其史无前例的高增长率，有以下几个原因。

新古典经济理论表明，增长最终来自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革新。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发展奇迹部分是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50%的高国民储蓄率所驱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发展速度很可能被社会老龄化、脆弱的国家社保体系、危险的金融系统以及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牵制。所有这些因素联合起来就可能抵消过去几十年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本积累速度。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威胁到其劳动力增长的能力，因为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正好和抚养比率（包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在内的非适龄劳动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在同一时间增长一倍。

而中国在有限的领域——显而易见，尤其是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创造新的主导产业中拔得头筹，而创造新的主导产业才是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最重要的原动力。

把这些因素考虑在一起，那么，即使中国将继续在相对一个时间段内持续发展，但是这种不正常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能长期维持，最终完成真正的大国权力转移，超越美国。

因此，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因为中国崛起是否能够持久而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即使由美国承销的开放的经济秩序能够毫发无损地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可能也不会发展出它寻求的“综合国力”——这是任何大国都必须具备的。即使中国能够成功地稳步扩大国民生产总

值（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人均收入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几十年。因此，从严格的权力转换的角度来看，北京甚至不能被视为一个名义上的挑战者。因为在很多权力转换理论家的眼中，人均收入是衡量的标准，而且这种观点是合情合理的。

即使把这种狭隘的概念问题放在一边，仍然有很多理由相信，虽然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将持续增长，但是在国力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中国仍和美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未来某个时刻超过美国，也几乎可以肯定，它仍然缺乏美国国力的标志——无所不包：经济实力是以普遍实施的国家福利来衡量的；军事能力使美国可以在离本国国界很远的地方仍然具备持续使用武力的能力；拥有基于相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强大盟友网络，由此具有地缘政治优势；国际上对其文化和社会的崇拜而带来的心理影响；最后，在全球体制中的机构能力使其政治影响力得以保持和提高。

然而，中国虽然在国际体系中离威胁真正的权力转移还很远，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之前中美关系就是和谐无比的。相反，它们转向敌对并不是因为权力“一定”会转移，而是因为权力“可能”会转移。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指出并详细说明的，自然状态的竞争不一定是因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的险恶用心，而是因为他们意图的不确定性使得只能通过权力的获得才能减轻对抗。在霍布斯澄清这条社会竞争的微逻辑之前，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分别展示了，如果必要，所有的政治实体，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在竞争性的政治环境中都会持续、无情地寻求统治地位，如果没有任何惩罚，仅仅因为环境允许，它们就会尽自己所能寻求权力扩张。

具体到中美关系，这个竞争的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利益至少有时是相交的，如果不是直接相悖的话。尽管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加，但是崛起的中国力量也日益带来抗衡压力，美国

要维护其霸权地位。中国，最起码，旨在维护其领土完整和全面提升国力。虽然这些日益增长的物质能力会走向何方尚未明确，但其破坏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可能性恰恰造成了修昔底德所预期的——“霸权的较量”即将到来。

即使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可以避免真正的权力转移，中美两国也会在下面三大领域遭遇日益激烈的竞争：经济关系、军事行动和地区地缘政治。

经济关系

不可否认，美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了良多的经济利益。大多数决策者都清楚地了解，在过去二十年间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与不断扩大的中国经济紧密相连。201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457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进口货物的最大供应商。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不可否认。即便是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也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商品提升了竞争力，无论是在本地消费或转出口。此外，在最近几年，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为美国巨额的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

尽管有这些好处，但是在美国，有一种恐惧在不断增长，那就是：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在削弱美国的利益，造成产业空洞化和本土失业率增高；与此同时，在高科技方面中国也日益成为竞争对手。关于产业空洞化和失业率的争论非常复杂，但在其最简单的版本以如下形式出现：中国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产品，然后自由地出口到美国，其结果就是破坏传统制造业，随之带来不可逆转的就业机会损失。虽然廉价的中国产品可能有利于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公民，但是进口会损害他们作为雇员的利益。如果美国公司希望有效地与这些低成本的中

国产品竞争，他们或者可以将其制造业务搬到中国以享受便宜的劳动力，而这将造成美国国内失业率攀升；或者可以降低本国劳动力的工资，这样就能保住他们的工作，但是会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

无论哪种方式，简单的产业空洞化文章都辩称，扩大的美中贸易使美国从中国进口额上升，削弱了美国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一旦缺乏就业机会，就不能享受廉价的中国产品带来的好处。这种说法迅速变得复杂起来——制造业萎缩、薪酬萎靡已经困扰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强有力的出口得益于各种不公平贸易，如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国内保护主义和各领域的倾销。

毫无疑问，多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稳步下降，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否都可以归结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因为对贸易依存度的增加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似乎是美国在该领域成果丰硕的增长所致，而作为就业机会提供大户的制造业本身的长期衰退是同科技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关的。

虽然最后这个事实确实意味着，至少有一些美国制造业的损失可能与中国的内部变革和不断提高的出口效益有关，但总体而言，这些损失一般应该可以被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抵消，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美国经济是增长的。

但是有证据显示，美国持续增长的进口即使不会引起国内失业率增高，其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纺织品、服装、皮革及相关产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电气设备和电器等领域在制造和就业方面蒙受损失，后果比较严重，因为它们会影响一些关键的选区，这在美国政治中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学术经济学家能够具有说服力地证明，这些部门的损失（在任何动态贸易体系中都可能会

发生）并不能归因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而且就整体而言，它们总是能够从国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和优厚的福利中获得补偿。但是这些结论并不能够化解这一政治体内居民的焦虑，也不能完全抑制美国领导人通过对中国采取政治行动以减轻经济损失的举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很容易理解这一行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国内的权力斗争与在外部寻求安全两者紧密相连。不出意外的话，在美中关系中经济优势的问题仍然会一直富有争议，而且这一争议将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而愈演愈烈。

虽然从贸易中产生的非工业化问题会被变化的相对优势所带来的痛苦抵消，但是，各行各业的现实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美国主导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可能会使中国成为先进的技术竞争者，这是一大威胁，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这种上升可以通过以下很多种途径实现：从美国、北美、欧洲、日本高科技进口贸易的增加；美国（或西方）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华设立研发和制造中心，或者将西方、美国先进的研发、制造中心移到中国；中国购买或投资美国（或西方）的高科技公司；作为对中国投标商业反馈的一部分，美国（或西方）将高科技转移给中国；中国合法购买到高科技产品后，为了研究其构造、功能和运作方式，拿出一小部分并将其解构。在开放的贸易体系中限制中国获得高科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但却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这是名义上的权力转移和成为现实的权力转移的根本区别。

近年来，对目前的贸易体系如何支持中国进行技术转移这一问题的担心与日俱增，因为上述渠道中显现出来的小支流已经汇集成了河流。例如，2010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定义，是指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电子、软件、信息和通信、生命科学、核技术、光电子以及武器）占美国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不算上香港的话，美国是中国大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客源。美国和跨国私营公司都在推动中国非凡的技术迅

速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大多数全球500强公司都在中国有投资，其中包括以领先创新先进技术闻名的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索尼、波音、松下、西门子、东芝、英特尔、柯达、惠普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

根据中国国家法规，大多数上述公司至少将它们业务的一部分与中国的合伙人或大学建立合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或大学往往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或负责的。

在今后的几年里，即使中国希望寻求特定的先进技术，即使美国还在致力于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但是其对技术转移的控制将会成为两国竞争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考虑某一特定贸易争议带来的好处或者整个贸易扩大带来的利益，中国对制造业主导权的日益增加也会继续使美国的神经紧张，因为它会由此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

美国国内用一致的内部平衡把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和其他竞争中与经济有关的部分放在首位。这将包括：更好地管理国家支出，投资新科技革命，如3D制造业。如果这些方法取得成效，近期权力转移的危险就解除了。但是如果这些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能获得什么好处的争论只会愈演愈烈，勾起另外一件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开放的贸易体系真的能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服务吗？

军事行动

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挑战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现在，在军事领域又渐渐产生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已经影响到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朋友和合作伙

伴；他们完成现代化后，将会破坏亚太战略稳定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当美国的盟友受到外部威胁时，美国有能力畅通无阻地协助他们。

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系统往往被称为“轴辐模式”，但其潜在的战略概念被乔纳森波拉克更好地捕捉到了，他将其比喻为“执牛耳”。这个比喻说明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能够对另一国家造成严重战略危害的武器，而唯一拥有这样能力的外部实体，即美国，缺乏滥用它们的动机，因为它要将自己的力量为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执牛耳”的策略从而利用了美国距离东亚遥远的事实：它将美国置身于一个没有威胁的角色，它依靠前沿部署力量成为外部保护者，由此降低了该区域国家获得任何军事能力的动机，而这使它的保护任务要么更具有强制性，要么更困难。

美国军队在亚洲沿海地区周围活动或者是致力于这一地区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因为，一方面他们要防止任何其他国家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区，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创建了该地区的秩序，避免该地区内的国家为了安全问题单方面轻率地消耗资源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队的超级战斗能力的存在实际上是为所有该地区的国家提个醒：任何想在该地区当霸主的企图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最终是徒劳的。如果有哪个国家胆敢挑战这一信息，美国前沿部署力量就会立刻成为支持其该地区盟友防卫的工具，如果需要的话，还将会成为实施更大规模遏制战略的工具。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为亚洲经济奇迹般地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亚洲各国得以不搞军备竞赛，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却成功地“执”亚洲之“牛耳”：它阻止了具有威胁性的地区霸权的崛起，避免本地区危险的、可以带来潜在战略后果的军备竞赛，为经济可持续合作创造了积极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前沿部署力量和美国军队前沿运作在保护其亚洲盟友和亚洲沿海重要中立国任务中从根本

上未受到挑战。

但是，中国最新精心部署的“反接近和区域封锁”能力将会从根本上威胁到美国的主要海上机构和与它们相关的陆地基地，实际上会阻止美国在亚洲履行安全义务。这种失败不仅会损害美国赖以阻止本地区军备竞赛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威慑力，还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带来更大的恶果，如该地区进一步核扩散，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还将会对美国的全球利益造成损害。

中国发展“反接近和区域封锁”能力最初的原因是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防止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有效干涉。这个目标是北京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台湾分裂国家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更高的要求——在更长的边境线上遏制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国军方希望在黄海、东海、南海及其他近海地区，解放军称为“第一岛链”的区域具有绝对控制权，并把触角延伸到“第二岛链”（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海域，从千岛群岛、北海道、马里亚纳群岛、帕劳群岛一直到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中国军方的这些抱负还包括中国“积极的近海防御”政策，即通过实施中国规划者称为的“非线性”、“不接触”、“不对称”等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在这里形成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因为中国有能力使美国的军队力量处在危险之中。

鉴于这种利益关系，在自身力量崛起的情况下，中国产生了控制从边境向外辐射的合适范围的欲望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中国已经投身建设一个强大的以陆地为基地的“侦察打击大本营”。这种能力植根于一个广泛的情报监视侦察（ISR）系统，包括在陆地和太空使用多个现象学的传感器以检测、定位、跟踪在远离中国境内的地方工作的美国移动军事系统，以及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固定基地的活动。

这些信息和中国海军、空军收集到的其他情报一起，通过国家指挥与控制网络传送到中国的进攻部队。而后，各级指挥梯队命令中国

最有力的武器，包括反舰弹道导弹，以及更普通的、数目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大规模袭击整个战场中美国的水面舰队及其配套基地。这些攻势很有可能会辅以对美国更大的空间、情报和计算机网络“动态的”和“非动态”的袭击。

最后的这类军事行动，虽然首先由地区性突发事件引发，但是因为美国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C4ISR）系统的高度综合性，必将带来全球性影响。即使可以避免中国这样的攻击带来的全球后果，美国的规划者也越来越达成共识：即使像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有限的、传统的冲突，美国的前沿部署和运行水面力量，尤其是航母战斗群，也将处在严重的危险中。

随着中国的“侦察打击大本营”扩大到西太平洋以外的其他地方（如印度洋），传统上美国享有自由行动的战场不断减少，从而使美国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削弱。因此，北京军事能力的扩充不但威胁到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提供延伸威慑担保服务的能力，还威胁到中国和其主要竞争对手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等之间现有的军事平衡。

这些战略趋势的不断延续预示着亚洲未来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将会遭到美国坚决的抵抗。美国致力于主导攻守平衡地位的斗争已经开始，并表现在三个不同但互补的方向：第一，通过在战术和操作层次寻找旨在使各种中国武器系统失效的技术解决方案；第二，通过修改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从早期强调纯粹的僵局或美国盟国原位防御转移到对中国的关键点进行攻击；第三，通过更系统地组合各种选择，以对抗中国通过进攻和防守手段构成的更大的核威慑和其他配套能力。

这些行动反过来将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军事反应，而中国的这些军事反应又将激起美国更多的进取心。如此周而复始，将导致在亚洲争夺战略主导权的斗争永无休止。因此，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即使由此

带来的权力过渡并非迫在眉睫，为保证在重要的亚洲战场上行动自由，美国和中国也将在技术和军事方面持续竞争，虽然两国竞争的原因不尽相同。

区域地缘政治

最后，对军事优势的竞争是对同样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争夺的应有之义。这场竞赛源自两个相互作用：首先，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增长的不安。中国力量如果能够持续不断增长的话，最终可能导致全方面、广泛地挑战美国的霸权，先是在亚洲，随后（或同时）扩展到全球范围；第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恐惧，特别是在与中国竞争的国家，中国实力的扩大预示着将会给它们的安全和政治自主性带来威胁。这些危险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现存的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同时也因为其他国家的天然恐惧，它们害怕崛起的中国最终将寻求建立一个现代版的“朝贡”系统，而这自然将会限制它们的自由。因此，中国邻国的战略关切与美国完美结合在一起，虽然所有有关各方都希望继续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持续获益，但是它们在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可以有效制衡中国日益增长实力的解决方案。

这个挑战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并不明显。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关系，以及美国通过“执牛耳”战略建立起的强大安全保护伞，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在亚洲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在苏联霸权的鼎盛期，与其在欧洲的能力相比，莫斯科在亚洲的高压触角也更为有限，沿海地区对苏联政治统治的威胁的恐惧也更弱。因为，莫斯科没有控制外围亚洲的历史，也没有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对这些地方取得持续控制的海上能力。中国未来的崛起在这方面是不同的。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宗主权历史，它的邻居对此记得很清楚，这也决定了它们现在在有利条件下会采取抵抗的态度。中国还与本区域的

重要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时常产生政治纠纷。由于地理和科技的原因，中国能够比苏联更好地抵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

而中国的日益强大、新兴的军事能力以及其关键的区位优势，这些结合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和本地区的不安。这场竞争关系重大，亚洲自身的命运也因此处在危机关头。这是因为，这是亚洲大陆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体系中一定会成为最大的单一经济地区。到2025年，全球43%的商品和服务将在这里产生，这里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政治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而欧洲则会变成最后一名。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正面临着与上个时代完全相同的任务：防止任何本地区的国家统治大陆的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积累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亚洲的资源，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重要的中立国家，甚至美国自身的安全。未来中国可能会以贸易关系为基石，在亚洲建立起一个以中国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为中心的网络。使印度洋—太平洋周边地区一体化。美国的利益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因为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可以使它在未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假设现在还没有开始这么做的话。美国自本世纪初已经尝试新的措施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这么做并不是认为中国就像曾经的苏联那样是一个恶意的国家。相反，美国的此类行为因为不确定性这一可怕的诅咒而获得了生命力——霍布斯称之为“无自信”或“先发制人”，这使得任何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无法准确了解它的竞争对手未来会如何作为。因此，有人担心，快速发展的中国可能在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演变成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竞争对手。而且还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将来可能通过高压外交或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或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大的、与国家规模和国力相称的特权。美国需要采取“与中国竞争”政策的信念因中国政策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而加深。北京军事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最终引发了具有决定权的掌能者支持对中国的崛起采取有计划的反应，因为中国新的武器装备加重了美国的安全困境，这意味着美国将不能再维持冷战早期“观察等待”的政策。

小布什政府认识到，中国的重新崛起如果不朝增强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前进，则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它开始制定和实施新的战略，以适应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性带来的利益，同时对冲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小布什政府很清楚，曾长期主导美国与苏联竞争关系的旧的遏制战略，在新兴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再适用。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方面美国与其他亚洲伙伴之间经济联系紧密，另一方面，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鉴于这一现实，小布什政府决定继续实施深化与中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战略，甚至故意扶持中国周边的国家，它们日益增长的能力将会成为北京使用权力的客观限制。基于这一政策，美国复苏了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与重要的东南亚伙伴如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加深了关系，而且还取得了一个巨大突破，即改变了以前与印度疏远的关系。印度是亚洲大陆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有能力，也有动机与中国抗衡；与中国的抗衡有助于维护区域平衡，这是华盛顿所乐见的。

小布什的方法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允许各方——美国和它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中国，继续从相互之间的贸易中获利，与此同时，在不遏制中国的情况下创造了限制中国潜在不当行为的基石。然而，这一“广泛联盟”的战略被中国视为“不太巧妙”地遏制北京的做法。无疑，中国的想法是正确的。本地区对中国强大国力的恐惧日益加剧，美国对维持全球平衡的焦虑也与日俱增，这都强化了美国的这种做法。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必将被刺激，从而采取各种方式“打破联盟”，而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这样做了。

北京的参与者对演变中的美国战略将作出各种可预见形式的反应。在可能或必要的情况下，为了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重大纠纷时，美国的同盟伙伴团结起来，作出一致反应，中国会试图在它们之间埋下楔子。只要有可能，北京还将防止中立国家和地区支持

美国和它的盟友对抗中国。为约束竞争对手的行为，中国还利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威胁它们可能会失去中国市场，或承诺提高非对称市场准入。最后，在极端条件下，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中国将会惩戒性地故意使用武力，威吓可能勾结起来破坏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者。

以上任何情况下，不管北京反应如何，事实就是，中国会利用其历史悠久的“打破联盟”的战略，单边惩罚、区别恐吓，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全面对抗，以抵消美国寻求通过平衡政策所得到的利益。反过来，这些举措又将驱使华盛顿增强在该地区的能力和对同盟伙伴的承诺，尽管双方都试图掌控变化莫测的拔河比赛中另外一方给出的力量，更害怕进入对方突然放手的圈套。维持联盟，即使在危险的敌人面前是一个动态的、通常不稳定的过程，也并不总能保证成功。结果，美国和中国将面临长期的、小心翼翼的竞争关系，它们想影响亚洲主要国家（也许是同盟伙伴，也许是旁观者）的选择，因为很明显，在北京和华盛顿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决策的重要性体现在美国能够在面临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保持何等程度的优势。争夺地缘政治定位也因此将持续一段时间，只有在华盛顿或北京停止以对方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局势才能缓解。

结论：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无疑是独特的，因为它是在美国权力的保护之下，通过由美国维持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形成的。中国是否能够无限期地保持这一优势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内部无数的弱点可能会相当程度地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会发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美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均收入也绝对不会超过它的西方竞争对手，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同美国竞

争。

即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些相对劣势，中美关系也将会因为经济关系、军事合作和地区地缘政治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短期问题而继续充满困扰，呈竞争性关系，让人伤脑筋。虽然双方都拥有会阻止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核武器，但是一旦发生冲突，从关系恶化到超限战，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也不会预测两国关系将会是和谐相处的。美国对中国总有一天会挑战自己的恐惧日益增加，这导致了它不可避免地为阻止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自由增长而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而中国对美国的恐惧恰恰将其推向以更大的自信心保护自己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方向。

只要目前的权力对比关系存在，这种互动模式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然而，不管是因为内部危机，还是在和美国或者其他第三方的战争的战败，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不确定性因素，或仅仅因为美国由于新的技术突破或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发生戏剧性的复苏，由此中国的力量在某些点上相对下降，那么双方的竞争激烈程度也必然会放缓。

如果现实情况与此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力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取决于在国际体系中其他大国的情况。如果美国明显衰退、中国持续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第三方国家的国力也在增强，比如印度，则会形成新的政治局面：一种可能性是美印联手制衡中国，另一种则是它们之间不能取得长久稳定的平衡，依据时事来形成两两联合、对付另外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在决定此三极是否稳定或不稳定，是否仍然是“均衡”的结果的问题上，中国的举动显得尤为关键。如果美国的相对衰落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大国崛起的同时，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将会异常复杂，呈现出多极化样态，问题的性质、利益竞争的强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单个国家或者不同国家联盟之间）等都将会影响中美关系。

如果美国的衰落仅仅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没有其他

国家获得与美国或者中国相匹敌的物质能力，那么中美关系将取决于两者崛起和衰退的速度。如果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缓慢的，那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前的系统配置会逐渐朝着两极方向演变。然而这种迭代的两极并不一定会像昔日的美苏竞争关系一样，除非现在将两国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国际秩序分崩离析，形成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每一个由其中一个全球大国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两个竞争对手的绝对和相对的经济表现，随之而来的两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世界将像扩大的、泛化的冷战一样，经济实体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会造成大国之间的剧烈竞争。然而，如果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仍存在并继续纠缠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除非合作的收益是完全对称的，这样竞争仍将随之而来。但每个国家都将会更加克制，因为要考虑政治斗争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平衡。

如果，跟上面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都是快速进行的，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崛起，那么两极现象将会转瞬即逝，随之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格局，一个被称为“中国霸权”的格局。届时，整个世界将会和现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很明显风格和细节肯定不同，当然，细节以中国如何取代美国为主。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这个新的霸主是否愿意承担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这将包括为维持这一系统流动性所必需的一切——从作出更大的贡献到生产全球公共产品，到承受结构性赤字。

在这个世界格局中，美国可能仍然是一个重要国家，但它会不断担心北京和其盟友会对华盛顿及其利益造成威胁。不论美国的常规力量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都将需要在其核武器方面——假使核武器仍然是未被其他设备取代的“终极武器”——采取更深层次的避难措施。美国显然试图与其他有相似兴趣的国家共同抵制中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力的分布”将被定义为防止任何有效阻止中国崛起的措施受

到限制。

不论这样的结果带来何种结构性的好处，它肯定对美国与其盟友非常不利。这一在将来某一时间非常有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促使华盛顿在中期阶段（即现阶段，也就是中国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时间）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一切最终成为现实。因为中国也恰恰预料到美国会是如此反应，所以中美关系注定是竞争性的，而且在将来也会是如此。一个传统现实主义者不会得出其他的墓志铭。

第5章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

近几十年来，阐释美国国内因素对其外交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指出了几个关键的国内因素，其中包括：舆论、媒体、政党及相关的党派斗争；与经济事务、国防事务、价值观及民族团体相关的利益集团，以及反映、有时甚至能够塑造特定利益看法的智库。这些国内因素的影响体现在总统和行政机构制定外交政策时的考虑和行动之中。不过，有时，总统和他的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会通过规章制度、保密或其他方式来与国内因素保持距离。与此相反，美国国会对于这些国内因素则更为开放，也更加依靠它们。相比于政府，国会的权威更为分散，缺乏集中控制，也具有更多的接触渠道，这些都有利于美国的国内势力影响政策的审议。实际上，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特定问题上，国会往往更多地反映国内团体或组织的关切。

本章评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发展情况，以期阐释其在当下及未来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的一种主流模式是，总统和政府主导着美国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他们在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国际环境中努力经营和发展中美关系。由于专注于国际政策，总统和政府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时往往并不关注国内因素。美国的国内势力常常反映出美国同中国的分歧，因此它们通常被视为政府强化对华合作、扩展国际利益的障碍。

本章认为，尽管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国内因素通过很多渠道同总统和政府打交道，但它们主要还是同国会打交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观察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关系便可从中窥探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性影响

美国国内因素虽然有时也支持总统和政府提出的发展建议及其他政策倡议，但它们还是更多地体现了同中国的分歧，它们给政府政策的执行设置障碍，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掀起争论。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并分析当前的发展，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利益有时会引发争论，而这些争论被证明是决定美国对华政策方向的关键因素或“驱动力”。很多时候，它们发挥着“制动”作用，放慢了美国同中国接近的步伐。

•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初期，美国国内因素减缓了美国政府试图进一步接近中国的努力，并阻止了政府对台湾的疏远。在卡特政府期间和里根任期之初，由于政府和国会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并持续多年。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国内因素促使美国制定反华政策，并力图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北京日益强烈的反抗所造成的不利后果，美国国内因素对华强硬、对台支持的立场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

年代初以及上世纪90年代这两个时期，国会中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加以分析之后会发现，在后一阶段，国会对政府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的反对态度显著减弱。

•由于过去十年中，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反恐、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朝鲜和伊朗的核危机、国内和国际经济停滞以及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大国等问题上，对美国政府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国内因素依然较弱。此外，美国国会在捍卫其外交政策权力上的意愿也大幅下降，这同样反映在对华政策上。

•对于国会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它在外交事务中的位置，专家给出了模糊的预测。在美国国内因素中，既有支持美国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声音，也有对此表示反对的声音，这进一步说明，国内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综合影响仍将是次要的，它们只是造成了周期性的争论，减缓了美中关系的发展。

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

早在尼克松和毛泽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内因素就不时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展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随着冷战在亚洲浮现，同时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一败涂地，美国“失去”中国迅速在媒体上、国会中以及国会和总统选举期间成为一个突出且能够造成两党纷争的问题。1950年到1953年间，中美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两国在冷战期间近20年的对抗和冲突。这20年的初期，美国开始在国会、媒体以及行政部门中清除、隔离那些被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持温和态度的人。在此背景下，即便有人曾经提出更为温和、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倡议，也只能在暗地里商讨，也许根本就不会商讨。

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和

一小部分美国官员在为开启中美关系大门所作的早期努力中采取了秘密外交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担心反对同中国缓和关系的美国国内因素会产生强烈反弹，从而令中美关系取得突破的希望破灭。不过实际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受到了美国民众和精英们的广泛欢迎。国会领袖、媒体人士、商界人士和其他意见领袖也纷纷开始与中国代表展开一系列的交流。

尼克松政府之后一直到里根政府中的领导人都有一种明确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同中国接近以使美国获利，特别是在同苏联的竞争中更是希望如此。尼克松、基辛格和后来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同北京进一步发展关系对抗苏联，就必须切断同台湾的关系。由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要以台湾及美苏关系为代价，所以它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在国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这一争论持久而激烈。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中的批评者争辩执行这些政策是否会使美国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认为，美国比过去虚弱，需要中国的支持来应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反之，很多国会议员和支持他们的选民则担心，华盛顿应北京的要求而同台湾断交会使这个长期以来的盟友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包括少数政府高官在内的其他人则担忧，推动对华关系会给美苏关系带来副作用。

那些希望通过牺牲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而交好大陆共抗苏联的人如愿以偿。但是，这遭到了美国一些国内势力的坚决反对，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美国弃台转而接近大陆的步伐也因此放缓。主要的反对因素包括：

•国会、媒体以及意见领袖中支持台湾这个长期盟友，并对共产主义和北京的领导者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人士。

•认为依靠中国平衡苏联十分愚蠢，或希望美国调整立场同莫斯科达成共识、实现缓和的战略家们。

•国会、媒体以及其他团体中的一些意见，认为同台湾断交会破坏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和其他盟友对美国的信任。

•国会及其他领域的一些人反对政府通过秘密的方式与台湾断交而同北京建立关系。一些国会议员认为以秘密方式制定外交政策是在无视国会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中的权力。

尽管反对意见减缓了美国政府的脚步，但实际上，美国断绝了包括美台防御条约在内的同台湾的所有官方联系，甚至还在1982年同北京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这仿佛宣告了美国对台军售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意见还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胜利，特别是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令政府决策者无法轻易绕过这个障碍而同大陆发展关系。

政策变化：1982—1989年

在里根政府后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源于美国国内因素的压力，而更多地是因为以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为首的政府官员重新评估了中国在制衡苏联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且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较有利的位置。美国军力的增强，来自日本等盟友的坚定支持以及苏联的显著衰落，加之美国认定中国是个难以相处的伙伴，这些都促使美国不再急于通过寻求中国的支持来对抗苏联。支持台湾、反对以牺牲美国其他利益为代价来同北京发展关系的那些国内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它们认识到，美国政府越来越不愿迎合北京的要求，因此不再认为需要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制动”的作用来保护美国在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利益。与此同时，后毛泽东时代（1976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台湾地区逐渐对大陆开放的势头，使北京更多地通过两岸接触来解决台湾问题，而非向华盛顿施加压力。

总之，从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期间的一系列争论涉及了事关美国重大利益得失的问题。而美国相对苏联的战略态势、台湾的未来则是最受热议的问题。在美国，政策倡议者在争论中往往不惜以巨大牺牲来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反映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对于权力和目标的极大不确定性。最后，美国以结束与台湾的官方联系及与这个忠实盟友的防御协定，来换取同中国大陆建交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帮助美国遏制扩张的苏联。

当时，有关对大陆和台湾政策的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之所以参与争论，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担心美国的政策取向可能产生的结果。而党派利益、利益集团或选民团体的影响在其中并不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主导了《与台湾关系法》的起草，后来又采取措施纠正了卡特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过度疏远台湾、亲近北京的问题，这些都证明，党派利益在美国国内争论中是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因素。

相对于以往总统团队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国会积极涉足外交事务的高峰。国会坚定地维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而美国政府官员则针锋相对地维护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地位。这种权力的竞争加剧了国会和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摩擦。

后冷战时期——大陆政治风波和台湾民主化的影响

在1989年大陆政治风波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的争论对于制定有关中国大陆、台湾和相关问题的政策而言显得越来越显著和重要。美国舆论急剧转向反对中国大陆。

在20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之后，美国媒体和舆论也开始变得反华，它们的报道近年来虽然已经相对平衡，但仍然喜欢强调中国大陆在发展中的负面内容及其对美国的警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地区在同一时期内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这提升了台湾在美国媒体、精英和舆论中的形象。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上，20年来美国接近中国的主要原因也随之消减。利益集团、相关媒体和智库转而关注新的重要事件，强调一系列有限和特定的安全、经济或有关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的分歧，例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贸易行为等。冷战期间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只起次要作用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始走到台前。在此背景下，要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设定一个连贯且有明确优先目标的议程似乎不太现实。

后冷战时期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在重要性上已经不如起初那么大了，多年后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减弱。有分析显示，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国会和其他领域推动对大陆强硬、对台湾亲近的倡导者的决心和意愿总体上减弱。政府和国会中的决策者对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信心十足，在苏联帝国业已崩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发美国政策大讨论的美国战略不确定性大为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面临取舍，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冷战之后，希望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人则不愿以牺牲美国的实际利益为代价。因此在1990年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攻击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骤然而止。而随着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战争结束，美国不再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保持沉默，国会对中国的攻击便又恢复。当1994年克林顿总统不再将中国一年一续的最惠国待遇与其他条件挂钩之后，国会虽未强烈反对，但仍显得十分失望。1995年，数百位大力要求美国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发放签证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强硬回应之后陷入沉默。

即便是部分反对给予中国大陆永久最惠国待遇的国会议员也声明他们无意阻碍中美贸易。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争论中的活跃分子寻求的是党派利益或是抱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与7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外交政策问题本身是推动国内争论的主要动因。为了赢得1992年的总统选举，克林顿用中国问题攻击当时的老布什政府。而对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提出批评的共和党人同样是出于党派利益的动机。

小布什政府

在小布什任期内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美国国内批评中国以及美中合作关系的声音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降至新低。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骤减，在此之前，美国国内正专注于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安全利益所带来的威胁。随着美国将注意力放到恐怖主义相关问题上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转而寻求与中国交好。小布什总统以非凡的能力限制了国会对其外交政策的干预。在战争期间，国会也迁就了总统的权力。

2006年11月，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大胜预示着美国选民对改变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和优先事务的要求。民主党的胜利对美国对华政策是个严峻的考验。评论人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预言，中美间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相关经济问题会引发美国政坛的一场内战。

尽管有这些悲观的警告，但现实状况缓解了改变对华政策的急迫要求。特别是在小布什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总统面前，民主党领导的国会要求改变中美关系的筹码相当有限。而且，当时国会主要着力于国内事务和在伊拉克、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这使得有关中国的问题难

以“脱颖而出”。尽管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曾试图迫使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像往常一样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占多数的民主党人和国会委员会领导人并未表示一致支持。2006年的国会选举之后，保守的民主党人增加了，而在美国的商业和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并不愿过度突出同中国的分歧。很多民主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并抵制他们的同僚对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些人受到了民调数据的支持，民调显示，美国人能够接受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委员会中，贸易问题上的鹰派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受到了一定制约。这些制约的力量包括：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领袖、民主党人查尔斯·兰热尔（Charles Rangel）以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领袖、民主党人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为首的贸易温和派，以及大量的民主党人，这些人加入了旨在促进对华务实交流并更明智、更有效地进行对华决策的工作小组。

直到最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在促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和行动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都相当有限。经常有人在国会中提出议案，或摆出姿态，抑或采取措施试图使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更为强硬。但另一方面，这些手段看上去并不足以改变两国关系。总之，这些事实表明，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国内持续的对华政策争论并未在实质上影响中美两国间的积极状态。

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争论的影响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会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强势不再。评论人士和学者认为，越战之后，国会不再有兴趣约束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其实，从那之后，国会不再像当初插手《与台湾关系法》等事务时那么积极地介入对外事务了。

国会的静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便是小布什政府出台的有关战争权力、被视为酷刑的逼供、羁押嫌犯等其他敏感问题的政策与几十年来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相抵触时，国会也默不作声。面对这

些挑战，国会无动于衷。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国会受到了两党资深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国会不负责任地放弃了宪法赋予它的责任，使小布什政府罔顾美国国父倡导的“权力制衡”原则而在外交事务中为所欲为。第110届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试图扭转国会在外交事务中的颓势，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和有关西南亚、中东等一些更为突出的对外政策问题上，无暇关注美国的对华政策。

国会同中国的对话

美国国会同中国对话的增加反映出，在国内因素和其他因素挑起的有关对华政策的问题和分歧上，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式了。国会复制了小布什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对话，并予以强化。正如葛来仪和傅瑞伟撰写的有关中美外交和经济互动的一章所介绍的那样，到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打响，美国进一步深化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加之朝鲜公开违反不扩散协议、积极研发核武器，小布什政府开始寻求同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加强合作。对中国来说，它急于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以此建立两国间的相互依赖，进而约束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两国很快开始通过快速增加的官方对话和次级对话紧密合作、处理分歧。

而同时出现的美国国会同中国相关部门对话的增加也表明，国会转变了原先的立场——国内因素与政府同中国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努力相冲突。上文说过，在过去数十年中，国会主导了美国国内有关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和安全问题等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即便是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国会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两党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些纷争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到处施展影响力、人权和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的军力增长带来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相关立法，限制与中国的防务交

流，避免促进中国军力的增长。

但与这种趋势相反，近十年来美国国会同中国同僚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加。学者指出了这种变化的几个原因。首先，国会务实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许多美国公司不断增长的在华投资，使开展同中国的建设性互动对于保护和促进选民利益十分重要。其次则是由于“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此后声势浩大的反恐战争。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事关美国安全的核心问题，追随总统更为务实地寻求同中国更好地对话与合作。

简言之，日益务实、专注和持默许态度的国会意识到，在中美两国政府间官方对话不断增加的同时，进一步开辟交流渠道是有好处的。由于美国国会权力分散，组织结构较弱，同时国会中的对华议案多取决于议员个人的倡议和利益，因此交流和对话的方式时常发生变化。不过总体上，以下几种建设性的交流方式呈增长之势。

美国众议院与中国“国会”间的交流活动在唐纳德·曼祖洛（Donald·Manzullo）的带领下明显活跃起来。曼祖洛领导的代表团在2005年访问中国，进行了第七次两国立法机构间对话。两国都认为这种对话是“深化相互理解最有效的方式”。2004年，参议院也建立了同中国的立法机构间交流项目，该项目旨在就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交换意见。在2006年的一次访问中，胡锦涛主席同参议院领袖会晤并强调，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是“双边关系的强大推动力”。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和艾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成立了“中国连线（China Caucus）”，成员已达35人。福布斯和斯凯尔顿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者。在对中国的访问和同中方同僚的交流中，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两国间长期存在的双边问题上。

2005年，众议员马克·柯克（Mark Kirk）和里基·拉森（Ricky

Larsen）成立了美中立法机构工作小组，成员达到30人。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积极的交流活动，如研讨会、访问中国、与到访的中方人员交流，讨论和理解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对国会至关重要”。

奥巴马政府期间国内因素的影响

本书其他章节已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期间中美两国的外交、经济关系，以及其他成就和不足。在近年来的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是较为特殊的一位总统候选人——他并没有在前任的对华政策上做文章。与小布什一样，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团队不希望过多地展现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他曾表示要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有效应对中国影响力和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

但是，奥巴马逐渐改变了原先试图在国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寻求同中国合作的立场。他和他领导的政府转而在对华贸易、经济和外交政策、朝鲜和伊朗问题，以及亚洲海上安全问题上公开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立场。

奥巴马的这种转变发生在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压力与日俱增之时。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停滞的持续，使中国在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做法成为美国国内讨论的热点，并影响着2012年的总统选举。2011年10月，参议院以较大优势通过议案，惩罚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奥巴马总统指责中国占尽国际贸易体系的便宜，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也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措施。要求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最高呼声来自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们。其中一位较为温和的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也严厉斥责了中国，同时列出了一系列系统的措施，声称将在当选之后加以实施，以限制中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不轨行为。而

在此时，为了评估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并继续对台军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11年9月到10月发起多年来国会首次关于台湾问题的听证会。许多国会议员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批评奥巴马政府不顾马英九的强烈诉求，拒绝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向台湾出售战机的法案以及多项加大对台支持的措施。

美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现状和前景

为了评估上述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本节评估了目前在对华政策上产生影响的多种国内因素。结果显示，情况错综复杂，充满矛盾。这些国内因素希望周期性地批评中国并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促使政府对中国更为强硬，所以它们通常对中国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不过，总体而言，它们没有反映出美国国内对更加紧密或合作性的中美关系的抵制，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或者90年代则有所体现。总的来说，它们并未驱使美国采取极度消极的对华政策，而是更多地延缓和阻碍了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发展。

这种看法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它认为，中国近期对美国和在外交事务上的强硬态度相比于中国政府为了安抚近邻、美国和相关国家而宣称的和平发展的论调，仍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对美国持续和公开的强硬姿态会被国会和选民广泛视为一大挑战，进而要求美国作出强硬回应。

这一看法的前提是，在面临应对政府赤字、税收政策和大规模福利政策的僵局时，美国能够避免另一场大衰退或有效治理的崩溃。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是治理危机，那么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的压力就会大增。这一看法还预测，中美之间在朝鲜、台湾等地区

热点问题上会竭力避免战争，两国能够避免像2001年南海撞机和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这样的军事冲突或军事意外。这样的事件在两国国内广泛要求采取强硬军事措施的情况下很容易升级。

在评估影响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时，本文首先着眼于党派对立和2012年总统选举的影响，然后探讨了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景。为了判断国会和美国政府将倾向于何种政策方向，本文考察了能够对国会和政府的对华政策偏好产生影响的国内因素，如舆论、媒体、大型的政府或非政府国家安全机构，以及包括利益集团、智库在内的要求对华采取更强硬（或合作性）政策的游说团体。

2012年初，党派对立成为支持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主要国内因素。共和党竞选阵营不断批评奥巴马在处理对美国不利的那些对华贸易、经济政策时太过软弱和低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是无视北京的强烈反对，决意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他们猛烈抨击奥巴马在2011年拒绝台湾军购大单的做法。

倘若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他是否会兑现这些必然会引发中国报复的竞选承诺仍有待观察。上一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踏入白宫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要对北京强硬并支持台湾，但很快就扭转了立场，务实地强调同北京进行建设性对话和接触。尽管以单边主义和富有争议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但小布什清楚地认识到，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掌握平衡对于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台湾的另一位支持者里根同样尴尬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收回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总统竞选中许下的要同台湾重建外交关系的承诺。历史经验表明，选举期间那些富有争议的对华政策声明最后都会被追求国家利益的务实立场取代。

同时，小布什8年任期中的对台军售比奥巴马首个任期中的相对少一些。在贸易问题上，尽管在竞选时出现了斗嘴和党派对立，但共和党领导层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是否明智的问题上

仍存分歧。由于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强烈支持自由贸易，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顶住了国内选民要求他们接受参议院通过的议案的压力。该议案要求对中国操控汇率的行为实施贸易和其他反制措施。

近几年，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压力主要体现在国会的行动、讨论和其他同总统的分歧之中。2010年，共和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国会中期选举，他们以较大优势掌控了众议院，而民主党则以微弱优势控制着参议院。在共和党的领导下，国会开始强势维护他们在政府债务、政府开支以及包括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问题上的权力。

他们带来的压力迫使美国考虑在外交事务和国防上大量削减开支，其额度大大超过奥巴马政府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这将影响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维持对美国有利、有助于应对中国的安全和外交环境。不过，削减预算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尤其是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已公开宣称将在必要时把其他项目的经费调拨给亚洲地区的项目。除了因削减预算会给美国应对中国的防务和外交政策造成不确定性之外，近来国会在预算和相关问题上的强硬预示着它将再度介入外交政策领域，特别是对华政策。

在某些事情上，国会认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才能使利益最大化，不过即便如此也很难精确判断国会的政策走向。正如上文所述，更为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在国会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而且面临着来自某些集团的压力。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正如傅瑞伟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的那一章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出口商品日益扩大的市场和美国的外资来源国。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国会议员认识到，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和经济措施可能会给他们和他们的选民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他们访问中国，并

加入了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国会工作小组。他们还听取选区商业利益集团、中国使馆官员和中国雇用的说客，以及美国广大商业团体的游说，这些人敦促对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

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的印象仍是负面的，但这不会像1989年政治风波后那样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的消极转变。2010年，一项最权威的美国对华民意综合性研究对过去几年中的几个可靠的民意测验进行了谨慎的评估。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在某种程度上担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威权政体以及人权问题。在希望同中国“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和冲突的同时，美国公众也支持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制衡中国。研究还强调，一直以来很少有美国人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发生冲突。

同样，与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几年相比，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发展状况时，立场也更为温和。总体而言，美国媒体反映了美国舆论中一个持续的趋势——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是消极信号。不过这种观点出现的密度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数年里已经明显减小。最近一份学术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自由和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加之中美两国明显拓展的合作，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发展时已经显得较为正面。

傅瑞伟在谈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章中说过，美国的商业集团已经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银行的广泛补贴及其他事项上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对付中国不公正的经济行为。有的还批评中国操控汇率，并支持参议院通过的、威胁将对中国操控汇率采取报复措施的议案。不过，美国商界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要保持中国商业环境的稳定，这对在华从事投资、制造业和贸易的美国公司是有利的。这种对稳定的渴求使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在游说美国官员时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纠纷置于次要位置。

美国的军事—安全界包括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国防部、各个情报部门、其他安全部门以及近年成立的国土安全部。除去这些政府机构，还包含为国家安全提供武器、技术、情报、分析和其他服务的商业机构。

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安全利益不受威胁。与日俱增的中国军力以及情报活动已经引起了这些机构的警惕。美国历任国防部长和美军高级军官有时会称，他们并不把中国视为敌人或威胁。一些最近退役的海军将领和国防部官员则敦促美国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总体上，军队、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来增强军事实力并采取其他措施，以此震慑咄咄逼人的中国，并在必要时应对同中国的冲突。它们倾向于寻求国会委员会的支持，这些委员会能够为它们提供资金并监管它们的活动。美国媒体也会将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情报活动描述为值得美国担忧的问题。美国公众同样担心中国的军力集结和外交意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一些人希望同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有关昂贵武器及相关系统——包括先进的飞机、水面战舰、潜艇、先进的导弹和防御系统以及精密的网络战工程——的提案更容易通过审批，获得资金。还有一些人认为防务承包商出于商业利润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研究显示，国会对中国的看法比美国其他精英和舆论对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原因之一可能是，很多希望通过国会来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国内因素都对中国政府及其政策和行为持负面看法。而且，尽管针对中国的国会行动是偶发的，但国会一直在支持两个委员会，它们在十多年里密切关注着被美国视为消极行为的中国政策和行为。

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由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成立。其法律职能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进程，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该委员会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5名总统任命的高级政府官员组成，此外，还拥有一批高素质专家来帮助其研究和评估，

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总体倾向总是在突出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消极影响。

中美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同样由国会于2000年10月创立，其法律职能是就美国同中国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监督和调查，每年就此提交一份报告，并适时为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提供建议。该委员会定期就中国的发展可能对美国产生的重大且往往是负面的影响举行深度的听证会。年度报告会评估听证会和其他调查的结果，并警示读者中国的哪些政策和行为会对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产生影响。

试图影响国会对华态度的说客和利益集团的代表通常将目光放在某些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产生消极影响的特殊问题上，从而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化。这些特殊问题突出了两国间的分歧，例如人权、西藏、台湾、新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贸易等问题。

不过，这些委员会和游说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要求国会采取积极对华态度的努力抵消。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所雇用的说客和代表是支持中国利益、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能够从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中获利。这个群体中的一大支柱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它与国会、美国政府、对中国感兴趣的专家以及中国同行合作，致力于推动两国的相互理解，培养更广泛的共识。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内的商业集团也在促进美国同中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设立了国会事务处，已经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逐渐壮大起来。国会事务处与华盛顿的美国—亚洲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并连同中方相关机构，组织并资助了100多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前往中国观光，并与相关的中方官员和专家交流。驻美国大使馆的中国官员对于过去十年中，安排两国立法机构官员交流等事务所取得

的突破十分满意。

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提供访华费用等用于游说的方式，效仿的正是台湾当局影响和接近美国国会的手段。不仅如此，大陆也学会了台湾给美国送大单的方式，高调地同美国达成购买各种美国产品的交易。对这些交易的正面宣传转移了人们对曾经的美台和当下的美中贸易巨额赤字的关注。

在游说国会方面，台湾对大陆而言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台湾动员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能力在1995年达到了顶峰。那一年，除参议员贝内特·约翰逊（Bennett Johnson）之外，所有议员都支持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允许其访问美国。对于国会中这些台湾利益集团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游说努力受到了岛内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和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之间的政治分歧的影响。民进党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便开始同当政的国民党斗争，并于2000年赢得“大选”，执政8年。自2000年以来，蓝绿阵营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双方分别成立机构为各自的利益游说美国国会。由于两大阵营的目标相悖，因此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的议员对蓝绿之争颇感失望和不解，这也导致了台湾影响力的下降。由于马英九当局寄希望于培植同美国政府之间紧密可靠的关系，对美国国会的关注减少，因此，马英九当政之后，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能力一直在下降。马英九似乎没能化解蓝绿阵营在游说事项上的分歧，特别是他任命泛蓝阵营驻美代表为台湾驻华盛顿代表。

族裔游说团体和族裔利益集团历来在美国国会考虑对华政策时影响不大。尽管几十年来华裔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印度裔美国人那些更为积极也更有组织的少数族裔那样，在政治上进行游说或参政。诸如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100）这样的华人团体正在弥合这样的差距，提升华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该委员会倡导美国应同中国建立更具合作性和更加稳定的关系。在对华事务中最为积极，也最具影响力的是在美国定居的台湾人。虽

然他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但是他们十分积极，在经济上也更加富裕。他们动用资源，在1982年成立了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会（FAPA）。该委员会强调台湾有自决权，并且同泛绿阵营合作，支持和推动绿营的议程。

许多位于华盛顿的智库都倾向于认同美国政府维持同中国“商业化”的关系并通过外交解决两国分歧的务实努力。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都拥有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人在近年来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的前共和党政府的亚洲问题专家们近期加入对奥巴马未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批评，这些智库中的一些专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以及安全政策和行为都持有极为负面的看法。与国会关系密切的传统基金会同样坚定支持台湾，批评大陆的安全政策。与劳工组织联合在一起的智库也呼吁美国用强硬政策应对北京不公正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与此相反，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带头强调了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也带头呼吁美国从亚洲的军事承诺和代价高昂的插手亚洲事务中抽身，这在美国的智库中仍属少数派观点。

结论

总之，美国国内强调中美政策和行为分歧的压力，不会挫伤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试图构建的务实、商业化的中美关系。尽管如此，中美关系的进步和发展仍将受到阻碍。美国舆论、媒体、利益集团和国会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两国安全、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突出分歧上。除非中国政府切实改变在美国看来与其利益和价值相冲突的政策和行为，否则美国的这些国内因素仍将继续阻碍美中关系的实质性发

展。不过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很小。

第6章 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郝雨凡（Yufan Hao）

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国内因素而日益变得复杂。这不仅是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者激增的原因。与此同时，在中国对美政策中还反映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想法。本章通过对在冗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因素，如网民、大众传媒、智囊研究机构、公众舆论以及企业界等的研究，来考察中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国内决定因素的结构性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精英制定的，公众对此毫不知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都有人试图一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这一“黑匣子”的内幕。他们主要采取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外交政策制定的结构、过程以及官场政治给予了特别关注。鲍

大可（A. Doak Barnett）在1984年开创性地阐释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内机构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通过与学者和官员的深入交谈，细致地研究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和供职于研究机构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对于国际事务（起初是美国事务，后来扩展到亚洲和欧洲）的看法和研究方法。有些学者运用其他各种视角，通过研究研究机构、组织和政策制定过程来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外部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关系来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的环境。这些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是直到最近，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国内社会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掣肘和影响。随着获得信息的渠道的增加，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加积极，更加多样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国内因素和外部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涌现。

自1979年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不那么偏激，也不那么理想化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实用和老练，变得更加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更加现实和灵活。相应地，人们也致力于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国内因素的作用。不过，这种以国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还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偏好、主要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帮派政治、官僚作风等。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长期被忽略掉的社会因素，如舆论、传媒、智囊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北京的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但是，外界通常并不清楚领导人对这种压力有何反应。

国内体制的变化

总体而言，有两种国内因素影响中美关系：一是体制行为者很

多，过程复杂，二是社会力量。体制行为者是指中国国家和政府结构中有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单位和机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办公室、中联部、国务院系统与对外事务联系紧密的部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本书中，葛莱仪（Bonnie Glaser）和吴心伯（Wu Xinbo）所著章节将对这些行为者进行分析。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经历了数次有意思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称之为多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多元化是指参与决策的人员和机构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有很大的增加，现在已经开始包括一些非政府（或准官方）的行为主体。由于中国同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中国的中央各部委、大多数省级和下属地方政府，以及许多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都由于与外国同行直接打交道而卷入国家的外交事务中。外交政策已经不再是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务院领导（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专有权限，还涉及工业、商业、农业、银行，甚至出版（宣传）等众多机构都开始参与其中。

近期，发改委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上，以及如何保证中国在海外获得重要能源方面。发改委的一大职责就是“拟订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会同有关方面牵头组织参加国际谈判，实施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实际上，发改委主任解振华领导的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小组在很多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峰会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外交部只起辅助作用。在哥本哈根，就是解振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了辩论。

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大量的双边贸易、投资往来，这使商务部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行为者。商务部在协调贸易、知识产权、投资、反倾销案件、世贸组织讼案以及其他商业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持强硬态度，因为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美国经济是知

识型的，因此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知识产权是美国保护自己国家企业商业利益的有力武器。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谈判，负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条款来制定条例以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商务部还负责处理其他一系列中美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如倾销关税、关税补贴和世贸组织争端等。

虽然军队职业化的目标是使其与民间领导权分离，但是近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多地卷入中美双边关系中。除了国防政策和军队战略方针，在控制武器、防扩散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的外交政策制定中都有军方的身影。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问题上，解放军的立场和态度很明显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1996年台海危机时，军事演习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此后中国军方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最近，东海和南海领土之争愈演愈烈，而美方坚持自己可以自由进出这一备受瞩目领域的海岸线，由此，中国军方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成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分散，分权化也越来越明显。内部体制的行为者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官员们可以利用他们在中国权力结构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位置对其施以影响。部委也要提供国内外信息以影响高层决策。有些部委的负责人甚至就处于外交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内。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在中美关系的某些问题上发动运动来引导舆论，例如，解放军军官经常通过电视采访或者利用民间研究机构组织的公开辩论的机会在媒体上发表强硬言论。他们强硬的立场经常引起公众的民族情绪，同时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一定压力。

在制度化方面，近些年来，建立了各种部门间协调的机构，外交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从过去基本上集中于个人层面逐渐转移到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各种组织机构中来。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过去有着象征意义的机构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外

交领域的各主要决策机构、经济实体，还有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国防的不同部委也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增加了部门间政策协调的能力，也有利于各部门在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达成共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由多个部委负责人组成，这就是制度化和提升部门间协调能力的一个努力。

此外，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更趋专业化。许多体制内的中基层官员都接受过国内一流大学的专业训练，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水平和外语运用能力都很强。同时，他们也多有出国考察和深造的机会，这使他们更具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也积极参与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高层决策者也越来越依赖这些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所提供的决策信息和意见。

北京领导层的决策风格同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革命时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已经不复存在。在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参与集体领导，在集体中达成共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像以前那样是“最高”的了。这个事实，加上上述制度化的改变，为各种非传统因素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这是二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上述变化，社会因素开始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是指在最高领导层以外的各种影响因素，它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国内因素中一个日益重要但关注不够的变量，包括网民、大众传媒、在媒体或学术圈发表观点的人，组织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智库、研究机构，商业团体和其他次国家实体。他们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外交决策过程，希望政策的最终产出能与他们的政治偏好相符。这些力量通常都是以一种较为松散、离散的方式

存在并发挥影响，其中众多利益不同、目标各异的个人行为主体或组织，大都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调。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仍然可以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向决策者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中提到，公民关于公共问题的激烈讨论可能会影响国家的最终决策。虽然他主要是从17、18世纪的欧洲得出“好社交”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却同当今以“互联网、媒体网络、聊天论坛和专家出版物盛行”为特点的中国非常相似。人们逐渐可以讨论与外交关系相关的一切话题（而事实上以前政府会给出垄断性的唯一说法），而且人们认为自己对这些话题加以讨论是爱国的表现。

媒体和智库型研究机构也对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日益产生影响。由于大量信息每天潮水般涌入中国，对信息的占有已不再是体制内一定级别官员的特权，大众传媒开始参与塑造和影响公众对外部事件的看法和舆论，当然也能更有效地调动民意支持政府的相关政策。互联网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媒体传播的信息。在这种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也在间接地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方式。尽管最近政府开始尝试审查互联网的信息内容，但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仍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获得大量的网络信息。

互联网的作用

与其他国家相比，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中国更具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呈几何倍数增长，中国拥有世界上数目最大的网民，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自1987年5月中国建立第一个电子邮件网点以来，互联网迅速在中国呈爆炸性增长之势。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4.57亿网民，占全世界网民

数量的23.2%，占整个亚洲网民的55.4%。上网的方式也呈多样性，784%的网民使用电脑，使用手机和便携式电脑的网民分别为66.2%和45.7%。博客用户达到6.311亿，占全部网民的13.8%。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于它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获得信息，市场将会更有效地运转。

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互联网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出现了使公众能够在线讨论的网络论坛。网络论坛包括在线聊天、即时信息、BBS、微博和其他一些在线讨论方式。其中，使用在线聊天的人数占77.1%，排在使用最频繁的网络活动的第四位，BBS拥有32.4%的使用者，排在第十二位。这些数据说明在线讨论是中国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网络活动。

根据洪俊宝（音）对中国上网行为的研究，网络论坛在公众参与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有四个方面，特别是在“公众参与”和“平民参与”方面。第一，这是一种面向所有公众的媒体。网络论坛发表的帖子和新闻能够被所有人阅读。第二，这是一种自媒体。一个网络论坛发布的信息能够即时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其他的网络上。第三，这是一种参与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和评论能够随即引起回应，从而产生辩论，鼓励各种观点参与，因而这种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达到的。第四，这也是一种产生行动导向的媒体。网络论坛能够成为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功能以外，网络论坛在中国还具有一些更重要而独特的功能。在中国，网络论坛的有效性将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并对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交政策还是公众话题的禁区，所有外交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层制定的。普通民众被完全禁止谈论国家的外交政策，更不用说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在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很多普通民众开始使用互联网来表达他们对各项外

交政策的看法，特别是在发生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时候。一部分专门针对外交政策事宜的网络论坛建立了起来。政府以更加容忍的态度、对互联网采取了比传统媒体更为宽松的管理方式，允许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公开讨论、发布见解、批评某些外交政策、提出建议的渠道。公众在网络上的讨论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如中国最重要的国有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运作着一个非常知名的BBS——“强国论坛”。这个论坛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就敏感社会、政治问题宣泄感情和发表观点的平台，而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强国论坛”拥有217万个注册用户和最多的浏览用户（每天350万人）。这样一个论坛的出现并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向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迈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变得愿意了解公众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回应的。所以，为了能够更加容易地通过网络收集公众的观点，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各级政府都实行了电子政务计划。该计划使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来改善与公众的交流和关系，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尤其是中央政府，一直在有力地促进电子政务工程。这项工程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网络观点收集体系，从而使政府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能够通过网络了解民意。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作出决定。

媒体的作用

在审视社会力量的时候，谁也不能低估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和影响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而官员们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制定政策的。普遍的看法是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既然媒体可以左右人们对时尚、汽车、流行音乐、影视明星和政治候选人的看法，它当然也能在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影响

公众舆论。

很明显，媒体擅长“选择并突出某些事件或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并对此加以归纳总结，以便得出某种解释、评价和解决方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宣传系统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它会对某个特定的国家划定一个总体骨架，然后由专家学者和政府掌控的媒体填上血肉，使其丰满。一般情况下，政府会为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提供一个基本指导原则。今天，媒体在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声音。基本模式是，政府影响媒体，继而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因为很多党报和出版社已经转型为营利型的企业，它们开始制作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报纸，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填满了城市中的报亭与书店。大众传媒的商业化改变了政府、传媒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传媒和读者可以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媒体报道范围的扩大，中国媒体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日益增强。政府对信息和观点的垄断不断弱化，一个新的模式随之悄然而生——媒体有时候呈现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以吸引读者，这样就可以设定议题，通过影响读者来影响政府。媒体报道什么样的国际事件、如何报道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公众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有为了吸引眼球、扩大市场份额而取悦公众的习惯。为此，大众传媒必须了解公众的喜好，甚至要了解公众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媒体会自然地想去附和潜在读者的口味。编辑根据他们对读者口味的判断来选择报道的内容。

信息爆炸使人们可以获得营利性和基于互联网的新闻源，这改变了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和公众的互动模式。为了引导公众舆论，甚至是得到公众的支持，政府经常通过大众传媒努力解释自己的立场。例如，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每次召开之前，外交部会举行记者吹风会来解释背景、主要对话内容以及对话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媒体都必须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来报道国际新闻。但是，商业化传媒往往不遵守这项规定，它们经常在未经外媒

许可的情况下翻译其报道，或者是通过采访当地专家以增加新的内容，达到吸引当地读者的目的。大众传媒提供了中美交流的平台。在中国，媒体做了很多塑造美国形象的事情。在2009年底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戴秉国和王岐山代表个人对记者表示感谢。戴秉国认为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够继续增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次精英的作用

傅士卓（Joseph Fewsimth）和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经将能够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人分为三类：精英、次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精英这一层面，中国最高领导层似乎对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改革开放政策、是否继续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没有什么政策方面的异议。然而，在次精英层面，在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看待美国在全球以及亚洲的角色、如何对付美国等问题上，他们都在政策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见。

次精英大部分是在政府机构和大学工作的学者、智库分析家和政策分析家等。有些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参与公共演说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公众，甚至可能会在一系列外交问题上影响政策制定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普遍存在。次精英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包括政府机关下属的智库、大学里的研究院和一些非官方智库。在智库的作用方面，沈大伟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外交政策智库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外交决策和情报分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确实，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在某些领域出现了由专家组成的“学术界”，并且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知识分子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些研究员的文章通过政府内部渠道提交给政策制定者。智库分析家，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人员，几乎是专职为

政府官员撰写文章。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复杂性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技术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日益倚重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的意见。智库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央和外围建立起了多层次的联系渠道。

第二，他们可以在杂志、报纸、互联网或中央、地方电视台上发表观点，影响舆论。在中国，中国的学者和大众传媒是舆论塑造者。为了给广大观众提供更多信息、更广阔的视角，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以及电台，越来越经常地邀请专家学者到谈话节目做客，地方报纸也经常发表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他们开始在国际问题上影响公众舆论。这同时也为这些学者提供了不菲的工资外收入。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学者忙于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或者到处参加国际会议，而无暇进行研究工作，也没有原创的学术成果。

最后，在某些问题上，他们还通过参与讨论来影响精英和舆论。21世纪的前十年，在国际社会衡量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力量时，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到底该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何理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追求成为全球大国的目标？”“‘负责任的大国’到底是什么含义？”“中国是否应该追求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衰落了？”“中国是否应该跟美国一样，成为全球两极中的一极？”“中国是否应该采取跟美国竞争的大战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愈演愈烈。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然而，他们对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持不同看法。有些专家认为，美国政治越来越趋于保守和中央集权化，这导致美国在金融方面执行“单边金融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还有人认为，美国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仍会保持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有些人认为中国作为传统大国的定位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中

国应该改变韬光养晦的战略。这个战略是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也自然地随之在全球扩大，继续保持低调的战略方针将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采取“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等自我保护的措施，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在“低调”和“有所作为”之间做到平衡。

很多专家认为，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将重心向亚太倾斜的目的是保持它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以此压制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能够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面对现实，增加对军队和国防基础建设的投入，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包含着武力的提升，需要建立一流的军队，发展高级的武装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中国必须抛弃幻想，面对现实，以最坏的情况来考虑国家安全形势和战略。有些人甚至以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更加具有侵略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依靠自己发展战略实力才能获得一定的国际地位。

很难断言上述这些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起码可以说，可能这些争论不仅仅影响了党政部门的中层官员，还对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政策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制定出来的。按照对美国看法的不同，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关的官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派，他们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二是反美派，他们总是对美国对华意图持高度怀疑态度，鼓吹对立立场。可以说，中国外交圈子里的人，特别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一般都持和平主义态度，认为和华盛顿保持稳定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在国防部门和军队工作的人倾向于持鹰派态度。

中国官员不仅被公众影响，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公共外交”，在外交政策方面影响公众舆论。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它的职责就是协调国内外媒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形成。原来附属于国家的企事业单位渐渐能够自主行动了，利益集团多元化活跃了政治环境。根据苏珊娜·奥德根（Suzanne Ogden）的研究，中国有20多万个县级、区级和省级利益集团和职业协会，有大约1800个全国性的和跨省的团体。她将此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提供咨询的方式协助国家，并且管理其内部成员服从国家政策；第二种代表成员的利益并挑战国家政策或政府控制；第三种兼具以上两者的功能。

公众舆论的作用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最近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新生势力：半自治的（虽然还是有所限制）公众舆论。在新兴市场经济中，互联网的发展、多媒体的崛起和中国政府控制民众思想能力的削弱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开始向外看，并且在国际事务上更加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是学术界、大学生、专业人士、白领和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官员。城市里的蓝领工人对外部事务不太感兴趣，农村里的农民也许除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其他事务都不感兴趣。

在中国，公众舆论的日益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它在中国领导人了解民意方面是有意义的。由于中国新生代领导的接任，缺乏像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所具有的领导魅力，所以他们必须倾听公众的声音，对他们的利益表示关心。同时，这对实现领导人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也非常重要。最近，政府经常采取很多举措，通过各项民意测验来征求公众对各种重大事件的看法。

其次，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在于，当政策取向发生分歧的时候，决策层里的精英们就会动用公众舆论来加强他们政策的可信度。例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倾向：一些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并且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而另外一部分人则相信两国通过合作和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接触，这种对抗完全可以避免。在这一点上，公众舆论就显得尤其有价值。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中美谈判时中国立场的转变就显示了公众舆论的作用。据报道，中国首席谈判官、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舆论——他们骂他是“叛徒”。

中国对美国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公共舆论的作用却是新鲜事。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公众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而言，在过去30多年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变。虽然这种关系还是非常脆弱。在不同时期，中国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1989年以前，在中国人眼中，美国的形象是正面的。20世纪90年代，因为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和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等，中国国内出现了反美情绪。进入21世纪，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对美国持有更客观、更平衡和更理智态度。但是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不喜欢美国。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搞双重标准，一方面经常谴责其他国家政府的暴力行动，同时自己却在国际上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

2010年6月至8月，中国社科院在8个城市就“中国人眼中的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7%的人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或者“比其他关系更重要”。只有15.8%的人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非常好”或者“很好”，73.5%的人认为“不是很好”，10.7%的人认为“不好”或者“糟糕”。这个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2010年12月，《中国日报》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这一问题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访问的中国公众中，90.9%的人肯定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中，54.3%的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随着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增加，受

过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国越来越持更加客观的看法。但是，53%的受访者将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纠纷归咎于美国。6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存在着竞争和合作。70%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超过美国，53.5%的人认为这将会在20年内实现。调查显示，跟上世纪相比，现在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处于最好阶段。大约有86.7%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对朝鲜半岛动武，81.7%的人反对美国在东亚驻军。

根据以上这些调查，我们可以就中国公众在美国问题上的舆论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同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二，中国人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磋商与合作解决，但是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第三，他们反对美国利用中国的国内问题来破坏中国的发展和内部稳定。2011年11月，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说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的网民来“扳倒中国”。《环球时报》网站环球网就这一问题作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网民对此感到恶心。

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苦难遭遇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这一情绪也指向了美国，并且反映在像《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1997）这样的图书，和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的游行示威活动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包含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内涵。这通常被认为是抗议羞辱和压迫的举动。

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对美国的公众舆论很显然经历了巨大转变。以往，美国被看作一个典范——一个在山巅上光芒四射的城市。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印象大幅下滑。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里兴起这样一股反美情绪？答案似乎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互联网和媒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近阶段涌现的反美情绪似乎是因为公众更容易看到国内外消息，而政府在某些领域对公众发声的控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的缘故。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利用获得

的信息和有限的言论自由增长了本领。有些人甚至将最近出现的反美情绪和反日爱国主义情绪定义为网络民族主义。确实，中国政府常常容忍作为爱国主义表现的反美情绪，甚至有时会利用这种情绪。但是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使这种情绪不至于失控，不影响它对美政策的执行，更不能挑战它的执政地位。

游说机构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界、商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的一支活跃力量。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造就了一大批强有力的利益团体。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截至2010年底，超过13000家国内企业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约16000家公司。

这种扩张增加了企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力。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存在的最正当的理由之一。企业不仅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还能够产生税收。中国大型国企同时还承担着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能源的责任，所以它们在中国政府某些政策的制定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中国有核心商业利益的国家。例如，当国有企业“走出去”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快也会出访那些国家。2005年1月至10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的国家至少有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家企业中的一家在当地有石油或天然气项目。

在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战略性行业如石油、矿产、核能源、国防以及银行业的大型国企可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自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参与制定汇率政策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管理政策以来，在减持还是增持美国国债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

两家机构说了算。有时候，政府依靠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来实现更广义上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议题。例如，中国政府经常责令国有企业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2011年4月，中国发表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以平均每年29.4%的速度迅速增长。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为提供经济或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维护，都由中国企业来执行。

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而游说相关政府部门则是最普通的一种。当美国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向中国施压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官员前往广州调研当地生产厂商的意见。为影响中央政府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些外贸商人讲述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它们的难处。结果，据报道，商务部成为反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强有力的游说机构。

企业自身也可以游说政府。经济发展是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地方政府通常同企业有更密切的关系，它们经常游说上级政府以保护当地企业的利益。在中国，有些企业属于政府所有，但是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中组部任命的。有些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可以在企业和中央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职位变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政策制定者有着直接联系。

在中美关系中，商业利益团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它们更希望两国关系朝着好的方向迈进。商业活动是两国关系相互依存的纽带。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但可以减少冲突的发生，而且能够拓展合作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企业也许会游说中国政府像美国一样承担起国际责任。但是，这些企业在海外的活动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摩擦。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企业在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和津巴布韦的投资削弱了美国对它们制裁的效果。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持相反看法，中国致力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并且怀疑美国的真实目的是限制中国的海外活动，通过破坏中国经济发展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结论

随着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社会的多元化，国内因素已经变成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美国问题上，中国的领导层必须考虑次精英的看法和公众舆论，有时他们不得不去协调不同的观点。集体领导制度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这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复杂，但同时也为社会力量影响中国的对美政策提供了些许的可能性。虽然所有国内单位和社会力量都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美国的要求和关切的同时，必须将这些利益集团的关切和利益也考虑进来。

本章阐释了社会力量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国内因素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变量。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力量一直比较温和、正面，但是现在正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不结盟政策问题上、在中国是否应该做全球领袖问题上，尤其是在对付美国这一问题上，学者、意见领袖和官员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所有这些都对中美关系有着明显的影响。

在新的变量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网民和互联网。因为它们彻底改变了政府和社会互动的模式。虽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脆弱，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互联网通过为公民提供新的参与机会来推动公民社会开展活动。而公民社会则通过提供互动和沟通所必需的社会基础，如公民和民间团体，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这使中国政府更加难以独自制定对美政策，因为国内社会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对美政策会置身于社会压力之下，特别是在两国有外部纠纷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中，有些人呼吁中国政府应对美国持更强硬的态度，以保卫中国在台湾、西藏、新疆和南海

的“核心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应当享有与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在贸易、人权和很多其他领域享受同等待遇。当感觉受到美国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中国公众通常反应强烈。这给中国领导层制定对美政策带来直接影响。

中国越融入世界，国内的社会力量发展就会越迅速。这种变化将迫使中国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考虑这些单位和社会力量的不同利益，而这使中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第7章 外交关系：要旨及过程

葛来仪（Bonnie S. Glaser）

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中美之间的交往只是零星地局限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一系列大使级会谈上。这些会谈始于朝鲜战争之后两国遣返战俘的工作，关注的政治议题很有限。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引导下，两国的对话上升到了更高级的层次，开始应对反对苏联的战略挑战，并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权宜之计。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两国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之间的工作层面的协调和双边对话有所增加。从两国建交的1979年一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十年间，双方的直接交流为促进双边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这十年中，向来对国际制度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们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论坛，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同各大国展开合作——这种变化正是美国所鼓励的。中国在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2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下了基础。中美在这些机构中的合作迅速增多。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议程也随之扩展，高层对话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1998年，中美设立首脑

热线。

在小布什政府初期，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具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这对美国利益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促使美国积极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元首之间的交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特别是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为了减轻国际责任所带来的负担，同时出于担心中国在海外的活动可能给全球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布什政府敦促中国放弃“搭便车”的做法，“巩固帮助其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此，双方建立了两个对话机制：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高级对话始于2005年8月，它为两国深入讨论一些战略问题创造了机会，同时也成为弥合分歧、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促进合作的尝试。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7月对这两个机制进行了合并和升级，即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大国，双方外交议程的深度和广度也迅速扩展。如今中美两国讨论的范围涉及全球各领域，涵盖了21世纪所有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外，中美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也在增强。同时，中美之间的双边对话机制的网络也建立起来，这是两国为增进理解、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而将两国关系制度化这一共同战略的一部分。

本章描述了中美之间日益多样化、全球化和制度化的外交议程，展现和分析了两国各自的目标、国内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双边对话机制以及双方所讨论的话题。另外，本章还评估了双边对话机制在处理两国关系、推进两国利益和推动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各自的目标

自尼克松起的连续8位美国总统都与中国进行了接触。经过多年发展，接触政策逐渐包含了两国最高级别和多部门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美国和中国都拥有深切的利害关系，也有很多彼此重叠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政策能够为美国的三大主要目标服务：（1）促使中国接受更多西方的规范和实践，制约中国的政策选择和行为，使中国融入当下的国际体系；（2）说服中国更积极地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贡献（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词在小布什任期结束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3）促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避免误判。通过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这些目标的实现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通过军事现代化、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以及加强同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来防范中国采取破坏国际体系和军事侵略的政策。

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国的目标是保护自身利益，在总体上推动双边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的目标可概括如下：（1）维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安全；（2）同美国维持积极、富有成效和稳定的关系；（3）保证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中国重视通过对话和谈判管控与美国的分歧，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它希望在避免与美国发生零和竞争的同时使中国行动的自由度最大化，减少对它的束缚。此外，中国也试图防止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防范美国阻挠中国提高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的潜在企图。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仍旧对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和竞争者的意图和意愿心存疑虑。

政府部门的作用

在美国政府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行政机构的首要部门，它负责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并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为总统提供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能源部长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家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顾问。如有需要，其他高级官员也可被邀请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政策协调委员会、副部长级委员会和主管委员会组成，掌管跨部门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些机构都有决策权，但前提是必须与不同部门的同事达成一致。政策协调委员会负责“日常的跨部门分析、行动路线、政策制定、协调、资源统计以及政策执行规划”。负责东亚地区的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副部长级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副顾问领导并主要由各部门的副部长组成。副部长级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议题得到彻底的分析，所有的观点和看法都会被考虑。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在副部长级委员会中作出，然后提交给主管委员会进行审查，最后交由总统作最后决定。

除了总统和副总统之外，主管委员会的成员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基本相同，它是总统的高级政策审查和协调团队。与其他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一样，该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首要任务是促成各部门之间的共识，并向总统提供政策建议。当主管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分歧无法弥合时，总统将加入讨论并作出决策。主管委员会的会议通常一周召开一到两次，开会的次数取决于需要审议的问题的多少。平均来说，主管委员会每年召开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会议在12次以上。比如在2010年，主管委员会召集会议讨论了美中之间的战略和经济关系，并批准了一系列对台军售。除了这些正式机制之外，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也包含了非正式小型工作组，它们不定期举行会议，其成员是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中负责对华事务的低级官员。

国务院是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机构，而国务卿是总统的首要外交

顾问。国务院制定、代表并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国务卿的权力大小要视他/她同总统的关系而定，也取决于他/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内阁要员的支持。另外，国务卿也可能在某些事务上比在另一些事务上更具有影响力。

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通常会就具体的对华政策提案进行协调，不过也有例外。当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2009年9月提出对华“战略再保障”后，尽管这一政策提议在副部长级委员会中进行了讨论，但它并没有在政策协调委员会中得到批准。此外，很多由国务卿及其他主管亚洲和其他事务的官员所作的政策演讲也未必能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和批准。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有着不同的决策结构，尽管这两个平行的结构在功能、权力，甚至人员上都有重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发布由各部门所执行的战略纲领、方针和政策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负责协调和监管政策的8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领导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更多地是一种交流和协调机制，确保信息的流通并在各部门之间促成共识。它们同样也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供政策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各领导小组中的相关中共官员所同意的政策提案也会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

两个讨论对美国政策的领导小组分别是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它们的组成人员有所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两个领导小组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他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周都会召开会议，而且在中美元首举行大型峰会之前也会召开会议。他们参考党政机关和部队有关机构的建议，达成共识，最终作出决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各种问题举行严格的审议，不过实际上很多外交决策是由政治局常委中的少数人作出的。

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三个机构也在外交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三个机构分别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办

公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研究工作、提供建议并为高层领导人起草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政治局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持，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向决策者分发的文件。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常常随中共中央总书记出访海外。外联部掌管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政党和组织的关系，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它在制定对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是政府机构，其任务是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比起美国的国务院和国务卿，中国的外交部及外交部长的权力要小得多。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外交部的影响力还在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同时一些希望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部门——比如商务部、财政部、安全部、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和军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往往由掌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负责。自2008年起，中央外事办公室——负责研究工作并协调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活动——主任也由该国务委员担任。接到高层派下来的任务后，中央外事办公室就会带头协调各部委和政府智库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提供政策建议或是进行危机管理。

双边机制

比起其他的双边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合作、解决问题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和依赖中共领导的指令来指导政治体制的特点要求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必须先获得国家主席的许可才能采取行动。一旦最高层达成某种一致，官僚机构就开始运转起来，贯彻最高领导的

指示。高层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对于在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及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美国利用元首会晤来“设定优先事项、传递信息和获得许诺”。只有最紧迫的问题才会被列入元首会晤的议程中。近年来，美国将朝鲜问题、伊朗问题、苏丹问题、中国汇率和贸易问题、经济再平衡、人权、海洋安全以及维持军方对话等议题列为优先事项。中国国家主席则反复表达了对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担忧。

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支持2011年1月南苏丹独立公投这两个问题上，元首会晤在协调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10年黄海和南海的一系列外交冲突以及愈演愈烈的贸易和网络安全摩擦之后，奥巴马和胡锦涛利用2011年1月会晤的机会将两国关系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上，并向对方保证本国的意图。

其他的高层交流对于增进两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也十分重要。美国副总统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互访对美国了解中国领导层的变动尤为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美国提供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机会，影响他们对世界和美国的看法。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国务卿同主管外事的中国国务委员（同样也是下面要讨论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负责人）的会谈对于双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确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两国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十分有用。

双方较低级官员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性随这些官员的个人性格及自身影响而有所不同，这在美国一方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由于经常能够接触到总统，因而在塑造政策议程和战略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官员与美国这些官员之间的交流同样显得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是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与中国驻美大使之间的交流。包括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级官员都会在关键时刻不定期前往中国。

对中美双方而言，一个“专人”的存在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或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这样的人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能够同对方就一些问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切实可行的行动进行坦率的讨论。这样一个官员通常很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能够达成积极的成果。如果双方均缺乏这样的人，那么双边关系将变得不那么顺利和富有成效。

大使馆和领事馆会报告对方国内的发展、接待本国来访的代表团并从整体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它们在中美关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大使同对方的高级官员的定期接触能够提供一个交流信息、促进相互理解的渠道，尤其是当大使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信任时。

除了官员间频繁的访问交流，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就双方的共同利益、分歧、政策的协调以及促进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机制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制度化，也说明双方越来越重视对方。

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关系中级别最高，也最受人瞩目的定期对话是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它始于2009年，合并了小布什政府期间设立的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包含战略和经济两个方面，分别由美方的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以及中方主管外事的国务委员和主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负责。这四人都是本国元首任命的特别代表。该对话每年举行一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与会人员包含来自美国和中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高级代表，这为许多次级对话提供了便利。实际上，大多数次一级的对话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双方深入讨论一系列短期和长期议题创造

了宝贵的机会。该对话既有能够讨论战略和经济问题的全体会议，也包含着力于敏感问题的小型会议。有15到30位部门负责人、内阁级别的官员和来自两国政府的共150多名官员参与该对话。全体会议的议程包括全球经济问题、气候变化、不扩散以及海外发展援助。

尽管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其前身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这些对话机制最显著的成果在于促成了中美高层官员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一些官员升迁之后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官员表示，“如果不进行交流，这种关系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伊始，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能迅速与中方代表取得联系，商讨对策。

战略与经济对话打破了中国的垂直管理体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那些原本只把注意力放在粮食安全等狭隘议题上的中国官员开始对中美关系更广泛的战略背景有了更好的理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结识政治体系中他们原本很难有机会认识的官员的机会。中国官员承认，战略与经济对话强化了中国不同部门间的协作，也在某些特定议题上促进了中央同地方的协作。

中美官员间的跨部门联系因战略与经济对话而增加，一些存在共同利益的新领域也因而得到确认。例如，资源保护方面的讨论开辟了双边合作的新领域。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也衍伸出了其他的对话，如2010年开始的中美关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的讨论，中美关于亚太问题的磋商以及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后两者都建立于2011年。

战略与经济对话也使得中美双方能够克服官僚错位带来的挑战。在美国，发展援助的职责由国务院承担，而在中国则是由商务部负责。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讨论了发展援助的方式问题，并探索了合作的机会。毫无疑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总体上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包括两国高级官员在内的代表团汇聚一堂，中美两国通过这

种方式向两国国民和其他国家表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两国能够一道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久而久之，两国之间得以建立合作的习惯，消除了误解，也增进了相互理解。

在准备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过程中，中美官员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双方这些交流活动同时满足双方所需。对中国来说，盛大的宴会和文化展示是必不可少的，这能向中国国民展现中美是具有合作性的，且在中国的掌控之中的。而美国更看重会谈“成果”，有了成果才能证明与会者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值得的。自对话建立开始，双方就对对话中的战略轨道作了一些调整，以提高其效率。据一位美国官员说，在前两轮对话中，全体会议十分冗长，高级代表们大多只就部分特定议题交换意见，没有给讨论其他问题留下足够的时间。在第三轮对话中，全体会议的时间被缩短，取而代之的是旨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双方都希望充分利用美国国务卿同中国国务委员交流的机会，讨论一些紧迫的议题。

战略与经济对话因其所获得的成果而受到称赞，但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专家一开始就对该对话的功效表示怀疑，认为两国缺乏合作和信任原因并不在两国政府，而是因为两国在“利益、价值观和实力上的不对称”，“提升两国关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一些人警告说，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一次，而不是像原先的高级对话那样每半年举行一次，这样会降低互动的效率，除非次一级的工作组能够保持良好的势头。有些人认为这样一个连美国同其盟友之间都不存在的独特对话机制会在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中引发对“两国集团（G2）”共治世界的焦虑。而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与财政部的内斗以及缺乏有效合作的问题引发了很多抱怨。还有人认为，该对话过于铺张，且占用了高级官员两天的时间（如果在中国举行，则还需要花费两天时间在旅途上）。还有一位专家警告说，美国需要防止对话本身变成“最终目的”，这会导致中国追求获得切实成果的意愿下降。

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次级对话

作为美国在全球层面就一系列政治安全问题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两国之间存在一些从属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工作级别的对话。两国举行了有关非洲、拉美、南亚、中亚和亚太的地区性次级对话。这些对话机制多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之前由美国牵头成立的，只有2011年6月创立的亚太事务磋商（Asia-Pacific Consultations）是由中国提议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地区性的次级对话由美国分管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主持，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方面派一名外交部副部长率团参加亚太事务磋商，在该机制建立的4个月内共召开了两次。

其他关注安全议题的次级双边对话包括：1）战略安全对话，这是首个文官与军官共同参与的对话（下文有介绍）；2）美中国际安全与不扩散问题会谈，参与会谈的美方代表以主管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为首，中方代表则以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3）中美政策规划会谈，两国与会代表分别由美国的国务院政策规划署主任和中国的政策研究司司长领导；4）中美反恐安全磋商机制。其他旨在解决外交议程问题、促进两国合作的双边机制有，人权对话及其次级对话机制——法律专家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妇女领袖交流和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战略安全对话

2011年5月，中美双方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轨道下发起了首次由文官和军官共同参与的对话，也就是战略安全对话。美国希望通过该机制使两国在双边关系中一些可能出现误判和意外的问题上增进

了解。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议题包括核战略和方针、导弹防御、外太空、网络安全等。中国则希望该机制能够促进两国的战略互信，并希望在它所关心的问题——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海上监视和对台军售——上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军方关系的缓慢发展为该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动力，美国对中国体制内的文职机构和军方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的担忧也是动因之一。战略安全对话由两国的高级军官和文官主持，此外还有来自军方、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的代表。

战略安全对话是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的智慧成果。他在2010年2月访华期间提出创建一个由文官和军官参与的有关安全问题的高级对话。对美国来说，战略安全对话的好处是参与的官员相对较少，这样能够使会谈专注于“对意图和误解的讨论”。

双边外交议程

过去十多年间，中美两国的外交议程从本质和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方讨论的焦点仍是双边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双边对话的议题扩展到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从地理上讲，如上文所述，中美两国的磋商范围涵盖除中东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地区。两国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也大大增加。以下罗列的是中美两国在外交对话和多边场合中进行协商的一部分议题。

经济

正如傅瑞伟在其章节所言，经济问题在中美两国的议程中，特别是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是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美国的目标在于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使美国公司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

则希望能够使经济问题产生的摩擦得到管控，说服美国放弃在高技术转让上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并为中国公司在美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两国讨论的具体经济问题有：全球经济再平衡、汇率、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保护、双边贸易不平衡、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和贸易纠纷，以及在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问题。中国在口头上对美国的很多要求表示认可，但是却口惠而实不至。比如，中国出于对国内的担忧而不愿意使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签署进一步开放本国经济的协议，因为这样做会对其国有企业造成额外的压力。经济问题同外交议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曾在奥巴马政府供职的官员说，“一旦两国爆发哪怕是低水平的贸易战，其他的问题也将失控。经济关系的恶化会对外交议程产生影响。稳固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双方更好地推进外交问题。在这一点上无可让步”。

军控及不扩散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材料和运载方式的扩散，已经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讨论了数十年。在这方面，美国主要是力争中国对制裁的支持，比如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采取更严格的保卫措施和出口控制，以及支持那些旨在控制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材料扩散的国际组织。中美在多边领域的军控及不扩散合作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两个国家都是一些与不扩散问题有关的机制的成员，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内瓦公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桑戈委员会等。双方都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国，但两国都未批准该协议。中国与“澳大利亚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机制保持着联系，但美国对中国加入态度消极。中国因《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合法性问题而没有加入。《集装箱安全倡议》已经在深圳、上海和香港等主要港口得到落实。中国还加入了美国能源部发起的一项旨在阻止核材料扩

散的《大港倡议》。美国根据国内法，以中国公司向伊朗转让美国所禁止的设备为由实施单边制裁。

反恐

“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强了国内外的反恐工作，并寻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合作。中美建立了反恐对话以期全方位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两国在反洗钱和包括制造假币在内的防止恐怖组织筹资等问题上也强化了合作。200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巩固了中美在反恐调查上的合作。除了双边领域，两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同样加强了反恐协作。

台湾问题

中国几乎在任何级别的双边交流中都会表达其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担忧。如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其章节所言，中国把美国插手台湾和两岸事务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的官员普遍认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是美国阻碍两岸统一的战略之一。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以及美国支持台湾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招致了大陆的抗议。北京反复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商讨控制对台军售，以便将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但美国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担心违反里根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不与大陆就对台军售进行事前承诺”中磋商”的规定。

海上安全

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一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能够从事哪些活动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分歧。如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在其章节中所述，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从事侦察监视活动。2009年中国在南海对美国的监测船只和飞机进行了拦截，这让美国担心2001年中美撞机那样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中国同南海邻国在领土领海上的争端使南海在2010年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2010年7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南海航行自由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关乎美国国家利益，此后两国开始将南海问题纳入双边会谈中。北京坚持认为领土纠纷应该通过双边渠道解决，反对美国干涉；美国则支持该地区许多国家的要求，即制定行为准则，通过多边对话维持和平并找到解决主权、资源纠纷的方式。

阿富汗/巴基斯坦

过去十多年中，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合作主要是打击塔利班，以及稳定并重建阿富汗。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美国同中国展开对话，就中国为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呼吁中国开放一条供应路线，以便在阿富汗的盟军能够通过中国西部获得食品、衣物等非致命性物资。尽管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也同意对这一提议进行研究，但最后中国并没有接受提议。在同美国合作的问题上，中国表现得犹豫不前，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原因：1）开放中阿边境可能会招致国内穆斯林的反对；2）中国对支持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表现得过分谨慎；3）担心此举会引起同巴基斯坦的摩擦。不过，中国同意为阿富汗培训警察，并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投资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对于巴基斯坦问题，两国也就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安全、国家稳定进行了讨论。

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

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领域，中美两国举行了多种双边对话和交流活动，这既包括高级层面也包括工作层面，气候变化政策对话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国都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经济大国论坛等多边论坛。在2009年7月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两国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要在气候、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加强双边合作。2008年建立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以及2009年达成的7项清洁能源倡议也促进了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两国在联合开发新技术及促进减排上的合作有所进展，但是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和所应承担的义务，双方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要在控制碳排放问题上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承诺很困难。

发展援助

随着过去十年中国对外援助的迅速增长，美国开始寻求就官方发展援助同中国进行讨论。在这方面，中美之间的紧张源于中国不愿意同西方援助国就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协调，也不愿意提供其官方发展援助的准确数据。为了增进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提出了多个对第三国的联合开发项目。其中一个是2011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宣布的旨在促进东帝汶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项目。有关对外援助的双边对话由中国的商务部部长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主持。但是，由于两国对外援助的方式迥异，因此对话进展不大。中国也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但是它更愿意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工作组中展开合作，而不愿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合作，因为后者被中国视为富人俱乐部。

人权问题

中美两国对于人权的定义存在分歧。美国更强调包括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和投票权在内的公民权利，而中国则更多地强调经济富裕和社会权利。成立于1990年的中美人权对话由负责民主、人权、劳工问题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领衔。这一以国际标准和规范为基础的对话机制为中美双方提供了一个坦率沟通的渠道。该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法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问题、多边合作、人权领域的最新动向（如强迫失踪，非法拘留、逮捕和定罪）等。美国方面表达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切，而中国则强调它在提高和保护民众的生活水平、完善法律体系、发展基层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人权对话之下有法律专家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政府和非政府法律专家共同讨论法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法律问题，其中包括法律改革、新的法律提案、现有法律的执行、律师在社会和法律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司法的作用等。

人员交流

正如劳泰瑞（Terry Lautz）在其章节所述，2010年5月启动的中美人员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旨在扩大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其中教育为重点。“十万留学生计划”旨在大幅增加在中国学习的美国留学生的数量。两国还设立了中美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和友好志愿者项目（Friendship Volunteers）。两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还包括推动文化和体育交流、双边妇女领袖交流和对话机制等。该机制由美国国务卿和中国主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的国务委员共同主持。

联合国安理会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进行定期的磋商和协调。在联合国，伊朗和朝鲜问题成为两国议程中的重中之重。自2006年以来，中国支持了一系列制裁伊朗和朝鲜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两国的谈判充满争议，但也往往能够达成妥协。由于伊朗的核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到2010年间通过了4个加强对伊朗制裁的决议。除了在2010年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929号决议——这是有史以来对伊朗最严格的制裁——之外，中国还同意放缓在伊朗的能源投资，并在私下鼓励伊朗缓解国际社会对于伊朗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担忧。

美国和中国还在联合国就苏丹问题成功进行了合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在苏丹进行投资并援助喀土穆的行为招致美国等国家的批评。中国对国际形象的重视令此事有了一些转机。美国说服中国接受了苏丹分裂的必然性，并在支持苏丹举行自由、公正的公投上使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美两国在诸如国际部队的使用、人道主义干涉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尽管除了经常对有关台湾的决议使用否决权之外，中国很少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但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使其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地使用否决权。一位前美国官员讲到，“如今，中国有能力追求其利益，一旦它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它就会退出谈判。现在它有说‘不’的实力了”。虽然中美进行了密集的谈判，但两国仍旧无法在缅甸问题上达成一致。2007年1月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缅甸政府停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军事袭击，但中国联手俄罗斯否决了该协议。2011年10月和2012年2月，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镇压反政府示威者的决议草案也遭到中俄两国否决。

其他全球和地区性机制

中美两国在全球和地区性机制中的互动仍在扩大。最重要的是，两国官员随时准备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以促成积极的成果。这些地区机制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二十国集团是除联合国之外中美两国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机制。

挫折和妥协

中美之间的外交往来对于双方而言都充满了挫折和愤怒。两国在构建共同战略以管控外交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只在很少的时候能用利益分歧来解释，更多的时候，造成这些困难的是两国对达到共同目标的最佳方式存在分歧。紧张的谈判多数时候都促使双方作出让步。通过对棘手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美中双方对各自的利益和角度有了更好的理解，也找到了推动各自议程的方式。

中美对双边关系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这让两国都感到失望。中国非常重视美国描述两国关系时所使用的词汇，它花了大量精力要求美国接受一些积极的表述。例如，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经过磋商之后同意共同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中国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对中国而言，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数量也是中国衡量两国关系的标杆之一，高层访问的数量、通话次数、信件和会谈的次数都成为了判断标准。而对美国来说，判断两国关系的主要标准是两国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对美国政策议程的支持等。

尽管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朝鲜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一个极不和谐的议题。中国坚持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同朝鲜之间，因此敦促朝美两国举行双边谈判寻找解决方案，同时支持继续举行六方会谈以确保自身利益。而美国则认为，朝鲜90%的能源和一半以上的进口食品是由中国供应的，因此中国对于朝鲜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力，中国应该利用这一影响力说服朝鲜放弃拥核野心。中美两国之间就回应朝鲜的导弹试射、核试验所进行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总是充满摩擦。

美国拒绝同中国讨论对台军售问题也使中方大为沮丧。在2010年1月和2011年9月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后，中方要求奥巴马政府就管控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讨论以防进一步危害两国关系，但美方拒绝了这一要求。另一个让中国感到愤怒的问题是，美国拒绝在2011年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加入在2009年11月双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表述，即“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美方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在美国国内以及中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经过70多个小时的艰苦谈判才最终敲定。由于在胡锦涛访美期间签订联合声明对中国的意义大于其对美国的意义，所以美国官员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被迫放弃将“核心利益”加入声明的要求，并同意了对朝鲜问题的相关表述。

除了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失望多数是由于经济问题。中国声称本国公司在美投资环境不佳，要求美国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此外，中国劝说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努力也并不成功。美国在人权等被中国视为内政的问题上的干涉以及在南海等问题上的不恰当干预也招致了中国的反对，尽管中国表示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对于管理和提高两国总体关系是必要的。

中美政治对话取得的效果

美国和中国在减少错误认识和误解、管控竞争与摩擦、在广泛的议题中提高政策协调性以及寻找新的合作领域等方面有所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全方位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对话，当然两国高级内阁官员、外交官和专家之间的对话同样十分重要。而且，同过去相比，两国的对话机制在不断拓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常规化，涵盖的议题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些制度化的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它促进了两国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推动了部门间合作，并为双方讨论不断拓展的议程提供了平台。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下的次级对话使双方得以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新出现的紧迫问题。由中国建议发起的亚太事务磋商旨在讨论两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避免采取零和方式导致更严重的对抗。由美方提议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意在邀请文官和军官共同讨论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重要安全问题。

双边对话机制对于加强信息交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广泛而多样的对话渠道——同美国与其盟友之间那些众多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相比，这还显得不够——是为了促进中美双方相互理解，培养两国之间合作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误判，并在两国的同人之间建立关系以便在发生危机时避免出现紧张。

确认新的合作领域以及增加人员交流对于抵消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问题——例如安全领域不断增长的相互猜疑和竞争等——所产生的影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弥补了两国在南海等其他领域的摩擦。双方的合作可以使两国的精英和民众认识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以及携手创造共同繁荣的稳定世界的潜力。两国在一些对彼此都十分重要的议题上的协作也有所改善，其中

包括反恐、核不扩散、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虽然这些对话促进了双方对彼此政策的理解，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在战略上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而且很可能继续加深。信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短期政策造成的，但两国对彼此的长期意图的猜疑是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在中国方面反映得尤为真切。中国领导人一直宣称美国在进行“西化和分裂”中国的阴谋，中国的媒体也坚称美国试图危害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阻止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及中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一度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释放，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要求他国尊重中国在困难时期无暇顾及的国家利益。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或政治体制，两国之间要形成更坚实的战略互信尤为困难。

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持续的关切，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使其谋求建立一个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新国际体系。美国欲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目标仅仅取得了有限而艰难的成功。从积极的角度讲，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和政策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中国也开始愿意选择性地对伊朗、朝鲜和苏丹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政策。说服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主要在于两大因素：1）中国不愿意接受西方对于“负责任”的定义，中国对于如何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2）由于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不愿承担应有的领导角色和责任。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依旧是主动的一方。“中国仍然是被动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我们希望中国有所作为，但中国总是在规避压力。”大量倡议都是由美方提出的，中国总是“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缺乏创造力”。美国通过一些策略在说服中国采纳某些特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将要发生的国际事件和高层双边会谈来获得中国的合作；2）参与高层直接对话；3）给中国尊重和面子；4）正面或者负面地进行诱导；5）使中国“丢脸”，利

用中国保持良好国际声誉的心理。通常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告诉中国，改变政策能更符合其国家利益。

为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利用现有对话机制消减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战略对话不能仅关注短期挑战，还要着眼于达成互利的结果。美国应当改变原先争取获得中国对美国议程的支持的做法，采取一种能够使两国合作更有效地解决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方式。正如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所言，真正的战略对话“应当是在两国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可能出现变化的背景下，将全球、地区以及功能性政策议题同对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讨论结合起来”。比如，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长远意图以及保证朝鲜半岛永久和平的路线图。在一些格外敏感的问题上，如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周边的监视行为、核武器、网络安全、外太空的军事使用等，两国不仅需要展开深入对话，还应当付诸行动。两国应当在这些领域作出克制和互利的承诺，以减少不信任。

除了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的对话，中美两国官员之间也应通过定期而持续的对话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系。两国元首之间以及高层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及高度信任尤为重要。两国还需共同努力寻找双方利益重合而有望展开合作的领域。在一些具体项目和政策上的有效合作能够防止对抗冲击两国关系。最后，中美两国应该在多边论坛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专题 7.1 美中对话机制

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

贸易

1. 透明度对话

2. 贸易救济工作组

3. 反垄断对话

4. 商法工作组

5. 结构问题工作组

6. 商务发展与产业合作工作组

7. 电信对话

8. 保险对话

9. 产业与竞争力对话

10. 无线网络协议标准小组

11. 数据统计工作组

12. 高科技与战略贸易工作组

13. 产业与创新政策对话

知识产权

14. 知识产权法实施小组

15. 知识产权刑事执行工作组

16. 政府及国有企业采购小组

17. 软件知识产权工作组

行业

18. 农业贸易工作组

19. 纺织业顾问小组

20. 旅游业工作组

21. 信息产业工作组

22. 钢铁对话

23.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技术小组

24. 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能源

25. 气候变化政策对话

26. 能源政策对话

27. 美中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联合工作组

28. 美中能效论坛

29. 美中油气工业论坛

30. 可再生能源论坛

31. 先进生物燃料论坛

外交

32. 美中战略安全对话

33. 美中人权对话

34. 美中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对话

35. 美中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36. 美中政策规划对话

37. 美中反恐与安全磋商

外交/地区性

38. 非洲对话

39. 南亚和中亚对话

40. 拉美对话

41. 亚太磋商

行业

42. 中医论坛

43. 交通论坛

44. 铁路项目交流

45. 农业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工作组

46. 出口管制对话

47. 法律专家对话

48. 美中打击木材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双边论坛

其他

49. 美中反腐工作组

50. 美中投资论坛

51. 美中城市经济合作倡议

52. 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与对话

半独立机制

53. 原产地规则联合专家对话

54. 年度劳动对话

55. 中美医改研讨会

56. 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

57. 金融联合委员会

58. 科技联合委员会

美中军事对话

59. 防务磋商会谈

60. 防务政策磋商会谈

61. 国防海事磋商协议

62. 美中核专家对话

第8章 商业和经济关系

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III）

20世纪70年代前期，当中美两国开启一系列涉及两国关系方方面面的交流时，商业关系并不在其中。这些早期的交流活动基本都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贸易并不是美国官员所考虑的问题。曾在1972年陪同基辛格访华的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大使回忆到，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几年里，他的国务院同僚以怀疑的口吻互致疑问：“我们能从中国人那儿买到什么？”

1972年，也就是美中重启贸易关系的第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3240万美元的商品，对华出口达到了6350万美元。近40年后的2011年，美国对华的进口额达到了3993亿美元，出口额也达到了1039亿美元。2011年，中国排在加拿大之后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以近830亿美元的总额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截至2011年12月，中国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美国官员不再质疑中国能卖给他们什么东西。由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消费品的主要产地以及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官员现在要应对的是被这一现实深深震撼的民众。

作为美国的进口来源国和债务持有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激增。但这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到2011年，中国已经在近15年里成为美国公司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2000年到2011年之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543%，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仅为80%。那些总部位于美国，但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不仅将中国当作出口的平台，也越来越重视为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服务。考虑到在北美和欧洲等已经成熟的市场难觅机会，美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依靠中国市场以获得短期和长期的收益增长。

表8.1　中美贸易额，2001—2011年（10亿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出口	16.3	19.2	22.1	28.4	34.7	41.8	55.2	65.2	71.5	69.6	91.9	103.9
变化%	*23.9*	*18.3*	*14.7*	*28.9*	*22.2*	*20.5*	*32.0*	*18.1*	*9.5*	*-2.6*	*32.1*	*13.1*
美国进口	100.1	102.3	125.2	152.4	196.7	243.5	287.8	321.5	337.8	296.4	364.9	399.3
变化%	*22.3*	*2.2*	*22.4*	*21.7*	*29.1*	*23.8*	*18.2*	*11.7*	*5.1*	*-12.3*	*23.1*	*9.4*
美国贸易差额	-83.8	-83.0	-103.1	-124.0	-162.0	-201.6	-232.5	-256.3	-266.3	-226.8	-273.1	-295.5

资源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

表8.1

作为榜样的美国经济

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30多年里，中国就从“后进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非凡的变化同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尽管有人不愿夸大美国作为市场和“导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同美国的关系的确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首先，在这个时期中，净出口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巨大的贡献（虽然将中国经济归为“出口驱动”并不十分确切），其中来自美国的需求是促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中国接受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因为它将美国作为其经济上的榜样。尽管鲜有中国官员将美国作为中国发展的典范，但是在1978—2007年的30年中，中国的决策圈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美国方式。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以及加入后的几年里，中国的决策者们时常学习美国的经济体制是为了将其运用于中国的独特模式中去。中国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对美国银行业、保险业、物流、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运行情况的研究中。尽管中国的政策专家常常言之凿凿地表示，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这些经济体制，但是这些剖析美国经济结构的努力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收美国经济结构的精华。

美国的市场和经济模式在改革全盛时期对中国的政策制定的影响，可以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力上找到端倪。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申请入世的过程中，充满了由于中国人渴望加入这一声名显赫的国际组织而产生的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两个现实的经济考虑是这一努力的主要动机。首先，时任总理朱镕基和其他改革者认为，国有企业和主管经济的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构成了以改革促发展的主要障碍。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举国目标，改革者有效地向国

内阻碍改革的势力施加了外部压力。毫无疑问，最有效、最有力的外部压力就是美国。美国正寻求通过由贸易代表领衔的谈判小组使中国的商业管制向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并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尽可能地与美国趋同。这并不是说美国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谈判就不艰苦，其实它们有时甚至是白刃相搏的。

表8.2　部分经济和金融指数，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增长率%	9,921.5 8.4	10,965.5 8.3	12,033.3 9.1	13,582.3 10.0	15,987.8 10.1	18,493.7 10.4	21,631.4 11.6	26,581.0 13.0	31,404.5 9.0	34,090.3 8.7	40,120.2 10.4	47,156.4 9.2
消费者价格指数	0.4	0.7	-0.8	1.2	3.9	1.8	1.5	4.8	5.9	-0.7	3.3	5.4
工业增值产出 增长率%	2,539.5 17.8	2,832.9 11.6	3,299.5 16.5	4,199.0 27.3	5,480.5 30.5	7,218.7 31.7	9,107.6 26.2	11,704.8 28.5	N/A 12.9	N/A 11.0	N/A 15.7	N/A 13.9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	3,291.8 10.3	3,721.3 13.0	4,350.0 16.9	5,556.7 27.7	7,047.7 26.8	8,877.4 26.0	10,999.8 23.9	13,732.4 24.8	17,282.8 25.9	22,459.9 30.0	27,812.2 23.8	N/A N/A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GDP相关数字的单位为10亿元。

表8.2

中国入世的第二个现实动因，在于避免美国国会中一年一度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给中国带来的尴尬和不确定性。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ck Amendment）允许美国有条件地向某些非市场经济体开放美国市场，不过同那些基于“正常”基础而同美国展开贸易的国家相比，这些经济体只能享受有限的优惠。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春季，美国同中国这一非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问题就会成为国会激烈辩论的主题，商业和劳工组织的代表齐聚国会山，宗教、人权组织的代表等也会加入混战。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将对中国的公开批评看作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因此这样的辩论是对他们的冒犯。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而言，更令他们担忧的是，每一年有关是否保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正常贸易关系”的讨论，会使有意投资中国出口产业的投资者感到巨大的风险——美国市场只是临时向中国开放的。加入世贸组织会使美国给予中国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也会使在中国出口产业的投资者更加安心。

显然，对中国来说，在1978—2007年的30年改革开放期间，美国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市场，也不是在经济政策上唯一的指路明灯。中国官方小心翼翼地学习了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那些行之有效且能为中国的发展所用的政策要素。但在很多方面，很多中国经济智囊将美国经济视为模范，决策者会认真采纳美国同行的政策建议。在入世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入世后的6年，当美国的谈判人员遇到他们不太喜欢的中国贸易政策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这些政策与美国的相关政策作对比。这并不能保证政策得到修改，但却能够保证他们的说法会得到认真的聆听。

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美国金融市

场的解体、从前秘而不宣的危险的揭露，以及美国经济因信贷危机而显现的脆弱性使一些中国人感到担忧，这些人希望实现美国式的经济体制，并为此“赌上了”职业生涯和名誉。正如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在2008年轻描淡写地揶揄说：“现在老师出了问题。”愤怒的失望、感到“受骗”的尴尬和在经济领域失去方向的紧张，三者构成了中国评论人士对危机和“老师们”的挫败感。危机也导致了一场关于中国为何能以相对健康的经济在危机中崛起的激烈讨论，同时也促生了界定和提出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尝试——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它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而不是因为与之相似或借鉴其政策。

无论如何，这场危机使中国官员对那些试图以正确的方式（也就是美国标准）劝诫中国官员的美国贸易谈判人员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再洗耳恭听。无论“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成为代替美国和其他西方模式而带来持久、公正的发展的新选择，中国官员越来越深信，在经济事务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向美国同行学习的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利益集团开始质疑两国贸易，并将中国看作战略、经济和规范方面的竞争对手。60年来的共识受到破坏，而这一共识曾支撑着全球自由贸易的议程并将建设性的对华接触作为亚太外交战略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两国国内都出现了有关不平等的质疑，这使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不再是两国政府所能够掌控的了。

公众互信的缺乏

两国之间关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当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应当对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负责时，很多中国人却认为美国的政策就是有预谋地使中国经济维持在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的水平上。在中国，有大量的论调认为，美国及其他外国利益集团在小心翼翼地限制中国进入商品的最终加工阶段，而这正是利润最为丰厚的环节，目前正掌握在美国和其他外国利益集团手中。中国官方和民众

经常抱怨说，国外投资者会通过保留在中国组装的产品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或为商品标定远高于他们支付给中国供货商的零售价格，从而在中国的出口中获得巨额利润。中国希望从中国生产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这一想法也体现在了许多政策中，但恰恰是这些使美国更加担忧中国在寻求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2010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在华美国商界对中国政府的歧视性法规日渐担忧。中国政府偏袒国内企业，一些政策限制了外资在某些领域的发展，而这些领域实际上已对外资开放了30多年。2010年11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次民调显示，58%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视为对美国的威胁，相比之下，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机遇。

幸福的依靠

观念的转变，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对两国经济关系不怀好意的鼓噪似乎掩饰了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特点。在1998—2008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也就是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的时期），这两大经济体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和显著的互补关系。现在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美国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工作岗位和生产力，同时也得益于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代替“美国制造”，但是这些看法经不起仔细推敲。

一来，这些看法忽视了超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在过去30多年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和我们向中国出售的产品不尽相同。很多时候，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是在中国进入国际贸易领域之前我们的制造业就已经停产多年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电子产品、玩具、服装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尽管此时这些经济体仍在相关的产业链

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时美国所进口的产品上已经打上了“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美国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对下降，当然所减少的部分被对华贸易中大幅攀升的赤字抵消。总体来说，美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产品目录很难解释工作岗位和制造业为何向中国流失。

再者，起初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是那些中国无法同美国形成竞争的产品，比如高端技术和工业产品，名牌产品以及中国以满足国内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而正在竭力生产的农产品。在这些领域，美国最初面临的竞争来源于西方和日本，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过去的30多年间，部分产品的生产工序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中国，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以及中国所组装的产品中高附加值工艺的输入都是中国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确定哪些来自中国的商品取代了美国商品方面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难题，即富有活力的全球供应链使得双边贸易甚至是地区贸易的统计数据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用于辨别进口商品来源的统计方法将产品的所有价值都归于该产品的最终组装地。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大量商品都是加工贸易型商品。也就是说，中国赋予这些产品的价值仅仅是组装材料所需要的劳动，那些商品的材料则来自东亚，甚至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换句话说，一件在中国大陆组装的商品包含了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技术，而它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则可能在美国。商品的其他原料，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过中国所赋予产品的价值，但是出于统计的考虑，这些进口商品一律被视为在中国设计和生产。

表8.3 美国与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赤字，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大陆	–83,833.0	–83,096.1	–103,064.9	–124,068.2	–162,254.3	–202,278.1	–234,101.3	–258,506.0	–268,039.8	–226,877.2	–273,063.2	–295,456.5
赤字率%	19.2	20.2	22.0	23.3	24.8	26.2	28.3	32.0	32.8	45.1	43.0	40.7
其他亚洲经济体	–142,763.6	–121,955.6	–126,258.0	–123,330.1	–141,534.7	–152,500.1	–162,109.5	–146,891.7	–126,677.9	–84,937.0	–94,220.9	–99,037.1
赤字率	32.7	29.6	27.0	23.2	21.6	19.7	19.6	18.2	15.5	16.9	14.8	13.6
文莱	–227.5	–295.0	–240.7	–385.0	–358.0	–513.1	–502.2	–264.9	–2.7	58.6	112.3	160.9
缅甸	–453.8	–458.5	–346.1	–268.8	11.7	5.4	7.5	8.7	10.8	6.8	9.7	48.8
柬埔寨	–793.9	–932.9	–1,041.8	–1,204.2	–1,438.5	–1,697.3	–2,113.9	–2,324.6	–2,257.3	–1,797.1	–2,147.0	–2,526.6
香港（地区）	3,133.0	4,381.4	3,266.2	4,699.3	6,513.5	7,459.3	9,795.5	12,875.7	15,015.2	17,479.6	22,274.1	32,214.8
印度尼西亚	–7,965.2	–7,583.0	–7,087.6	–6,998.7	–8,139.1	–8,960.4	–10,346.2	–10,331.6	–10,154.7	–7,831.6	–9,532.2	–11,696.4
日本	–81,555.0	–69,021.6	–69,979.4	–66,032.4	–76,236.5	–83,323.1	–89,721.8	–84,303.8	–74,120.4	–44,669.5	–60,059.6	–62,643.0
老挝	–5.4	–0.1	1.4	0.6	2.5	5.6	–1.7	–14.5	–24.1	–23.1	–47.1	–32.8
马来西亚	–14,630.9	–12,962.6	–13,665.3	–14,526.1	–17,328.7	–23,224.3	–24,089.1	–20,948.3	–17,786.6	–12,879.3	–11,820.5	–11,553.9
蒙古	–99.2	–131.8	–95.5	–162.6	–211.0	–121.8	–90.8	–57.5	4.5	25.7	103.9	302.3
朝鲜	2.6	0.5	25.0	8.0	22.3	5.8	0.0	1.7	52.2	0.9	1.9	9.4
新加坡	–1,372.0	2,651.8	1,415.5	1,422.4	4,027.0	5,356.0	6,057.5	7,224.9	11,968.7	6,526.9	11,590.2	12,282.3
韩国	–12,477.7	–13,000.8	–12,996.0	–13,156.8	–19,981.2	–16,209.8	–13,584.5	–13,160.6	–13,400.4	–10,603.7	–10,028.9	–13,130.5
台湾（地区）	–16,096.7	–15,252.6	–13,766.2	–14,151.5	–13,038.4	–13,211.3	–15,502.5	–12,448.9	–11,399.8	–9,876.5	–9,802.6	–15,429.4
泰国	–9,768.1	–8,737.6	–9,932.7	–9,348.2	–11,210.5	–12,633.1	–14,550.9	–14,418.2	–14,471.7	–12,164.1	–13,716.2	–13,898.5
越南	–453.8	–592.8	–1,814.8	–3,231.1	–4,169.8	–5,438.0	–7,466.4	–8,729.8	–10,111.6	–9,190.6	–11,158.9	–13,144.5
美国总贸易赤字	–436,103.0	–411,899.0	–468,262.0	–532,350.0	–654,828.5	–772,374.2	–827,970.0	–808,765.0	–816,200.0	–503,582.0	–634,896.0	–726,714.0
美国GDP（万亿美元）	10.0	10.3	10.6	11.1	11.9	12.6	13.4	14.0	14.3	13.9	14.5	15.1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单位：百万美元

表8.3

移动的沙与再平衡议程

对于认为美国经济基本健康并信奉美国经济政策的中国人来说，2008年后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心理上的冲击。不仅如此，对两国各自的经济结构的长期持续性的看法也因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了转变。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时，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而自1980年开始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速。而在2008年秋季，中国的家庭消费尽管在绝对值上是增加的，但是在GDP中的比重则下降到大约35%。这两个经济体是截然相反的：对美国来说，因低息贷款而膨胀的过度消费已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而在中国，相比于投资和出口，驱动消费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中显得并不重要。在美国的经济体制中，美国消费者对其支付能力之外的进口产品的需求同商品出口国（主要是中国）是否助长这些过度消费的意愿无关。对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官员而言，这样的经济体系，其长久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两国政府单独或通过磋商在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概念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奥巴马总统保证在五年内将美国的出口额翻一番，因此他也采取了多项措施，旨在刺激新的、生产性的投资（包括吸引来自中国的资本）。中国在2011年春季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着眼于经济的调整。中国希望通过减少公众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忧虑，同时将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移，从而促进国内消费。

认识到GDP结构的不可持续性，并有意调整GDP中各项的比重，这是一回事；而要通过重构两国各自的经济来修正经济的不平衡，则是另一回事了。美国要减少长期的消费，中国则要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这都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再分配和巨大的政治决心。即便是在处境最好的时候，这两者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在全球经济仍然疲

弱、中美两国仍处于艰难的政治转型的时期，限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转而希望其他因素能够取而代之，这完全是碰运气。对两国领导人来说，任何可能增加失业的举动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

在再平衡问题上的交易几乎很难达成。实际上，两国正各自作出努力，同时竭力劝说对方不要采取破坏性的措施。中国希望美国不要限制其出口（尽管中国试图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或限制中国资本在美国投资那些比美国主权债务工具收益更好的资产。而美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接纳更多的美国出口商品，同时也希望中国减少试图削弱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

再平衡不仅仅是中美经济政策中唯一的议题：两国都试图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美国（和欧洲）地位下降，而中国（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越来越强大——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由于一些为了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政策会被视为向非本国的公司制造竞争壁垒，所以这些政策本身会对两国间的再平衡议程和减少经济摩擦的努力产生短期影响。

表8.4　通过支出方法计算出的GDP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	9,874.9	10,902.8	12,047.6	13,663.5	16,080.0	18,713.1	22,224.0	26,583.4	31,490.1	34,631.7	39,430.8	未知
总消费支出	6,151.6	6,693.4	7,181.7	7,768.6	8,755.3	9,905.1	11,263.2	13,151.0	15,234.7	16,682.0	18,690.5	未知
占GDP%	62.3	61.4	59.6	56.9	54.4	52.9	50.7	49.5	48.4	48.2	47.4	未知
家庭总支出	4,585.5	4,943.6	5,305.7	5,765.0	6,251.9	7,265.3	8,210.4	9,651.0	11,059.5	12,113.0	13,329.1	未知
政府总支出	1,666.1	1,749.8	1,876.0	2,003.6	2,233.4	2,639.9	3,052.8	3,590.0	4,175.2	4,569.0	5,361.4	未知
总资本构成	3,484.3	3,976.9	4,556.5	5,596.3	6,916.8	7,785.7	9,295.4	11,094.3	13,832.5	16,446.3	19,169.1	未知
占GDP%	35.3	36.5	37.8	41.0	43.0	41.6	41.8	41.7	43.9	47.5	48.6	未知
总固定资本构成	3,384.4	3,775.5	4,363.2	5,349.1	6,511.8	7,423.3	8,795.4	10,394.9	12,808.4	15,668.0	18,234.0	未知
库存变化率	99.8	201.5	193.3	247.2	405.1	362.4	500.0	699.5	1,024.1	778.3	935.1	未知
物资和服务净出口	239.0	232.5	309.4	298.6	407.9	1,022.3	1,665.4	2,338.1	2,422.9	1,503.3	1,571.2	未知
占GDP%	2.4	2.1	2.6	2.2	2.5	5.5	7.5	8.8	7.7	4.3	4.0	未知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单位：十亿元

表8.4

争论的焦点

汇率

2003年，一些工业公司和劳工组织首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国会和小布什政府进行游说，他们认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币值被低估了，这使中国在向美国出口商品时获得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此后，来自纽约的国会参议院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同其他人一道推动立法，欲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以此纠正人民币汇率过低导致的问题。

虽然在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上有所分歧，但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有意地大规模压低人民币币值。如果人民币币值被低估，那么很明显，中国产品的成本会更低，人民币币值实际上是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对本国制造业进行出口补贴。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受到低估会产生不可否认的扭曲性影响，这会削弱一些国家同等发展的能力及同中国竞争的经济结构。因此，很多观察家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拖了全球增长的后腿。

事实上，即便算上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还是要比同等条件下在美国生产的产品更便宜，特别是在上文所说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了其他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的产品之后。这也说明，即使人民币币值发生足以使世界贸易格局改变的变化，中国的产业也不会转移回美国，而是会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并从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即使部分美国商品能够同中国竞争，对美国国内经济而言，总体上的影响是压制商品的零售价格，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公司从美国进口商品的能力。

考虑到美国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对中国贸易的赤字就成了

政治话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成为极富爆炸力的议题。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评论人士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同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联系在一起。不管汇率问题是否是两国间的双边贸易问题，这一问题已经使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黯然失色。虽然到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7.5%（这是美国早先认定人民币被低估的额度，也是2004年参议院议员舒默在他的法案中为惩罚性关税确定的额度），但是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还是正式通过了对汇率操纵者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即便没有指名道姓）。虽然该法案未被两院通过，但汇率问题仍然将是有关美国与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政治讨论的焦点。

美国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也使那些提倡更为自由的汇率机制的中国官员大为失望。这些官员私下对美国同行抱怨说，中国汇率管控事关主权，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干涉大大限制了像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机构改革汇率机制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举动会被认为是对美国利益的屈从。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汉克”·保尔森（Henry “Hank” Paulsen）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曾寻求淡化在汇率问题上同中国的公开冲突，以便给予中国人民银行一定的政治空间在内部解决这一问题——自由的汇率机制也会减少中国金融系统的压力并在处理通胀时赋予中国政府更多的手段。但是没有了美国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也面临着来自其他部门的抵制。

2003年末，在与时任中国央行副行长的会面中，笔者提到中国的汇率问题在美国产生了政治后果，因为它被认为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该副行长恼怒地表示，其实，“在中国，我们每天必须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以应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一内政问题远远超过了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特别是中国的商务部，汇率问题普遍被视为就业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拉迪（Nicholas Lardy）在过去8年中持续关注人民币的升值。他发现，随着人民币币值升高，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也在增长，这说明在人民币币值升高后，出口商的日子基本没有变得不好过。但是很多中国官员认为，在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如不缩小规模，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所获得的微薄利润将使它们难以为继。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在沿海出口工业聚集地，企业因受到不断增长的工资压力而将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加重它们的压力，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再注重传统出口密集型行业中低利润、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将重点放在了能够提高这些行业的利润和价值的战略上。

表8.5 人民币 / 美元的汇率以及美国的贸易赤字，2000—2011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汇率，人民币 / 美元	8.28	8.28	8.28	8.28	8.28	8.07	7.80	7.29	6.82	6.83	6.60	6.29
增值%	0.0	0.0	0.0	0.0	0.0	2.5	3.3	6.5	6.5	0.0	3.3	4.6
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赤字（10亿美元）	83.8	83.1	103.1	124.1	162.3	202.3	234.1	258.5	268.0	226.9	273.1	295.5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表8.5

国内优惠政策和市场准入

在通信、新能源、铁路和其他领域内，中国已经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典范。2011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占到了出口总量的35%。其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也十分惊人：201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了56.2%，而美国在同期则下降了1.7%。2010年中国有1万名工程学博士毕业，而美国仅有8000名（而且其中的中国学生和华裔学生有很多人计划回中国发展）。中国建设以企业为引领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努力引起了跨国公司和媒体上的警觉。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在2020年之前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该纲要提出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到2020年，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将加强技术创新作为国家目标对经济发展和提高民族自豪感都有好处。中国领导层着力提高中国的技术能力有其重要原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就任之初就认识到，过去30年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人口、环境和社会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在接受和改造已有技术方面（这也是一种创新）成效显著，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仍比较低。世界银行2008年的研究显示，1992年中国对加工贸易（即从外国进口材料和配件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再出口国外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整之后，中国的技能密集度就没有出现过变化。且不说像电信巨头华为这样的创新公司，在当今的中国工业中，创新企业仍是少数，更多的是不投入持续研发

的非创新企业。

2005年胡锦涛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中国的长期繁荣要建立在以效率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上，而不能基于初级产品的输入。要求中国企业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是十分明智的。但是，企业应当明白它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道路上也有一些教训。首先，盲目着力于创新而忽视了它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会使这些努力难以实现最终目标。对创新广义上的定义——不仅是发展前沿技术，也包括对现有技术的改进——会更有助于实现长期创造工作岗位和财富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技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限制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也会限制知识和效率的发展。将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这一目标看上去就像过去的出口代替政策一样，同样与自由市场政策背道而驰。须知，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自由市场政策。

第二个教训是中国政府应该明白何时结束其推动创新的努力，何时把这些交给市场来做。目前，促进大型国有企业的研发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恰恰对传统上能够产生发明和创造的激励因素不甚敏感。据估算，比起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利用每一百万科研经费所能创造的专利更多，每100名科学家所能发明的专利也更多。依靠国有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

最后，如果私有企业比国有大型企业更具创新能力，那么中国有必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能更好地鼓励私有企业创新。按照现有的发展路径，拥有更多政治权力的国有企业也许能更好地保护其发明不被盗版，但是这将使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私有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

跨境投资

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资本史无前例地涌向美国。中国利用巨大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境外国债持有者。截至2012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178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0959万亿美元）。此外，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也大幅增长。2009年和2010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额增长幅度都达到了130%。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为53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额已累计达到约116亿美元。

随着中国投资的增长，一些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战略选择，这种投资不仅为了获取商业上的利益，更是政府大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着眼于为中国获取自然资源和核心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结论便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和技术正在受到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来自中国政府所控制的投资。另一方面，那些对增长的中国投资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游说中国核心领导层，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有三种途径：（1）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2）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利用部分外汇投资美国股票；（3）通过新建投资和并购两种手段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其中，中国政府对前两种投资方式严格管控；对于第三种，一部分受到政府的控制，另外一部分则由市场驱动。

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0年以来显著增长，在2011年6月达到3.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约70%为美元资产。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了美国国债。为了应对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更能规避风险的投资战略，将资产

变更为分散地投资期货和包括股票、对外投资在内的其他硬资产，特别是投资于资源和技术。

美国对于中国的投资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另一种则担心中国的投资是由中国的战略考虑所驱动的，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悖，这也使美国的决策者对中国在“战略性”技术和资源资产上的投资深感担忧。在美国外资委员会多次审查之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Unocal）和华为收购3COM子公司的行为由于这些担忧而流产。

美国决策者担心，中国的海外投资会将国家安全的考虑置于企业的利益之上。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公司——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以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战略为导向。国有能源公司由于其糟糕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媒体严厉的批评，而其政府中的支持者也遭到了挥霍无度的指责。因此，中国政府很难通过那些仅着眼于安全利益的行政命令来推动非市场化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若是出于分散外汇储备目的，那么比起大型国企，让私营企业使用这些资金在海外进行投资在政治上更加可行，同时也会更加理性和以市场为导向。

产业政策

正如上文所说，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决策中产业规划的回归。鼓励某一产业发展而限制另一产业发展的政策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由来已久。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出版“投资目录”，该目录将各产业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层次。这一目录是省级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指南。“受鼓励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在高科技和提供大量就业的产业中）会得到相应优惠。以税收、土地和用工上的优惠而体现的补贴、

极为简化的管理程序以及其他优惠使中国经济中的某些产业比其他产业更受优待。

近年来，对产业的鼓励和抑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超的艺术。在中国，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官方团体，特别是被认为与国内所支持的产业打交道那一群人，正在迅速形成新的工业集团。很多时候，即使中国政府中不存在广泛的共识，这些集团也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来鼓励中国某些产业的发展，从而对美国公司及其员工形成挑战或让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一些有望发展成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不一定是国企）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殊的优惠。这些公司所获得的优惠各不相同，但是中国政府扶植它们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官方出于提升民族自豪感的目的支持中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竞争。当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产生利益冲突时，中国公司总能够因为“爱国主义”而获益。这一点在绿色能源技术领域尤为明显。考虑到中国国内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规模庞大，很多中国官员认为，绿色能源领域是中国公司可以在国际商业中大展拳脚的领域。

这些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会认为中国政府会不顾经济理性，而对中国公司进行补贴。它们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补贴将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和市场的扭曲，这在资源和商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新兴的中国技术公司却手握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支票本。

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管理机制

自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大大增加。为了促进对话与合作，并为中国同人提供一个学习美式经济活动规则的平台，很多经济机构和部门之间的会谈一再升级，并实现正式化。到2008年，大量的美国内阁成员和中国的部级干部实现互访，并就经

济和商业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3年，一年一度的双边合作机制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获得升级，中国方面派出了副总理，而美国方面的代表则是两名内阁官员（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这一原本为促进合作而建立的机制成为两国解决贸易和经济问题，回应公众对两国关系的关切的平台。2006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悄然搁置了两国财政部之间沉寂多年的对话（经济联合委员会），另起炉灶牵头建立了由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国副总理参加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该对话涉及许多美国内阁官员和相应的中国官员。保尔森的这一举动是希望将两国对双边商务摩擦的讨论上升到对全球经济战略的讨论。该会谈包含金融结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方面的讨论，美国希望中国能在这些问题上成为其全球经济管理的伙伴，而不是其经济政策的跟随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她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两国在合作气氛下解决实质性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些高层会谈之外，有关农业、能源、创新及其他问题的内阁和内阁以下级别的广泛交流，已经成为管理和维护积极的商业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从所达成的协议来看，这些对话的结果反映了两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努力，也能看到美中力图转移国内对两国经贸关系中所体现的不平等的批评。

结论

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成为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处理好这些问题，使国内一致支持向中国开放市场，这绝非易事，但也不是没有好处：除了个别时候的龃龉之外，无论怎么衡量，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都是极其成功的，也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美国的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是其全球业务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很多公司正

在扩张它们的在华业务。尽管如此，两国的贸易问题仍在不断增加，同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实质性进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原因之一是中国官员似乎不再把美国同侪当回事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者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等外部压力使市场经济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认为入世的失大于得；有的人甚至怀疑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世贸组织的原则——这些原则多数是在美国领导下形成的——是否能够兼容。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意味着两条核心原则：开放市场（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状态）以及国民待遇（一个国家应该在该国市场上给予外国人同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应当相互承诺彼此开放，并将此作为国家利益。世贸组织的成员认识到遵循这两个原则所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国内企业很可能转瞬即逝的狭隘的利益。世贸组织在某一方面是很大胆的创新：使主权国家转让部分权力，来约束和控制它们的经济。通过打破贸易壁垒，世贸组织和该组织所代表的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共识都主张，一个没有国界的商业世界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一共识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许多利益和财富。但这一共识是十分脆弱的，而且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身上似乎也找不到替代方案。

作为这一共识新近的参与者，这一状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的经济健康和福利非常依赖一个高效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来管理国际贸易。美国在领导一个更为稳健的世贸组织自由化进程问题上左右摇摆，也难以清晰地阐明其对贸易政策的愿景（除了一个地区性颇强的方案之外）。

每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地方政治都会破坏国家对开放市场和国民待遇的国际承诺。每个政治体系中的国内行为体都会也都愿意参与（有时甚至是控制）政治进程，从而以一种与世贸组织根本精神相悖的方式维护它们的利益。所以毫不奇怪，中美两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两国遵循世贸组织的原则。但问题在于，如果排斥世贸组织的原则，

中美双方都会摒弃各自经济成功的本质要素，也会对其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困难，更会侵蚀双方建设性接触的根本基础。像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十分有用的机制，但是这距离建立一个两国贸易关系的可持续的双赢途径还很远。

如果中美两国希望建立一种既能保护自身国家利益，又能给对方保护其国家利益留有一定空间的关系，那么两国之间成功的经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对成熟的贸易关系都面临国内政治的压力。但是双方必须达成一致，至少双方必须认可某一核心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附和美国的世界观，也不意味着美国必须为了更大的外交利益而放弃国内的经济利益。但是，美中两国间的关系日益变得不协调，缺少共识。经济关系一度是联系两国的纽带，但现在却可能使两国翻脸。40多年的商业互动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关系。官方来往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两国中其他的利益攸关者对于推动这种关系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应对政策挑战和向各自的公众展现它们对建立高效的双边关系的承诺等方面，两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美经济中的利益攸关者的直接联系和对话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公众对两国关系的讨论并没有抓住中美关系的进步和取得的成果。如果中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实现其潜力，两国利益攸关者之间的交流就必须反映出这种前进的态势。

第9章 文化关系

劳泰瑞（Terry Lautz）

文化可缓解国家间及民众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其互信。文化能够赢得人心以实现国家和政治目标。文化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增进理解的桥梁和展示实力的手段，但是，这一点却常常被政策分析人士忽视。相反，他们更注重国家间的外交、经济、军事关系等“硬”的安全问题，却忽略了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在塑造形象、影响舆论和传递价值方面的作用。

本章分析了近年来中美文化关系所展现出来的趋势。文章首先介绍了两国政府如何利用文化来提升形象、增强影响力，接着分析了中美社会之间随着中国的财富和机遇增加而兴起的一些交流形式，这些交流多是通过大学、非政府组织、智库、基金和艺术界进行的。本章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在同中国进行的文化影响力甚至软实力的竞争上，美国是否正面临失败？文化交流是否创造了更多的互信和自信，而不是摩擦和忧虑？展望未来，又有哪些教训、机会和需要关切的问题？

两国对彼此的看法历来是复杂和矛盾的。模板、伙伴、自私的恶

霸、霸权国家，这些都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而美国不是认为中国弱小且贫困，就是认为它危险而充满敌意。这些正面或负面的看法不稳定地混杂在一起，纠缠于两国关系之中。这个问题主要可以用美国的家长作风和例外主义来解释，此二者在美国历史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其他国家相比，前往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显然更多，他们给中国传递着一条信息：只要接受基督教和西方价值，现代化就会接踵而至。很多中国的教育家和领袖人物同意外国人的看法，并同他们一道建立了大学、医院和减少饥荒项目。但是中国政府有时会将这些机制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明证。正如唐耐心（Nancy Tucker）在其章节所言，在20世纪前50年里，试图以美国的意愿再造中国的尝试以戏剧性的失败而告终。

中美关系的新纪元随着1971年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交流而开启，继而尼克松总统在次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随之而来的是大熊猫、剧团、体育团队和学者，两国期望这些善意的努力能为两国的官方关系赢得群众支持。冷战带来的孤立已经给双方对彼此意图的认识造成了危险的扭曲。

中国同美国进行接触，被视为美国人改变中国的又一个机会。通过文化和贸易接触引导中国发展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这成为美国人不言而喻的希望。这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信奉的“和平演变”战略异曲同工。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中国领导人对于那些被他们称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价值观所具有的腐蚀性仍然心存怀疑。他们质疑美国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并认为应当重视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争论仍在继续。2011年，胡锦涛强调要加强中国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中国随即在2012年1月推出禁令，限制“低趣

味”的选秀、竞赛及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数量，增加新闻和教育性节目的播出。

即便是邓小平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1979年启动两国学生交流项目时也是各打各的算盘。务实的邓小平希望通过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培养来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高等教育遭到的破坏。许多中国学生被派往美国主要进行理工学科方面的学习，同时，大量美国学生和教师来华进行中国研究。卡特和邓小平都认为，指导方针应该是平等、互惠和互利的，但事实远非如此。

不过，其产生的结果是积极的。正如李成（音）所言，中国的对外学习实际上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国际金融、国际法、宪政和公共管理等新的学科建立了起来，中国的大学还开设了有关人权、环境与气候变化、宗教、性别问题以及同性恋的课程。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精英并不见得比“本土精英缺少民族主义感情，或更加亲美”。相反，“海归”学生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但是他们对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中国的巨大社会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存在摩擦和怀疑，但总体上，文化交流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中国人喜欢好莱坞电影、NBA以及麦当劳，而美国人则对针灸、艺术展和武术十分推崇。中美之间的旅游业日益兴旺。此外，21世纪以来，美国家庭已经收养了超过6.5万名中国儿童。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得学习英语，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也开始学习中文。成千上万的交流项目推动着两国关系。双方的这些联系值得欢欣鼓舞，它们有助于克服误解，并有利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不过，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两国在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这些联系中也会出现问题和风险。

中美之间的文化外交

中美官方现在越来越注重公共外交和两国关系中的文化维度。其中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2010年5月启动的中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该机制在北京和华盛顿轮流举行会议，目标是“提高和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联系”。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补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其视为“建立两国政府间合作的首要对话机制”。

中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是一个高层论坛，交流信息的渠道，也是鼓励双方增进交流的一种方式。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和妇女问题已经被视为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文化交流包括在表演和视觉艺术上的青年发展协助，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联合主办的文化论坛，博物馆和图书馆间交流以及由费城交响乐团、美国西部牛仔竞技表演（Rodeo China，向中国介绍美国西部文化的团体）、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和常青藤学生理事会（Ivy Council，常青藤联盟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的合作机构）等团体所组织的项目。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认为，该机制“不仅能够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同时也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文化外交

胡锦涛在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将“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领导人相信，输出中国的文化将会提升其国家形象、赢得尊重，并帮助其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这也能够缓解外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胡锦涛的政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增长也体现了这一政策。

2011年9月，时任文化部长蔡武向美国听众介绍了“基于人伦关系

的开放而包容的中国文化它体现了辩证法的中庸哲理，以及能够防止偏狭与偏执的和谐、平衡的理念。同时，中国文化也表现出一种既深且广的博爱精神和慈悲情怀”。蔡武还表示，中国从没有把弱小国家作为殖民地，中国古代对外的经济往来，也一向以和平互惠的方式进行。总之，“千百年来，中国人崇文而不尚武”。他说，这种和谐文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种文化依赖于“一个和平、安宁、稳定的国际环境”。他总结说，“我们应该通过交流深化相互理解，通过对话增加相互信任，通过交往扩展共同基础”。

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其软实力的龙头项目，该项目是为了在国外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孔子学院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这是由政府资助的机构，通常被称为“汉办”。2004年马里兰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截至2011年，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达到75个，而在世界各地已经有350多所孔子学院，总共耗资约5亿美元。隶属于孔子学院的500多个孔子课堂还为中小学生提供教学资源。大多数孔子学院都建在大学里，这区别于法国、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所资助的独立的文化中心。他们在中国的伙伴大学为其提供师资，而国家汉办不仅为其提供教学材料（但不要求必须使用这些材料），还每年都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201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有超过2000名代表参加。这些项目中最为活跃的项目包括：匹兹堡大学（该大学帮助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教师和高中）、俄克拉荷马大学、犹他大学和芝加哥公立学校等项目。2011年1月胡锦涛视察了在芝加哥的项目。

每一所孔子学院每年会得到国家汉办10万美元的拨款，同时孔子学院也需要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对等的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是提供师资和办公场所。随着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等名牌大学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一种双重体制正在形成。斯坦福大学每年获得100万美元，同时提供100万美元，供相关的会议和项目使用，此外，它还会得到100万美元的研究生奖学金，另有200万美元用于

在孔子学院资助一个有关中国诗歌的教授职位。这样一来，斯坦福大学每年总共能够从孔子学院的项目中获得400万美元。

孔子学院拥有相当的自主性，没有证据显示国家汉办干涉各学院的工作。孔子学院在资金的使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弹性。很多孔子学院把精力集中在小学和中学，有的则着力于商务，有一个孔子学院甚至专注于京剧。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中国的资助只是预算中的一小部分。孔子学院能够创造或强化同中国大学的关系，为学术研究、交流和招生提供机遇，这也是该项目的一个激励因素。对中国来说，孔子学院是获得新受众的一种划算且有价值的方式。

美国的文化外交

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美国在华公共外交的详细报告，其中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软实力竞争表达了忧虑。在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要求之下，该报告称，中国发起的一些充满活力且经费充足的项目连美国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已经被中国赶超，中国能够利用美国开放的体系，以不同的方式散播其信息，反过头来却可以用它自己封闭的体系阻碍美国的相关努力。”正如中美之间失衡的贸易一样，“当直接与其他国家的公众打交道时，我们会面临另一场失衡的竞争”。

尽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增，卢格的报告仍指责说，中国已经阻碍了美国同中国公民接触的努力。中国在美国建立了孔子学院，而美国却无法开展对等的项目。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大型的文化中心——只有五大“spaces”。美国资料中心——建于各驻在国图书馆中的资料中心——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富布莱特项目十分活跃，但是共同资助十分有限，而且有关建立中美合作的富布莱特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能成功，而这在其他国家早已建立。

报告表达了对美国可能在信息战中输给中国的担忧。2011年5月，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纽约时报广场设立办事处，中央电视台出现在很多美国的有线频道中。中国的国家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美国9个城市发行（当然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舆论要另当别论）。相比之下，只有两名驻京记者的美国之音（VOA）已经缩减了普通话广播和电视，其粤语服务则被完全取消，它已经将精力转向网络和社交媒体。

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10月仿照孔子学院的模式，给予美国相关机构近100万美元，与中国大学合作建立美国文化中心，旨在介绍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办的美国文化中心成为其中的试点；这两所大学有很多联系，其中就包括合办孔子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华的公共外交所受到的限制包括国会预算的削减、对安全的担忧（限制了同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接触），以及美国将外交重点放在伊斯兰世界等。冷战之后，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于1999年取代了美国新闻处，这标志着公共外交重要性的下降。不过说到底，美国政府各机构在介绍美国文化和价值上并不是最有效的。多元而富有生气的美式生活实际上通过媒体、电影、电视、广告、非政府组织等多种交流形式，由私人领域的个人和机构进行传递。

文化理解的方式

教育

教学是中美文化交流中最有效的方法，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数量都要多。2010年到

2011年，大约有157558万名中国学生（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2%）前往美国大学学习。来自中国的本科生所占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上一年度人数增加了43%。其中绝大多数人自己承担全额学费和食宿费用。很多人甚至向招生人员支付了大量费用。同时，有很多难以达标的学生使用伪造的文件，这也招致许多抱怨。

相比之下，2010年到2011年间，有1.4万名美国学生前往中国，而十年前这一数字只有3000。这使中国成为美国第五大留学目的地，不过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只占赴海外留学的美国学生总数的5.1%。（前四位的国家依次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另外，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另有1666名美国人在中国参与各种项目。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问中国时曾呼吁扩大这一数字。随后国务卿希拉里宣布了“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期望到2014年能够将前往中国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数量翻一番。与之相关的目标是，为弱势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便更多不同层面的美国人能够对中国有更深的理解，并为投身全球经济作好准备”。其对象包括社区大学、初高中学生、非裔和拉丁裔学生，以及相对贫困和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为了帮助该项目获得所需的6800万美元的经费，卡特皮勒、摩托罗拉、花旗集团和可口可乐全力资助了许多学校和海外学习项目，美国国务院也发动各个基金会提供支持。中国也为该计划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国家汉办为美国高中生、校长以及美国的汉语教师提供了1万个前往中国进行短期学习的“汉语桥”奖学金名额。2011年4月，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决定为美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再提供1万个为期4年的奖学金名额，以支持他们在华学习。中国在美国的6个领事馆每年都会给美国的大学50个奖学金名额，同时中国地方政府也会为外国学生提供经费。

美国政府为许多资助美国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教师前往中国或其他国家从事研究、语言学习和文化研究的项目提供了大量经

费。这些项目包括富布莱特项目、本杰明·吉尔曼国际奖学金、伯仁国际研究奖、国家安全教育计划、国家安全语言青年计划（针对高中生）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同样也遇到过挫折。如2011财年给国家资源中心项目的拨款从3400万美元减少到1800万美元，减少了将近47%；该项目在美国许多大学中开展，以支持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地区研究。另外，富布莱特—海斯博士论文海外研究项目也被取消。

尽管研究中国的美国人要远远少于研究美国的中国人，但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平很高，相比起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仍不完善——虽然中国人更了解美国的流行文化。中国学者渴望更加细致地了解美国，但是由于当前的政策问题（如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学者对英语语言和文献的过分投入（而非重视文化和历史），使得他们对美国社会有着先入为主的看法。一名中国分析人士表示："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美国总统的讲话，而是应当研究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来帮助我们阐释美国的行为和决策。"

美国研究学会、港美中心、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美教育基金会以及中国富布莱特学者项目都在积极地阐释美国历史和文化，但仍需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和机构间交流。美国的基金会、智库和大学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所提供的支持远远不够。另外，美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相当自负，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很容易被人理解。

语言教学

英语教学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具有中心地位，中国对外国英语教师的需求依旧很旺盛。对此，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作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设有英语教学项目办公室，负责教师培训和课程开发，美国驻华大使馆设立的地区英语项目办公室负责协调相

关工作。另外，和平队也有138名志愿者在中国教授英语。

很多美国青年通过科罗拉多中国委员会、铭贤联合会、普林斯顿亚洲、斯坦福亚洲志愿者、世界教学组织（由哈佛学生创办）以及雅礼—中国协会等非营利组织有机会到中国做英语教师。这些组织都提供了深入进行跨文化学习的良好机遇。

美丽中国——原名中国教育行动——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北京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8年，隶属于成效显著的美国教育。除了岭南基金会和卢斯基金会提供的启动资金外，美丽中国从高盛集团和香港的李嘉诚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在这个项目中，来自中美两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会被派往缺乏师资力量的城镇，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美国大学生主要教授英语，中国大学生则教授理科和数学。中国的学校为支教人员提供住宿和一半的薪水，美丽中国项目要求每个支教人员都能够享受到淋浴和网络服务。2010年，有60名教员在云南的20所中学里支教，2011年这一项目将扩展到广东，届时将有180名教员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16年参与者能达到1000人。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2009年，美国有近61万名大学生报名学习汉语。许多双语和双向浸入式（two—way immersion）项目在美国的出现说明中文热并非昙花一现。虽然犹他州的亚裔人口不多，但该州小学仍开设了17个浸入式中文教学项目。（洪博培曾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他在担任犹他州州长期间，对这些外语项目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些项目中，学生们在一天中有一半时间使用英语，另一半时间使用中文。犹他大学的埃里克·奇普曼（Eric Chipman）表示，“这种项目的需求很大，每个学校都有大量的人等待入学”。2011年至2012年间，中国汉办向犹他州派遣了30名汉语教师，其中的6人负责双向浸入项目，其余24人则负责教高中和初中。由于中国是犹他州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商务活动是解释犹他州拥有众多汉语项目的首要因素，此外，对东方文化、哲学的兴趣

以及摩门教的影响对此都起到了作用。“多数从事浸入式汉语教学的非母语教师曾经是传教士，而这些项目的很多学生，其父母也是传教士——他们认识到能够说流利的汉语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他们希望子女也能学好汉语。”奇普曼说。

许多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中国促进中小学教育。2011年，约1200人参与了在旧金山召开的全美中文大会。管理中文进阶考试的美国大学理事会通过中文和中国文化行动为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帮助，同时也同中国孔子学院总部联手与全美的地方学校和私立学校展开合作。全国亚洲教育联盟为美国中小学的亚洲研究举办研讨会并提供其他资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起的全国中美教师教育交流计划得到了弗里曼基金会的资助，过去5年间，已向两国派遣了约400名教师。

美国大学在中国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很多美国大学纷纷涌入中国合办大学，这与传统上在海外进行研究和语言学习的模式大为不同。中国会确保外国学生的人身安全，给他们提供安定的政治环境，当然也会带给他们中国美食、令人激动的异域生活经历以及工作前景。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大量的留学生和外国学者的到来能够促进它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同样也能弥补因大量天才学生流向海外而造成的人才流失。

另外，当美国大学面临财政困境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校长托马斯·乔治（Thomas George）毫不讳言建立四川密苏里大学的原因。他说：“我们可以从中赚钱。”根据协议，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以及天府学院将进行合作。这两所美国大学将帮助设计课程，而该校中国学生的最后两年将会在密苏里度过。通过合作，两所美国大学每年能够获得400万美元的收入。

许多合作是工商管理类项目，这些领域能够迎合中国提升其在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需求，所以毫不奇怪。哈佛商学院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合作推出了中英文双语教学的高级管理课程。该项目为期三周，分别在中国和哈佛大学进行，培训费用高达4.5万美元。哈佛大学面向中国推出的全球CEO项目同样为期三周，费用为7万美元。

美国的大学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办事处来协调大规模的海外学习、学术研究和交流项目。设立于2010年9月的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要负责三项工作：商业、经济和政策；医药与公共健康；文化、社会和艺术。2012年，斯坦福大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斯坦福大学中心，“作为斯坦福大学师生在中国进行研究、教育项目的基地”。一位在香港的斯坦福大学校友为该项目捐赠了500万美元。密歇根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在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研究项目上进行了合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计划在上海启动工程研究项目。

根据位于伦敦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报告，已有9所美国大学在内地或者香港开设了分校。1986年由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最早的中美合办教学研究机构，它开设一年制和两年制的硕士班。近期，从中国移居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本杰明·杨（Benjamin　Yeung）向该机构捐赠了1000万美元，这将为两所大学的科研和交流创造新的机遇。

纽约大学将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于2013年在上海浦东开办新学校。纽约大学称，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提供文理通识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园相似。该校将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为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海市政府为该校提供初始资金。

与此同时，杜克大学与江苏省在距离上海65公里的昆山共建了一个200公顷的校区。这个将在2013年揭牌的学校在杜克大学的教职工

中引发了争议，他们质疑建立该校的决策过程，并对学术自由以及建校将花费的4000万美元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表示担忧。尽管宣称要建立一个综合性大学，但昆山杜克大学首先开设的将是工商管理课程。该校学生将分别在昆山和北卡罗莱纳接受教育。

非政府组织

美国的私立机构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推动了中美之间的教育、对话、倡议和交流。它们在医疗保健、人道主义援助、法律和人权以及环境等问题上提供培训或技术性援助。这些行动的目标都是促进目前规模不大，但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与中国的部委合作来实施各种项目。总部位于波特兰的美慈组织就是一个例子。该组织为少数民族、农民工和农民提供帮助，并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参与了救灾援助。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在生物多样化、气候变化、能源和其他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行动，并资助了许多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该组织以大熊猫作为标志）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同时在中国拥有6个地区办事处和80余名工作人员，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森林可持续经营、优化药用动植物贸易管理等工作。

宗教性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有很大的自由度。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世界宣明会、安泽国际救援协会、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以及仁人家园拥有庞大的人员和预算。尽管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其他宗教活动是被允许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东门国际已经在中国发放了数百万《圣经》，并建立了50座教堂和超过200座图书馆。

很多组织都在促进教育和交流。1966年成立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深信健全而富有成效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因而致力于促进美国同大中华地区的理解与合作”。该委员会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陈述各自观点的平台，培训教师、议会工作人员及青年学者，同时设立了旨在让两国公众增进了解的项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组织是百人会。这是一个无党派组织，旨在“使华裔美籍领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上发出统一的声音”。

中国官方对于私人领域的扩张态度颇为矛盾，在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限制性的法律、内部管理和治理结构的缺陷、全职专业人员的匮乏以及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但总的来说，中国对这些组织——它们能够增强中国提供培训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的容忍度在增加。

智库

美国主要的智库几乎都有研究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国内问题、区域、全球实力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智库通过讲座、会议、政策出版物、在国会作证以及同美国政府机构的交流来向公众和媒体传递信息。部分智库还出资赞助了讨论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议题的非官方二轨外交会议。这些智库的资金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赞助，也有一部分来自情况说明会、研讨会和课程所得收入。

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全国亚洲问题研究所、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都在对与中国相关的内政、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性问题进行研究。它们的议程涵盖卫生、能源和气候变化、贸易、经济、政治、战略等。

美国专家也会与中国同行交换信息，交流意见。已有两个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促进“美中两国的学者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合作或单独的研究”。卡内基基金会也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它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学者，“针对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合作开展研究，这些问题包括：核不扩散与裁军、国际经济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能源；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安全挑战，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等”。当然，获得来自中国的资助是这些机构在北京设立相关机构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

前往美国的智库和大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的中国研究生和政策专家很多，但长期在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却不算多。尽管许多较为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流利，其中也不乏华裔，但是许多高级中国问题专家汉语水平不够高。许多中国的研究机构对国外的学者表示欢迎，但是缺乏与之配套的组织良好的项目。中美两国在政策方面的合作研究相当少见。

基金会和慈善组织

私人基金会在中国的关注领域与非营利机构和组织略有重合，包括教育和文化交流、扶贫和医疗保健、中国公民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中的作用。

弗里曼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和斯塔尔基金会致力于教育和交流事业，以促进美国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并非巧合，因为这三个组织的创始人——霍顿·弗里曼、亨利·卢斯和斯塔尔——年轻时都曾在亚洲待过。其他基金会则着眼于跨国性问题。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关注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蓝月亮基金会关注环境问

题。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中国防治艾滋病。

福特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培育本土组织，且每年会为此提供1200万美元的资助。福特基金会特别重视对贫困人口、妇女、移民、少数民族及其他团体的帮助。亚洲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重点关注法律发展、治理、妇女权利、灾害管理、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对福特和亚洲基金会本土员工的薪酬规定十分复杂，但并没有干涉基金会的其他工作。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南方的环保项目。其中之一是同北京的全球环境研究所以及华盛顿的气候战略中心共同管理的降低碳排放项目。该项目的主任郭慎宇女士经常往返于纽约与广州之间，致力于培育中国本土的基金会，帮助非政府组织提高获取资助的能力。郭慎宇表示，现阶段出现的中国慈善组织“有钱却不知道怎么进行捐助”，其管理和吸纳大额捐助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许多团体与中方同行展开合作，交流最佳行动方式，以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的统计，2011年中国已有1186个私人基金会，自2004年管制放松以来有了显著增长。公众对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7万多人死亡，50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反应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的转折点，尽管其中多数捐赠仍然来自企业。

位于纽约的美国基金会中心与成立于2010年中国基金会中心共享信息和数据库。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也同一批新近出现的中国慈善机构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和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在2011年8月发起建立了中美战略慈善平台，希望能够建立“中美慈善领袖合作平台，促进创新型慈善”。该平台建立了五个联合委员会，负责五个领域的工作：法律问题（包括税收政策）、能力建设、社会事业投资和创新、

非营利部门、透明度和公信力。

随着中国日益富裕，美国的基金会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其中两个主要问题是：首先，如何能够让慈善事业在中国得到支持，美国的基金会在这方面如何提供帮助？其次，美国人能否将他们的计划同中国的现实协调起来，特别是在像法律和人权这样的敏感领域。

艺术团体

艺术交流的形式通常会令人惊讶。华盛顿国家纪念公园上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花岗岩雕像出自中国福建雕塑家雷宜锌之手。2011年，华盛顿、费城和纽约举办了前所未有的联合音乐会。

许多新的合作正在出现。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由亚洲协会和阿斯彭学会联合举办。2011年11月，该论坛耗资100万美元的启动仪式在北京召开，活动包括电影、对话和表演等，两国知名的演员、音乐家、导演和作家参加了该论坛，其中包括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马友友、乔尔·克汗（Joel Cohen）和谭恩美（Amy Tan）。2012年，一个由中国文化界名人组成的代表团将会回访美国。

随着中国对国内文化投资的增长，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同一家中国国企之间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将在天津合作建立一个新的艺术中心。林肯中心将“提供有关表演内容、运营模式、设计和建筑的建议，并为其进行员工培训”。林肯中心的发言人表示，希望这次合作能够“促进中美两国艺术家和艺术团体之间的交流”。

博物馆在塑造文化认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在北京和上海

举办的“美国艺术300年：适应与革新”是首个反映美国艺术发展历程的展览。2010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合作举办了一个关于生活与文化的展览。有关中国传统艺术的展览在美国吸引了一大批观众。亚洲协会、华美协进社与国际摄影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和摄影展，一些在中国不一定被人接受的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大受欢迎。

结论

在教育、政策研究、慈善、艺术和其他一些领域，中美之间的合作已经使彼此大开眼界。这些合作有的是公共的，有的是私人的；有的是正式的，有的是非正式的；有的是机构间的，还有的是个人的。30多年前，中国一贫如洗，它自身的传统也刚刚开始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恢复过来。为了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将最优秀的人派往海外接受教育，虽然他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再回来了。在迎头追赶的过程中，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一边倒”的，因为美国总是老师，中国总是学生。如今，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也开始资助大规模的文化外交，并要求世界正视中国的软实力。

这种局面是否会因为中国的富强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而扭转？美国是否会像2011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所说的那样，在同中国的文化竞争中节节败退？美国的外交官面临着中国方面带来的阻碍，而在文化实力的构建上，中国确实比美国投入了更多的财力。国会削减美国大学在国际教育上的预算着实令人担忧。在美国，更多人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被视为可喜的现象。同样，美国国务院对设在中国大学中的美国文化中心的支持对中国公民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但是现状仍然不平衡。前往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比

前往中国的美国相关人员的数量多9倍——双方政府都在努力提高这一比率。由于中国人过分重视科学和商业，因此他们对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缺乏深度。相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力更强。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的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十分熟悉，而美国人却不怎么欣赏中国的流行文化。不过，最严重的失衡则在于美国是通过私人组织来传递文化价值和规范的，而中国则过分依赖政府。

这些不平衡没有打击中美社会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的动力和热情。从本章的事例来看，总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现在，双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联系，更多的共同利益，更多的合作以及更多的交流方式，而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领域美国也向中国方面传授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依然面临危险。首先，人文交流能够消除固有观念，引发共鸣，促进理解。但是，如果中美两国民众不能正视各自的设想、动机、目标、职业和教育标准、法律法规，那么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加可能事倍功半。

另一个风险在于，两国文化关系的商业化和货币化。这在美国的相关机构中——无论它们多富有，多有名望——造成了淘金心态。那些能够支付全额学费，却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会导致投机主义的出现。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争相在中国开设联合项目和双学位项目、设立分校区会造成标准的降低和期望的幻灭。现在美国同日本之间已经鲜有合办的教育机构了。

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不应被视为零和游戏。文化实力不仅仅是数字、金钱或政治，其内容必须是有趣、有用和可靠的。美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它来自个人的自由表达和创新。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2010年进行的民调显示，美国的软实力依旧远远强于中国，这种实力更多地

依靠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美国的软实力来自许多资源：从好莱坞到哈佛，从麦当娜到盖茨基金会，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到奥巴马的选举。如果美国政府的言论同国内的现实不一致，那么它们恐怕很难对别人产生吸引力”。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民众都对对方表示过长期关注，有时是羡慕和模仿，有时是嫉妒和敌视，这取决于各自的需求、机会以及政治环境。深入和广泛的文化交流减少了误解，但文化仍然是两国的竞争领域。美国断言民主是普世价值，而中国则强调儒家美德。如果中国依旧不能勇敢地接受多元化，那么中国人仍会觉得还是美国的月亮圆。

第10章 军事安全关系

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

迄今，中美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未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判断当前仍然是准确的，但其中的不确定性却越来越明显。本章的重点便是这些变化中的问题——它们总体上展现出一幅前景暗淡的画面。但是，这并不是两国整体关系的准确反映。正如本书的其他章节所阐释的那样，两国关系中有着许多制度性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际上的因素，它们能够缓解这些紧张关系。其中，如同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其一章中所强调的，中美两国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制度中更为广泛地融入，是两国关系中最稳定的因素。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很可能超过安全领域存在的负面因素。

在评估两国关系的时候，要切记勿陷入最悲观的假设之中。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可参见本书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的相关文章]不同，尽管安全困境（受本性驱使，可以得到缓和）是中美竞争的重要原因，但两国关系并未笼罩在零和游戏的阴影中。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国家利益的冲突，但这些利益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冲突并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可供双方纵

横捭阖的空间，以减少最坏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新的安全考量

中国正日益强调其军事上的全球利益。2004年，胡锦涛提出，解放军要“履行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战略方针继承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国际环境的积极看法，改革开放期间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保卫中国国土完整的诉求。但这一方针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胡锦涛要求“军队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国际安全。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核不扩散、全球公域的保护（包括国际水域、外太空等）等问题变得相对重要起来，这些问题也需要多方进行合作。美国重心的改变也反映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上。美国的政策仍然明确否认要“遏制”中国，而是呼吁“战略稳定”。

然而，从军事角度看，安全利益是首要的。这一点在两国将军事需要放在预算优先事项上有明确的体现。过去15年中，中国军费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而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在700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对外援助和外交开支的15倍，将近占到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

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关安全问题的交流很多。本章将以中国为中心，分区域对它们进行介绍。文章将由中国近海周边地区延伸到中间地带，最后扩展到全球问题，以此详细介绍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在每个按照地域划分的板块中，文章会在评估中美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之前，讨论双方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通过对这些区域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均势正在向中国方面倾

斜；不过这一趋势只是在接近中国的近海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因此，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分歧给两国的战略关系带来了潜在的困扰。在外围区域，冲突并不那么严重，天平也更偏向于美国。总之，两国关系中既有传统的安全困境，也存在常规的利益冲突，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近海和周边地区

在中国附近的海域，中国对安全利益的关注最为强烈，也最为敏感。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多数陆地边境都有天然的屏障，但中国的海岸线一直让它感到担忧。

台湾海峡

虽然近年来两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台湾问题仍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问题。双方都希望避免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除此之外，北京希望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而华盛顿则希望台湾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双方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胡锦涛在统一问题上的语气较为温和（如，通过宽松的方式达成统一的时间表，并与台湾进行务实的接触）。不过，在胡锦涛任期内，军事现代化增强了大陆对台湾的威慑能力。

从小布什政府至今，美国一直在同台湾强化非官方关系。美国与台湾的“正式”接触始终让大陆颇为不满。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描述以外，美国不断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可以说在这十多年里，美国加强了对美台关系的政策表述。其中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对台军售，军售已经变得更为“常态化”，同时伴随着美国与台湾防

务部门更密切的军事交流。近年来的大规模军售包含了台湾军方（或军事预算）能够消化的所有项目。除了先进的武器之外，双方之间的合作还涉及台湾防御能力的原则以及其他“软件”方面的改革。虽然高层的政治接触尚未解冻，但许多双边动议进行得如火如荼。美国向台湾出售导弹防御系统是最令大陆感到不安的一个问题。这些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化解大陆威慑台湾的主要武器所带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交易显示了美国与台湾合作的程度，这令大陆十分不悦。

正如任雪丽（Shelly Rigger）在其章节中所探讨的那样，民族主义在台湾正在不断强化。这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专属经济区和实地侦察问题

美国在中国领海附近的侦察和打着“航行自由”旗号的巡逻已经诱发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它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现行规范——包括抵近侦察、国际水域的原则（这是美国方面经常引用，但缺乏法律依据的条款）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美国并未签署该公约，但美国通常都支持这一“习惯法”）。美国遵循着数十年来它所奉行的规则，并遵守被广泛（虽然不是完全）接受的国际规范。不过，这些规范正是美国依循上一任全球海上霸主英国的惯例而主导建立起来的。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随着权力对比的变化，关于这些规则的争论必然会存在。

更大的争议在于，中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要求。具体来说，中国要求停止在其专属经济区（可能被视为巡逻或侦察）的军事过境。美国常有军事过境行为，并认为其行为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这些行为并不违反国际惯例，但国际法对这样的军事过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相互冲突的看法也酿成了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

年美国“无暇号”监测船与中国船只的冲突。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方都对美国进行的侦察感到恼火。

第二，美国对通过上述行为监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在克林顿政府后期，随着现代化的中国海军舰艇开始在近海活动，美国对华进行海上侦察的频率明显提高。随后的几届政府和军事领导人对此事也非常重视。随着中国海军持续部署新的船只和潜艇——特别是核潜艇，美国的情报搜集会更为频繁，手段也将更加多样。对美国而言，这些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在战时维持美国军队的优势十分重要。

朝鲜半岛

朝鲜是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一个无常的角色，并令中美关系更加复杂。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上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希望朝鲜半岛去核化，不过相比于中国，这对美国更加重要。无论朝鲜半岛的统一之路顺利与否，中国都希望能够减弱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特别是对朝鲜的影响。美国不能保证一定不会采取颠覆朝鲜政权的手段，实际上它在这个问题上刻意保持沉默。对中国而言，一个麻烦不断的缓冲区也比一个受美国影响的统一的朝鲜半岛更符合其利益。

为了应对朝鲜的核计划，许多机制应运而生。在美国推动下中国所建立的六方会谈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一会谈缓解了中美间的紧张关系，使双方在面对朝鲜的核计划时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中国则对美国所发起的防止核扩散的“防扩散安全倡议”表现得相当谨慎。这些机制可能对限制朝鲜核扩散带来的危险有所帮助，但无法解决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更广泛的分歧。

未来，中美因朝鲜半岛发生的意外事件造成无意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未来朝鲜的挑衅行为会遭致美韩联军的回应。对于前几次美韩两国的适度回应，中方的反应相当紧张。美韩两国更大规模和更活跃的介入可能会将强大的军力带入中国领土周边的海域和空域中，并对中国的重要利益——将朝鲜作为永久的缓冲国——造成威胁。如果朝鲜的挑衅或者政权的崩溃引发了地面冲突，那么美韩联军会很快推进到中国边境。中美之间并没有讨论过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境在1950年造成了误解，如今类似的风险依旧很高，相似的情况仍可能发生。

在中国近海和周边地区的主要军事考虑

在近海和周边地区，中国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尽管覆盖范围各不相同，但很多系统的覆盖范围能够达到数百公里。

如今，中国在本土水域中的活动通常被概括为“反介入/区域拒止”。这种能力主要是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利用附近水域，并削弱其投射军力的能力。

其中的第一层次是现代化的柴油动力潜艇舰队。这个约有30艘潜艇的舰队被视为强大的短程武器。考虑到这些潜艇舰体小、部署慢、续航能力有限，它们主要被用于应对周边事态。

第二层是来自各个空军基地的陆基战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拥有能够装备防区外巡航导弹的攻击机。这些导弹射程不等，性能十分强大。尽管这些飞机可能遭到对方战机的攻击，但当它们在距海岸线16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时，先进的防空导弹会给敌机造成巨大的麻烦，使它们更加安全。

中国的许多军舰也在这些水域中活动。中国最近部署了大约80艘

装备有先进的地对舰导弹的攻击快艇。这些致命性舰船和其他一次性舰船会对在中国附近海域活动的敌方海军造成重大的威胁。另外，其他性能更强的舰船则在更远的海域具有相对优势。

但迄今为止，中国所发展的这些能力都受制于联合作战能力的缺乏。这一点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

面对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五角大楼的回应是强化海军、空军与其他平台的协同作战能力，增加中国判断的复杂性。现在，美国仍然保留着能够从相对安全的位置穿透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区域的武器，如隐形轰炸机、潜艇和防区外巡航导弹等。对美军来说，发生军事冲突时，在接近中国领土的区域作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美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巅峰状态大幅下降。海军的巡逻机在争议空域又极易受到攻击。由于护卫舰数量大大不足，美国没有可靠的方式在战时将海军陆战设备投送到濒海地区。不过，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静音效果极好，具备超强续航能力，并装备有先进的传感器和武器。

作为目前美军作战主力的战术攻击机同样面临着挑战。中国的潜艇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给美军造成的威胁，使美国在中国海岸附近部署航母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冲绳和关岛易受中国陆基导弹的攻击，因此，陆基战斗机也受到了挑战。

一个危险的区域

中国在其周边区域有着巨大的安全利益。中国保卫这些利益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而且在不断提高。美国在该地区同样有很多安全利益，在有些情况下，两国存在潜在的冲突。从十年前开始，美国通过这些海域向中国投送军力的能力大大削弱。此外，由于中国的"反介

入/区域拒止”能力，美国在这些区域的作战能力也被削弱。这并不是说一旦中国周边区域发生冲突，美国没有别的办法与其作战。不过，这的确意味着冲突可能会转移甚至升级。

另外，该区域存在使冲突升级的倾向。出现在近海地区的水面舰船会成为诱人的目标。即便双方无意使冲突升级，但大量易受攻击却有着强大攻击力的武器的出现，会成为混乱的诱因——一方面，这会在战略层面造成不稳定（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指挥官都会要求当局出于保护部队的目的先发制人。

最后，反舰巡航导弹的出现可能导致出现“空空如也的海洋”。在这种情境之下，制海权失去了实际意义，不过双方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也要面对小型导弹艇、潜艇和来自空中的威胁。

中间地带

另一些可能存在竞争的区域位于距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之外的区域。2009年到2011年期间的南海是最典型的代表，当然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紧张局势也愈演愈烈。

南海

南海地区争议众多，南沙群岛是其中之一。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该群岛（或部分地区）宣称拥有主权。如果某一国对这片富含岛屿、珊瑚和鱼群的群岛的主权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那么它将可以对丰富的渔业资源、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行商业开发。2009年，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设定的期限的

临近，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提交了它们各自确定的基线、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方案。

另外，由于中国对它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态度坚决，这个问题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贸易量占到全球总贸易量的40%，因此对这些航线的畅通所构成的威胁会产生经济和安全上的影响。同样，由于美国常常在该地区部署海空装备并进行常规演习，这里将成为产生冲突的主要地区。

第三，美国同南海周边国家长期保持着关系。美国同菲律宾保持着盟友关系，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盟友关系对美国有全球意义。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近来美国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在深化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美国同文莱的关系也出现了热络的趋势。所有这些关系都包含着美国的承诺，有的甚至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友谊。

最后，核因素使南海问题更加重要。中国在海南岛建造了潜艇基地，可能会将此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地。这可能进一步激化该地区的安全竞争。中国不会将南海用于发射导弹（因为中国的导弹在南海无法打击任何一个位于美国的目标），中国可能将南海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堡垒和安全调遣这些潜艇的基地。由于中国的空中力量和海军能够在该地区进行巡逻，美国海军要在这里进行反潜战并全身而退恐怕十分困难。这样，双方就会对此提高军事关注。

日本的安全

中美的另一个安全利益冲突与日本相关。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双边盟友结构的关键。美国十分关注日本的安全和美日盟友关系。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是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根本依托。美日盟友

关系具有全球影响，包含各方面能力的紧密协调与整合。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两个国家也存在许多社会联动。所有这些重要因素使它们的利害关系更为紧密。

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经谈到，在过去几年里，日本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长期存在的敌意令两国之间的具体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中国海军的远洋打击能力度不断进步，他们开始突破“第一岛链”，其中就包括日本。由于中国海军舰队的发展，这些行为对日本的刺激更大。多种“水面行动小组”的部署表明，中国的战术装备在不断提升，攻击能力越来越危险。就像美国进行海上侦察所显示的，一些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会刺激周边的海上邻国。（中国的军力发展虽不是针对日本，但显然会刺激日本，这是一种固有的安全困境的体现。）

日本与中国还存在钓鱼岛争端。这个被日本控制的小岛成为两国民间极端人士争论的焦点——两国渔船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于美国承诺保护钓鱼岛，近十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钓鱼岛问题。

最后，美国向日本提供扩展核威慑的承诺变得越来越重要。表面上看，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源于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的核能力。过去几年中，日本与美国正式就扩展核威慑政策启动官方双边进程，以进一步落实美国的承诺，同时美国的高级官员也重申向日本领土提供核保护。美日之间的导弹防御合作既是对这一承诺的支持，也是对中国的威胁。

中间地带军事平衡的主要考量

在距中国海岸线数百英里的范围内，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

止”十分有效。南沙群岛距离中国本土1000多公里，相比之下九州岛距离中国仅800公里。与上文所述的中国周边地区相比，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战事，中国投入的军力会较少。中国军队若在这一地区作战将很容易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他们将远离其陆基防空导弹的保护范围，而他们可能依靠的陆基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是勉强能够到达这些区域。中国最新型号的柴油潜艇确实能够在这些区域执行巡逻任务，但前提是潜艇必须放弃其隐形能力进行近水面航行，而这会使这些潜艇极易受到海上巡逻机的攻击。中国的导弹艇和绝大多数导弹在该区域难有作为。

中国仍有一些能够发挥作用的武器平台，尽管也会受到局限。中国可利用的导弹不多。据五角大楼估算，中国所拥有的东风—21导弹不超过100枚，而航速更慢、威力更小的东海—10巡航导弹约有数百枚。这两种导弹能够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基地。一些改进型号的导弹也能够攻击水面舰艇，但要对敌方的大型基地进行封锁则远非导弹所能胜任。实际上，这些基地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性能先进的战区或战术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另一个可利用的武器平台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些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开始在远离中国沿海的地区执行巡逻任务，并参与联合舰队的行动，这是中国海军在战术方面一个巨大的提升。不过中国的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噪音很大，而且与美国海军的同类潜艇相比，它们在舰队中的巡逻率要低得多。由于只有6艘该类型的潜艇，所以持续巡逻将是个挑战。

最后，中国的水面舰队也会在近海之外的地区进行训练，但在战时这样做的风险很高。长期以来，中国的舰艇易受空中打击的严重弱点已经大大改善，但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海军。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反潜战能力和推进系统依旧十分落后。中国的舰队相比小国的海军来说实力强劲，但当它们面对美国的核潜艇和舰载机时则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美国海军的规模虽然不像冷战时期那么庞大，但相对而言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它拥有11个航母战斗群，此外还有11个两栖攻击舰群作为补充，这些两栖攻击舰群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称得上是航母战斗群了。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宙斯盾驱逐舰也领先于其他国家。

除了武器能力，美国在该地区所缔结的安全合作关系使其在竞争中更具优势。美国同日本和韩国日益紧密的盟友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牢固的同盟之一。每年，美国都会同6个东盟创始国中的大多数国家进行联合军演。美国在新加坡部署了两艘濒海战斗舰，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而且同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也重新恢复了活力。这些关系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地区安全合作影响力之争提供了便利，也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军力态势多样化。

由于这些关系的发展，美国在战时能够动用的潜在前沿军事基地得到增加。这也使美国在面对进攻时，能够以区域力量作出回应，中国的政治成本计算由此变得更为复杂。

全球范围

21世纪的中国拥有更多的全球安全利益，而它也有更强的实力来捍卫这些利益。比起近距离区域中的问题，这一区域中的问题较为缓和。另外，在这一区域所能够使用的军事装备也有所不同。

利用资源和市场是其中最重要的利益。随着中国直接参与在拉美和非洲的资源开发，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国家利益也相应增加。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瑞黎明（Dawn Murphy）在其章节所述，确保中国能够畅通地通往这些地区是中国在同美国打交道过程中的重要安全问题。

中国依赖于跨越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以及由马六甲海峡通往印度洋及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中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都严重依赖这些通道。2009年，中国的石油消费中有53.5%来自进口，而其中85%的进口石油和石油制品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中国表达了对“马六甲困境”的担忧，中国军方高官曾在官方刊物中写道：“获取能源和资源的海上运输和战略通道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在海上面临的安全威胁，认识到我国海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战斗作好准备。”

不过，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狭义的军事问题。实际上，正如金骏远以及沈大伟和瑞黎明的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广泛的利益，但这个问题不一定非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比如，中国只有10%的进口石油是由属于中国的船只来运输的。“保护”在他国运输船上的中国石油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在2005年中期开始强调不要过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一位中国学者称，“中国主要利用非军事手段来缓解‘马六甲困境’”。

在南海之外，中美之间在防止非传统威胁影响货物自由流通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打击海盗的行动是其中最值得肯定的领域，这也许是因为打击海盗对两国利益的意义是最明确的。中国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的巡航拉近了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距离，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而战斗。尽管中国尚未完全加入负责这些巡逻任务的北约联合指挥与控制机制，但它确实进行了广泛的协作。2012年初，中国派遣的第九批舰队就位，对一支不善远程部署的海军来说，这是它所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在这一地区，中美两国的行动队员进行了交流互访，打击海盗的双边演习已经商定，但尚未举行。

在中国和美国的安全竞争中，印度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印度与中国所担心的“马六甲困境”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在两国发生边界战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国的边境问题依旧很突出。中国往往以有利于

邻国的条件在名义上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陆地边界争端，但它同印度的边界谈判却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期双方在边境上的军事建设以及两国潜在的核竞赛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算不上核心问题，但也会造成一定的紧张。美印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之间尚不成熟的军售预示着中印关系仍将是一个问题。

国际军事平衡的关键考量

在这个存在潜在冲突的区域，军事天平一边倒地倾向于美国（实际上，只要远离国土，即便是对付小国，中国都难有作为）。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海外基地使美国受益匪浅。由于美国拥有一批能够进行海上补给的大型舰队，其中一些舰船的续航能力长达数月，因此美国得以称霸全球各大洋。位于美国本土的轰炸机能在全球任何地区提供火力援助，这一点之前已经谈过，而且在近20年的战争中也得到了证明。

在亚洲之外，中国很难与美国及其盟友相抗衡。中国的潜艇并无多少长途巡航的经验，其舰队也没有远程作战部署的经验。（实际上，中国打击海盗的行动才刚刚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此外，中国的舰队极易受到来自水面或者水下的攻击。

中国的新航母可能会在距中国领海不远的亚洲海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主要的相对优势体现在更远的海域。中国航母的唯一价值就是在陆基飞机难以到达的区域提供空中力量。虽然该航母尚未形成战斗力，但可以预计，它将能够搭载15至20架左右的苏—33或歼—15战斗机。英国早在英阿战争期间就发现，如果只有少量这种航程较短的飞机，那么这些飞机不得不将所有精力用于防御性巡航以保护航空母舰。这种情况在缺少综合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体系和较强的防空护航能力时尤为突出。因此，中国的航母在执行远程任务时不得不将主

要精力用于保护自己。

由于军事天平向美国一方倾斜，且两国的利益并非有着根本性矛盾（实际上往往是一致的），因此爆发全球性冲突的可能不大。

战略层面

将上述按地理区域划分的问题放在一边，现在来看看“战略性”武器。在冷战背景的形成过程中，对核平衡的考虑起着重大的影响，这种现象如今依旧存在。不过，当下由于行为体的多样化、导弹防御和其他新的因素，“战略”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实施了现代化，并适度增强了核力量。十年前，中国所依赖的是几十枚可到达美国本土但易受打击的导弹。而如今，中国的武器库不断扩展，其中包括保存能力很强的陆基导弹。未来五年，中国可能还会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这将丰富其战略武器，但同时也会使它对指挥与控制问题的关切更为复杂。

为了威慑中国的导弹，美国在与俄罗斯达成战略武器削减协议之后将保持1500枚弹头（此外，美国还保留了5000枚未部署的弹头。）这些弹头能够通过先进的轰炸机、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越来越可靠和出色，这也增加了中国进行考量的难度。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系统并没有在实战中得到验证，它们是否能够经受住“反制措施”的考验仍存疑问。实际上，中国的安全分析人士偶尔会暗示，中国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反制手段。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对导弹防御系统感到担忧，也对美国与该地区盟友的关系因此得到巩固而感到焦虑。

美国还在研发具有“全球快速打击能力”的常规武器。一些改装之

后能够携载154枚远程常规巡航导弹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已经在亚洲海域执行任务。上述武器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武器系统，使美国越来越有可能不用核武器即可摧毁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些都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

太空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新领域。2007年中国摧毁了一颗废弃的气象卫星。美国在这一领域仍然掌握着多项技术。美国最近测试了一款机器人航天飞机，摧毁了一颗卫星，并开始研发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考虑到轨道环境的脆弱性，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中美之间并没有像美国与苏联那样在太空相互约束彼此行为的协议。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于源自太空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来为军事和商业利益服务，这样的情况应该会改变。但是，太空武器军控问题存在难以“核查”的固有困难，而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武器将令该领域继续充满争议。

网络安全是中美之间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但区分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是很重要的。网络攻击可以避开传统的军事防御，攻击对一国具有重要价值的目标，这与核武器类似，因此有人将此提升到了“战略”层面。虽然有一些预测十分悲观，但更加冷静的分析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事实上，迄今为止，网络攻击造成的有形后果很有限。而间谍活动——国际政治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开始利用网络工具。

就中美两国在战略（核）层面的外交而言，美国曾向中国释放信号，表示愿意接受两国之间模糊但稳定的“战略平衡”。尽管要回避“相互脆弱性”（该词带有冷战色彩，在美国有着政治上的敏感性），但五角大楼明确表示，不会试图用核武器、常规武器或导弹防御系统来打破平衡或“战略稳定”。中国不完全相信这样的表态，但它对美国在核武器作用上的政策转变表示欢迎。双方就这些承诺进行了会谈，也就未来建立信任的措施进行了非官方接触。但是，这些讨论远不及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所进行的相关讨论。

军事冲突的制度性限制

前文聚焦于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地区，并分析了在那些地区中美两国的军力平衡。正如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所言，大量证据显示，制度和规范能够缓和这些狭隘的安全竞争。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中虽然存在许多这样的机制，但发展尚不完全，且缺乏实质性。

以下是中美两国双边军事外交的状况：

•多年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国防部长都会在正式的双边会谈中与中国同人会晤。

•1997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每年都会与中国军方的副总参谋长参加中美防务磋商。

•2005年启动的防务磋商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与会者包括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和中方的副总参谋长。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和平时期两军（特别是两国海军）商讨“交通规则”的长期性工作级会谈（与1973年《美苏海上事件协议》相似）。

•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互访也十分普遍。

•两国国防大学的代表团有时会互相访问对方选定的地点。

•由文官主导并聚焦经济和战略问题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安全问题，并在2011年启动了战略安全对话。这样做是为了将文官与军官对安全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

通过这些常规对话，中美高级领导人能够就彼此的威胁认知、政策方略和地缘政治影响等问题进行接触。葛来仪在其章节中表示，这些会谈中的实质性接触越来越多，而不是仅仅复述事先准备好的纲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在许多交流中，中方的透明度在增加，透

明度的问题一直是美国所担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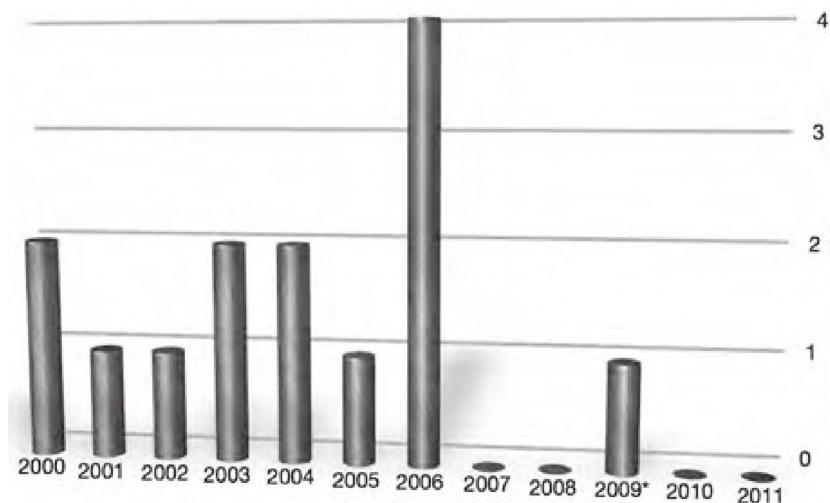


图10.1 中美海军港口互访次数

在这些外交接触之外，两国很少采取切实的手段来降低危险出现的可能性。再三拖延之后，中美于2008年建立了军事热线。双方作战舰船的互访也在2005年左右达到了高峰。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只进行了两场海军联合演习（2006年在圣迭戈附近举行的通信演习和同年在南海举行的搜救演习）。尽管双方已就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HA/DR）以及打击海盗的演习达成协议（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但目前仍未落实。

多边领域的情况也大概如此。美国主导了许多多边演习和对话，中国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对话。虽然美国试图鼓励中国积极参与，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军演仍算不上多，即便这些演习只是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助或者海上搜救。

军事演习	目的	参与国家	存在年限	备注
环太平洋军演	军事演习	14（+3观察	40	中国未参与，

		员）		2010年拒绝成为观察员
太平洋空运	防入侵/区域封锁空运	25	16	中国拒绝参与
太平洋尝试	防入侵/区域封锁	20	8	中国拒绝参与
太平洋范围	水下搜救	5（＋13观察员）	5	中国是观察员，但拒绝参与
军事对话				
西太平洋海军研讨会	海军事务对话	20（＋4观察员）	23	中国参与
太平洋军事会议	多边安全对话	22	35	中国参与
国防部高层	高级对话	36	14	中国拒绝参与

表10.1 部分多边军事演习和对话

中美两国在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展开了一些有限的合作。两国军队在地区或全球性的灾难救助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对立（硬实力竞争也许是零和游戏，但软实力绝对不是）。因此，2008年美国的飞机向中国提供了援助。2010年1月，中国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海地提供了援助。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还强调自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行动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喜欢提供一些其他的支持要素（当然这也是急需的）。中美两国参与维和行动的部队很少有互动，但仅有的几次，如在海地的合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缺少常规的定期交流，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何积极意义都取决于转变中的中国的安全认同和行动规范。这也许会在将来成为可能，但当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维和行为是出于多种利

益的考虑，其中包括多边主义、国家形象构建以及一些更为传统的考虑。”除了“国家形象构建”外，上述目的表明规范或认同的转变并没有出现。但当然，这些变换已经有所显现，虽然几年内可能不明显，但未来几十年应该会出现。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一章中指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规范的变化。

同样，金骏远在其一章中表示，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表明，中国开始积极并有建设性地介入一些令中美两国都感到棘手的安全问题。中国支持了一系列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倡议，而这一多边论坛也为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的伙伴国谋得了重要的发言权。

在核领域，中美两国的双边接触很有限，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利益，也展开了一些共同行动。在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方面，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衡量，但已显露出一些积极的迹象。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中国一贯倡导限制外太空军事化，支持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就《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不过，中国对五大核国家有关核透明问题的讨论的默许态度以及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和美国一样，签署但未通过）要积极得多。

尽管这些接触是积极的，而且应当继续下去，但效果并不大。原因之一是，它们常常为一些“政治性”问题所裹挟。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成为冻结两国军事交流最大的借口，也导致了上述双边接触的暂停。长远来看，像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美国的侦察行为等事件都是导致两国军事交流中断的原因。鉴于此，双方对双边接触的预期并不高。

更重要的是，双边讨论的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在涉及专属经济区的主权问题上陷入了停滞。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弱势而不愿进行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尽管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部分，但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到，苏联当年也有着同样的顾虑。中美之间在军事实力如何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

问题上所进行的实质性讨论十分有限，而这种深入的讨论对于减少可能加深两国国家利益分歧的一些误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暂停的进程还是很有可能继续进行。特别是在人权和打击海盗这些凝聚了全球共识的问题上，两国的合作越来越频繁。这样一来，双方更需要在多边或双边论坛和演习中进行军事接触。

结论

本章对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层面进行了分析，一些更深远的主题正在显现。首先，尽管均势发生了改变，但这种变化在中国周边地区最明显。随着离中国领土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年均12%的国防预算增长所能产生的效果也就越少，实际上，在第二岛链之外，它只能对中美之间的平衡产生有限的影响。

其次，出于上述原因，临近中国的区域中的安全挑战会十分严峻。这一区域的军事动态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旦政治紧张关系升级，一国可能率先发动袭击或调动部署兵力，这种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意外情况是一大担忧。

第三，越是远离中国，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原因之一是，中国无力保护马六甲海峡之外的海上交通线，它不得不——也已经开始——考虑采取多边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和运输。由于中国所从事的其他“全球行动”也开始影响安全问题，所以，类似的因素将很可能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影响。

第四，均势和战略层面的技术变化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技术产生变化，双方采取不同的军事手段发生对峙时，红线、门槛和信号这些问题都会变得复杂。这在以往的中美关系中就是很棘手的问题，

如今它依旧如此。

最后，中美关系中既存在传统的安全困境，也存在传统的利益冲突。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通过成熟的外交方式，安全困境是能够克服的。但更加棘手的是利益冲突。不过，利益并不是由国际体系确定的，也不仅仅来源于国际体系（这与阿什利·特利斯一章中的现实主义观点不同）。相反，利益随着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参见约翰·艾肯伯里的相关章节）、政治同盟的发展、文化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相互依赖性的不同而变化。这些因素将逐渐缓和中美两国在全球性利益上的冲突，尽管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的安全观念仍然是零和式的。

第11章
中美两国在亚洲的交流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

自世纪之交以来，影响亚洲，尤其是东亚国际关系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是该地区两个最大的行为体——中国和美国。中美两国在整个亚洲的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该地区不仅国家众多，地理范围也十分广阔。因此，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对东亚（从韩国到缅甸）、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亚（阿富汗及与中国接壤的原苏联加盟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便是在东亚内部，人们可能还是会发现差异，因此，想要一笔概括总的区域趋势不大可能，总有明显的例外。显然，仅用一章的篇幅不可能全面讲清楚如此复杂的区域特征。相反，我列举了中美关系的几个宏观趋势，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联系以及亚洲地区近来出现的一些主要发展趋势。这种方法不单是为了突出一些共同的主题，也是为了理解这些主题中一些重要的差异及例外。

除了将注意力放在这一特定地区外，本章内容（像本书中的其他章节一样）还重点关注了一些时间节点，以此考察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相对稳定的工作关系似乎在2007年扎下了根，顺着这股良好趋势，2008年成为一

个格外有用的起点。当时看来，两国关系似乎很可能推动这一地区的稳定。然而，2008年之后，中美关系问题迭出，东亚地区紧张不断，这给该地区的稳定与未来打上了问号。一些人将这些紧张理解为引发中美关系及其各自与该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甚至是重大转折的原因。但也有人将近来出现的这些困难视为再正常不过的复杂因素，它们时不时地搅动该地区持不同，有时甚至是敌对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经常出现的“紧张与缓和”的循环关系类似，并未预示着一个更具对抗性的新型亚洲国际关系时代的到来。

本章首先简述了该地区发生变化的背景，然后考察了这两个“相互纠缠的巨人”之间影响该地区事务以及被这些事务影响的方式。文章将重点放在了东亚这一世界上最具变化的次区域上，同时也关注了澳大利亚、南亚、中亚以及东亚一些多边组织的发展。最后，我对该地区的未来提出了一些设想，我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问题，而非给出确定的答案。

地区关系中的中美因素

2008年，随着美国的选举季逐渐展开，中美两国在亚洲的关系似乎稳稳地走在以合作为主的道路上，尽管在众多国际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上两国仍存在长期的分歧。当时，似乎有理由认为两国双边关系会保持这种态势，而且双方会努力管理或避免因在亚洲的分歧而发生尖锐的冲突。关系的延续性似乎是很有可能的，首先是因为，牢固的工作关系不仅对中美双方有利，也能使其他亚洲国家获益；其次，很少有迹象显示，中美各自的领导层有改变这种态势的意思。中方高层似乎奉行“和平发展”的宏观战略，这在其与邻国增进关系并与美国保持建设性、合作性关系上得到体现。这一战略在21世纪初受到了公开

欢迎，当初欢迎这一战略的中共领导人将继续执政5年。然而，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鼓励和欢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外政策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与前任小布什抱有广泛的一致。其实，在奥巴马首个任期内，中美关系以及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区域关系都保持了延续性。

然而，在此之后，人们对这种延续性的预期开始变得不明朗起来。从2009年底一直到2010年底，地区稳定在多方面都遇到了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令人意外的变化都与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2010年夏，观察人士想知道，该地区新出现的这些令人不安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将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尽管2010年发生的那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并未预示着该地区将彻底转型，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两国在能力、行为和意图上的一些重大转变。对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这三个因素影响着它们如何理解有关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会在亚洲的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

2008年以后，美国对从经济大衰退中复苏投入了压倒一切的关注，忙于应对该国长期经济健康所受到的威胁，其对外政策因而受到牵制。现实令美国急需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抽身。“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迅速增加，但到2009年底，其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比预想的复杂得多，而国内的经济挑战又似乎更为艰巨。

由于华盛顿开始缩减海外部署的规模，并且不再对担任全球领袖所要承担的巨大压力表现出以往的热情，美国重新审视了其军事现代化的计划，以确认在这个资源稀缺的时代应该优先往哪些方面进行投资。重新审视对于中美关系及其对亚洲安全图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以及后来的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规划美国未来的军事采购需求之际，决定向哪些重大冲突进行投资的依据显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美国必须为之准备的突发事件是那些涉及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事件。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也指向同样的方向。说具体点，美国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方案反映出美国的注意力将转向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它担心中国可能会拿出一副要在亚洲有所作为的姿态，从而损害美国的关键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新提出了一个“空海战”的概念，并对此展开广泛讨论。但这一概念的细节仍未确定，它能获得多少预算或许决定着其最终是否会被用作美国军事现代化的基础，来应对与中国相关的突发状况这一新的关注点。

明确这一军事优先事项的工作会继续进行。在奥巴马上任初期，华盛顿也明确了其外交优先事项，强调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美国最初的论调转变很快变成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美国努力增强与一些亚洲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组成了美国长期设计的“中心辐射”式地区安全架构。除继续推行小布什政府时期与韩国、日本这些盟友深化关系的政策之外，奥巴马政府还努力增强自冷战结束后有所弱化的辐射关系，尤其是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并借着与印度关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还有越南）的好兆头培养潜在的重大新型安全辐射关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这种外交活动。她指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理念，即美国的“重心”要从中东和阿富汗转向亚太。

不论是美国未来的军事现代化规划，还是重新强调其在亚洲的盟友与伙伴，这些动作都未被看作企图遏制中国的新战略。但美国的政策的确明显表现出了对更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担忧，尤其担心在不明朗的未来，中国可能具备什么能力，抱着什么意图，而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亚洲伙伴一样，继续与中国进行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合作。毕竟，在当下关切的重大问题上——包括防止朝鲜半岛爆发公开

冲突、振兴全球经济以及避免周期性的海上冲突升级——各国的利益即便不完全一致也是会有重合的。可是，从2009年末开始，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一方面是两国之间的一些双边分歧（本书其他章节有详细阐述）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与其区域邻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此前十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国与韩国、日本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经过了一段改善期。实际上，这一地区趋势在2001年后引发了一种猜测，认为中国在东亚的进展或许会以被“全球反恐战争”分了心的美国为代价。然而，在本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与该地区各国的关系却出现恶化，削弱了北京近来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并促使其邻国纷纷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

在外界眼中，中国在东亚地区更直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国内引发了新的担忧，它们对北京的意图感到不安，尤其是一个财富和实力都迅速增长的强大中国。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但中国经济却在持续增长。近20年来不断攀升的军事预算也终于看到了成果，中国测试、展示或开始部署了一系列先进的武器（包括反卫星系统、隐形机、装有机动式弹头的反舰弹道导弹、大量隐秘性很好的柴油潜艇、性能更强大的舰船、第二代核导弹潜艇以及首艘航母）。虽然短期来看，这些新武器系统中大多数的军事意义并不大（除了柴油潜艇和新型驱逐舰），但它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兆头，其对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只是时间问题。

毫无疑问，2009年以前，亚太各国就对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但北京在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它的强大不会产生威胁方面却十分成功。消除对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担忧情绪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宏观政策中的一条主线。就算没有使人彻底相信，但中国的承诺至少推动了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即中国的长期意图仍不明朗，有可能通过合作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意图并不急着需要加以制衡。中国的邻国在自发与北京改善关系中找到

了些许安慰，目的是让保持合作关系牵涉到中国的利益，即便它越来越强大，同时继续与华盛顿保持一贯以来的良好关系，以便万一强大起来的中国拒绝合作能得到美国的帮助。由于中国对于东亚未来的长期塑造作用尚不清楚，因此在21世纪头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来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

然而，2009年以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促使外界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北京的对外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强硬，在与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会明确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观点令中国的几个东亚邻国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于未来的影响是凶险的，而非不确定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以及它最近在南海和东海主权利益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更加深了外界的这种看法。日本、菲律宾和越南无法将此视为未来地区关系的积极信号，而认为这是对中国长期意图所发出的预警。它们原来打算尽量在中美之间一碗水端平，如今却在试图增进与美国的关系（比如越南），以此应对日益强大和强势的中国可能给它们带来的压力。2009年底之后，中美之间新出现的摩擦让华盛顿更下定决心要与中国那些紧张不安的东亚邻国加强合作。

但在2010年底，中国领导人开始回应这股地区关系方面的不利趋势，他们默认自己之前一年的对外政策确实引发了风险。当时负责外事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后，北京除了改变论调，还开始与亚洲邻国接触，以缓和2009至2010年间一些争端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虽然在组织地区关系恶化方面——主要是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北京在2010年底再次强调自身和平承诺的努力却并未取得像上世纪90年代时那样的成果。这或许是因为，15年后的中国变得如此富有和强大，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的行为背离了其所谓的与邻为善的承诺。对于其在2010年底所作出的政策调整，中国越来越难以缓解外界对该政策的真诚度和持续性所怀有的不断加深的疑虑。

地区发展

日本

2008年，东京似乎进入了一段与中美两国都维持良好关系的时期。小布什政府结束前夕，美日两国就驻日美军部署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有助于巩固保持了几十年的美日安全同盟。2008到2009年间，中日关系也相对平稳。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大选获胜似乎预示着自小泉纯一郎政府以来，不时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些长期分歧有望得到进一步化解。不过，如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对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和日本继续执行小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有关驻冲绳美军搬迁的协议。但新上任的日本首相、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在竞选时承诺，将重新考虑其前任达成的这项协议。鸠山还暗示，他或许会在驻日美军的期限问题上寻求改变，并重新考虑日本对于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作战任务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鸠山的做法给2009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及同年11月奥巴马的访日行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再平衡的一部分，鸠山欲进一步改善自小泉纯一郎下台以来的中日关系。此举有助于增强日益紧密的中日经济联系。然而，鸠山本人及其继任者菅直人所进行的两次努力最终都加强了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

首先，2010年3月爆发的“天安舰”事件大大增加了日本对朝鲜的核武能力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担忧（这一能力随着2009年平壤的导弹以及核试表现得更加明显）。朝鲜在“天安舰”事件（以及后来11月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的立场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这个短期安全挑战的忧虑，对此，东京能得到的最好保护是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加入国际社会对朝方挑衅行为进行谴责的决定让鸠山对自

己原打算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想法产生了疑虑。

第二，2010年9月，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东海一片中日争议海域命令一艘中方渔船驶离时与对方相撞。日方逮捕了中方船长，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中方坚持要求放人，日本当局则坚持要对其进行审判。随着冲突的加剧，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日本的高科技工业面临威胁。北京坚称，暂停稀土出口并不代表中国在使用经济手段迫使日本放人，但这却反映出与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可能给日本带来的风险。日本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华舆论，而中国人也质疑东京对这起事件的解释以及逮捕船长的合法性。

简言之，在一年时间里，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边修复日美关系、一边改善对华关系转向了增强日美关系以反抗中国（及朝鲜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危险）。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所言："鸠山向中国倾斜的政策变成了拥抱美国。"驻日美军基地的问题被搁置，后在鸠山的继任者菅直人和野田佳彦时期，双方同意考虑冲绳当地人对美军基地的反对意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到2011年，美日关系回到了正轨，而中日关系却退至小泉执政时期"经济上热、政治上冷"的局面。中日之间广泛的经济联系继续确保双边关系不至出现严重的裂痕。但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意味着，东京更加清楚经济上的依赖性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加深其与北京之间的政治摩擦，同时提醒其与华盛顿保持盟友关系的长期重要性。

朝鲜半岛

在2008年和2009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和美国似乎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支持按照六方会谈的框架通过谈判解决朝鲜核问题。平壤在2009年进行的核试验和导弹测试破坏了会谈，而这似乎进一步巩

固了中美外交合作方面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在2010年，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出现问题。时年3月，爆发“天安舰”事件，11月又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两起事件均造成了韩方人员伤亡。美国和中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截然不同。美国支持盟友韩国对朝鲜的控诉，重申其对韩国安全的承诺，并高调地进行联合军演，显示其与盟友的团结一致，而中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虽然北京和华盛顿都一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重启六方会谈，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将朝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作为前提条件，因为朝鲜自2008年以来的行为让各方开始怀疑其对和平及去核化所作的承诺。中国希望让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这个平台上来讨论更广泛的紧张升级的问题。美国则支持韩国的立场，称若要重启六方会谈，平壤必须先与首尔进行对话，就那两起事件给韩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此外，美国还坚称，朝鲜必须先证明它已作好重启会谈的准备，会谈的目标则是让朝鲜彻底停止研发核武。朝鲜在2010年透露其正在实施一个铀浓缩项目，这个项目可能是为了替代其钚反应堆项目，以生产武器级的核材料，此举让重启会谈变得更加困难。

中美两国在2010年应对紧张不断的朝鲜半岛局势上所出现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分歧：一方面公开对朝鲜施压，另一方面又依靠外交手段商讨无核化协议，这种方法是否有效？2010年期间，伴随中美关系的总体消极趋势，两国分歧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令北京感到惊慌的是，华盛顿对与中国之间纠纷不断加剧的东亚国家给予了更大的支持。面对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断恶化的战略和外交形势，中国似乎还准备将其东北与朝鲜半岛接壤一带的不稳定局势列入挑战事项。中国过去一直有意与美国合作重启六方会谈，并鼓励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但如今它担心，与美国及其盟友一道反对朝鲜可能增加半岛陷入混乱的风险，从而在中国附近的又一个舞台上增强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对美韩在2010年夏天和秋天举行的联合海上军演提出批评，这反映出，北京担心，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会被美

国及其盟友用作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加强军事合作的借口。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称正是中国不愿对朝鲜施压加剧了平壤不断作出挑衅的风险，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如此应对，从而令东北亚安全环境很可能朝着北京所担心的方向发展。

然而，如同东亚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有起有伏一样，2011年，各方都收回了决不让步的态度，重启六方会谈的前景有所增强。朝鲜、韩国、中国和美国都开始寻找挽回面子的方式，以满足各方为重启谈判所提出的条件。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尽管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从好的方面说，中美两国从2009年到2010年之间一连串事件中吸取的教训将令六方会谈变得更加复杂；从不好的方面看，这增加了朝鲜问题持续陷入僵局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北京和华盛顿都想避免的结果——任由朝鲜发展核武项目。

菲律宾和越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邻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断加深，共同的经济利益促进它们之间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北京欲维持这种势头并与东盟培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诞生，并在协议原定于2010年生效之前就早早享受到了东盟国家所给予的特权。此外，北京还表现出了新的灵活性，同意努力与各方达成“行为准则”，以缓解该地区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冲突对地区关系的影响。如上文所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进展证明中国的东亚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2008年以后，越南和菲律宾对它们眼中崛起的中国对地区利益的诉求日益感到不安。如同日本和韩国一样，越南和菲律宾纷纷开始调整各自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只不过日韩两国的呼声更高。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南海主权争端非常棘手。它们曾在2002年宣布要签署一项《行为准则》，但这方面的进展已陷入停滞。2009年到2010年间，随着海上领土争端加剧，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急剧恶化。为此，越菲两国都积极与美国靠近，以减少各自在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时可能面临的风险。

分析人士在争论，南海争端的尖锐化是否是北京对菲律宾和越南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造成的。认为起因是中国改变行为方式的人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在上升，而与此同时，美国仍将注意力放在海湾地区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上，再加上其国内的经济危机，这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战略缺口。但也有人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决定抓住这一机遇，推进其主权诉求。相反，他们认为，三方都明确表示了一致的立场，不仅因为经济发展的计划正在推进，还因为他们需要在截止日期前将相关海上诉求提交给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由于在最后期限到来前未能拿出化解分歧的方案，三个国家都宣传自己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任何一方都不会放任他国发表这样的言论，因为，如果未来将争端诉诸国际法裁定，就可能影响自身诉求的正当性。

2009年到2010年间，各方的论调不断升温，南海争议海域的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一些事件据说是因为中国船只强行捍卫自身主权而引发的，但中国领导人对此给予了多大的指示或授权便不得而知。虽然一系列新的冲突的起因和责任方不够明确，但很快，中国在东南亚海域的战略意图所产生的后果便显现了出来。菲律宾投向美国，重申美菲安全协议规定的美方的援助义务，希望一旦受到中国的直接挑战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越南也加快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升温，并出人意料地将双边军事合作提升了一个层级，目前尚不清楚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有多广。

奥巴马政府早些时候决定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多边论坛同样为美国释放自己的立场创造了机会。随着海上局势日渐紧张，时任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8月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论坛在越南举行，且东盟各国对希拉里的立场（重申美国对确保国际水域自由通行的关注，倡导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美国在这方面不持立场，同时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化解分歧）表示了广泛而一致的支持，这被外界视作对中国的警告，告诉它不要动用自己的硬实力来压制东盟小国，迫使其通过双边途径解决争端。

外界对希拉里演讲的反应，以及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一开始在河内论坛上作出的强烈回应，凸显了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新挑战。是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强硬对抗，还是努力恢复与东盟邻国保持了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北京面临抉择。2010年末，北京明确表示，它决定选择后者。2011年期间，中国加快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经济和外交合作，并重申其愿意朝着达成《行为准则》的方向迈进，以减少海上领土争端可能带来的冲突风险。不过，如同韩日关系一样，中国能够缓解与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但它无法抹掉这些邻国从近来的经历中获得的两个经验——其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如果其改变意图，它们捍卫自身利益时就会面临风险；其二，强大的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能给它们带来无可取代的好处。

中国想要说服外界相信其在该地区仍是抱有善意的，但这是有难度的，最明显的体现便是菲律宾不断向美国寻求更大的帮助。该地区的亲美倾向在2011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召开前夕达到了顶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马尼拉参加庆祝美菲同盟60周年的活动，她在停靠在马尼拉港的美国“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上签署了《马尼拉宣言》。在随后的演讲中，她承诺美国会继续与菲律宾保持双边合作，重申了美国对于海上安全问题的立场。相比之前一年在河内的表态，她似乎更清楚地表明，美国支持通过多边手段解决南海争端。在谈到南海争议水域时，她还使用了“西菲律宾海”这个新词，以示对菲律宾的支持。

除了寻求盟友华盛顿的支持，马尼拉还试图在东盟伙伴国之间建

立统一战线。不过，努力没有成功。在2011年的东亚峰会上，菲律宾未能说服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公开反对中国的海上领土声明。虽然其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海上野心有自己的担心，也欢迎美国加深与东盟和东亚峰会的接触，并且在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将海上安全列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它们（可能是东盟最大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反对联合美国及其盟友来公开对抗中国。其他东盟国家并未觉得自己面临着像越南和菲律宾在本世纪头十年末所感受到的那么急迫的挑战。对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优先任务是应对国内问题，而非国际挑战。此外，维护和平的地区环境事关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它们与中国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因此，它们不会在海上争端的问题上采取可能令自己与北京的关系加剧紧张的立场。至少除了菲律宾和越南，其他东盟成员国都会尽量避免挑衅中国、煽动所谓的中美对抗，否则，这些小国家可能就得要选边站了。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显然制约着东南亚一些邻国的反应。事实上，即便是越南和菲律宾因担心中国而投向美国，它们仍试图维持与中国的交往。曾有人认为，中国将凭借其经济影响力很快把美国从这一次区域中赶出去，但2009年到2010年期间发生的事让这种预测变得复杂起来。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强大经济利益令东盟各国不能无视这种好处而一味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的缅甸在2011年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或许能令其摆脱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不利。缅甸军政府同时宣布在国内实施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美国对改善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条件。美国方面表示它将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缅方。东亚峰会后，美国宣布国务卿希拉里将于2011年12月访问缅甸，这是1955年以来首次有如此规格的美国官员访问缅甸。事情进展得很快。2012年1月13日，美国宣布将与缅甸全面恢复外交关系。虽然尚不清楚两国关系的解冻最终能产生怎样的战略意义，但这意味着，缅甸也将像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中美关系交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追寻自己的利益。

澳大利亚

与中国的许多邻国一样，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是经济上十分紧密，但政治上却可能出现周期性紧张。2007年陆克文（Kevin Rudd）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有人猜测，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包括能讲流利的汉语）或许能开创一个中澳关系的黄金时代。事实却并非如此，澳大利亚不仅在中国的人权记录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争端，而且在中国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处理方式上也与对方产生了分歧。2009年发生的力拓间谍案所引发的外交纷争一度令两国关系异常紧张，中方还逮捕了一名澳大利亚人。不管此人遭逮捕是否与力拓间谍案有关，但此事都严重损害了中澳政治关系。不过，同中澳间的其他政治分歧一样，此事并未从根本上损害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关系。2007年，经济繁荣的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成为其主要出口对象国（尤其是钢铁、煤炭和液化天然气）。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澳大利亚得以免受全球经济衰退重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澳大利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这是该地区一个常见的模式。2010年7月取代陆克文出任工党领袖和澳大利亚总理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提出了一种立场，既凸显澳大利亚与美国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这两种关系之间的不同。她呼吁自己领导的政府采取一种符合这种双重利益的新型战略立场，以适应21世纪的今天该地区以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崛起。

吉拉德的话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即澳大利亚同东亚许多国家一样，仍希望中美竞争不会迫使该地区其他国家选边站。一方面，经济现实为澳大利亚避免与中国这个诱人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发生冲突提供

了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又需要预防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安全挑战，因而它也有充足的理由与美国保持牢固的盟友关系以实现自身的军事现代化。澳大利亚的行为反映了这两方面的考虑。它一再向中国申明它对双边关系所给予的重视，同时积极参与亚洲的多边组织，即便美国的利益已经变得多元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澳期间宣布，多达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将轮流驻守在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基地。

这一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新的军事安排并非第一个地区和国际变化促使美澳两国重申盟友关系的事例，但这一声明的背景有两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1996年对这一盟友关系进行升级是在冷战结束后，当时，中国尚处于经济崛起的最初阶段，其军事现代化还远未取得多少进展。而2011年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已崛起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行为体，而且在对军事现代化进行长达20年的巨大投入后，它开始部署一系列引起各方关注的先进军事力量。其二，财政吃紧的美国很可能会减少其海外的军力和装备部署。考虑到这一背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设立军事基地不仅意味着华盛顿要继续与堪培拉保持盟友关系，而且清楚地体现了奥巴马所作的一个更为广泛的承诺，即美国要在亚洲发挥作用，而且不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还与新加坡达成协议，同意美国的濒海战斗舰部署在樟宜。这虽然算不上多大的军事合作，但同样象征着美国对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所作的承诺）。中国对此的反应与2009年后它对美国一些倡议的反应如出一辙。虽然澳大利亚（和美国）明确表示，新的军事安排并非出于对中国的担忧，但中国先是表示怀疑，然后斥责这种行为是“过时的冷战思维”，是美国欲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

中亚和南亚

2008年后，中美两国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虽不能说是完全一致，但也比本文所讨论过的该地区其他区域内的利益要协调。这一区域的大背景是，在2009年末再次加强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美国公开宣布，计划从2011年底开始逐步撤离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国战略上的转变恰好证实了该地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的猜想，即美国也像苏联和英国一样，想要摆脱在阿富汗旷日持久的行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正如埃文·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所言，在中亚，即便中美双方没有正式的协作行动，但在经济发展、贸易以及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跨国恐怖组织方面，两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因而能够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中美两国在中亚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都希望限制可能助长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不稳定因素；在经济方面，双方都希望创造条件以充分释放这一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潜力。此外，双方的战略意图也都较为缓和，目的是确保谁也不要主导这一地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防止欧亚中心地带被一个强大的对手控制。这一担忧原来针对的是俄罗斯，现在则是实力和意图均不明朗的中国。中国的战略意图则是近来才产生的，即防止受美国支持的地缘政治包围圈——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起，南至印度，西抵中亚——将自己包围。虽然这些战略意图为冲突提供了基础，但至少从2008年以来，中美在中亚的对抗远低于两国在东亚的程度。

中亚之所以没有为中美对抗提供土壤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对于美国长期在其西侧保持大规模军事存在的担忧逐渐减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将很快减少美国在与中亚各国进行物流合作方面的需求，这种合作在2001年之后曾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美国对阿富汗建国努力的期望破灭缓解了中国的一个担忧——美国在中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活动（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欲在该地区实现的一个目标）可能会给北京带来另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第三，与东亚不同，苏联统治和地缘政治的遗风意味着，俄罗斯仍在中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减少了中美两国对对方在该地区

建立危险而不可挑战的主导地位的担忧。此外，俄—中—美三足鼎立的状况为中亚各国创造了一个利用这些大国间有限对抗的独特机会，而在竞争激烈、争端迭起的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鉴于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计划从2011年底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和印度面临着其所在地区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两国都担心对方利用阿富汗的局势变化对自己不利。早在美国于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巴基斯坦就已制定对阿战略目标，即防止阿富汗出现一个与印度关系过分密切的强大的全国政府。而印度的战略利益则是与喀布尔建立关系，使巴基斯坦不敢只关注其东部与印度接壤地区的情况，否则就可能腹背受敌。但新德里更大的战略利益是防止阿富汗（不管有没有巴基斯坦从中作梗）成为另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孵化器，否则这将令新德里面临的两大挑战进一步加剧，一个是因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国与国冲突所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另一个则是针对印度国土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对南亚地区的这些考量表面上似乎与不断变化的中美交流并无关系，但实际上存在着两层联系。其一，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的安全重心转移，其中包括将其在南亚和西南亚地区的关切转移到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东亚海上安全关切上，这可能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考虑寻求美国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区域利益。其二，2009年底以后，即美国开始减少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之时，中美之间不断增多的摩擦塑造了新的战略背景，而印巴双方都据此调整了各自的政策。

巴基斯坦与美国本就因后者在巴阿边境打击叛乱分子的行动而产生争端，随着201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两国间的正式合作关系更是严重受损。

印度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担忧令其与美国和中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新德里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这一长期国家利益促使各方不要将目光局限于眼前由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在巴基斯坦的国家支持者

以及它们与阿富汗未来的战略地位的相关性所带来的危险。引发1962年中印交火的边界争端目前看来是可控的，而且印度出于经济利益尚不会与中国发生激烈的冲突（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立场经常是一致的）。但印度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促使它进一步推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关系始于克林顿政府晚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加速发展。虽然尚不清楚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像前任一样努力将印度发展成自己的战略伙伴，但阿富汗的困难、对巴基斯坦的失望以及对华关系的动荡很快便促使华盛顿重申美印关系的重要性。

多边主义

在21世纪头十年晚期，中国很难像之前那样通过多边组织深化地区经济合作、缓解外界对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的担忧。随着贸易和投资流动的频繁，伴随日益扩大的经济交往而来的是摩擦，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不过，这种定期出现的挑战并不能解释该地区多边外交出现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更明显的原因是，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的海上领土争端、与日本在东海不时出现的紧张以及因北京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中立而令其与忧心忡忡的韩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所谓的“好邻居”政策深感怀疑的东亚各国欢迎美国加大在地区组织中的作用。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被认为只关心其自身的“中心辐射”盟友网及“全球反恐战争”，对亚洲的区域架构和其他问题却不够关注。外界所称的美国对亚洲国际关系的其他方面（如东盟支持的各种会议以及2005年东亚峰会的创建工作）不感兴趣或表示怀疑以及美国多次缺席该地区重大会议，或许恰好反映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烧钱的行动需要其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小布什政府的遗产为奥巴马总统提供了一个与前任划清界限的机会。奥巴马政府抓住这个机会展开了一

系列高调的行动：宣称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决心提前结束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这一它早已加入的机制中采取了更明显、更积极的立场。正是在上文提到的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关于南海安全问题的讲话，讲话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也遭致中国的批评。但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早已释放出欲与该地区组织加强交往的强烈信号。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扫清了其参加东盟峰会的一大障碍。这一动作发生在2010年中国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之前，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担心在一个对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地区机构中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随着2010年中国与美国以及与其东亚邻国之间分歧不断，外界认为，华盛顿拥抱东盟峰会（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东盟巴厘岛峰会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该地区对其表示的欢迎反映出，美国担心该地区其他只有亚洲国家参加的机制（比如由中国、日本和韩国参加的“东盟＋3”）可能变成中国用来限制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工具。

地区多边主义形势的变化还反映在2005年有关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提议上。这是一个环太平洋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拟将亚洲的几个主要经济体囊括其中。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不久以及在奥巴马总统于同年11月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期间，美国宣布将加入有关建立TPP的谈判之中。2009年的时候，这一消息还仅被视为美国为确保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更广泛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但当两年后的2011年11月在檀香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美国的支持成为建立该协议的重要因素。外界广泛认为，该协议的建立对2009年奥巴马访华后两国关系出现的动荡具有新的政治意义。这种看法在那次会议召开的前夜日本宣布计划加入TPP后进一步增强。尽管日本首先必须应对其国内对加入

TPP的强烈反对，但外界清楚，日本的障碍要小于中国加入TPP可能面临的障碍。虽然各方都欢迎中国加入TPP，但这将需要它改变其管理在华外国企业和投资的经济政策，而这是北京一直以来所抗拒的。外界广泛认为，成为TPP成员的要求意味着中国短期内无望加入其中。人们认为，TPP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多边协议，其原则可能会制衡那些不包括美国但包含中国在内的区域经济组织（如“东盟＋3”），尽管也许这并非故意。中国尤其对美国重新在亚洲倡导多边主义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这只不过是美国及其盟友欲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而采取的又一个手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地区组织视为安抚其忧心忡忡的邻国的工具，但如今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怀疑的中国或许会重新考虑地区组织的有效性。如果它们变成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或美国制约中国崛起的舞台（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这样的担忧），那么它们的吸引力就会减小。实际上，从中国对希拉里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所作发言的强烈反应或许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在重新审视这些地区组织了。但在2010年底，中国又释放信号，认为继续在地区组织中扮演建设性伙伴的角色更有利于自身利益，而且在中国通过双边努力让邻国相信它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同时，这种多边机制还能对此起到补充作用。但尚不清楚的是，自2010年底以来中国继续支持地区多边主义的温和态度是北京的广泛共识，还是争议尚未解决下的权宜之计。如果是后者，那么美国对TPP的态度变化及其对东盟各国将海上安全问题列入2011年东盟巴厘岛峰会议程所表示的支持很可能再次引发北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讨论也很可能被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国内因素左右。

结论

2008年之后，亚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未曾预料的转变。近25年来，这一地区出现了一股扩大合作的总趋势，而基础则是各国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所持有的广泛利益。不过，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该地区的利益冲突已浮出水面，这给地区关系在未来能否像本世纪初那样顺畅打了问号。或许同样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地区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并未如世纪之初所预料的那样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的两个因素——台湾问题和中亚。2008年以后，中美之间因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的分歧而爆发冲突的风险有所变小。而且虽然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临时增加了，但美国提出撤兵计划意味着，台湾问题也不大可能成为中美对抗的新战场。相反，亚洲其他地区的局势增强了人们对稳定前景的担忧。

实力日增的中国早已开始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但它对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问题的反应令其邻国感到不安，这些与华盛顿增进关系的美国盟友（如印度、越南等）开始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分歧，它们开发出了一种只有美国这个伙伴才能发挥的杠杆作用。此外，鉴于2009年11月之后中美关系的恶化，华盛顿也越来越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支持。认为自己的政策只不过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中国不认可各方作出警惕性反应背后的根据（尤其是认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并称这只是它们遏制中国崛起的借口。

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可能并不觉得这样的变化出乎意料，认为在这个“无政府”的国际舞台，出现利益冲突的国家都只顾自身利益，未能与他国共同处理好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安全困境。然而，安全困境背后的逻辑固然十分重要，却未能回答这种状况到底有多么激烈。随着实力的转移，每当国家面临新的挑战，领导人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应对。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和平合作与棘手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每个国家的选择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看法和选择，从而决定着它们所面对

的安全困境是会缓和还是会恶化。2008年以来的亚洲国际关系表明，这样的选择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因国家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分歧。

2010年，在实力发生重大转移的时候来处理这些分歧所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一些人认为，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已经迎来转折点。按照这种观点，亚洲的两极化和摩擦正反映出受困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对抗，这种对抗决定着亚洲国际关系的背景，如同美苏对抗对冷战的决定性作用一样。然而，也有人不认同所谓“转折点”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紧张是暂时的，中国与其邻国以及美国之间很可能恢复本世纪头十年初的那种相对合作的关系。他们认为，经济交流所带来的好处、互相依赖的制约作用、军事冲突的代价以及国际机制的多元化能提供外交途径，避免两极化的出现，促进以“双赢”方式处理分歧，而这才是决定亚洲国际关系背景的力量。

当然，现在判断亚洲2008年之后出现的动荡到底是转折点抑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为时尚早。中国在2009至2010年期间作出强烈的消极反应后又重申坚持和平发展政策，这或许支持了第二种解释。然而，中国的邻国在2011年热烈欢迎美国高调地“重返亚洲”，以及西方媒体不断声称奥巴马总统11月的亚洲之行就是为了展示美国反对日益强硬的中国的决心，加之北京对此作出的强烈反应，这些都表明，动荡期仍未结束，同时也暗示着第三种可能性。

事实证明，2011年既不像本世纪头十年初的形势那么温和，也不像2009年底以后的形势那么紧张。相反，2011年是一个混合体，这或许就是新的常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亚洲的地区关系则既不会像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随着中美对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不会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正如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20年前所言，亚洲新的常态或许最终是一种更趋向现实主义且更加健康的大国间关系，而非在夸大的敌意和天真的友谊之间摇

摆的关系。避免毫无根据的希望或担忧有助于将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处理真正的利益冲突上，从而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尽可能减小它们的破坏作用。

虽然亚洲的未来走向仍不明朗，但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面对一些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问题，人们的答案将塑造亚洲的未来。亚洲的主要国家会和美国联手从“既合作又限制”的政策转向“制衡”中国的政策吗？或者近来的政策转变反映的只是战术上的调整，而限制仍在继续？中国会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花更大的力气来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其和平意图吗？还是中国的反应表明它想要防止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即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促使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合作架构发生改变，转而结成一个旨在制衡和遏制中国的联盟？如果中国的实力继续增长，那么什么样的地区角色是北京所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其影响力增长到什么程度才是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所能接受的？如果在可接受的地区角色上的分歧无法调和，各国又会采取怎样的战略来保护各自的利益？对亚洲而言，广泛的经济交流令政治考量变得复杂，核武阴影又制约着军事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战略选择无法令人信服或者不具有吸引力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包括中美在内的亚太国家能否想出其他方案来满足实力转变背景下各方的利益？抑或它们仍只会选择固有的做法，而无法很好地适应21世纪的亚洲所面临的现实？

第12章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任雪丽（Shelley Rigger）

中美关系包含很多富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台湾问题困扰两国关系的时间最长，也最激烈。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态度都十分坚决，互不退让。不过，使这个棘手问题更为恼人的是台湾对双方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力。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宏观战略目标大体上是确定的，但它们具体的对台政策却要受各自的战略考量和政治压力的共同驱动。由于台湾具有使局面发生变化的主动权，因此，双方的决策者在很多时候都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于是，台湾的内部政治情况不仅是影响台湾与大陆、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重要因素。这种态势在21世纪以来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从排斥大陆的陈水扁过渡到倾向与大陆接触的马英九，但这都不是新现象，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改变。

自1949年内战胜利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从未发生过动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解放台湾来实现统一，其目标是要将台湾同胞从国民党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与大陆统一。随着内战热情的冷却和民族主义在大陆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大陆调整

了论调，由“解放”转为“和平统一”。“和平统一”设想通过一个协商的过程，而非诉诸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这一过程最终能走到哪一步仍存争议。

1949—2000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它一直是一个核心关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去考虑是没多少意义的。当时并没有“台湾问题”，只有“红色中国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和华盛顿开始外交接触以来，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就一直是双方推进关系的绊脚石。

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发现，大陆官员一心想借中美关系的解冻来推动两岸统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人眼中，国民党能够抗拒统一并挑战大陆的关键正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因此，大陆方面希望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美国不再支持台湾，从而打开统一之门。

在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助长了中国人的这些期望，但是在美国，多数人并不认可把台湾作为同大陆交易的筹码。“自由中国”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其中包括国会中的反共人士和富有的说客。最后，尼克松政府决定巧妙处理这一问题。结果便是《上海公报》——由北京和华盛顿共同发表的一系列原则性声明——中那样的措辞：认可统一但又没有明确支持这个目标：

>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公报签署时准确描述了两岸政治人物各自的诉求，也算是为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找到了一个有效而聪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一做法太高明了：对中国人来说，公报看上去支持统一，但美国人明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份为中美关系后续发展打开大门的文件并不是一份有关共同价值或原则的声明，而只是用艺术性的措辞拒绝表明立场——未来必定会产生误解。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随着1979年签署的第二份联合公报而达到高潮，同时回避了美国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重申将《上海公报》作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但是在美国，台湾在国会中的盟友依旧决心在美国可能抛弃台湾之际维护其利益。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同样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此外，该法同样要求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北京最大的诉求是切断美国同台湾的安全关系。美国同意废除它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军，但是终止对台军售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美国人并不同意让没有防御能力的台湾独自面对他们眼中咄咄逼人的大陆。这种想法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有所体现——“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是美国的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承诺在两岸发生冲突时保卫台湾，但该法要求历届美国政府“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不出所料，中国官员对于没能将终止美国对台军售写入建交协议中大为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出建交谈判，而是仍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其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行动。1982年中国同里根政府签订的第三个联合公报中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

不超过中美建交后九年内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促成最后的解决”。

中国认为1982年的联合公报是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承诺，但美国却没有满足这一期望。相反，华盛顿仍在批准向台湾出售大量的武器和防御性装备，其中包括能够显著升级其系统的设备。对大陆和很多美国分析人士而言，美国的做法显然有违1982年的公报。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则试图将对台军售正当化，他们的理由是，1982年联合公报所预期的两岸之间军事紧张关系的减弱并未成为现实。

30多年来，1982年联合公报已经成为两国摩擦的源头。华盛顿的行为违反了公报的规定和精神，而其对台湾的承诺则进一步破坏了它对北京所作的承诺。由于担心公报可能对台湾产生影响，里根总统通过其驻台代表向蒋经国传达了口信。里根对蒋经国所作的“六项保证”包括：不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设定对台军售终止期限、美国不做两岸调解人、不强迫台湾进行谈判。里根政府的姿态安抚了台湾，但也让大陆领导人更加认为美国在谈判中背信弃义。

总之，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些措辞模糊的文件上的，在推动两国关系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三个联合公报模糊的措辞使北京方面对美国断绝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这是确保两岸统一的一步。而与此同时，无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如何承诺，美国政府都无意将台湾拱手交给大陆。

这一段扭曲的历史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让台湾有了更好的筹码来博取美国的同情。与此同时，这也破坏了几十年来两岸关系之间的静态平衡（尽管也是麻烦不断）。

从内战结束到1987年，台湾奉行不同大陆接触的政策。台湾所要做的就是为重返大陆做好准备。虽然两岸还是有过一些不可避免的接

触，但都限于最小程度。由于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两岸统一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水火不容，但双方都将统一视作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双方置于对等的地位。

但是，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打破了这种僵局。首先，这使台湾人能够向领导层施压，要求开放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当1987年台湾人被允许前往大陆时，他们立刻明白了两件事：大陆同台湾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差异使大陆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很快，台湾企业家涌进大陆，投身制造业，许多企业得以摆脱台湾高工资、高地价的包袱而重获生机。把大陆视为难以对付的敌人、台湾人不能去的危险异域的想法，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好的方面讲，民主化开启了通往大陆的大门，改变了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但也同样唤醒了对立势力。政治改革结束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关两岸关系的讨论因而活跃起来。这场讨论中马上出现了要求正式独立的呼声。改革同时也加剧了选举的激烈程度，政界人士也更需要考虑选民的诉求。统一并不是唯一诉求（独立也不是），因此台湾政界人士对统一热忱不再，对该问题的谈论也在减少。

2000—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

2000年台湾的第二次大选震惊了台湾选民，也震惊了大陆领导人。反对党民进党的支持率一直停留在40%左右，远不到多数。但是，2000年过于自信的国民党失算了。候选人提名使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不满的一派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民进党得到了该有的选票，而国民党的选票却被分散了，最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

陈水扁温和的就职演说是为了消除大陆领导人的疑虑（同样也是

为了安抚台湾选民和华盛顿的官员），但北京仍然对陈水扁和民进党心存疑虑，北京方面认为二者都致力于台独。北京方面起初表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但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点，两岸关系进展趋缓。陈水扁同样面临着由国民党领导的立法院的反对。2002年8月，陈水扁开始偏离温和路线，将两岸关系描述为“一边一国”。在随后的任期里，他一直致力于加强台湾抵制统一的力量，包括旨在灌输台湾人身份的教育改革。

2008年马英九的胜选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陈水扁当政时期，两岸的经济联系和人员交流飞速发展，但两岸政府之间半官方代表的谈判则陷入僵局，这是因为陈水扁不愿接受北京方面提出的对话前提——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即便是李登辉时代所达成的措辞模糊的“九二共识”，对陈水扁和民进党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曾经促使两岸关系有序发展的会谈渐渐消失，两岸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马英九在竞选中承诺重新发展两岸关系，既要减少紧张又要使经济往来更富成效。他愿意将“九二共识”作为新一轮会谈的基础。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让大陆大松了一口气。它消除了台湾向独立跃进的威胁，并使两岸在经济甚至政治问题上取得进展成为可能。

经过8年的“怒目圆睁”，大陆领导人在2008年发现，即便不足以微笑，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陈水扁时期令他们担忧的最坏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尽管马英九也不大可能很快推动统一，但合作和接触的前景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长远来看，大陆领导人认为，合作和接触会为统一创造条件。

在马英九就任一个月之内，双方的半官方代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打破了它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僵局，并在一些困扰了双方8年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它们使一系列定期会议制度化，而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两党定期会谈也成为另一个平行的渠道。海基会与海协会签订协议的速度超过了各自政府执行协

议的速度。合作在2010年6月29日达到高潮，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协议放松了投资和市场限制，降低了关税，创建了纠纷解决机制并确立了其他经济合作措施，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措施给台湾带来的好处要多于给大陆带来的好处。

两岸之间的谈判和经济合作在2008年至2012年间迅猛增长。不过，虽然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但两岸关系中仍存隐忧。很多台湾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和方向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希望同大陆维持和平的局面，也承认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好处，但就是不愿越过经济和其他一些实际问题来考虑政治话题。

2000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复杂性凸显了大陆对台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大陆领导人希望能够抓住机遇，但不想被人利用。他们担心包括马英九在内的台湾领导人只想获得好处而不想回报。所以，他们的让步基本仅限于经济领域，原因之一是，政治上一旦作出妥协，想要撤回就不那么容易了。

北京的谨慎也反映出它实现长期目标的决心。大陆愿意在经济上给予台湾好处，从而使自己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如果这样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大陆就不必作出政治让步。

2000—2011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追溯中美关系因台湾而出现的紧张，其根源几乎如出一辙。大陆要求美国尊重其主权，也勉强接受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官方联系，但是对于任何可能使台湾地位升级的行为，它都会进行抗议。美国愿意断绝同台湾的官方联系，但却不愿停止给予台湾它向其他国际朋友所提供的一些实质性好处。在这些好处中，最

主要的是防务援助，这也是引发中美关系紧张的第二大源头。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尼克松、卡特和里根都背弃了原先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承诺。这些根本矛盾扩大了双方的分歧：大陆认为统一在道义和政治上都是不容置疑的，而美国官员则不然。

陈水扁的政策在这些方面挑战了华盛顿和北京。2002年年中之后，陈水扁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提高台湾国际地位的行动：推动新“宪法”、要求进行有关台湾“主权”问题的公投、要求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等。不出所料，大陆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且危险的。2005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授权人民解放军可以使用武力阻止台湾正式独立。

美国也认为陈水扁的很多行为十分冒险，有损稳定，也是在无理取闹。虽然小布什是几十年来看上去最支持台湾的总统，但2003年底他也被陈水扁的挑衅行为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期间，小布什对记者说：“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作出决定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是反对的。”

陈水扁的政策不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2000年到2008年间，声势浩大的台湾游说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克林顿时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打政治牌的美国国会，在小布什上任后兴趣大减。这一方面出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崛起。议员们对此的忽视使台湾在国会山中的关注度大大降低，当然这是政府官员乐见的。在李登辉签证事件上遭遇惨败之后，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直接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通过国会施压。当白宫对陈水扁失去耐心时，台湾显得无可依靠。

台湾在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完全是自找的。李登辉将大量对美外交事务都外包给了私人游说公司，而陈水扁政府则采用了另一种外包方式。台湾在美国的准官方代表处由从外事部门派出的官员组成，但陈水扁和民进党并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从台湾派特使直接

同美国官员打交道。不同信使所传递的信息难免会有冲突，这令美方感到疑惑和失望，特别是陈水扁的许多特使对美国官员的话毫无兴趣。包括美籍台湾人团体在内的支持台湾的非官方组织也只是增加了不和谐的声音。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连对台军售都会造成美台之间的紧张。2001年春，小布什总统批准了台湾在克林顿时期所提交的军售清单。这项决定引发了北京方面意料之中的反应——强烈的谴责，但台湾方面的反应则完全出乎意料。台湾政界人士非但没有欢迎这一期待已久的防务大单，反而提出了批评。7年中，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一直拒绝拨款购买大多数美国希望向台湾出售的武器。

军购的反对者利用此事招揽选票，甚至指责美国为了经济利益剥削台湾。他们意在否定陈水扁在政治上的成功，却破坏了美台关系。美国官员对台湾的两个政党都失去了信心。最让人难堪的是，美国顶住北京的压力批准了军购清单，却未因此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回报。

陈水扁执政的前两年可称得上是“错失”的两年，因为大陆错失了一些有助于陈水扁走温和路线的机会；而他执政的最后两年则由于丑闻频发而陷入死亡漩涡。2002年到2006年间，他将“大陆恐惧症”的观点嵌入了台湾的政策和政治中。几十年来，大陆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美国插手，但在那四年里，大陆却依靠美国来约束台湾。大陆直接向台湾施压的努力事与愿违。

经过陈水扁时期的紧张和不确定之后，马英九的当选使中美官员都松了口气。2012年，他的连任也同样受到欢迎。尽管如此，三方领导人依然明白，他们不同的目标和愿望会继续制造艰巨的挑战。大陆欢迎马英九反对台独的立场。美国官员对两岸恢复会谈和合作表示欢迎，但也明确指出，只要军事威胁存在，对台军售就将继续。马英九当局则一边同大陆展开贸易，一边向美国购买军火。

2008年10月，白宫告知国会，希望向台湾提供价值65亿美元的军售大单，这是美国向新的台湾当局释放的信号。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阵营表示会跟随小布什政府的脚步：“奥巴马参议员强烈支持缓解大陆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赞扬了双方在这方面的努力。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不仅不会使两岸缓和关系的进程遭到破坏，反而会促进这一进程。”

北京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并取消了多项与美国的交流。但它并没有批评台湾，而只是批评了美国。这种模式贯穿了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不论台湾方面多么渴求军购，大陆都无视台湾在军售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将矛头直指美国。

在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里，大陆进一步回击了美国对台军售。2009年6月，中国军方官员在美国参加防务会谈时，重申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在2009年中国时任台办主任王毅同美国外交官的会谈中，对台军售也是会谈的焦点。

2010年5月，关友飞少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期间发表长篇演说，抨击美国对台军售。同年夏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访问亚洲期间，中国军方拒绝邀请他访问中国。当盖茨表示中国过分强调了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马晓天回应道：“对台军售表明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

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在对台军售上的步伐是有所克制的，但中国并不买账，反而对事态的每一次发展都作出了强烈反应。在媒体曝出美国政府已经同一些企业签订为台湾生产“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之后，大陆痛斥美国，并威胁对相关公司实施制裁。大陆的强烈反应和对相关企业前所未有的制裁威胁使美国的观察家认定，大陆增强了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反对。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

的武器。大陆像往常一样继续指责美国，而不是台湾。它断绝了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并威胁制裁美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批评美国的军售使中国无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2011年10月，美国批准对台湾现有的F—16A/B战斗机进行升级。升级现有战机而不是出售新战机的决定使台湾方面和它在美国国会中的盟友感到失望，因为台湾一直希望美国能够出售新的、更先进的F—16C/D战机。尽管如此，这一决定还是引发了大陆标准化的反应，而台湾无法获得足够拨款完成美国已经批准的军购项目也使美国感到不快。

总之，在马英九时期，对台军售问题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大陆提高了反对的调门，同时在言论武器中加入了新的内容。除了常规的措辞——对台军售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违反了1982年的联合公报——之外，大陆领导人开始用日渐热络的两岸关系来证明结束对台军售的正当性。他们指出，现在两岸之间一切顺利，唯一在闹事的就是美国。

马英九在2012年1月的连任肯定了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大陆在经济上对台湾慷慨让步，希望以此强化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但大陆不要求马英九在政治上作出突破，以防在台湾不稳定的政局中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同时，大陆继续扩张军力，不仅为了震慑台独，也为了从长远上为大陆赢得更多选择。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北京公开寻求华盛顿的帮助来遏制台湾作出它所反对的行为。马英九上任后，战略发生了变化。大陆不再通过美国限制台湾，而是试图在美国和台湾之间打入楔子。大陆官员抨击美国对台军售，却不批评台湾。当台湾没有完成军购时，美国官员有理由惊讶，为何台湾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得到了政治利益，而遭受惩罚的却是美国。

是该有点新意的时候了？

美国在同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保证了美国大体上能够同大陆和台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被称为“战略模糊”的方式既不支持统一也不支持独立，它强调不管两岸关系如何发展，都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对台湾的防务援助能够确保两岸关系保持非强制性的和平发展。这项政策的模糊性在于，美国没有明确承诺，如果两岸和平发展进程遭到破坏，它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保卫台湾。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模糊性能够形成对海峡两岸的双重威慑：既能震慑大陆进攻台湾，也可震慑台湾挑衅大陆。

战略模糊也遭到了批评。有的人希望美国更坚决地支持台湾，有的人则要求优先确保良好的中美关系，即便这意味着要减少甚至取消对台湾的支持。在马英九执政之初，这一讨论开始升温。奥巴马政府继续执行以往的战略，但要求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压力在增长。批评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其中大多数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分析判断：一个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有关，另一个则与两岸关系有关。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政治难题，但在2000年之后，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中美经济合作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同时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也比以往更加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小布什总统立下目标，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机制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些发展预示着什么？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这一问题在分析人士中产生了分歧。有些专家强调中美之间合作的潜力，另一些人则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中美之间产生战略竞争。在台湾问题上，观察人士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台湾曾经是，将来也会是中国内政和外交中具有破坏力的因素，另一派则认为未来几年台湾对大陆的挑战将会有所

缓解。

2011年，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Jr.）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美之间日渐增强的战略竞争以及台湾在中国政治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美国撤销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成为必要之举。按照前大使傅瑞伟的说法，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正在经历自由落体。他的结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减少那些促使中国准备好同美国一战的活动是十分明智的”。他认为，这种活动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援助：

> 台湾问题是唯一能够引发中美之间战争的导火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同台湾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对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敌视态度。美国持续的对台军售、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和军事建议是对中国自尊心、民族主义、日益强大的实力以及军方的潜在挑战。

傅瑞伟暗示说，对台军售阻止了台湾接受他所认为合理的统一条件。他说：“北京认为美国的政策是阻碍中国在唯一且受国际尊重的主权之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后障碍。尊严和统一曾经是，也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核心目的……追求民族尊严的政治动因迟早会促使北京采取比现在更加冒险的政策。”而对台军事援助正是把衰落的美国放在了崛起的中国的对立面上。

唐耐心和葛来仪虽然与傅瑞伟有着相似的推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她们同意傅瑞伟有关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增强，以及台湾对大陆而言是个棘手问题的论断，但她们并不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迁就大陆就能够缓解问题。相反，她们认为，“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或者仅仅只是削减对台湾的援助都会让大陆更自信地认为美国已经式微、犹豫不决、不可依靠”。与此同时，大陆的民族主义“虽然会对美国放弃台湾感到满意，但这不会完全满足大陆展现实力的需要”。因此她们认为，不再对台湾进行防务援助会造成两岸的不稳定，也不会给美

国带来利益。

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在他讨论对台政策的文章中也同意这些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增强的判断。这些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对大陆的挑战会越来越大。但萨特怀疑，如果台湾顺从大陆，这是否会给美国带来风险。他认为，台湾在大陆的压力之下已经很难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目标——维持台湾地区实力和影响力的平衡，使之有利于台湾和美国的利益，并受美国影响——而言，两岸实力的现状和趋势已经对其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萨特呼吁美国重视那些可能导致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受阻的事态发展。他也暗示，台湾如果被允许（也自愿）与大陆统一，那么美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

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也认为台湾正在向大陆靠近。但是与萨特不同，他认为美国应当欢迎这种被他称为“芬兰化”的发展势头。“芬兰化”意味着“台湾会走向中立，而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这样能够使大陆不再担心台湾会成为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抱负的绊脚石。反之，大陆也会放弃军事威胁，允许台湾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组织中，并扩展其经济和社会利益”。

在吉利看来，华盛顿的战略模糊政策使“芬兰化”的进程复杂化了。如果台湾无法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它就不会再犹豫不决，“芬兰化”进程就会加速。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避开这个问题，任由“芬兰化”发展，因为台湾不应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傅瑞伟等人认为“大陆受到民族主义驱使，其统一台湾的要求源于民族所遭受的耻辱和虚弱……大陆正在试图通过重新统一台湾来转移民族主义的诉求并避免合法性危机”，而吉利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以高度的交流、互信以及减少武力威胁为前提的安全观是两岸都认可的”。

他认为“芬兰化”对大陆、台湾和美国都有好处。这一进程之所以有利于美国，是因为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并不是意识形态上

的，而是地缘战略上的：大陆希望确保台湾不会成为包围和威胁它的工具。他表示，美国现有政策可能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是它发展军力”。

“加剧中国大陆对被包围和其海上领土的担忧，进而促使与傅瑞伟、唐耐心、葛来仪和萨特不同的是，吉利强调中美进行合作和双赢交流的潜力。但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前提是使台湾问题不再“碍事儿”。事实上，他表示，“对于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实现其最高目标——维持和平的国际自由秩序——的美国政府而言，台湾开辟新路的决定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这种乐观的看法得到了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和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这两位台湾问题专家的回应。格拉泽在《外交》杂志撰文称，“中国的崛起不会像正统的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危险和具有竞争性，因为导致大国冲突的结构性力量仍然较弱”。但这场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台湾问题在大陆政治中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欧文斯和格拉泽就不再乐观了。

格拉泽认为，大陆将大量军费用于准备同台湾之间的战争上，由此认定，“鉴于这样的风险，美国应当考虑收回对台湾的承诺。这会消除美中两国间显而易见的冲突导火索，也会在未来数十年中保证中美关系顺利地发展”。欧文斯在一篇敦促美国修改或废除《与台湾关系法》的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写道：“重新审视这一过时的法律是必要的，这一做法会被中国视为美国为发展两国关系所作的真诚的努力，这可能带来开放、互信甚至是友谊。”

在台湾问题上的第五种观点主张维持现有的战略模糊政策，这并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或两岸关系的乐观（或悲观）看法，而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认为当下改变政策将带来更多的风险而不是好处。卜睿哲（Richard Bush）和容安澜（Alan Romberg）在一篇回应罗伯特·萨特的文章中坚持认为，美国的利益不是保持海峡两岸的均

势，而是维持其和平与稳定。

鉴于这个目标，他们表示，萨特不必担忧台湾的发展方向，因为岛内健全的民主制能够保证它不屈从于压力或者恐吓。他们赞同目前台湾同大陆接触的政策，“使大陆安心会带来风险，但是同样也能够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也能为两岸关系奠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基础，这不仅是美国的目标，也是台湾和大陆的目标”。我也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台湾尚未准备好接受统一，因此撤销对台湾的防御援助会在统一条件尚未具备之时提升大陆的预期（也会提高民族主义者要求对台湾“有所作为”的呼声）。最后，“这种变化会让大陆高兴，但也同样会创造与原有问题同样棘手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更加陌生，因此也可能更具挑战性”。

结论

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重创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在中国，这场大衰退令一些人认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从传统大国转向中国。中国学者、官员的公开言论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一系列强硬的行动正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信心。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这已经证明战略竞争将要出现。奥巴马总统2011年实施的“重返亚太”的政策被广泛认为——包括中国在内——是在应对中国的崛起。

如果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幅大国竞争的场景，那么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位置也很可能发生改变。台湾将不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独立问题，而将成为大国较量中的人质。大陆坚称，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统一台湾的决心不应被认为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随着北京在南海及其他地区的政策越来越强硬，包括卜睿哲和美

国前驻台代表杨苏棣（Stephen Young）在内的一些观察家也将台湾视为中国大陆崛起的危险预警器。他们认为，大陆对待台湾的态度是其对待邻国态度的指针。目前，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看法认为，台湾是特殊的，不过这一逻辑在大陆收缩对台湾的野心时更容易理解。现在中国大陆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其他问题上，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很多决策者会怀疑，台湾并非大陆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开始。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的意图很关键。一方面，美国坚持几十年来在统一问题上不明确表态，只要是通过和平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它都可以接受；另一方面，在地区发展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美国仍要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对中国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一些美国人为了避免中美冲突升级而准备迁就中国的要求；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必须阻止北京的野心，即便这意味着要反对台湾同大陆接触。

对台湾来说，它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北京有何意图？在积极接触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政治自主，抑或大陆会在统一问题上施压？如果是后者，那么台湾如何利用它同美国的关系来对抗这种压力？美国又会怎么做？它会帮助台湾实现其目标，还是决心遏制大陆的崛起？如果是后者，那么台湾如何在两个超级巨人的冲突中自处？这些只是台湾决策者未来几年所要面对的诸多棘手问题中的一部分。

第13章 中美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的互动

沈大伟、瑞黎明（David Shambangh and Dawn Murphy）

全球层面的互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引人注目的新特点。自1971—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两国间的互动仅限于双边和地区（亚洲）层面。从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会谈开始，中美两国多次探讨全球议题，但实际上，两国之间的互动仍然局限于亚太地区（当然也有例外，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支持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的扩张进行反制）。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七届政府期间，中国一直希望被纳入战略对话中，美方对此亦表示欢迎，但实际上，美国作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希望将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亚洲。

不过，如今世殊事异。现在以及将来，中美关系将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关系。因为中国已经跻身世界舞台。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在很多方面扩展了全球影响。尽管中南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仍有22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外交承认。在亚洲、中东、非洲

和美洲等多个地区，中国以成员国或观察国的身份进一步深化了同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在某些地区，它建立了新的地区间对话组织）。现在，中国已经是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能源机构之外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同其他国家的军方开展军事交流，并同世界各国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除此之外，它更是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作为工作重点。经济上，中国的足迹同样遍布全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贸易上，也体现在其服务、海外直接投资以及对亚非各国的援助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介入跨国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中。

在以上及其他方面，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加。但有人认为，中国仅是一个全球行为体，而非全球性大国。这是因为，虽然中国在外交、制度、军事/安全、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国还是无法影响地区或全球走势。如果将对其他国家和事件结果产生影响的能力作为衡量世界大国的标准，那么中国远未达标。除了贸易和商品价格领域，中国的影响力尚显不足。因此，中国应被认为是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而非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外交依旧是消极而应激式的，这体现在中国并不热衷于解决地区或全球问题，或影响争议问题的走向。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一些敏感的国际问题上，中国通常力求迎合所有人。除了朝核问题，或许还包括气候变化议题，中国无意深度介入任何国际问题。即便是在朝核和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上，中国的反应也常常是迟缓的。中国在外交上的行为常常令美国感到失望。美国原本希望中国奉行更为积极、合作的外交政策，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除了弹道导弹、太空计划和网络战能力以外，由于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依旧局限于亚太地区，因此中国尚无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尽管增强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被列入政府新的工作重点，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依旧虚弱，而中国的国际形象（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是略显消极。中国的确是一个贸易大国，不过2010年它的对外投资额仅以58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五，这与美国高达24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额

相去甚远。

因此，从多个标准来看，中国虽然十分积极，但缺乏全球影响力。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依旧广泛而深刻（虽然相对而言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虽然越来越广，但并不深刻。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难免略显“肤浅”，但中国仍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大国。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1999年撰写了著名文章《中国重要吗？》，现在来看（当时亦如此）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西格尔十分正确地告诫分析人士不要高估了中国的能力（尽管他没有回答影响力这一问题）。

中国在各大洲、各领域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催生了中美关系新的变化。中美之间在许多曾经“素未谋面”的领域展开了争夺。本章的核心观点是，迄今为止，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各自为战。也就是说，两国以一种自主的，而非互动的方式在追逐利益并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诚然，美国官方和情报机构对中国在西半球的活动表现出了严重关切，也在非洲和中东关注着中国的行动，但是美国并没有将应对中国的行为作为当务之急，也没有针对该问题制定政策。中国对美国在战略上的关切了然于胸，因此，中国想尽办法避免惹恼美国或成为美国战略关切的目标。

因此，本章认为，尽管中美之间是首次形成全球性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互动的，正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一样。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深入，这样的局面会发生改变，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同敌视美国的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或直接挑战美国的盟国和伙伴；或是在海湾及附近地区建立海军军事存在；或是试图破坏美国的地区安全机制；或是支持反美的恐怖活动；再或是损害美国的经济和能源利益。至今，中国已经将部分做法付诸实践：它在挑战美国的盟友，试图制约美国在亚洲的安全部署，并支持敌视美国的国家。两国之间初显战略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体现。

虽非直接竞争，但是在任何地区，两国也未协力合作。因此在操作层面上，所谓的“两国集团（G2）”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在广泛的全球事务和地区范围内不存在双边协商。2009年和2011年召开的中美首脑峰会及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反映了两国双边对话的全球化的本质。如同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其章节所述，中美之间存在60多个以促进切实合作为目标的政府间机制。其中包含了有关亚太、南亚和中亚、非洲以及拉美的双边对话。两国利用这些机制就它们在各地区的首要任务、政策、公平性等交换看法，以此作为潜在摩擦的“早期预警”，同时确定双方在这些地区可展开实际合作的领域。同时，非官方的“二轨”外交对这些官方交流起到了辅助作用。

全球性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完全竞争性的也非完全合作性的，就如本书序言中所说，二者处于“合作性竞争”之中。这就像是一场尴尬的现代舞——双方围绕彼此起舞，但又竭力避免碰到对方，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对方，各顾各的。本章接下来的内容将考察中美两国在中东、非洲、欧洲和拉美这四个重要地区的关系。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本书中对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两国在亚洲存在明显的竞争态势）。把这些结合在一起，读者应该能从总体上把握中美两国的全球性关系。

欧洲

中美两国同欧洲都有紧密的联系，但是美欧关系更深，也更牢固。美欧有着共同的纽带，这来自共同的价值、公民社会、民主、宗教、语言、移民、相互通婚、经济、共同安全等。这些起源于18世纪的联系经过几代人的往来而强化，历经战争的考验，在和平时期重建起来，并被各国政府制度化，最后通过大量的社会联系得到确立。

中国和欧洲则有着更为矛盾的历史。同样追溯到18世纪，当时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接着在19世纪，商业和殖民成为中欧关系的主要内容，而“炮舰外交”、羞辱性战争以及领土割让也频频出现在双方的关系中。虽然一些清朝的官员和学人向欧洲寻求富强之道，但总体看来，中国人十分痛恨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和目标也深受这段屈辱历史的影响，这一点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后达到了高潮。此后的几十年里，中欧之间罕有交往。中国同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建交，但是受冷战的影响，它同西欧的关系一直相当疏远。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同英国建立了贸易联系；1964年同法国建交，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其他西欧国家建交。但冷战给它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了一层阴影。后冷战时期，中国和欧洲才脱离美苏的影响，自主建立了联系。随着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开始与中国建立广泛的联系，并为同中国打交道制定了战略。中欧关系随后在2000年到2006年间进入蜜月期，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复杂。

中欧关系具有许多特点，其中最鲜明的是双方的商业往来。如今，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出口市场和高端技术的进口来源。反之，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地。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4315亿美元。欧洲进口了23%的中国出口商品，而中国也是增长最迅速的欧洲商品出口市场，2010年双方的商品贸易同比增长达到35%。在外商投资方面，2010年欧洲对华投资额达到49亿美元，在总共33361个项目中累计投资达到733亿美元，成为中国第四大外国投资者。而中国公司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仅有9亿美元，仅占欧洲外资总量的1.7%，欧洲吸纳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是继亚洲/大洋洲（65%）和拉美（17%）之后的中国第三大投资地。

中欧商业关系也不是没有摩擦。双方的贸易仍不平衡，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688亿美元。欧洲的公司和商会时常抱怨

在中国遭遇众多市场准入限制，而中国政府则不停敦促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由各主权国家认定的“市场经济地位”使出口国免于被征收反倾销关税。到2009年，已有97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主要的发达国家仍未承认。中国每年都要遭受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其中多数来自美国和欧盟。2009年，40%的反倾销调查和75%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的。世贸组织的数据显示，仅在2010年的前六个月中，就有119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被承认，那么中国商品的市场价值将会以“替代国”——而这些替代国的生产成本比中国高出许多——的成本数据，而不是其实际成本来计算。这使中国公司很容易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中国希望欧美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据估算，欧元资产占到中国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45%（其中多数为德国国债）。手握4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中投公司也准备投资固定资产，而不愿援助欧洲。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倒是有兴趣投资欧洲基础设施升级的项目（公路、铁路、桥梁和码头），但是他希望能够通过投资获得这些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在美国的情况一样，让中国人拥有并经营欧洲的核心基础设施，欧洲人会感到紧张。

中欧关系的另一个焦点是所谓的“武器禁运”。欧盟自1989年来一直保持对华军售的禁令。如今要改变禁令，则必须由27国一致同意，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武器禁运问题反映出欧洲各国在对待中国上的分歧。虽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希望同中国保持积极的外交、贸易和投资联系，但一些问题引发了双方间的紧张气氛。很多在中国具有大量业务的欧洲公司不断抱怨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许多民调显示，在欧洲民众中，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是最低的，并在2007年到2010年间持续下降。但是2011年，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 survey）对所有欧洲国家进行的调查

显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有所上升。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好感是否会保持下去尚不能确定。实际上，在2011年，除了巴西、土耳其、约旦、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对中国的好感同比下降之外（虽然后两个国家的绝对数值依旧很高），全世界对中国的好感都在上升。

表13.1　中国的受欢迎率（2002—2011年）

	2002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0-2011 变化
美国	—	43	52	42	39	50	49	51	+2
英国	—	65	65	49	47	52	46	59	+13
法国	—	58	60	47	28	41	41	51	+10
德国	—	46	56	34	26	29	30	34	+4
西班牙	—	57	45	39	31	40	47	55	+8
立陶宛	—	—	—	—	—	—	—	52	—
波兰	—	37	—	39	33	43	46	51	+5
俄罗斯	71	60	63	60	60	58	60	63	+3
乌克兰	—	—	—	64	—	—	—	63	—
土耳其	—	40	33	25	24	16	20	18	-2
埃及	—	—	63	65	59	52	52	57	+5
约旦	—	43	49	46	44	50	53	44	-9
黎巴嫩	—	66	—	46	50	53	56	59	+3
巴勒斯坦	—	—	—	46	—	43	—	62	—
以色列	—	—	—	45	—	56	—	49	—
印度	—	—	—	—	—	—	—	25	—
印度尼西亚	68	73	62	65	58	59	58	67	+9
日本	55	—	27	29	14	26	26	34	+8
巴基斯坦	—	79	69	79	76	84	85	82	-3
巴西	—	—	—	—	—	—	52	49	-3
墨西哥	—	—	—	43	38	39	39	39	0
肯尼亚	—	—	—	81	—	73	86	71	-15

资料来源：皮尤全球态度调查

表13.1

美欧关系近年来颇为稳定牢固。在经历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波折后，双方的关系持续回暖。2011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Marshall Fund）的调查显示，仅有4%的公众认为美欧关系不佳，绝大多数公众认为美欧关系“良好”或“不好不坏”。虽然阿富汗战争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不受欢迎，同时战事正在得到平息，但阿富汗仍有一支北约领导的，包含了12个欧洲国家及土耳其的军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北约同样领导了对欲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由于欧洲国家纷纷削减防务支出，北约的未来也许会遇到严重的财政问

题，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欧联盟已经作了调整，并在实质上得到了强化。

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及2010年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但这也促使双方一道努力来应对危机。2010年，美欧贸易额达到6678亿欧元（约合8899亿美元）；同年，欧洲对美投资达到792亿欧元，美国对欧洲的投资也达到了1296亿美元（约合973亿欧元）。美欧商业往来依旧繁荣。

早些年有过对中欧美“战略三角”的讨论，但实际上，自2007—2008年以来，这三方之间很少有互动，三方之间同时缺少常规化的官方磋商机制。尽管为了增进相互理解，合作应对全球治理的相关挑战，三方的确不时开展非官方的磋商，但美欧关系才是主角。自2005年起，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开始轮流举办美国官

员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之间的正式（也是私下）磋商，这些会面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同时，美欧之间还存在许多相对不那么正式的定期互动。2008年以来，中国出现在了美欧首脑峰会的议程中。在2008年的峰会上，美欧达成共识，将各自同中国的关系长期列入峰会议程。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的专家继续就中国问题和西方与中国的关系私下展开讨论。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如今还算不上西方的合作伙伴，更多的是西方政策所针对的目标。

中东

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越来越多，在该地区打交道也越来越频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对美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东，美国要保护的利益包括：保证能源安全、反恐、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支持以色列。反之，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则没有美国那么历史

悠久，也仅仅局限于某些领域。中国在该地区首要的利益包括保证能源安全，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拓展市场以及防止国内，特别是新疆的极端分子从这里获得支援。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同中东地区的互动显著增强，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包括：

深化经济关系；

2004年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02年任命第一位中东问题特使；

参加联合国在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

2008年派海军前往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多边行动；

同埃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1999年）、沙特阿拉伯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08年）、阿联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阿尔及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

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

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建立经济特区（经贸合作区）；

在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摩洛哥、苏丹、土耳其、阿联酋和巴林开设孔子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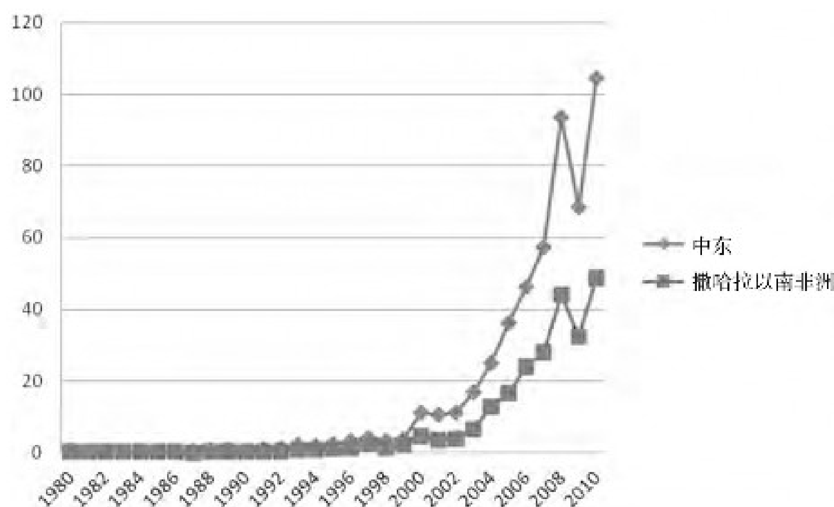


图13.1中国从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进口额（10亿美元）

能源安全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日进口量960万桶），而中国是第二大进口国（日进口量480万桶）。

中东地区的油气生产和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对两个国家而言都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还是新近的事。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开始猛增。2010年，中国进口的原油中有52%来自中东（日进口量250万桶）。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原油进口比例将达到72%，2010年这一数字是50%。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五大石油进口来源国是沙特（19%）、伊朗（9%）、阿曼（7%）、苏丹（5%）、伊拉克（5%）、科威特（4%）和利比亚（3%）。相比之下，美国进口的石油中只有25%（日进口量240万桶）来自这一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原油进口来源国主要有沙特阿拉伯（10%）、伊拉克（5%）和阿尔

及利亚（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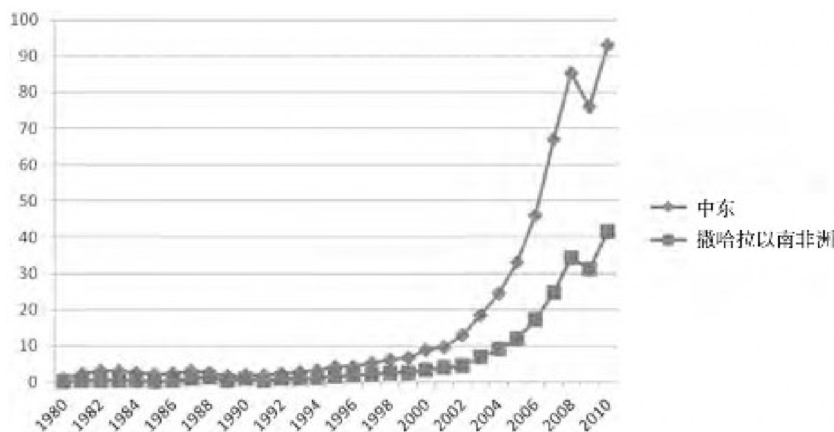


图13.2中国向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额（10亿美元）

鉴于中东巨大的原油储量，中国对该地区的能源依赖很可能上升。由于中东的能源对中美两国都很重要，两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但是，在能源领域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通过在索马里海域参与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国已经表明，当其经济利益遭到威胁时，它愿意在海洋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由于中东能源输送事关中美利益，因此在这一地区保护能源运输安全成为双方潜在的合作领域。比如，两国可以合力确保游轮和其他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等石油运输阻塞点的行驶畅通。

出口市场

拓宽商品和服务市场是除能源安全外中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利益。截至2010年，中国对中东的出口额已达到930亿美元。中国在中东的五大商品出口国分别是阿联酋（212.4亿美元）、土耳其（119.6亿美元）、伊朗（11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03.7亿美元）和埃及（60.4亿美元）。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产品（消费电子和家用

电器等）、纺织品、服装、机械和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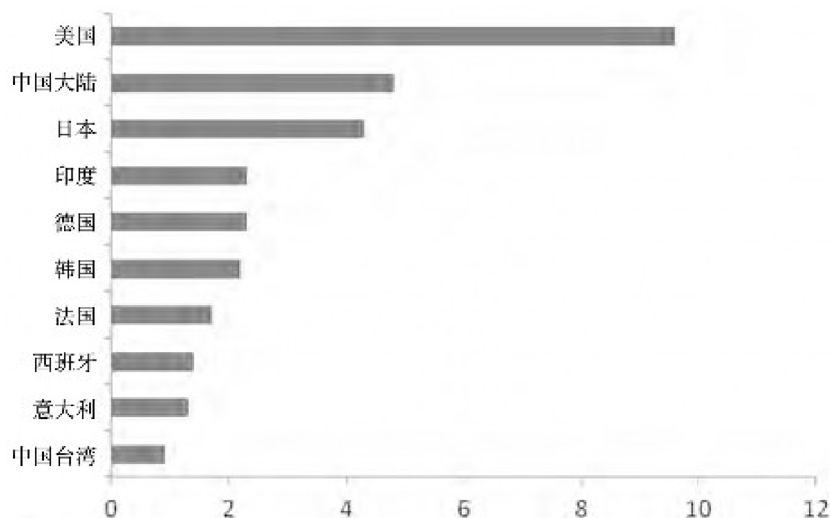


图13.3全球十大石油进口经济体（百万桶/天）

中国不光要为商品寻找市场，也要为服务开拓市场。中国在中东的服务出口市场主要是建筑、通信和金融。中国建筑公司的合同是这些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中国在中东的施工合同总额已达244亿美元。2009年，中国在中东的五大建造服务出口市场分别是阿尔及利亚（59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6亿美元）、阿联酋（35亿美元）、伊朗（21亿美元）和苏丹（21亿美元）。

不过，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所在。与商品和服务出口相比，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微不足道。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只有9.7303亿美元。

与中国不同，寻求商品和服务出口机会并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利益。2010年，美国对中东的出口额仅为600亿美元。不过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可以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阿拉伯动荡后，很多阿拉伯国家渴望外来援助帮助其进行经济改

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这种政治上的发展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随着中东国家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国都能从该地区日益增加的进口需求中获益。中美两国可以利用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来指导中东国家重构和发展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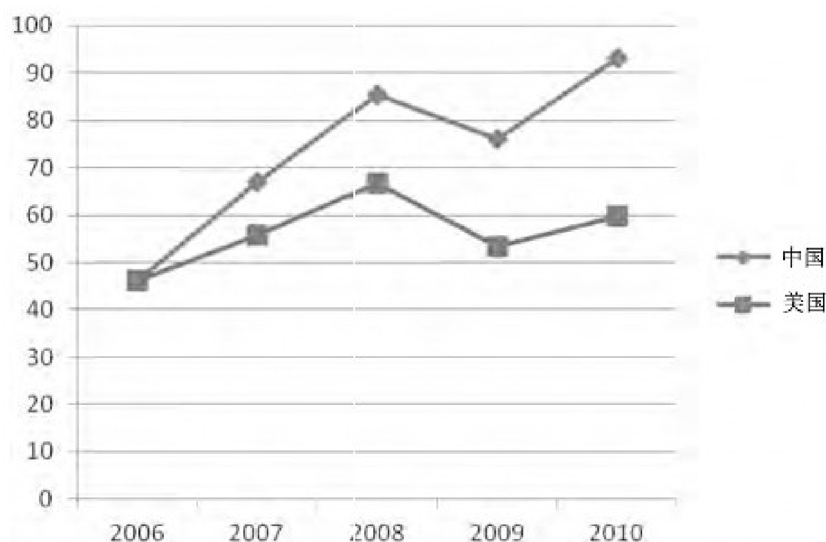


图13.4中国和美国向中东的出口额（10亿美元）

恐怖主义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发源于中东的恐怖主义感到担忧。中国的穆斯林中有50%是维吾尔族，大多居住在新疆西部。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继承了共同的道德文化。多年来，维吾尔人在新疆和东部多个省份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汉人的袭击。主要的叛乱运动就是我们所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该组织已经被美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列为恐怖组织。

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之后，中国对内生和跨境的恐怖主义越来越担忧。有迹象显示，由于2009年的新疆骚乱和中国在伊斯兰国家

中经济影响的扩大，基地组织对“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力度在加大。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往来的增加，其在国外的业务可能日益成为基地组织攻击的目标。

中国已经表示愿意加入中东地区的多边安全协议（如在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参与联合国在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因此，如果基地组织威胁到中国的全球经济利益，中国会更积极地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反恐行动中加强合作。

以色列

最后，除了保障能源安全、反恐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大利益是支持以色列。中国成功地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取得了平衡，不过，在1992年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国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有力支持者。2002年，中国设立了中东问题特使，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中国在此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它们相信，相比美国，中国并没有那么多偏见。不过，看上去中国并不愿意在这一进程中触动美国的利益，也希望维持与以色列的良好关系。未来，如果中国屈从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或因为其他原因而更加积极地在和平进程中帮助阿拉伯国家，那么中美关系无疑又将受到考验。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与中东的情况类似，过去20多年来，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但不同的是，中国同这一地区的联系已维系了60多年。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利益涵盖能源安全、获取自然资源、为商品

和服务开拓市场。它在这一地区的显著进展包括：

同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显著增强；

为该地区提供了重要援助；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以及此后各领域分论坛的成立；

2007年任命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南苏丹等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与尼日利亚（2005年）和安哥拉（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南非（2010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国建立经贸合作区；

在贝宁、博茨瓦纳、喀麦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美国在这一地区也有重要利益。对美国而言，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能源安全、防止恐怖主义扩散（主要是失败国家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以及公共卫生。美国同样希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促进民主和人权事业。

能源安全、自然资源和出口市场

从石油进口和缓解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角度上讲，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对中美两国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非洲，中国有着广泛的商业、政治、文化利益。2011年，中国进口的原油（日进口量120万桶）中有25%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2010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四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美国有14%（每天130万桶）的进口石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中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是主要的供应国。因此，中美之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围绕能源展开的竞争会愈演愈烈。

与中东不同，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多种自然资源，不仅包括能源，还包括矿石和农产品。中国从这里进口的主要自然资源有铁矿石、铜、铬、钴、锌、锡、金、钻石和农产品。美国也从这里进口自然资源，其中80%是能源，对非洲大陆关键资源的进口依赖度达30%至60%。除了能源之外，美国从这里进口最多的是矿产、金属、化学原料和农产品。美国是非洲矿业投资最大来源国，占有非洲大量矿产资源开采权。2011年美对非矿业直接投资存量达333亿美元，占其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59%。

中国同样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视为其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在这里的出口额达到415亿美元。2010年中国在该地区的五大出口国分别是南非（108亿美元）、尼日利亚（66.9亿美元）、利比里亚（43.9亿美元）、贝宁（22.7亿美元）和安哥拉（20亿美元）。中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产品多为电子产品、机械、纺织产品、运输工具等。相比之下，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额为170亿美元。

和中东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是中国建筑、通信和金融服务的主要市场。2009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建筑项目额达166亿美元。这些服务的主要市场在安哥拉（49亿美元）、尼日利亚（20亿美元）、赤道几内亚（13亿美元）、埃塞俄比亚（12亿美元）和刚果共和国（9亿美元）。中国在这里的对外投资并不多，2009年它在该地区的

对外直接投资额只有10.7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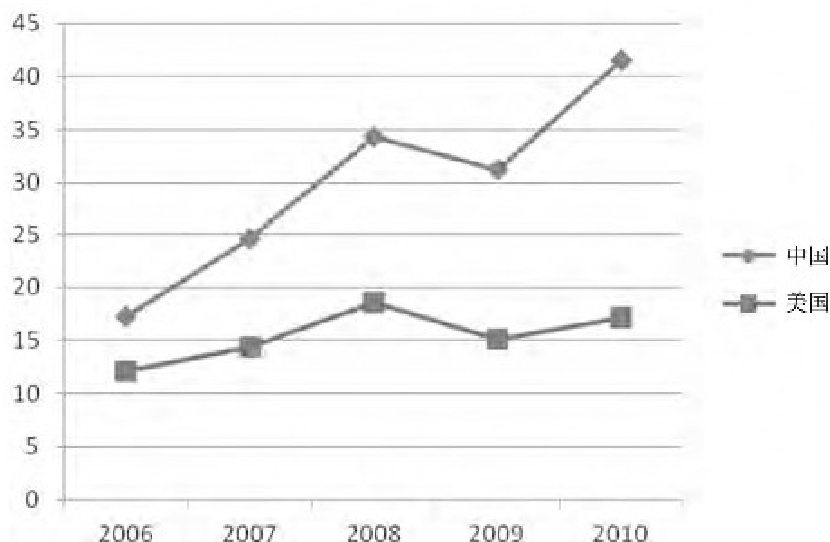


图13.5中国和美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额（10亿美元）

过去，对非出口仍然不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看重的利益，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促进该地区自然资源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也许会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领域。

以上所阐述的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为两国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对两国都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非洲沿海水域——特别是几内亚湾、亚丁湾以及西印度洋沿岸——饱受海盗侵扰。中国已经参与了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行动，也许类似的中美联合行动也会出现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恐怖主义

除了能源安全，美国在这一地区最为关注的就是防止因为贫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而产生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这种忧虑源于1998年美国

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的内罗毕所遭受的恐怖袭击，并在“9·11”事件之后进一步加剧。于是在2008年，美国设立了非洲司令部。近年来不少中国工人在非洲国家遭到绑架，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也成为中国所担忧的事项。近年，出于对非洲国家政局稳定的担忧，中国向刚果（金）、利比里亚、南苏丹等国派出了维和部队。这样一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携手训练非洲当地部队，以防止恐怖主义出现在失败国家和贫弱国家中。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是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另一个潜在的合作领域。美国致力于在该地区解决艾滋病及其他卫生问题。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投入这一领域的联邦经费大幅增长。中国也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派遣了医疗队，并在国内对当地的医生进行培训。中国在抗疟疾方面的工作十分成功。在这些卫生领域的合作不仅能令该地区获益，也能够使中美之间产生善意，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中美两国同样在西半球小心翼翼地打着交道。中国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角色使西半球的战略平衡开始被打破。虽然门罗主义已经十分遥远，但是华盛顿仍然将这里视为它的后花园，并对中国涉足西半球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竭力避免成为美国的眼中钉。比如，中国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保持着一定距离，也没有直接支援当地的叛乱、社会主义运动或是左翼政府；将对这一地区的军售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没有在该地区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尽管支持古巴，但也仅与哈瓦那保持低调联系。

虽然中国竭力避免在美国的后花园刺激它，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同这一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果从外交、商业、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来观察，就会发现，与上述几个地区以及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在其章节所写的相比，中国在该地区的情况既有相似，也有不同。

从外交上来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京仍然面临着台湾的竞争。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两岸宣称在“外交事务”上非官方地“暂停”竞争，但这仍是北京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核心。还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这与其同非洲和中东的关系一样——拉美地区代表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立场以及推动多极世界的愿望，因此，双方都在推动所谓的“南南合作”。对北京而言，巴西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拉美国家正在寻求“多向性”的外交政策，试图扩展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关系，从而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与中国交往恰恰符合它们的政策诉求。

中国和该地区多数国家建立了不同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总体框架。巴西同中国的关系异常紧密——也许是所有拉美国家中同中国关系最紧密的；同时中国也致力于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建立和谐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古巴。高级别双边外交异常活跃。1997年到2010年间，超过110位拉美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领导人到访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也先后五次访问拉美，此外，很多中央政治局级别的领导人也曾到访多个拉美国家。

在多边领域，中国在当地的多个国际组织中也相当活跃。2008年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实际上，早在1997年它已经加入了加勒比开发银行，2004年它还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常驻观察员。中国从1990年起同里约集团举行了多轮对话，还同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和拉丁美洲议会建立了对话机制。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中国也同拉美地区建立了许多论坛机制，如中国—加勒

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南方共同市场对话、中国—安第斯共同体磋商和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中国利用这些多边机制同拉美国家展开了广泛的联系。因此，不论在双边还是多边领域，中国都同西半球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和政治联系。

除了国家间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拉美地区的各政党也开展了极为活跃（但十分低调）的交流。在该地区，中国共产党同33个国家中的80余个政党保持着工作联系。中国共产党不仅同执政党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也同反对党以及在野的政客发展关系——这样如果他们上台，中共对他们已经相当熟悉（反之亦然）。中国还同很多拉美国家开展了议会交流，尽管不像党际交流那样广泛。

在这里，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国同19个国家签订了团体旅游协议，大量的中国游客涌入拉美。超过100对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建立了姐妹省/城市关系。移民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大约有3万名华裔居住在阿根廷，在秘鲁的也不少。中国加强同拉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努力还体现在建立孔子学院上，中国目前已在这里建立了24所孔子学院（全世界共有350所孔子学院），同时每年还为1000名拉美学生颁发奖学金以鼓励他们来华学习。中国与拉美已经达成了许多官方文化交流协议，两地的大学之间也开始签署合作备忘录。但学术界和拉美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依旧处于极低的水平。

中国目前在拉美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并不大，但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很明白，对于它在拉美的出现，美国已经开始感到焦虑，而美国对军事活动尤为敏感。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安全活动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首先是专业的军事交流，其中有一些级别相当高。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4位中央军委的领导人访问了该地区——比访问其他地区的频率都要高，同时每年也有大量拉美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军队高官访问北京。中国也在其军事学院中培训拉美军官。第二个层面是双方的军火贸易。中国一般向拉美地区出口小型武器和装备——中国每年大约向拉美地区出售价值1.5亿美元的直升机、火炮、

装甲运兵车、车辆、K—8教练机、雷达、指挥控制装备、反舰导弹及轻型攻击武器。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在海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总之，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安全活动不多，但是在逐渐增加，不过显然还没有达到令美国严重担忧的程度。

目前，商业活动是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活动。双方贸易额呈指数级增长，在2010年达到1789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5倍以上，其中2006年至2010年增长幅度达到160%。现在，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很多拉美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在同拉美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占到总量的40%。虽然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但拉美同中国的贸易额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4%。巴西作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也仅排在第20位。

双方的贸易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极度单一的特点。中国主要从拉美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它从巴西进口的商品中有70%为铁矿石和大豆等初级产品。中国从拉美进口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的矿产、能源和原材料。2008年，中国进口了168亿美元的铁矿石、74亿美元的铜矿、58亿美元的精炼铜、94亿美元的原油和精炼油，还进口了相对较少（数值仍较多）的铝、镍、铅矿、锌、镁和钼。中国从拉美进口的石油（包括原油和精炼油）也在增长：2009年4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北京承诺，将向中国输送的石油增加四倍，即从每日20万桶增加到100万桶。2010年巴西对华石油出口量也提高到每天20万桶。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推高了这些商品的全球价格（也大大提高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国的财政收入）。现在中国要消耗世界上40%的煤炭、25%的镍、25%的铁矿、20%的铜矿和14%的铝。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第二大铜矿进口国。

中国也从拉美进口大量的农产品、渔业产品和酒。大豆和大豆油是中国在该地区的第二大进口商品。中国的大豆进口占全球的40%，中国进口的鱼肉有80%来自秘鲁和智利，其进口的糖有80%来自古巴。中国同样从阿根廷进口大量肉类和皮革制品。

拉美国家则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电子产品（主要是手机和电脑）和工业品。大量的中国纺织品、鞋类及其他低端商品极大地冲击了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因此，2007年起，墨西哥和阿根廷不得不采取单方面的保护措施，避免大量中国商品涌入带来的冲击。这一年，阿根廷所采取的50%的反倾销和反向贸易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2008年这一比例涨到90%。中国在同拉美的贸易中逐步提升技术含量，开始向拉美出口汽车、摩托、飞机及相关配件、电子产品以及农业、生物、纳米和信息技术。这样一来，双方在低端产品领域的竞争得到了缓和。

为了促进贸易，中国同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创新型贸易融资也是一个有趣的新领域。中国同阿根廷达成价值10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允许阿根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这项协议同中国与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白俄罗斯所达成的协议类似。

中国正在该地区增加投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拉美已成为仅次于亚洲（2009年为73亿美元）的中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但是其中大量的资金流入了英属维京群岛（16.1亿美元）和开曼群岛（53.6亿美元）这两个免税天堂。据商务部估计，截至2009年，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达305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则更高一些。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占到该地区外资总额的10%。

中国也向一些拉美国家提供援助。虽然很难得到准确数据，但是一则报告称中国在2002年到2007年间向拉美提供了267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据显得过高，很可能将中国在该地区的部分投资计算在内。

总体而言，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足迹日渐增多。当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依旧强大。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2009年，美国与拉美贸易总额达到5230亿美元，是同年中国与拉美贸易额的3倍多；

美国在该地区有11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只有2个；

美国是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这一地区其他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

2010年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达到519亿美元，是同年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额的20倍，也与当年中国全球对外投资总额几乎持平！2003年到2010年间，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为1470亿美元；

2010年美国对拉美的武器贸易额为6.27亿美元，是中国的3倍多；

美国通过1947年签署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即《里约条约》）承担了西半球“安全互助和防御”责任；

美国每年为该地区培训1.5万名军事和警务人员（2009年的数据）。

美国在西半球的援助和培训项目也相当广泛，包括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进行的禁毒和反走私项目。美国国务院在这里确立了四大优先政策：促进民主、扩大贸易、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增进合作。

美国和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十分活跃，但是美国与该地区的联系历史久远，也更为深入。同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样，美国同拉美国家和社会间的往来已有两个多世纪。共同的价值、语言、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共同的安全利益、庞大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美国定居的大量拉美移民，这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

结论

本章考察了中美两国各自在欧洲、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和政策。在所有这些地区中，中国的影响在增强（有时甚至是十分迅速的），但是，从深度和广度上来看，中国仍然无法与美国相比（也许除了在非洲）。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中国的脚步不断扩展，但是都不够深入。

同时，这两个国家在上述地区都是各行其是，它们尚未陷入战略竞争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似。两国的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都在这些地区分别展开活动，但双方并不存在互动。但这并不是说，彼此之间不存在相互警惕，美国政府密切留意着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外交、军事、文化和商业活动。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损害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资源——尤其是在中东和拉美地区。尽管双方在这些地区并不是竞争性的，但双边合作也不多（如果有的话）。就像本章开头所言，中美两国尽管是在同一舞台上“跳舞”，却不是舞伴。一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增长或者中美在亚洲陷入竞争性更强或敌对的战略关系，这种局面就可能发生改变。但在目前，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确都是在“独舞”。

第14章 美中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中的交流

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

20世纪80年代初，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中国融入全球机制有助于促进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全球治理机制中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有约40年的时间。邓小平认为，和平与稳定对于中国领导层的优先政策事项——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而美国在创建这一关键的战后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71年，中国同美国一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先后加入了其他一些核心组织，如198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裁军谈判会议，1982年加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世纪90年代末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建立时，中国很快崛起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主要成员国，特别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开始在多项讨论中发挥关键作用。

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参加这些组织记录情况的学术分析大体都

给予了积极评价，少数分析人士可能认为中国在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作出了直接或创造性的贡献。比如，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2003年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参与度与合作度都超过了以往”。此后的一些著作也都赞同这种观点。

然而，自2008年起，这种总体积极的评价开始减少。从那时起，中国的多边外交经常被认为挑战或扰乱了我们所熟悉的多种全球治理秩序。目前，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持相同立场的人并不多，但或许用不了多久，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她的观点。如埃克诺米所言，“北京启动了‘走出去’的战略，目的是重塑全球规则与制度。中国自身在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在她看来，我们需要搁置视中国为墨守成规的行为体的观点，而应当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一支变革的力量”。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及其行为所发生的消极变化所进行的解释与中美关系的状况密切相关。在上述例子中，美国一直在政治和经济上软硬兼施以诱使中国与其合作。更近一点，中国相对美国的实力增长可能助长了其国内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声势，实力增强的中国希望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军费预算也跃居全球第二。对中国的某些民族主义者来说，这应当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的地位提升。

此外，在中国物质实力增强的同时，美国政府在竭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殃。外界广泛认为，两党合作制定政策的机制已不奏效，其结果是效率低下的政治泥潭。一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不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由美国发挥支配作用、在全球秩序建设和维护上居中心地位的世界。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具备无可匹敌的资源，其最大的战略敌人苏联又遭遇解体，美国享有很高的地位。可如今，多极体系正在加速显现，人们难以适应并感受到了挑战，而且“游戏规则改变”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崛起的中国被视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行为体，而且比其他所谓的新兴大国更有实力来影响规则的改变，这意味着，本章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行为上，以此来衡量这个“新来者”参与国际体系的情况。此外，如克里·布朗（Kerry Brown）所言，世界“将日益视其自身为中国的利益攸关方，正如中国被鼓励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利益攸关方一样”。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要理解中国的内外行为就要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核心政治挑战。然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外部行为都受制于一个条件，即它所认为的它与美国一道在多边机制中的得失，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近年来，美国发现它也处于类似的境地。美国的官员、分析人士及评论人士日益意识到国际事件及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权力结构的重塑作用是何等迅速，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经常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对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影响来评估其全球治理行为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交流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以及双方的行为和看法。只讨论中国而不考虑美国在相应的多边组织中的行为，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于中国在这些组织中的行为的理解。对美国而言，情况也越来越如此。我们既不能建立在近来中美双边关系紧张加剧及中国相对实力崛起的基础上，假设两国的交流及成果缺少实质性进展，也不能单纯以零和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应当认为两国是可能展开交流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的确存在零和式的对抗关系和明显的分歧，但两国又都从这种僵局中收获了满足，因为它们限制了一个彼此都不喜欢的国际协议的出现。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它们的行事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有利于全球治理。

因此，在解读这一系列活动的问题上，我反对那种认为中国在故意重塑全球规则和制度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的这种“关注自我”的政策有时能够促进合作，有时又制约或促进着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我还借助经验主义的证据来考察，是否应将2008年视为中国彻

底改变其所奉行的从国际机制内部重新崛起的战略的一年，这一战略中国实行了30多年。不过，我的确承认，相对实力的增长令中国官员更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大胆表达见解。这些官员同样对一系列广泛的中国利益作出更明显的回应，这些利益需要在国内日益多元的政治背景下加以协调。

我首先简要考察了评估和概括与全球治理相关的国家行为时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全面描述了美国和中国对于这些作为全球治理核心要素的多边机构的态度，包括双方对于彼此在这些机构内的行为所持的看法。接下来，我列举了上文中提到的两国在众多机构中进行交流的典型例子。我特别将重点放在了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交流，正如伊恩·赫德（Ian Hurd）所言，联合国安理会可能是所有涉及全球

治理的国际组织中权力最大的一个。不过，我也用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全球组织来举例，有些隶属于联合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此外还有非正式的二十国集团等。这些例子更多地显示了中美两国行为方式上的长期趋势，而非突出2008年是中国行为方式的转变之年。最后，我简要评估了中美交流对于未来全球治理的意义。

评估行为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帮助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条约等其他多边机制，衡量一个国家在这些机制中的行为存在公认的难度。比如，全球治理机制可能由一系列广泛的原则组成，并与详细的规则和行为标准相联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要求越具体，国家就越不愿遵守。全球制度包含多种不同的内容，其中一些可能相互冲突，国家遵守的程度也彼此各异。这使国家可在众多的全球标准框架中“东挑西拣”，一个国家可以声称自己确实遵守了某一框

架。

在不同的领域，国家的参与度可能很消极，也可能十分积极。它们既可以最小程度地遵守这些框架，也可以积极参与有利于某个特定组织或全球机制的核心价值的活动。区分这些最小程度的遵守和深层次的合作以及评估这些行为方式是否始终如一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此外还有国内能力的问题。一国政府可能希望遵守规则，但因缺乏制度或法律能力而无力为之。在核不扩散原则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早期的一些行为方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很难想到哪个国家在遵守国际组织的要求方面是完美的。最后，在评估有关全球治理的行为时，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多边主义。这一概念同时包含最小化和最大化两种解读方式。最小化的形式指的是三个及以上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协作；最大化的形式则意味着各行为体自愿限制其政策自由以遵守协商一致的规定、规则和标准。它们还可能产生具有超国家权力的多边机制。

在综合评估一个国家的行为时，需要牢记这些分析、衡量及定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将“现状”与“革新力量”的对比作为主轴，而不是采用非此即彼的分析框架。

美国、中国与全球治理

美国

尽管分析起来很复杂，但有关美国在全球治理及多边组织上的行为表现方面存在一个共识。人们长期认为，美国与国际组织及更加广泛的多边组织之间的关系颇为矛盾。总体而言，美国一向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多边主义者”，地区和全球组织、安全和经济领域都有它的身影，“它根据具体问题、自身利益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从

一系列可能的方法中进行选择”。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和谢泼德·福曼（Shepard Forman）在2002年写道，“全球相互依存在不断加深”，“谁都无力独自解决的跨国问题”也在不断扩展。但他们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多边机制怀着深深的矛盾心理，在履行新的国际承诺时也变得十分挑剔”。此外，虽然我们应当承认，美国政府在建立众多现代主要全球治理机制上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当它认为有必要远离这些机制时，它也表现出了持续的疏离倾向。

美国位居全球层级顶峰的地位是解读这一倾向的关键因素。美国的霸权赋予了它借助多种手段——从单边到多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但这种选择性同样来自美国的例外主义冲动，这促使它擅自设定其自身理想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自认为是“国际秩序的终极保持者”。如爱德华·C·卢克（Edward C. Luke）所写的，美国以为“其国家价值和实践适用于全世界，其政策位置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而不只是权宜之计”。多种信念的结合促使美国决策者有时置多边场合于不顾，当他们认为某些机制不符合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需要时，就会不时地试图加以改革或修改。因此，在相对而言的强大实力和例外主义的推动下，美国在必要时更愿意与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共识保持距离，有时甚至试图彻底重塑这些机制。比如，1990年到2007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几个国家避免经常动用否决权，而美国却频繁使用，22次投票共动用了15次。在决定是否动用武力的问题上，美国也十分强硬，且表现得与众不同。如今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有关联合国安理会是动用武力的“唯一合法授权机构”的说法作出回应时说，“参议院没有人认同这种说法，毫无疑问，安南错了”。

因此，鉴于美国的这些看法，在中国的国际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之际，美国官员和一些评论人士强调要让中国在这个美国主要为自身利益塑造并将继续塑造的国际秩序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也就不足

为奇了。在这一点上，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发表的那场题为“中国应当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过，美国也曾发出类似的劝告，比如尼克松总统1971年呼吁中国“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关系”；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1989年表示，“自1971年以来，我们的对华战略是让中国摆脱孤立，融入国际社会……我们的期望是，我们未来的对华态度能够促使中国领导人逐渐接受并遵守国际行为准则”。

中国

中国加入众多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时，心里清楚美国在创建许多核心国际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知道美国的行为方式会不时发生改变。这种意识还附带有两个彼此关联却又多少有点儿相互矛盾的立场：其一，美国令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屈服于自身意志；其二，中国严格遵守这些组织原则和准则可作为削弱美国正当性和实力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坚持和平崛起且更值得信赖的全球行为体。

然而，尽管对国际组织和强国之间的关系怀有深深的疑虑，但约翰斯顿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显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行为仍表现出了诸多合作的特点（也有一些大的例外）。从毛泽东时代的低起点开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并且未对全球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至少目前没有。安·肯特（Ann Kent）2007年对中国在4个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进行了研究，她得出结论认为，“外界可能会依据中国对国际组织及其准则、原则和相关协议规定的遵守程度来对其作出评价。事实上，如果从中国1980年与国际组织参与程度和合作程度的起步水平来看，其进步是显著的”。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虽然指出中国在2009和2010两年出现了一些消极变化，但他还是对中国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其间克里斯坦森在小

布什政府任职）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全球治理行动表示赞赏。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描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核不扩散政策，大体上得出了积极的结论："中国加入了众多的核不扩散条约和协议，缩小了其敏感的出口的规模和内容，其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承诺实现了制度化，并打造了一批包含政府内外人员的核不扩散专家。"此外，中国还努力推动这一标准框架超出国界，这一特殊承诺使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利益展开直接竞争。在全球金融领域，尽管在银行管理体系（所谓的巴塞尔规则）中很明显是"规则执行者"而非"规则制定者"，但中国依然总体上遵守了这些管理规定，并在2003年组建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那时起，中国就接受了二十国集团的共识，即巴塞尔框架依然有效，但需要根据自2008年11月以来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所设定的路线进行改革。2009年3月，中国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并同意加入互相审查的长期过程，目的是促进这些标准的执行。

当然，这一总体上合作的趋势也有重大例外，这些例外可根据大多数全球治理机制的自由价值（这些自由价值在约翰·艾肯伯里撰写的章节中有概述）以及完全遵守这些规则可能产生的消极国内结果来加以解释。例如，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不那么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调整人民币币值的诉求了。虽然中国口头上依然坚定地支持核不扩散准则，并加强了国内监管和对协议的执行力度，但它仍迟迟不愿对朝鲜或伊朗的核活动施加严厉制裁。中国认为，一味地配合将给其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国内优先任务带来消极后果，在上述例子中，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由此来解释。然而，当全球需求和国内需求一致时——如巴塞尔规则的例子，中国国内的改革者希望借此来改革中国脆弱的银行业——我们看到，中国十分支持全球规则，即使有些规则当初完全是由他国制定的。

不过，虽然有证据显示中国在多边领域的行为是积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严格践行上文定义的多边主义概念的行为体。中国

总体上对自由的国际秩序抱有矛盾心理，并在独立于成员国行事的机构中感到不适。这在中国对地区组织的偏向中可见一斑。此外，这些倾向近来变得愈加强烈，随着相对实力的增长，中国有时会将这些机构视为为中国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而非所有国家和人员都有利可图的机制。如时殷弘所言：“在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长期关切方面，有一个关切或许是压倒一切的，即中国政府经常感到，西方所谓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将超过中国的能力，从而损害其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利益。”

因此，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希望在决策方面保留尽可能多的自主性。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既没有在全球治理机制的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这种角色使美国在面对全球秩序问题时，能够运用单边、双边和多边等多种手段在多个多边组织中进行选择。总体而言，中国从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机制中看到了利益，尤其是在这些活动与其国内目标相一致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多边机制有利于支持中国所谓“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论调，有时能够赋予其行为积极的印象，将这些行为与其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行为区分开。

中美交流的类型

中美两国在全球层面的交流主要可归为四类：（1）零和对抗；（2）虽有明显分歧但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3）两国利益碰巧重合；（4）两国的行为方式可能不同，但结合起来却总体上有利于全球秩序。

零和对抗

第一种类型的典型案例与全球经济失衡有关。这如今是二十国集团商议的主要问题，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美双边讨论的一大长期关切（详见葛来仪撰写的章节）。2010年11月在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遇到的困难尤其多。有报道用“狂风暴雨”来描述谈判过程，首尔峰会发言人谈到各国副财长举行的前期会议时说，“各方都提高了调门，不肯让步。争辩如此激烈，氧气仿佛都不足了，我们不得不敞开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要求美国多留心其“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还有一些人暗示人民币币值问题不应放在国际论坛上来讨论，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国内带来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以及美国等外部行为体都应考虑到这些后果。

在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美国国会于2011年8月最终投票决定提高美国债务上限，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纷争随之进一步恶化——至少在言语上如此。新华通讯社发文称，美国应“治愈其借债成瘾的问题”，并“量入为出”。这意味着美国应削减其“巨额军费开支”，并“提高社会福利”。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指责政府将一半的外汇储备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实在是太愚蠢。中国学者朱峰称，财政部的官员都紧张地“双手紧握”。

毫无疑问，这种两极化的态度吸引了二十国集团的注意力，妨碍了它们长期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后果的能力。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也比以往更加决心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保持在全球议程范围之外。不过，这种两极化以及日渐强烈的相互指责的成因是复杂的，不完全是由于自2008年以来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一问题来源于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2006年成为世界主要的顺差国，而美国却成为最大的逆差国。

相比2008年以来中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初源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则需要顺差国和逆差国

双双作出调整。对此，中美两国在2009年11月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似乎也表示认同。声明写道：

> 中国将继续实施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消费比例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恢复到可维持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

可不幸的是，这一对称且明智的方法并未深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中美两国的心中，情况又退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点放在顺差国的储备积累上，同时放松对美国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制约。事实上，中国官员在2005年的言辞让人想起20世纪末他们的措辞："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大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首先要拿出可信的行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国家储备。"2005年左右对中国心灰意冷的美国试图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规则。2007年达成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收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汇率的监督。中国认为该政策是在针对自己，并且由于助长了投机性资本进一步流入该国而引发中国不快。对一个向来都根据共识运作的机构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中国反对这一提议，并在2007至2008年间退出了双边监督程序，仅在2009年又重新回来，但仍对监督程序保持警惕。在当时的中国看来，这些规则是不公平的，这些规则太过迎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加以改革，而且这些多边机制完全无视汇率调整可能产生的国内成本。中国已经提升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比例，但在2010年，这也不过提升至了总份额的3.81%，低于法国和英国的联合份额，更远低于美国的16.73%。因此，中国仍将对这个似乎不照顾其国内关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心存疑虑，而依赖二十国集团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似乎也算不上是好办法。

虽有对抗但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

然而，也有一些时候，中美之间的交流虽然公开呈现对抗性——有时是因为双方有根据认为彼此的价值观不可协调，有时则是因为官方声明的论调——但事实上，这却在无意中促进了双方在结果上达成一致。这一部分的大多数相关讨论恰好都处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如约翰斯顿所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倾向于比较传统的国家主权定义。不过，鉴于保守的共和党在美国的实力一直有所延续，这些利益上的重合一直到奥巴马执政时都还依然存在，奥巴马政府的行为方式更趋向于多边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尤其是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以及小布什时代——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交流特点。在这些谈判中，中美在推动有利于防止对人类造成进一步伤害的核心原则上存在巨大分歧，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双方对此原则仍有分歧。

美国长期认为中国是在该领域实施相关政策的障碍。美国评论人士，尤其是国会议员强烈表示，《京都议定书》将所有改革成本都算在发达国家头上，而让中国这样的主要排放国无所作为是不公平的。中国则称，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先导致了这个问题，是它们挥霍能源，在城市和工业发展进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中国还认为，其生产的许多商品以及导致碳排放的商品在世界各地都有消费，尤其是在美国市场。这些冲突严重制约了气候保护协议的达成，以及为《京都议定书》寻找合适接替者的努力。

不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气候保护立法进程受阻可能促使两国政府以某些形式展开协商。安·肯特写到，双方似乎在2005年的谈判上联手减弱商讨后《京都议定书》机制的努力。那一

年，也就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大约四年后，小布什政府启动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中国也加入其中且绝对支持，原因之一是该计划的要求是自愿而非强制的。中国还加入了美国在2007年发起的“经济大国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美国此举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对其不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的指责。中国对于该论坛建立起来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表示欢迎。即便如此，该论坛并未取得多大成果。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也难以取得进展，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用于各种国际减排努力的资金，国内其他政治团体以经济为由反对减排，并经常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表示他们的不满。

利益重合

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也会进行合作，以显示它们在某些有限的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如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所言，在广泛意义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发展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例如，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举行前夕以及对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大自由》报告的讨论中，有关国际社会如何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就符合中美两国的要求。两国都反对科菲·安南提出的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制定干预原则的做法。中国（和俄罗斯）坚持认为，任何干预行动都必须获得安理会授权，这意味着有可能遭到否决。美国也反对可能对其决定何时动用武力的自由产生约束作用的规定，它不想卷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坚称，“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责任和义务“不具有法律意义”。他说：“我们不认为，作为整体的联合国或者安理会，抑或任何一个国家有义务根据国际法进行干预。我们认为，联合国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应当取决于具体情况。”事实上，中国对此非常欢迎，其主要关切更多的在于国家对于民众的权力

以及任何可能破坏不干预原则的行为，而非战略自主性，这一点与美国类似。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概念以及对个体人权的保护表示认同，但美国在多起事件中的审慎态度表明，它并不想将这个领域的政策自主性让给联合国。比如对苏丹，它呼吁进行“坦诚对话”，软硬兼施；对斯里兰卡，即便军方对泰米尔猛虎（Tamil Tiger）组织的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美国仍采用的是经济手段而非以武力相威胁；对“阿拉伯之春”，它对暴行保持了审慎的克制反应。中国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以及在一些事件（如干预利比亚）上的做法反映出，它也希望缩小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但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公然反对推进这一原则。

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也有着广泛的相似立场，即使中国竭力反对日本“入常”，而美国则支持日本。它们立场的相似之处在于，宁愿“不改革”也不接受“不可接受的改革”。两国都坚称，要避免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分歧，这样可以防止进程停滞。尽管奥巴马政府对增强安理会代表合法性的需要表示了关切，但改革进程并不快。美国依然坚持认为，改革不应降低安理会的“效率”，而在中国官方声明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主张。

不同但可能有利于全球秩序的方式

上述中美交流的方式既可以被认为不利于全球治理挑战的化解，也可以被认为会产生模糊的结果。我在本节要讨论的两个案例对于全球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哪个案例都不代表中美两国间直接或有意的交流形式。我这里要讨论的是两国各自的行为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首先，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西方，尤其是美国刻意营造而由中国来填满的真空地带。自2000年的卜拉希米报告——矛盾的是，该报告主要支持的是西方对于维和目的的理解——出台以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西方人员“在相对和绝对意义上”都减少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以来，美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度减少得尤为明显。对此产生影响的还有2002年通过的《美国军人保护法》，该法规定，除非受助国能保证维和人员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否则禁止美国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填补了其中的一些空缺，如今其派出的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自2004年5月以来，其派出的维和人员数量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中排在第12至第15位——在绝对意义上这是一项良好记录，尽管按人均计算并不算突出。中国还是第7大维和资金提供国。在广野美和（Miwa Hirono）和马克·兰特根（Marc Lanteigne）看来，“中国如今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忠实支持者，并试图深化、拓宽与该机制的接触”。中国在这些行动中的贡献主要是冲突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修复。中国也特别强调冲突预防以及对争端进行政治调停，而不是用高压手段来压制滥用暴力。反对干预以及对侵犯国家主权的担忧意味着，当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它们不是“第一应对者”，并试图防止作出军事应对。这与贝拉米（Bellamy）和威廉姆斯（Williams）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西方倾向于发挥“战斗”作用，挽救面临危险的生命。

然而，虽然这些方式不同，本质上也依赖于不同的价值观，但西方这种在联合国行动中发挥短期作用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由中国填补了空缺，这个国家更愿意建立在提供与发展直接相关的项目的基础上，采用有可能打造长期和平的方式。广野美和与兰特根认为，“不论中国政府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对于维和行动的贡献促进了受助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政府和企业愿意支持这样的行动”。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中的互补关系。它们的行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政治中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如伊恩·克拉克（Ian Clark）等人所言，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接触对双方都有利，因为“一旦双方闹翻，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就会使双方的正当性都面临危机，从而导致美国的权力和联合国的权威都被削弱。中国的行动有时能够帮助维持这种相互性。中国在安理会经常投弃权票（比如2011年3月在对利比亚实施干预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上投弃权票），而不常动用否决票，使在严重牵涉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华盛顿不大可能绕过安理会采取行动。中国的否决票（如2012年2月的叙利亚问题）助长了美国的单边行为，或者促使美国去寻求“意愿同盟”，从而令联合国的正当性面临危机。中国表示它希望维持这个机构的存在，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国际社会”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克拉克指出，阻挠美国参与的行为有可能导致美国实施单边主义，而这可能损害赋予中国（及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殊地位的那个机构，也会损害这个经常被中国官员给予积极评价的机构。如中国2005年对联合国改革的报告所言，“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最广泛、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也是共同应对各种威胁与挑战的有效平台”。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保持克制，这有助于维持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接触，从而有助于维持联合国作为一个治理机制的重要作用。

结论

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交流范围如此广泛，仅一章内容无法完全涉及。此外，我的讨论并非要帮助我们确定上述四种交流类型中哪个占主导地位。然而，揭示这些交流形式的确能够引发我们对“修正

主义者”与“现状”大国这一概念对比的可行性作出思考。衰落大国与崛起大国——尤其是基于不同政治体系的大国——的假想将无助于在国际组织中构建富有建设意义的关系。多边机构以及它们的组织原则能够促进妥协，鼓励务实行为。外交时时刻刻都能够减缓战略失信所引发的破坏性影响。即便在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刻，意料之外的结果也可能对全球和国内治理产生积极作用。正如伊丽莎白·埃克诺米所言，“中国希望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现状，尽管若操之过急，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但长期来看又可能对美国有利，或许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实现财政自律”。此外，又如约翰·艾肯伯里在其章节中所言，对中国来说，推翻合理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并非易事，那些深深融入全球机制中的准则、规则及相关标准对任何一个行为体来说，想要改变或推翻都是很困难的。这些要素导致全球秩序出现一种惰性，各国，尤其是崛起中国家需要对它们可能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行为找到充分的理由。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富有成效的参与不仅在物质上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被认为是展示其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和国内改革的负责任大国的方式。国际组织有时会成为其国内法改革的理念来源，并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些理念被认为很可能有助于巩固占主导地位的国内价值。不过，中国对国内需求的过度关注导致其行为表现出狭隘主义的特点和保守的递增主义的倾向，目的是测试国际组织的决定对于其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意义。对于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的需求，它的关注远远不足。因此，尽管中国试图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寻求更广泛的代表性，并且认为某些机制在程序和实质性成果上不够公平，但发言权越来越大的中国除了在增强其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之外，不会有别的作为。

而美国在创建自由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全球体系中的许多人仍指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来维持和发展这种秩序。然而，在推动全球性视角的过程中，美国经常表现出一种不积极的倾向，不愿打

造其国内价值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使它经常无视其他国家立场的正当性——在权力分散的全球体系中，这种倾向事关重大。在经济衰退和经济、政治总体上不稳定的时刻，国际社会对此的质疑在不断放大。可是在美国国内，人们越来越认为，国际组织经常代表着一种不民主且充满敌意的空间，纵容他国无偿享用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美国却无力再进行提供。

美国国内对自身需求的高度关注加之中国对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一党执政的长期投入使未来几年，全球治理很可能迎来一个复杂且薄弱的发展期。正如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和吴心伯（音）在本书所言，我们将会看到中美两国合作交流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的情况。此外，本章所提供的许多中美合作的例子在为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时，更倾向于不作为而非采取行动。再者，在中美充满争议的一些领域，国际社会的需求还会被忽略。鉴于两国关系中的自我中心倾向，未来全球机制将充满挑战，且变得难以预测。

第15章 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吴心伯（Wu Xinbo）

中国的学者和专家认为，自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每十年都会经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明确反映在双边关系的议程和发展轨迹之中。1979年到1989年间，由于冷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在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同时两国关系也得到了相对顺利的发展。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冷战的结束，加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双方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经济关系、台湾问题、核不扩散及其他问题上出现了持续的分歧和紧张，两国关系几经波折。到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美国将精力集中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上，同时中国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双边关系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地区、国际事务以及全球议题上合作的扩展。

那么，到2020年，中美关系会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界、学界精英中并没有共识。对此，中国政府中的主流观点是乐观的。2011年初，中国外交部负责中美关系的副部长崔天凯发表了一次

有关两国关系的演讲。在提及2010年中美关系所遇到的麻烦之后，他抛出一个问题：“中美关系这艘船究竟能不能继续向着合作的方向前行，驶向更加广阔的前景？”他的答案是肯定和明确的。他接着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中美合作的历史趋势不可阻挡；中美合作的现实步伐也不可阻挡；中美合作与亚太振兴之路相辅相成；中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前景备受期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这次访问期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一致认为，两国要“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职官员和军方仍然公开抱怨美国的对华政策。主管外事工作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一篇文章中批评美国“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和“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行为，并指责其因“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需要”向台湾出售军火。2011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同样表达了对美国试图强化军事同盟、进一步涉足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对台军售的担忧，认为这些将“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损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中国的学界在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上分歧更大。乐观的观点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建设性态势，中国和美国更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悲观者则认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催生了结构性竞争，并断言两国之间对立、冲突的利益多过共同、互补的利益，两国间很难发展出真正的战略友谊。

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有着多种看法，本章试图展现中国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本章先分析了双边关系的新局面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性，接着深入研究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然后又考察了中国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值得称道的地方，最后，文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作出总体分析。

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迅速发展，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特点。本书前面几章已经详细阐述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而且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都在塑造着两国关系。但是本文会着力于几个关键的因素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后几年两国关系的走势。

首先是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两国相互依赖中对称性的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得到增强。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而来自美国的出口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却没有那么大。由于21世纪初中美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显著增强，如今美国也倚重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也是第四大外资来源国。另外，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在帮助美国融通资本应对巨额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对美国政府平衡赤字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贡献良多——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美国政府能够保持低利率，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中美两国间现有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表明，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并发展出多层面且不断增强的对称性。

第二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国际化。两国关系的国际化始于1972年，当时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苏战略三角就此形成。因此，中美关系产生了全球战略影响。但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崩溃，战略三角

消失了，两国间的互动主要集中于双边议题，很少涉及地区或国际议题。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受累于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认识到其力量有限。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虽然强大，但并非无所不能，于是他们开始寻求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世界大国展开协商与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间的互动范围得到扩展，所涉及的地区、国际性问题也越来越多。正如2005年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日益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如今当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他们讨论国际问题的时间常常多于双边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方面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国的对美政策往往是由极少数的几个高层领导人制定的。不过随着过去十年中，中国政治由“强人政治”过渡到集体领导，更多领导层内外的行为体加入了决策过程。与此同时，随着两国交往领域的拓展，很多政府机构开始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外交部的影响力随之减弱。因此，中国对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内部协调（有时甚至没有内部协调）和讨价还价很困难，造成这一过程中的低效和自相矛盾。而且，正如郝雨凡在其文章中所言，随着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带来的重要发展，中国社会在思想和利益上都变得更为多元，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也越来越热衷于讨论这些。在信息时代，中国的决策者也很看重自己的国内形象和声望，所以他们很重视民众的情绪，特别是中美关系中一些备受瞩目的议题（如台湾、西藏和贸易摩擦等），这使中国的对美政策比以前更具有不确定性，总体上也更为强硬。

最后，但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美之间均势的转移。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18万亿美元，仅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6%。到了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88万亿美元，已经是美国的40.5%。尽管仍然远

远落后于美国，但中国有信心在未来十年里进一步缩小差距。同时，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以及美国和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都使中国的经济活力更加耀眼。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遍及全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提升。这一切都增强了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的地位和信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中议程的设定者，中国则处于被动地位。然而近年来，北京在议程设置中更为积极。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赋予了它更多筹码。因此，与过去20多年相比，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更为活跃和重要的角色。

自中美在1979年建交之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两国关系同中国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从台湾问题到经济发展，从安全环境到国内稳定。在新的环境下，由于对中国的重要性日增，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经济上，美国依旧是中国不可代替的伙伴。作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贡献巨大。尽管近年来中国极力扩大内需，但短期内无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美国作为外资来源国的重要性却在减弱，因为中国不再缺少资金，但是美国依然是中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中国正致力于经济结构转型，希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比以往更需要来自他国的技术转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近年来频频敦促美国放开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美国成为他们的主要投资地，中国也呼吁美国为中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美元的大幅贬值或华盛顿无力偿还国债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维护其财政稳定和国家信用，以保证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安全。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始终期待同美国展开合作。尽管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稳步发展，但是岛内政局不稳，以民进党

为首的“台独”势力仍在伺机重掌大权。北京希望国民党能够掌控岛内局势，美方也乐见两岸关系的发展——当民进党上台时，美国也会对其施加影响，压制其“台独”倾向。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国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军售。

在亚太地区拥有大量安全资产的美国是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外部因素。自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积极加强了同该地区盟友以及其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安全政策和战略意图感到担忧的国家的合作。现在，美国还开始插手南海纠纷。中方认为，这些行为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并使它承受了更多安全压力。稳定和平的安全环境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至关重要，所以中国希望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调整幅度不要过大。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就曾表达过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政策的期望，“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拥有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世界大国，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对中国也日益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将美国视为重要的参与者，并珍视美国在帮助提供这些公共品方面发挥的作用。随着中国更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它期望美国成为一个积极负责任的伙伴。2011年1月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在演讲中表示，“中美两国应该开展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通过双边渠道和各种多边机制，加强在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继续在地区安全、区域合作和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交流，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在其文章中深入讨论了中美在很多议题上的观点。中国不愿看到一个被分化的国内政治拖累而无法履行其国际责任的美国，也不愿看到一个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后

遗症困扰而退回孤立主义、不愿意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美国。

最后，在扩大自身国际影响时，中国期待与美国合作。过去30多年里，中国是美国所建立和领导的这一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即便中国国力增长，它也只会试图在国际体系内增加其影响力，而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希望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其国家利益，并对体系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公平、公正、包容和更易于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就显得更加重要。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权利，因此，中国成为两大机构中的第三大股东国。鉴于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同意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同时向欧洲国家施压削减其投票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野心面前，进一步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展望未来，当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多发言权，特别是需要以美国的影响力为代价时，中国希望美国会以开明而通融的方式回应。

塑造未来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未来无法预测，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上述种种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经济联系会继续成为促进稳定、合作的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加深两国的相互依赖，并使这种关系更为对称。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国还可能在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的同时，成为美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国。有关贸易和投资的摩擦仍会不时发生，有时甚

至会引发报复和反制措施，但是，这些应当得到控制。因为两国的经济联系太重要了，双方都不愿意破坏它。此外，近几年中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有效的分歧解决机制，并为中美两国提供了经济摩擦的缓冲区。总之两国互为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所带来的利益将帮助双边关系在稳定的轨道上发展。

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的协作同样会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冷战结束后的20年相比，在当前的十年中，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会进一步下降。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多极化将进一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回到19世纪大国竞争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主要行为体必须进行合作以强化全球治理，这事关每个人的利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也为了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一称谓相符，预计中国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合作的领域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鲜的无核化以及半岛安全机制的建立）、美国撤军后阿富汗的稳定、伊朗核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谈判、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果等。稳健的中美关系能够促进两国在经济、安全、环保等领域的国家利益，培育两国的合作习惯，将伙伴关系实质化以解决共同的挑战，这是两国共同承诺要发展和强调的双边关系中的积极趋势。

从消极的角度讲，中美之间实力的转移是双边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近十年来，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在中国，这意味着外交上更多的自信和民众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于和美国之间旧有的或新生的矛盾，中国会更强硬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更不愿意妥协。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权力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冲突，这种宿命论令美国产生了焦虑感，这种焦虑可能使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作出过激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在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竞争的态势可能加强，并超过合作的态势，使中美关系出现更多的紧张。

如果这样，亚太地区将出现中美两国的战略对抗。亚太地区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是中国扩展海外利益最重要的平台。在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存在的美国希望保持其在该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同时确保该地区的发展不会损害它的地位。美国希望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强大的军事存在以及同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来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则会尽全力反抗对它的包围，甚至遏制。中美之间的这种零和互动可能会分化该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使亚太地区重现地缘竞争。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中美关系则会呈现两分态势——经济上的合作与战略和安全上的竞争。沈大伟在序言中称这种状况为“竞合关系”。战略和安全上的竞争过于激烈，也会对两国的经济合作造成破坏。

尽管全球治理急需两国展开合作，但是在这一领域同样会出现摩擦。随着中国在推动世界事务的良治过程中愈发积极，它不会满足于参与，而是更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提案被接受。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从国际体系的改革到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国重新给自己定位，并维护这种地位。正如近来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两个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场合所反映出来的那样，两国之间的分歧往往会导致激烈的外交摩擦。多边领域的竞争和摩擦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令气氛恶化并损害互信。

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尽管中国对于推广其发展模式持谨慎态度，但是一些美国人仍对中国模式的走俏感到担忧和沮丧。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所谓的“北京共识”打击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在美国，一些警告的声音认为，两种模式的竞争不仅掀起了两国软实力的竞争，也掀起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拉锯战。一旦将来这样的想

法在中美政策层得势，那么双边关系将面临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

中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成绩

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双方所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关系是重要而复杂的”。复杂性体现在双方在各自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的诸多差异上。这些不同加上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使中美关系同历史上任何一对大国关系都不相同。

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使两国关系更为独特。在任何国家间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分歧或重合，双方采取的战略、政策和策略也很重要。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双边关系中的议程设置，因此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也在增强。未来，中国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对两国关系的走向所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重视从过去和历史的智慧中汲取经验。随着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中国决策圈和学界的主要忧虑在于如何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也就是历史上常见的、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过去十年中，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理论作为其大战略的首要概念框架。这包括以下要素：“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发展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同其他国家一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和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

对“和平发展”理论的阐述不仅是为了打消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同样也为了凝聚国内共识，指导中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中国相信，它能够走上一条同历史上其他大国所选择的以战争和冲突为特征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道路，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可以这样说，中国是现代历史中第一个对和平发展有着严肃全面思考，并希望避免过去暴力崛起的旧道路的大国。除了“和平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外，中国所追求的一些重要政策同样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挑战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上有所克制。中国从未挑战美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威胁美国的国内稳定。中国对美国主要的国家安全顾虑也十分敏感。在20世纪90年代，核不扩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完善了其核导弹出口管控政策。“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又在削减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同美国展开了广泛的合作。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这不应仅仅被解释为是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同样也表明了中国对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尊重。

其次，中国不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正如中国在许多场合中所阐述的，中方“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中国政府承诺要“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尊重地区外国家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中国明白美国在东亚地区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也明白美国担心中国会将东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像二战前日本所做的，或者美国在门罗主义之下在西半球所做的一样。为了缓解美国的忧虑，中国不仅在口头上一再向美国作出承诺，同时接受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中方的努力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同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冲动，降低了地区两极化的风险。

再次，中国无意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尽管美国的防务政策带

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点，强调军事上的优势，但中国的防务政策则遵循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依赖可靠的威慑力。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的物质实力有限，也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承受得起更多的防务开支，但其军事实力不太能够赶超美国，即便是在美国因国防预算削减而收缩军事存在时也不大可能。在中美安全关系中，中国当下所进行的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对美国可靠的威慑力，而不是压倒美国的优势。尽管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努力避免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但它仍需努力控制美国方面警惕的声音，避免走上美苏在冷战时期的老路。

最后，与苏联或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并不追求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发展模式。实际上如今的中国思想界是十分务实的，并不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而且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再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来改变外部世界，而是更集中精力通过经济发展改变自身。尽管过去3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但中国在处理其发展经验时依旧十分低调。虽然国内有人讨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但中国政府仍十分谨慎地避免输出这一模式。中国的确认为它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当同自身国情相适应。中国缺乏输出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热情也有利于抑制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

从策略角度讲，中国的一些做法在稳定和促进双边关系上发挥了作用。例如，中国常常以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不拘泥于短期利益（这种态度缓解了因短期损失而产生的压力）。在与美国的接触中，中国把它看作正和游戏而非零和游戏，这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使之保持积极的势头。此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积极同美国建立各种对话机制，这不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增强互信，久而久之促进问题的解决或减少麻烦。

在除了台湾问题以外的很多分歧上，中国很少诉诸对抗性的措施——例如施加军事压力或进行制裁。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该地区的前

沿军事部署和盟友使美国具备了军事上的优势，美国也不时运用这些优势对中国施压。美国也经常利用两国在市场上不对称的依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或对它们采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而言，这些措施不仅损害了两国的互信，也使冲突升级，对两国的整体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中国在战略、政策和策略上的长处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之外，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保证了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选举政策和利益集团而产生的政治周期，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确定性，而对华政策也常常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受害者。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要用战略和长远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但是受制于政治周期，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着眼于策略性的短期利益。中国的国内政治在处理对美关系上越来越复杂，但这种影响是可控的，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波动也远远小于美国政治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波动。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愿意投入精力处理中美关系，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导人在国内面临的政策争论和政治风险要比美国领导人在党派纷争、利益集团横行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小得多。

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

理论上说，中美关系可能存在三种前景：伙伴、竞争者和敌人。让我们看看这三种“想象情境”如何上演。

作为伙伴，两国会以一种合作的模式打交道。在这种情境中，双方不仅彼此信任对方的战略意图，同时对于地区和全球走势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这为它们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和概念框架以及实践基础。双方在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将促使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发展出合作共存的模式，扩展共同利益，有效克服或处理分歧。

在亚太地区，两国将携手塑造以中美协作为特征的新的地区秩序。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中国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美国则更愿意倾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声音，从而形成一种大国分享责任和权利的模式。

作为竞争者，两国之间将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并常常在地区或全球议题上持不同观点，也会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竞争会代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总体特征。在双边往来中，贸易、汇率和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摩擦，以及有关人权的政治纠纷将会不时出现。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美国会采取制衡中国的战略，以保持它在地区事务中的首要地位。虽然它们可以相处，有时也能够进行协商与合作，但双方在影响力和利益上的竞争会使应对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两国在原则和方式上往往意见相左。它们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

作为敌人，中国和美国相互视对方为自己核心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它们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不仅看法不一，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与竞争关系——两国虽然试图获得更多利益，但是在经过艰苦谈判之后仍能够展开合作——的情况不同，在敌对情况下，两国都会阻挠对方获得利益，合作几无可能。在双边关系上，经济关系会迅速降温，贸易战和制裁频现，激烈的政治纠纷也会增加。在亚太地区，双方都大打地缘政治牌，积极争取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打造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地区秩序的分化将不可避免。在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竞争和敌对将压倒合作与协商，由于种种纠纷，促进全球治理的努力也会陷入僵局。

事实上，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最有可能是合作、竞争和有限冲突的混合体。它们既是伙伴同时又是竞争者，这种关系甚至会在同一议题上有所表现。但是，它们绝不会是敌人。这就是沈大伟在其文章中所说的“竞争性共存”。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也赞同这种看

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联系将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即便在贸易、投资、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会有更多的摩擦。中国和美国在地区及国际和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与协商将是另一大支柱。在人权、军事发展和军事活动以及处理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依旧会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加剧，但这不会给双边关系造成太大障碍。对两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保证双方之间的合作多于竞争，同时减少或避免冲突发生的风险。

认识到这一点，两国就不应该对双边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脱轨状况视而不见。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萧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将不仅会加速缩小两国的实力差距，还会进一步打击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使其对中国的怨恨越来越大，这正是目前表现出来的。美国持续抨击中国会使双边关系气氛恶化，削弱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就不仅将阻碍中美经济关系的拓展，同样也会影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从而破坏中美关系中的两大支柱。

其他领域也会出现问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朝鲜在金正日突然去世、不成熟的金正恩紧急接班后进入不确定期，中美在半岛局势出现意外时或许会出现正面冲突。中国希望保持半岛局势稳定，而美国则可能利用意外事件推动朝鲜政权倒台。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和越南都试图利用美国的支持对抗中国，而美国对于卷入南海问题也越来越有兴趣。一旦菲律宾和越南为了拉美国下水而制造危机甚至同中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也可能随之爆发冲突。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模式还将呈现其他的特点。首先，日益自信的中国会在议程设置中更加积极，也会在讨价还价中更加强硬。因此，美国应该以更平等互利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第二，影响两国关系的国内因素会增多，比如中国的媒体和公众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这将令管理两国关系更为复杂。第三，相比从前，“第三方因素”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将进一步扩展双边议程，同

时要求建立新的机制来管理双边往来。

结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在每个十年里都曾遇到不同的挑战。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挑战是如何在后冷战时代建立双边关系的新模式。经济合作成为两国交往中的重点，美国避免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中国也寻求参与国际体系。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中国高速发展和全球性议题大爆炸的背景下管理双边关系。在保持高速发展的经济联系的同时，美国缓解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忧虑，而中国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当前这个十年的挑战是，如何在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全球治理需求增长的情况下管理两国关系。随着权力的平衡迅速转移，中国和美国需要建立高度的战略互信并使经济摩擦得到控制，这样才能保证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另一方面，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挑战，中美应建立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有效解决挑战，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全球治理。

第16章 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中美关系的未来经常被描述为互不相容的状态。中国和美国将成为“朋友”还是“敌人、伙伴或对手”？它们会成为亲密的合作者，共同解决双方越来越多地拥有共同利益的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吗？它们会成为经济和战略上的竞争者，即便不发生直接对抗，也会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吗？抑或双方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如此之大而让两国关系呈现激烈的对抗，甚至引发公开的冲突吗？

虽然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冲突不可避免，但也有不少人预计，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将促使这两个国家彼此合作。不管有多么勉强，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呈现合作、竞争和冲突共存的特点，这三种情况之间的平衡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定义和优先考量、寻求共同目标并共同推进这些目标的能力以及处理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水平。

为本章内容贡献力量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种对中美关系未来更为平衡的预估——以合作、竞争和冲突共存为特点——很可能比另外两种经常主导中美关系讨论的设想（冲突或伙伴）更为准确。不过，这种预估仍有待进一步发展。这三种可能的结果——合作、竞争和冲突——都包含更多的可能性，需要加以更仔细的确认和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地预测中美关系将呈现竞争的态势，而是要探索这种竞争可能具有的性质：双方可能明显出现竞争的层面、双方竞争的方式以及竞争可能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的后果。类似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合作或对抗的情况。

我在本章指出，不同形式的合作、竞争和对抗会对中美关系的总体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看，这一总体情况将会塑造这三种不同的关系，甚至可能在它们之间取得平衡。原因在于，以合作为主线、有序竞争的关系很可能将增加信任感，减少不和谐的声音，相反，勉强合作、无序竞争、在彼此眼中都被视为不公平的关系将更有可能导致互不信任，甚至引发冲突。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或许并不是竞争、冲突及合作的简单混合，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会随时间而改变，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中不同方面的问题。

竞争

中美两国在许多领域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从奥运会上的金牌争夺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但问题不仅在于这两个国家是否在展开竞争，而更在于它们竞争的形式：竞争的领域、竞争被双方都接受的规则（默认的或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的程度以及竞争所产生的结果是否都被双方认为是合理的。对中美两国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两国关系越来越趋于竞争，还在于其中的一方或双方认为它们所竞争的领域代价高昂、不够公平且风险巨大——这种观点会导致互不信任，最终引

发更为激烈的竞争关系。

评估一种竞争关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确认竞争发生的领域。例如，在经济领域，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之间，平等、公开的竞争是决定一个市场是否运行良好的特征，这种机制有助于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供应并降低价格。因此，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制定了政策来促进竞争、防止垄断等其他有碍竞争的商业行为。与此类似，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竞争所能给贸易和跨国投资带来的好处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而竞争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得到促进。简言之，在经济领域，竞争是受欢迎的，而不是想方设法规避的，即便一些行为体可能从竞争中得到的好处比别人多。

竞争同样被认为对于民主政治制度必不可少且大有助益。政治候选人参与公共职位的竞选；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竞争成员资格和资金支持；政策和意识形态则争取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事实上，“观点的自由市场”产生了一个有关竞争的隐喻：正如市场竞争有利于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领域的竞争有利于社会。

相反，在其他领域，竞争对参与竞争的各方或整个体系可能就不那么积极。在国际安全领域，竞争可能引发烧钱的军备竞赛并导致著名的“安全困境”：一个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努力会引发其他感到威胁的各方的应对措施，最终增加所有各方的不安全感，甚至诱发先发制人的行动或令已经开始的对抗升级。在安全领域，竞争可能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

竞争关系变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它们受规则所限制的程度。规则可以限制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进更有益的结果，并为竞争参与者所接受和遵守。阿纳托·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关于竞争关系经典的三分法指出，“游戏”和“辩论”都由限制参与者可使用的方法的规则所指导，因此，国内经济竞争可被禁止虚假广告、抑制垄断、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规定来管理。国际竞争同样为一系列越来越多的

规则所推动，比如减少商品、服务和投资流动的障碍，禁止倾销（凭借补贴在对象国以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售价出售进口商品的行为）等不公平行为等。许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都将这样的措施写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谈判中也都涉及相关内容，并在该组织内部建立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实行这些规定时出现的分歧。国内政治竞选同样有旨在推动“公平”竞争的竞选法来管理。即便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竞争也可能被一些广为接受的对于“公平游戏”的一般理解约束。

即便是“格斗”——拉波波特所称的第三种也是最激烈的竞争关系——也会受到类似的约束。几乎所有涉及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摔跤、足球、拳击、橄榄球等）都设立了旨在减少身体损伤风险的规则。战争法的发展、军控制度的创建以及互信建立措施的发展同样可被视为旨在减少国际安全领域竞争关系代价和风险的努力。

最后，竞争关系变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所有竞争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在相对得或失的问题上——赢家赢了多少、输家输了多少，结果是零和的、负和的还是正和的——却经常有重大差别。在竞争各方对结果是否合理、是否公正的问题上同样也会有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和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双方竞争的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具风险、代价更高。此外，管理双方竞争关系的机制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而且双方的一些观察人士都认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衡与不公平的。

中美竞争的经济层面

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一段时间里，鉴于双方不同的国情和发展

水平，中国和美国都将彼此视为高度互补的经济体。当时，有关中美经济关系最熟悉的一种说法是，世界最大发达经济体与世界最大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这种关系能够互利互惠，互补性远远超过竞争性。随着冷战渐渐退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经常说，虽然来自苏联的共同安全威胁让中美走到了一起，但让这两个互补经济体保持紧密关系的将是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尼克松作出上述预测时，中美经济关系却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性。随着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进入了不同的经济领域，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渐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越来越多，并出现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换句话说，中国进入了曾被视为美国专属的经济生产领域。伴随这种情况的出现，两国经济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少，竞争气氛逐渐增加。中美两国企业纷纷在国内外市场争夺份额，竞争逐渐扩大至两国政府都视为具有高度战略性的领域，例如汽车、超级计算机、商用飞机、太阳能电池板等。中美两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众多领域争相创造新的研究成果，例如超级计算机、生物技术、载人航天等。两国企业也在争购合同（同时也与第三方国家的企业），欲在全球各地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两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和上海——也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展开竞争，同时两个经济体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争曾经，也将继续带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预见的那种积极结果，例如，中国经济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同时缓解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通胀压力，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竞争还为生产中国企业所需设备、材料和部件的外国企业拓宽了市场或开拓了新市场。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新发明、新创造最终也丰富了整个世界的知识储备。

然而，中美两国观察人士却日渐抱怨，两国经济竞争不仅在加剧，而且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缺乏足够的管理。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歧视性政策的受害者，尤其是美方认为中国欲在美国进行的

投资项目涉及先进技术或关键基础设施的占有而遭到严格的审查或阻碍。北京还抱怨美国不断限制对华先进技术出口，而且中国因制定反倾销法规而迟迟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反过来，针对中国的抱怨也并不少。起初是在美国，如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欧盟和日本。它们称，中国企业从政府的一系列规定中获益，比如不鼓励购买外国产品和进口技术、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关系中国经济战略的部门以及推动一批强大的中国品牌帮助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外国同行展开有效竞争。还有人指责中国企业利用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币值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一些外国批评人士称，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展开不公平竞争，以期获得海外能源和自然资源，手段之一是向他国提供大规模的无条件援助项目，从而获得对该国政府的影响力，最终拿到开发和生产合同，中国企业不仅为了通过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销售这些资源而谋取利润，更试图“独享”这些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曾试图建立机制来管理双方间的经济竞争，缓解彼此的抱怨。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被要求接受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措施和旨在确保公平跨国竞争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也建立了一套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涉嫌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此外，中美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谈判和对话来解决双方竞争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但美国日益认为，中国没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与自己进行的后续谈判中有关提高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此外，中美竞争中的一些领域仍缺乏管理，尤其缺乏针对直接投资的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坚称，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能产生可使双方都受益的“双赢”结果，至少总体上是这样。他们称，尽管各方可能有得有失，但中美两个经济体都能从双边经济关系中获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道理，但美国日益认为，中国获得的相对利益更多，它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市场份额及其在主要经济领域中的相对优势。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这种不公平竞争的观点令中美经济关

系更加复杂，导致了双方间的不信任，从而有可能蔓延至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

中美竞争的规则层面

除了经济竞争，中美之间也存在规则竞争。这有时被描述为两种相对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即美国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倡导的“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主张快速走向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北京共识”则提倡国家对于管理经济发挥持续的强大作用，其中包括在战略领域里相当程度的国有比例，并逐步推动试验性的经济改革。

虽然近年来“北京共识”吸引了相当大的关注，但经常提及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竞争关系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一些外国观察人士。中国分析人士，尤其是官方发言人，更趋向于否认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而是声称，中国的发展经验只不过表明，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国际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逐步推动试验性的经济改革。此外，在中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与“华盛顿共识”有所不同的问题上，中国分析人士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承认，中国近来的发展经验体现了“华盛顿共识”中的许多主张，包括融入全球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对经济生活中的私人和外国成分更大的接受程度。此外，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些专业建议也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事实上，“中国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模式，不如说是“反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普遍适用性的反对，而非表达清晰、普遍适用的所谓“北京共识”。如此看来，中美两种发展模式之间其实并未如人们设想的存在那么激烈的竞争。当然，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的竞争的，比如美国认为“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自由的改革发展模式具有

普遍适用性，而中国则坚持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此外，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可能更加明显，尤其是两国在管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方面存在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依然赞同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其章节中所描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这是一种以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领土完整等长期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美国采取的是艾肯伯里所称的“自由”的国际政治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在时间上较近的自主概念可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推动人权和其他人道主义考量的行为或许可以成为干预他国事务（包括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这些自由准则还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系统的扩散，即便国家主权、自我防卫权这些历史更久远的原则或许可以为这些行为提供正当理由。虽然北京对这些新的自由准则持保留态度，但可以说，美国及其盟友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挑战有时比中国对艾肯伯里所称的“自由秩序建设体系”的挑战更为有效，至少目前是这样。

相应地，中美之间在管理外部援助的准则方面同样看法不一。美国更倾向于认为，包括遵守善治和人权在内的这些条件都可以通过官方的发展援助项目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北京至少在目前更愿意对外国提供无条件的援助——或者，至少不会以尊重人权和实施善治为条件。北京所开出的条件，不管是含蓄提出还是开门见山，更多的是与受助国在一些重大涉华问题上的立场有关，比如与台湾的关系，对西藏问题的看法等，而不是美国十分关切的那些问题。

这些彼此不同的模式和准则——“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自由秩序建设体系”以及对外援助的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限制了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能力，因为这些分歧有时会导致双方对同一问题支持不同的解决之道。此外，如果北京和华盛顿试图寻求其他国家来支持各自的观点的话，这些分歧就可能还会引发双方的进一步竞争。

再往前看，中美可能还会开始在其他文化领域展开竞争，比如，在发展国家“软实力”方面的竞争。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十分渴望找到他们认为专属于中国的价值观，至少要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区别开来。中国近来强调的“和谐”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与美国所倡导的文化多元性（即便可能会以社会不稳定为代价，这也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同样，一些中国社会学者也期望在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创建中国自己的“学派”。这些所谓“中国学派”的特征仍有待确定，但一些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既然科学具有普遍性，那么试图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创建本国“学派”的做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论或结论上的任何重大差异都不大可能以国界来区分。对中国来说，比较现实的或许是打造可与外国同行竞争的一流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吸引在海外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籍人才。中国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模式（至少在形式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式的——大力招募世界级的教师、推动前沿研究以及效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制度化的评级体系来衡量成功。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学术环境对许多一流学者的吸引力不够大，过于强调政治教条等。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及其他国家）参与该领域竞争的决心。打造世界级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努力与上文所述的科技领域的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美竞争的战略层面

中美两国不仅将彼此视为经济和规则上的竞争者，而且认为双方同样存在战略上的竞争，这是最大的危险。不幸的是，两国军队已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彼此，都在部署武器系统，设计战术来应对对方，尤其是针对台湾问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此外，两国间的竞争正日益聚焦于南海，中国与美国的一些盟友就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产生了纠纷。为了推进这两方面的领土主权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

制定阻止美国进入西太平洋的战略（如反舰弹道导弹），而美国则在努力保持进入的能力（如“空海战”理念）。

这种竞争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并导致沉重的经济代价。在中国近海执行侦察和巡逻任务的美军与试图将他们赶出中国领海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事件已有多起。在高度紧张时期，这样的事故搞不好会升级为公开的冲突。这与两国间另一个规则分歧有关，即双方对中国是否有权限制或禁止外国海军舰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各执一词。中国认为它有这样的权利，美国则不以为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是此类事件中最严重但并非唯一的一起。这种事件升级的风险并不小，并有可能增加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

还有一种日渐盛行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在亚洲所提出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倡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北京“与邻为善”的政策以及对美国在该地区拉帮结派、部署军事力量的指责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在企图削弱美国当前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相反，美国在撤出伊拉克后的“重返亚洲”，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菲律宾及越南进一步发展安全关系的努力，将中国排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外的行为以及与缅甸这种昔日的下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举动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在加大对中国的包围和遏制。

为了管理这种不断抬头的战略竞争，中美两国展开了军事交流，以增加透明度、建立互信，并举行了高层战略对话以增进彼此对对方利益和意图的理解，此外，还商讨了一系列军控措施来制约两国对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部署。但目前为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双方达成的实质性协议少之又少，中国并未在交流中表现出多大的透明度，军事对话不时中断，尤其是中国为了表达对邻国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台军售）等紧张局势的不满经常这样做。缓和两国战略竞争的努力失败增加了这种竞争带来重大风险和造成沉重代价的危险。同经济领域的情况一样，在战略竞争中，有可能减少这种危险的机制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中美合作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即便是在战略领域，并未削弱两国合作推动共同目标的可能性。事实上，两国在一系列广泛事务上拥有共同或重叠的利益，因此也在努力展开合作，比如制衡俄罗斯的崛起、鼓励朝鲜去核化、防止伊朗拥核、确保世界经济繁荣、打击非洲海岸的海盗活动、支持中亚和西南亚的反恐行动、扼制台湾独立、促进能源供应安全、开发新能源以及控制气候变化等。

中美在保持全球经济活力方面的共同利益体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双方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两国都支持在亚太地区构建地区安全和经济架构。毫无疑问，如果其他威胁双方利益的领域（如非典、禽流感）出现危机，它们同样会合作。两国还同意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提高能源安全、开发替代能源、推动能源的高效利用等。

不过，同竞争的情况一样，问题不只在于两国是否存在合作，更在于合作的形式、结果以及双方对结果的看法。可以预见的是，中美合作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代价和好处的分配问题。此外，两国在合作方式上的分歧也十分严重。例如，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将给两国都带来损失和风险的问题，但它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的责任分配问题上却各执一词，甚至在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对此制定法律约束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同样，华盛顿和北京也许都同意在亚洲打造更强健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但它们在这些组织的成员和议程方面又意见相左。它们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但在对朝鲜施加严厉制裁的问题上又态度不一。

这些责任分配上的分歧更多地体现了中美关系的竞争层面，而非共同利益。两国在气候变化责任分配上的分歧与它们的深层经济竞争

有关，正如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与它们在亚洲的战略竞争以及对人权问题的不同态度有关。这些分歧令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一致，从而令整体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代价和好处的分配问题只是可能令两国关系复杂的一个因素，另一个是合作的质量。光谱的一端或许可以被称作“被动同意”，一方对另一方希望采取的行动表示同意，但也有可能说反对就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的许多投票中，尤其是涉及对第三国实施制裁或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所能得到的中国方面的“合作”正是中国所希望的弃权，而非动用否决权。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或许可以淡化商议之中的决议，将其强烈反对的一些内容取消，以此作为点头的条件。有时，中国弃权只是因为它不愿成为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投否决票的国家。但确保这种适度的合作对华盛顿而言是重要的，因为这能使美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它所希望的制裁或军事行动。

更紧密的合作形式有赖于两国对共同利益的认可，不管是默认还是公开承认，然后再采取独立行动来推动这些目标，而不必非得紧密携手。真正的合作能走得更远，即不只是认可共同利益和采取单独行动，更要联手制定和实施相似或协调的措施来实现这些共同目标，并承诺进行持续合作直到这些目标都已达到。强弱两种合作形式之间的差别与同步努力和并行努力或是正式盟友和松散的“统一立场”之间的差异相类似。相比后一种形式，前者中各方的自主权和行动空间牺牲的更多，而在后者中，各方都作出了更强的承诺，并接受实现合作所需承担的更大制约。

多年来，许多美国人认为，即便中国与美国在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展开了合作，但合作的方式往往是相对被动或疏远的。在某些领域，中国或许会同意美方的倡议，但不会动用自身资源来表示支持，或许还会对这些倡议的明智性和合理性持保留态度。在另一些领域，中国又可能通过更积极地采取和实施自己的政策来实现合作，推进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在制订共同对策方面，北京向来不公开

表现出积极与华盛顿合作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想被国内外人士认为自己与美国走得过近，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自主权的需要。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强调的，这一点在两国共同反对苏联在亚洲的扩张时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两国对于反对苏联霸权拥有共同的利益，但并未像美国与其北约盟友一样公开表现得那么亲密。基辛格讲述了1971年他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内容大概是“美国和中国如何进行全球合作？毛泽东建议，各方都明确提出自己的国家利益概念，（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合作”。

毛泽东称此为“手拉手”，但他的回答明显暗示着，事实上，两国的“合作”是一种有距离的“合作”。基辛格对中美就共同反对苏联霸权所进行的交流是这么总结的：

> 在合作谈判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和其他中方领导人都坚持维护中国行动自由和自尊的立场。他们不需要保护，必要时中国有能力独自应对所有可预见的危机。他们使用了共同安全的说法，但又保留了指明其内容的权利。

1971年以来，形势明显有了很大改变，中国不再有能力“独自应对所有可预见的危机”。但中国在与美国合作上更倾向秘而不宣而非大方公开的做法依然在许多方面有所体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希望采取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或许它想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发挥首尔和东京都做不到的调解作用。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认为，与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高层磋商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形式，即便结果更多的是对分歧的相互理解，而非达成旨在推进共同目标的协议。中国采取的是名义上的被动合作，而美国更希望看到的是更积极的态度，正是这种差距导致美国许多观察人士对中美合作感到不满，甚至加深了两国间的不信任。

对抗关系

中美关系第三种可能的结果是不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新冷战”，甚至是公开的军事对抗。对抗关系意味着，两国的目标存在严重分歧，超越了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可能动用各种施压手段——从外交倡议到经济制裁，再到威胁使用武力甚至真的动用武力——以强迫另一方妥协。这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竞争关系有很大不同。竞争关系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因为竞争可能给其所存在的领域带来很大的好处，比如经济竞争可能令其所存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对卷入竞争的行为体而言，竞争甚至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们能从竞争中获益，只不过程度有别。相反，对抗关系更容易成为零和博弈，结果通常为一方获胜一方失败。更甚者还会发展成负和博弈，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尽管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获益。

对抗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陌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经历过多段对抗期，其中不乏武装对抗。其中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几次台海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美国对华制裁、1999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在这些对抗中，持续时间最长、被中国视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是台湾问题。华盛顿希望看到台湾有一个和平的未来，而北京则坚持保留以武力实现统一的权利。不过，1989年以来，人权问题成为两国对抗的第二大导火索，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和贸易问题也可能成为诱因。

然而，同看待合作一样，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才能发现，因利益分歧所导致的各种关系并不总是类似的，而是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上文对各种合作形式所作的区分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对分歧、对抗甚至公开冲突这些对抗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加以区分。

分歧的情况意味着，中美公开承认两国存在利益分歧，但不至于

导致对抗行为，因而不大会破坏两国整体关系。这种行为方式经常被中国描述为“有所保留的分歧”，美国则称为“和而不同”。例如，美国不断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在国内事务上倒退。但尽管美国仍会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发表这样的言论，它已不再对中国施加严厉的制裁。中国经常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是冷战遗风，但并未怂恿相关国家撤销美军基地（也未要求美国政府将它们关闭）。受到谴责的一方或许会对这些公开表达的分歧感到恼火，但不至于马上给整体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国际关系中，对抗关系最危险、最强烈的形式是动用武力或施加武力威胁。对此，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问题（程度较低）以及在越南的代理人战争中已有过体验。如果朝鲜半岛或台海局势再度失控，再次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公认的台海局势最危险的两种情况是，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大陆报以武器回应，或者大陆单方面动用武器迫使台湾接受统一。不管发生哪种情况，美国都必须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美国对台湾安全所作的承诺。倘若美国决定这么做，中美将极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此外，虽然这种情况人们谈论的较少，但朝鲜半岛局势还是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最令人担心的可能结果是平壤政权的垮台，然后各种外国势力为推动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竞争性干预，不管是否能建立一个友好的新政府，确保朝鲜核武器和核裂变材料的安全，或者只是单纯的恢复秩序。这种竞争性合作并不一定会一开始就让美国也参与其中，但如果韩国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非军事区，受到跨过鸭绿江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抑或中国在未事先与美国和韩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朝鲜实施干预，那么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其他对抗形势同样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可能包括中国与美国在南海或东海的某个盟友之间出现危机，或是中美军队之间发生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那样的事件。这些情况升级到足以引发中美军队爆发

真正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并不能完全排除。

令人格外担心的是，管理这些对抗情形的机制还不够成熟。鲜有证据显示，两国间的各种安全对话曾商讨过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两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还远未能够商讨一旦平壤政权垮台它们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使我们无法排除出现上文所述的那种竞争性干预的可能性。中美似乎也未曾认真讨论过如何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再次出现的危机。虽然两国政府间建立了热线，但很少有人相信两国高层能够有效利用这一通信渠道来应对危机。目前为止，令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降低的更多的是各自所明确表示的“红线”，而非当红线被越过时能够缓和局势的机制。红线有一定作用，但无法替代危机发生时有效沟通的作用。

结论

本章认为，中美双方在近几十年中都觉得两国关系在经济、规则和安全领域均呈现更多的竞争态势。此外，双方都日益认为，两国经济关系不公平地倾向另一方。尽管双方作了大量努力来制定规则以管理这种竞争关系——不论是通过双边谈判还是让中国加入管理竞争的国际体系中——但不论是对自身规则还是另一方对规则的信守程度，双方都不满意。在战略领域，竞争管理机制以及防止利益分歧升级为对抗或冲突的机制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尽管两国提出做合作性“伙伴”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对话，但中国对自主行动的偏爱而不是与华盛顿进行公开合作，以及对“干涉”他国内政或对美国此类行为给予支持的犹豫态度导致美国国内出现大量不满情绪。简言之，虽然中美进行了管理竞争、减少不合及促进合作的努力，但最终结果还是让中美都认为两国关系本质上更趋向竞争，彼此间由此产生深深的不信任。

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了双方间的不信任，但未能想出有效的手段

加以缓解。他们没能解决彼此存在重大分歧的那些问题。敏感问题的透明度依然缺乏，而且由于缺少各种措施，两国对对方所作的承诺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未来几年，在竞争、合作或对抗这几种广义上的交流形式中，哪个会相对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主流形式？如果上述形式都不是主流，那么这三种形式混合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似乎不大可能，至少中短期内如此。双方在价值观、政治制度、利益、发展水平以及对现有国际制度的看法上所存在的分歧如此之深，很难让它们在所有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或是在追逐共同利益的时候找到彼此都认可的代价和利益分配比例。只有广泛而强烈的共同利益才可能促使合作成为两国间的主流关系，比如大范围流行病的爆发、又一次金融危机、针对两国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等。但即便是出现这样的共同利益，中美也未必能在责任分配方面取得一致。

幸运的是，中美之间出现本质性对抗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两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使双方关系具有相对弹性，关系严重破裂的代价对它们来说都是高昂的。同样重要的是，军事冲突的代价——尤其考虑到两国都是核大国——将会对军事冲突产生有力的遏制。中美或许无法被迫合作，但换句话说，它们可能会被迫避免对抗。此外，目前看来，上面提到的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性很低，同样，大陆以武力强迫台湾统一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一种互相遏制的机制得以防止一方越过另一方的“红线”。另一个可能引发中美冲突的事件——平壤政权的垮台——可能性略高一些，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红线也不那么清晰，但两国迅速沟通以避免公开冲突的能力虽有待加强，但估计也够勉强应付，除非在此之前两国关系就已进一步恶化。互相遏制对防止两国陷入军事对抗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的话，则中美关系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和的混合状态，即沈大伟在序言中所称的“竞合”关系。但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仍要由双方的行为所决定。如果中美能做到以下几点，两国关系的天平将会向合作一方倾斜：

确认并认可更多的共同利益。

在追寻这些共同利益时将合作交流的形式从相对被动（缺乏成效的“对话”、“搁置分歧”、对彼此倡议不冷不热）转变为更积极、更公开和更富成效的合作。

确保两国关系的竞争层面受到双方都认为公平的规则和制度的管理，每一方都要遵守这些规则和制度，并认可对方的表现。

将两国竞争关系中的战略因素降至最低，尤其是在亚洲。在军事采购和军事部署方面，单方面克制或谈判加以限制尤为重要。

预防可能威胁两国关系稳定的争议问题。

在管理两国关系不和谐因素的问题上，明确确认对方不应逾越的红线，并坚持谨慎行事的原则以降低对方越过红线的可能性。

在坦率表达分歧的同时双方都作出合理让步，防止出现制裁与反制裁的升级态势。

简言之，中美关系将呈现竞争与合作共存的这一熟悉形式并没有问题，但还不够完整。有些竞争或许激烈，但却是健康而有建设性的，有些合作却可能招来怨恨或导致紧张，因而会令人失望。两国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一定会存在分歧，甚至是一定程度的

对抗。中美关系将会被两国高层间的缺乏互信影响，尤其是在竞争与不和最强烈的问题上。

中美之间并非注定要出现对抗关系，前提是它们能学会如何管理竞争、增强合作、减少利益分歧，这是摆在两国面前共同的责任和挑战。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两国间的高度依赖性应该能增强双边关系的复原力。鉴于这些进展，用“脆弱”来描述中美关系已不再合适。但又考虑到双方间的不信任、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以及国际体系规范方面的分歧，中美关系依然易遭受谁也无力控制或预防的重创。预见、预防及管理这些重创将是对两国领导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美关系复原力的考验。

编者与作者简介

编者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及中国政策项目主任。他同时还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在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任教前，他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政治学教授，并担任《中国季刊》编辑。沈大伟教授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的著作。其近著有《中国走向全球》、《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挑战的图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权力转移：中国及亚洲的新动态》、《中国皇家艺术珍品的冒险旅程》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沈大伟教授经常在国际媒体担任中国和亚洲问题评论员，并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此外还担任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基金会和私营企业的顾问。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担任访问学者或教授，如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

作者

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及高级研究员，主要负责研究生的国际关系课程。她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福特教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她曾撰写或编写了大量著作，如《权力的实施：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超越边界的权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权问题的抗争》、《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及《中国重要吗？》等。其最新著作是与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合著的《中国、美国和全球秩序》。福特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如美中关系、人权问题亚洲地区机制等。

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III）是百事可乐公司亚洲、中东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同时还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非常驻高级顾问。傅瑞伟是第二代“中国通”，人生中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亚洲和美国生活工作。在政府供职期间，他曾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主要负责与中国相关的事务。其间，他曾担任对话贸易首席谈判代表，在制订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整体贸易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美国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全球贸易框架中所做的各种努力。傅瑞伟现为华盛顿全球战略咨询公司麦克拉蒂公司高级顾问，同时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和哈丁—勒夫纳新兴市场基金集团董事会成员。傅瑞伟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校时曾任《法律评论》编辑，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在塔夫茨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经济。此外，他曾赴上海复旦大学研究中国经济政策，并在台北的中华语文研习所学习汉语。

葛来仪（Bonnie S. Glaser）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问题，她同时也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高级研究员和美国政府东亚事务顾

问。2003年到2008年中期，她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担任高级研究员。葛来仪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对外和安全政策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内容涉及美中关系、两岸关系、智库和中国军方在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对美国实力的评估、中韩关系以及中国对导弹防御和亚洲多边安全的看法等。她的文章发表在大量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如《华盛顿季刊》、《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国际安全》、《共产主义问题》、《当代东南亚》、《美国外交政策利益》、《远东经济评论》、《韩国防务分析》、《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各种有关亚洲安全的文章汇编。葛来仪自太平洋论坛网络刊物《比较联系》1999年创立以来便担任固定供稿人。她目前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成员及国际战略研究院成员。她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学位。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担任克里斯·托弗布朗国际政治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及中国政治。其著作主要有《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21世纪的遏制与安全：中国、英国、法国及核革命的长期影响》、《从得势者到权力政治的平衡：中国政治与结构性限制》。此外，他还在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如《国际安全》、《国际组织》、《战略研究期刊》、《中国季刊》、《亚洲研究》、《比较政治学》等。他还是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郝雨凡（Yufan Hao）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曾在美国科尔盖克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研究领域主要有美中关系、中国外交决策、中国政治。他曾任哈佛大学贝尔弗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麦克阿瑟研究员、韩国东亚研究院卢斯研究员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他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其著作主要有：《澳门与中美关系》、《中国的边境政策与国际影响》、《中美关系：前方的挑战》、《中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外交、全球化及下一个世界大国》、《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回顾与展望》以及《中国外交决策》。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腾领导力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及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此外，他还是亚洲基金会副主席、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理事会成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委员会成员。他曾在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任教，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担任高级研究院，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担任院长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并担任欧亚集团研究与分析部门主任。其研究领域为亚洲问题，主要著作有：《印中关系：美国需要知道的》、《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1945—1955》、《中国的二次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及《组织中国：官僚问题》。哈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及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同时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而且是韩国庆熙大学的国际杰出学者。其著作《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2002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评为年度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最佳著作，获得施罗德·杰维斯奖。艾肯伯里的著作主要有：《自由秩序与帝国抱负：美国的权力与国际秩序》、《西方的终结？大西洋秩序中的危机与变化》、《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21世纪的威尔逊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艾肯伯里教授是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联合主任，并与安妮—玛丽·斯劳特合著《依法打造一个自由世界》。此外，他还于2003

—2004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团成员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美欧关系特别小组成员。

劳泰瑞（Terry Lautz）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访问教授，2010年曾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公共政策访问学者。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卢斯基金会副主席，领导了亚洲项目和亨利·卢斯项目。他现在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顾问之一。他曾担任岭南基金会的受托人和耶鲁—中国协会董事会成员。劳泰瑞是一名越战老兵，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求学。其最近的研究内容与相关著作主要涉及中美对彼此的看法、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美国在华传教士和士兵约翰·伯奇的书。

瑞黎明（Dawn Murphy）是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关系。撰写论文期间，她曾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实地研究，并在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她曾在南非斯泰伦波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她曾在美国和中国的多个私人机构任职。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任雪丽（Shelley　Rigger）是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及政治学系主任。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与国际事务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管理博士学位。她于2005年在台湾政治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2006年在复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任雪丽出版了两本有关台湾内政的著作：《台湾政治：为民主邮票》和《从反对到权力：台湾民进党》。其他著作还有《台湾为什么重要：小岛、全球发电站》、《抬头的台湾民族主义：世代、政治和台湾的民族主义》。她还发表了众多有关台湾内政、台湾的民族身份等两岸关系的文章。其最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两岸经济互动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影响。

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政治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此前，他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担任亚洲研究访问教授，在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兼职任教长达40年。萨特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当代东亚和太平洋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文章和政府报告。其近著主要有《中国的对外关系：冷战以来的权力与政策》、《中国外交政策历史词典》、《美中关系：危险的过去与务实的现在》、《美国在亚洲》、《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前景与危险》。萨特还曾在政界任职，先后供职于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要从事与亚太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工作。他曾多年担任美国国会研究处外事与国防部门的高级专家顾问。他还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和亚太事务情报官员，并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担任中国事务负责人。

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合伙人，为国际安全与防务及亚洲战略问题专家。他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政治事务高级顾问，密切参与了美印民用核协议谈判，并曾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高级顾问。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战略规划高级顾问和西南亚事务高级顾问。在供职于政府之前，特利斯在美国兰德公司担任高级政策分析师，并在兰德研究生院担任政策分析教授。其著作有《印度的核姿态》，并与他人合著了《中国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他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战略亚洲项目的研究顾问，并在该研究所近来编撰的8本书中担任编辑，其中包括《战略亚洲2011—2012：亚洲应对崛起中大国——中国和印度》。除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兰德公司出版的大量著作之外，特利斯还在众多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她还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

高级学者。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外交史学家，其研究方向主要为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关系。她曾在多个机构供职，如美国国务院顾问委员会、外交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年，她被授予美国国家情报成就奖。其著作主要有：《中国威胁：20世纪50年代的记忆、迷思与现实》、《海峡对话：美台关系与中国危机》、《不确定的友谊：台湾、香港与美国》。她还担任《林登·约翰逊面对的世界》和《危险的海峡》两本书的编者，并给《中国秘密》一书做注并担任该书编者。此外，她还在众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如《外交》、《美国历史》、《美国历史评论》、《政治学季刊》、《外交史》、《华盛顿季刊》等。

杜孟新（Christopher P. Twomey）是美国加州蒙特利海军研究生院的国家安全问题副教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曾担任当代冲突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及美国国务院在亚洲外交事务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及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顾问。其著作有《军事视角：中美关系中的学说差异与遏制失败》。此外，他还是《中美战略核问题》一书的编者。杜孟新在众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如《亚洲研究》、《安全研究》、《当代军控》、《当代安全政策》、《亚洲政策》、《当代历史》、《当代中国》等。他曾在哈佛大学、兰德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教或担任研究员。目前，他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有众多在华生活经历，懂中文，经常来亚洲旅行。

吴心伯（Wu Xinbo）为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美国的亚太政策，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问题的著作。他在复旦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亨利·史汀生中

心、布鲁金斯学院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任美国和平研究所杰宁斯·兰朵夫高级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美之间：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世事如棋局——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此外，他还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他还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华盛顿季刊》编委会成员，并参与编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洲安全研究系列丛书。

THE IMPROBABLE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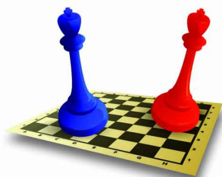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 克里斯托弗 · 科克尔 著

卿松竹 译



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普遍懈怠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作者 [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译者 卿松竹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冲突的逻辑: 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 (英)科克尔著;卿松竹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15

书名原文: 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ISBN 978—7—5166—2268—1

I.① 大…… II.① 科……②卿…… III.① 中美关系—研究 IV.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3072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6255

TheImprobable War: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by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Copyright © Christopher Coker 2015

目录

序 言

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第1章 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

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第2章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和大国冲突的逻辑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第3章 战略叙事和战略的逻辑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

第4章 战争及其多变的逻辑

《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结 论

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 “不大可能 ”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返回总目录

神看到未来的事情，凡人看到眼前的事情，智者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

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命运。

——卡尔·荣格（Carl Jung）

如果麻烦将在你最意想不到之时出现，那或许你就应时时戒备。

——考麦克·麦克西（Cormac McCarthy）

序　言

> 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本书并不预言中美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即便有所尝试，考虑到政治学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向来成绩不佳，如此臆测实难令人信服。事实很简单，人类并不擅长对那些最接近我们自身直觉和经验的领域进行预测。人类只有在观察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时才最有把握，例如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或遥远天体的运动。科学试图发现表象之下的规律和共性，即各种“定律”和“守恒”，各种“常量”和“原理”：这些模式使人能够作出可靠的预测。结果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定律迄今很难被证明是可靠的。人类社会太复杂了。

政治现象会随时间而演变和分化，因此在政治学领域作出精准的预测尤其困难。尽管我们有可能确认革命环境和战争环境，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主张的那样，革命环境并不总是导致革命发生，战争环境也并不总是以战争结束。政治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经济周期逆转政治命运；民族主义情绪在出人意料之时爆发；或许最重要的是，人类是任性的，容易冲动行事。

这并不是说政治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为国家行为甚至政治家行为创建模型是可行的。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可以开展行为分析，但人们的行为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可预见性。与知道故事如何结局的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学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他们唯一的指南就是逻辑规则，也就是对人类行为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的模式和规律。政治学家正是利用这些逻辑规则来帮助政治家预见具体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涉及战争的可能性，无论这样的前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大可能”。

在很多人看来，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纯属天方夜谭，而且中美两国的政府和军队高官也持有这种观点。当我告诉我的同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回应。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这种观点，或许在西方尤其如此，但在亚洲也一样——尽管那里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当我对这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我才认识到它既根植于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相互提及的元叙事[1]，也根植于国际关系的主流范式——根据这种范式，和平有利于积累财富。这种理论在自由派思想中根深蒂固。

然而，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强调大国战争匪夷所思，但两国仍然在为此作准备，尤其是现在，全球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21世纪主要冲突的地位。尽管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9·11”事件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但明天的历史学家更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9·11”事件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而不是21世纪的开场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认为1979年是真正的转折点——在那一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斯兰主义从此兴起。同样在1979年，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这个国家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880年以来美国一直占据这一地位）。

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展开对抗，那么会不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历史从不重演，但有其自身规律，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旨在确定一种在大国关系中和对抗时期内反复出现的逻辑。有关大国不再走向战争的说法或许

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战争具有某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逻辑，即便这种逻辑只能算是某种“经验之谈”。对于大国战争已经过时的乐观言论，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的确，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个世纪，唯一比预测战争结束还常见的就是战争本身了”。

挑战传统思维、提出不同问题并给出新答案正是学者的职责所在。就此而言，大国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因为它让我们理解大国领导人在局势紧张时期握有哪些选择。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对未来的深刻认识，而是基于当前的一种可能性，而作为一种可能性，它就还没到不可避免的地步。

关于逻辑

让我举一个大国冲突逻辑的例子，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战略学逻辑的例子。“战略学看似自相矛盾的逻辑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相反，与一切对智慧的通常定义都相反……只有你理解辩证法的时候它才讲得通。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去备战。如果你求战若渴，你就解除自己的武装，战争很快就会找上门。”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前提正是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2] 理论的例证：最简单的解释是最可信的。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勒特韦克是在引用一句古罗马格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想要和平，就去备战）。尽管这句格言在历史上被多次证实，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科学的准则。简单性原则只告诉我们应该先沿着哪条思路展开探讨，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的确，符合逻辑的解释常常是简洁明了的。但有时并非如此。不去备战的国家并非总是遭到攻击。如果所谓逻辑就是能让我们在人类活动中找到某种一致性，那么这并不要求人类时时刻刻都必须保持一致。

一个以战争内在逻辑为基础的论证要想成立，就必须能从其前提合理地推导出一个结论。本书探讨了有关大国竞争的多个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前提必然推导出战争爆发的结论。要理解某种逻辑就需要用演绎法——判断从给定前提中能推出哪些结论，还需要归纳法——在这些前提之外总结出新的东西。这些都依赖于我们的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或许远不及我们的想象力强大。

此外，我们并不是天生遵循逻辑的物种。即便人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们也并不总是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历史学家常常说这种不作为才是正确的作为。善于推理或许能帮助我们演绎出自身行动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后果。然而，并不能以此断定一国必将接受另一国的挑战，或者一国必然不愿接受对手以智谋取胜。在某些情况下，失败甚至可以被视为胜利。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认为的，对于按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我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对逻辑的掌握。

维特根斯坦还坚持认为，逻辑的局限性就是世界的局限性。换言之，逻辑的局限性决定了什么是可能的。然而，我们确认的行为模式并非真正的规则。它们是规律，知晓这些规律不必然帮助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尽管如此，不承认这些规律几乎总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你意识到事件的逻辑，那么至少这个世界在你看来会有所不同。你会发现，你并非生活在一个毫无确定性的宇宙中，万事万物并非只能用偶然或者人类的冲动来解释。这个世界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东西，这种了解会让你变得更强大。它能帮助你避免被那些理解能力胜于你的人利用。

在本书中，我将找到我认为大国走向战争并常常陷入无法避免的冲突循环的主要原因。我将考察大国误读历史的常见方式以及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诉诸战争极少是非理性的选择，但它可能是不合理的，而理解两者的区别非常关键。我将考察大国竞争的逻辑，尤其是

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时候，后者守护现有体系规则的能力或许不及以往。我将考察战略学的逻辑；必须打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并且以足够的智慧精心制订一个体现这种智慧的战略。我还将讨论战争如何具有自己的逻辑；它的的确确是多变的，因而会产生多种可能。正当你认为战争已经演化至尾声的时候，它会来一个出其不意——又找到了新的演化方向。

本书不应该与那些预言战争的虚构和非虚构著作归为一类，例如H·G·韦尔斯（H. G. Wells）的《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1908）或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下一次美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1990）。《空中战争》虚构了一个东亚联盟（中国和日本）与美国一决胜负的故事，而《下一次美日战争》出版之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才刚刚开始。如果中美之间将爆发战争的话，那么我估计这在可预期的未来就会发生，但这场战争被避免也是完全可能的。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这两个大国是否认识到大国冲突的内在逻辑。

对好奇者的警告

在此处发布一个免责声明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政治学家，不是汉学家。我提出的任何专家意见都是通过常用的学术方法取得的。我从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借用了一些观点，并将它们融入我个人的论证之中。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我正确使用了历史类比，那也是受到他人的视野和思想的启发。

本书从一个战争现象学家的角度审视有关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主流论述，旨在寻找大国冲突的逻辑并考察这样一种逻辑是否适用于中美关系。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说：“我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与我预测事件的能力极不相称……即便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我的

成绩也谈不上突出：最恰当的说法是，我的理论框架让我能够在事件的进展中理解它的重要性。”关于预测未来的各种理论，值得一提的恐怕只有这个——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结果。

主观倾向在所难免，我基本上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我曾尝试对中国公平一些，公正对待中国对美国提出的、我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批评。我也要批评美国大多数战略思维的低劣，以及美国常常不惜损害自身国家利益、一味追求自由国际主义（或干涉主义）的狭隘做法。

然而，考虑到竞争的逻辑，我深信，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大于美国，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从本能上讲它并不一定是好战的，尽管它可能经常导致战争和冲突。中国却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中一股危险的力量。或许中国崛起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其“近乎病态的赶超西方的需要”。尽管战争并非总是野心或者恶意的产物，但它常常是判断错误的结果。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计划事与愿违，或者图谋因偶然因素被挫败。如果寻常/不寻常的外部因素——无法列入考量范围的事件或者人物——也被考虑在内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和战争常常毫无逻辑。

本书针对大国冲突的本质以及中美未来交战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我们能找到的似乎最合理的历史类比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将落入哪些陷阱？对于像“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观念，我们应该给予多大重视？国家例外主义是不是冲突的引擎？尊严和名声还会刺激人们相互争辩吗？如果大战略包括社交智慧，那么中美两国有多大智慧？两国在制定各自的国家战略时会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吗？两国的努力是为了避免战争，还是为了一旦战争爆发自己将处于优势地位？本书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一场战争很可能以何种形式发生。在小说。时间的尽头。（Toward the End of Time，1997）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描述了2020年的中美战争：

> 站在令人目眩的四叶形立交桥上回看这座城市的轮廓，我们看到那些蓝色玻璃的后现代大厦在战后的荒芜中黯然失色，那些嶙峋的建筑的底部已染上斑斑锈迹，它们惨遭遗弃，因为对我们这个衰败不堪、老态龙钟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建筑太过靡费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他认为21世纪早期是一个“饱受创伤、复仇心切的时代”。这场战争主要由一群“受过高度训练的年轻男女”来指挥，“他们坐在安全的密室中观看三维计算机图像”。每个人都曾想象过，如果真要打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它肯定是由坐在密室中的大量操作人员来操控的，他们向计算机输入密码和指令，在计算机屏幕上，人只会显示为风格化的图标、颜色条或者不断运动的网络流。正是这些受过高度训练、坐在屏幕前的年轻男女最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中下一场大国战争的主角。

在后面的一个章节中我将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两个热核大国相互交战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但真的是这样吗？网络空间的冲突与传统冲突相比是非动能的，但那仍然是一场战争。的确，诺厄·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提出“凉战”[3] 的概念，这种战争“比冷战暖一些，因为它似乎意味着几乎不停歇地采取进攻性措施，尽管称不上真正的战争，但通过侵犯主权和渗透防御，不断地尝试破坏或削弱对手，或者占据优势地位”。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这种凉战的热平衡能维持多久。

撬动历史

展望未来犹如雾里看花。往事可顾而不可塑，未来可塑而不可顾。人类是一个向前看的物种，更偏爱未来，但这种偏爱并不允许抛

开历史对未来任意想象，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1）里白棋女王所说，“这是一种可怜的回忆，因为它只能忆及过往”。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研究历史。过去的人们无法看到未来，后见之明所看到的事情是当时的人们所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常常看起来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质疑当时的人们为何就看不出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在告诉我们，超前思维有助于克服后见之明的偏见。我们以为我们比祖先知道得多。我们利用历史的优势（透过爱丽丝的镜子）看待事件。我们解读事件时并未思考该事件之前的事件，而是之后的事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们善于评价过去，因而自认为也善于预测未来，这种倾向实不可取。

当人们仔细思考中美之间这场不大可能发生的冲突时，最常被拿来作类比的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查尔斯·埃莫森（Charles Emmerson）写道：“在很多方面，一战前夕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犹如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奇异的折射。这种看法让我们很难不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就像把一个世纪压缩成一眨眼的瞬间。”一战前夕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最明显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如此多的顶级思想家都感到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

关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争论从未停止。基本共识是列强与其说是昏昏沉沉地误入战争，不如说是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不大可能爆发。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在共同边界附近调动部分军队。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achter）当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虚张声势，都是虚张声势。除非有人愚蠢至极，做过了头，以至于无法收手，否则战争不会爆发。我确实认为当今政坛还没有谁会这么蠢。”几年以前，一位英军准将曾被问道：“是不是只有当政治家愚蠢到难以置信时才能点燃

欧洲的战火？”他回答说：“你马上就将见识什么叫愚蠢到难以置信。”

这场战争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列强的领袖们最终冒了太多的风险，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大国冲突不大可能发生。“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杰克·贝蒂（Jack Beatty）将有关战争起源的看法分为三种——可以避免、不大可能和不可避免。只有当政治领袖竭尽所能阻止战争的时候，战争才“可以避免”。他们并未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太低。考虑到欧洲政治具有火药桶的特性，要想让这块儿大陆保持和平，必须具有非凡的危机管理技能。只有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战争才“不大可能”。因此可以推知，战争基本“不可避免”，因为这些政治家并没有认真考虑战争爆发的前景。

历史学家永远不会就一战爆发的原因达成“最终”一致。一些人主张战争源自政治上的误判，而另一些人将战争归因于同盟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冒险之举。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以这样一个因素为基础，即各方政治家都得出战争不大可能发生的结论，结果导致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它。

今天的世界面临重蹈覆辙的风险，因为我们在重复1914年时我们对自己说过的话。对大国冲突前景的普遍懈怠基本和当年一样，认为国家间战争几乎“绝迹”或者“过时”的错误的自由主义假设也和当年别无二致。正是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近期导致冲突的爆发。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信徒凭借对世界的粗浅理解认为国家间战争不会爆发，而经济学家和全球主义者也认为“距离已经消失”，因为全球主义已经战胜了地理。本书正是要打破这些人对国家间战争的看法。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

历史类比并不考察全部历史经验，任何规则总会有例外，但我们也只能做到类比这一步。当有人警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越南的行动暗藏危险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工夫跟你扯历史。”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想避免犯下前人的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他那样的豪气。

1 元叙事（metu-narrative）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它通过预期实现，对一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编注

2 “奥卡姆的剃刀”是由英国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1287—1347年）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这个原则一般被概述“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不同的假说在预测或解释同为约一件事情上具有相同的效力，那么最简单的、需要最少前提的那种假说最为可信。——译注

3 相关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已由新华出版社于2014年引进出版。——编注

第1章　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

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 历史的首要实际用途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
>
>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说："上天没有赐予我任何东西，每一样都要去争取；不仅现在和未来要去争取，过去也是如此——当然，或许每个人都继承了过去，但这也必须争取才能得到。这或许是最艰难的任务。""争取"过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过去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如果通过研究最合适的类比而吸取了正确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至少有机会认真准备、以防不测。

类比有助于逻辑思考，它们是归纳推理的核心。这种推理假定被过去验证的规律性和相关性在将来也成立。归纳推理往往从具体的个

例（例如1914年战争的具体原因）指向一般性的结论（一切战争的原因），或者从一般性的结论（凡大国必相争的观点）指向具体的个例（中美之间的竞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归纳推理，这也是人们普遍喜爱历史的部分原因。历史是一种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向导，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实现与过去不同的未来。不过，尽管类比是归纳推理的基础，但它们不一定有助于预测历史与过去相似的方式。问题在于具体情况：规则的例外或者统计异常。

归纳推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归纳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自然规律的可靠性可以使预测的准确率高达99.9%。然而，人类社会高度多元化的本质意味着归纳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适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文化信仰、自身定位和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对战争原因作出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的一般性陈述。如果能作出这样的陈述，那么作出准确的预测就简单得多。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救援》（The Rescue）中，一个角色宣称，世界上一切冲突都可以归咎于女人：

>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乘客……他曾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希腊人为某个女人打了十年的仗。土耳其人好像是绑架了这个女人。无论怎样，他们在土耳其打仗，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打仗。

尽管康拉德小说中的这位老者振振有词，但关于战争的原因人们已经争论了几千年，很可能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例如，修昔底德颇感自豪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他理解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使他的作品不同于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叙述。在荷马的叙述中，一切都归咎于神灵，当然，还有一个女人——海伦。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将希波战争

解释为东方企图对特洛伊的陷落进行报复。

1914以及一切此类论述

一个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即刻否定。这个今天再度流行的观点认为，激烈的国家间冲突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带来回报。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曾说，“求知使人远离平庸，经神秘之路前往世外之地，万般新知藏于彼处。”这就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原因——他们引领着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波兰工程师让·布洛克（Jan Gotlib Bloch）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在他对战争原理的研究中，他断定战争是一种消耗资源的活动。战火不仅烧毁希望，也烧毁资源。他对列强在20世纪前夕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估计，认为欧洲爆发战争对胜利方和战败方都是灾难，因此战争不大可能爆发，甚至是“不可能的”。他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G·B·古奇（G. B. Gooch）在1911年写道，“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像决斗一样过时。”

很多著名的作家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不仅不再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违背开明自利论。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就是其中之一。1912年1月，他在对伦敦银行家协会发表演讲时说：

> 商业上的相互依存是银行业的一大特征，因为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任何其他职业或行当都不存在的——事实上，一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与多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密切相关。各家银行都必须有信心相互兑现责任，否则整座大厦都会垮掉。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道德终究

> 不是建立在个人牺牲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开明的自利上，即对于将我们绑定在一起的全部纽带有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这种更清晰的认识必将进一步完善，不仅涉及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观念将推动建立更有效的人类合作和更美好的人类社会。

一名在会议现场的前《金融时报》编辑随后报道说，安杰尔几乎征服了全场观众。

这种认为世界日益错综复杂导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的观点在今天也很常见。像今天的很多分析人士一样，安杰尔认为，世界的错综复杂性挑战了此前主导战争的力量，他在《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1909）[1] 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此书认为，战争将扰乱国际信贷的流动，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避免任何战争。即便战争爆发，信贷危机也很快会使其结束。安杰尔坚持认为，国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抢劫”无利可图，外交“欺诈”徒劳无功。

安杰尔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理论。到1914年时，先进的欧洲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大陆、延伸至大西洋彼岸的商业循环的组成部分。但安杰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高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及其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各国政府在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领域签署了国际公约，并且统一了铁路时间表，但它们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如此，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债券市场非但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在冲突最终爆发时为战时财政提供了便利。

安杰尔的观点与一套被广为接受的思想体系相符。就是在那段时期，人们第一次开始谈论全球联网，尽管他们那时还尚未使用该词。到1900年时，世界已经开始全球化。19世纪从欧洲迁往北美的数以

百万计的移民成为一个大西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跨大西洋资金流动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经济体。不同市场的价格和利率趋于一致。随着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一国的经济下滑可能迅速蔓延至整个世界。

之前充当国际贸易语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可以说英国人是全球化的创作者。当有人问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什么将是20世纪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时，他回答说是北美人讲英语这个事实。英语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好发脾气、好与人争的大国联合起来，先是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然后是反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最后是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

在安杰尔看来，20世纪初全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英语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意味着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反常现象。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安杰尔一人。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批判战争的人，包括荷马——“愿争斗从神界和人间消失”——但人们一直以来都想当然地将战争视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直到人类开始对战争的原因产生怀疑时，这一点才发生改变——人类对生活中其他一些此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活动也都产生过类似的怀疑。如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所写，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开展的活动逐渐被当作论证的对象”，而战争就是这种情况。在安杰尔著书之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合作胜于竞争的观点，而最认为这个道理不言自明的国家恰恰是安杰尔的祖国。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总结说：“我们已经从战争那里索取了它能提供的一切。”作为达尔文的信徒，斯宾塞宣称，推动人类进步并且导致战争的那种热忱和情感已经失去了适应能力。自那时起，这种观点一直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大量文献中，最近的要数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

然而，尽管安杰尔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保持一致，但他确实招致了一些批评。最重要的是，支撑其著作的一套观点是典型的20

世纪初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任何与他的世界观无关的东西都被他直接删掉了。他看到的全是战争的风险，却看不到战争创造的机会。

安杰尔还忽视了德意志帝国那些竭力宣扬战争好处的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895年获聘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科学，唯一目的就是扩张各国的民族经济。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但他论述时咄咄逼人的措辞绝对是前所未见的。他的演讲中布满了直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拿来的行话，例如“生存”和“选择”，以及像“历史法则”和“国家竞争”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韦伯同时代的人，例如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t）的著作中找到，后者对斯宾塞有关战争已经提供“它能提供的一切”的观点尤其不屑，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繁荣后便“沾沾自喜”的典型表现。当与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松巴特抱怨说，“我们常常不得不感到我们的敌人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百货商店”。

有一种说法认为，战争摧毁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信仰，但正是这种信仰导致了战争——这么说或许不太公平，但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犯下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历史学家今天仍然在问为什么德国在1914年选择了战争这条道路，他们给出了从争夺市场和民族主义情绪到国内政治压力等各种解释。然而，尽管这些都毫无疑问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实质性因素通常并不“导致”战争：它们只是构建了斗争展开的参照系。冲突的爆发归根结底源于一个社会对暴力以及预计从参战中获得的好处的情感反应。当足够多的人认为战争对生存竞争来说必不可少，是第一等的生理需要，或者当战争被视为一个国家用来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舞台时，用实质性因素去解释未免多此一举。

对于认为和平能带来一切、战争使人一无所有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安杰尔的观点格外有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们根植于在当时的英国虽未得到认可，却占据主流的思想体系。例如，他坚信大英帝国是

人类行为的终极楷模：

> 在这方面，世界当以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为指导……将大英帝国的指导原则推广至整个欧洲社会正是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方法。通过武力获得进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将靠观念获得进步，否则一无所有。由于这种不同团体可自由开展人际合作的原则在特殊意义上是英国人的创造，那么领导责任就理应交给英国。

经济观念像其他一切观念一样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转或应该如何运转的主观意见，而且经济学家比大多数人更一厢情愿。1914年世界走向战争之时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箴言，在幕后管理世界经济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问题就出在这儿。欧洲青年在1914年走向战场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令人吃惊，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学这门刚刚接管政治生活的“沉闷的科学”抱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胜利属于全心全意维护自己利益、不满足于安逸生活的一方。

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过程也是一整套思想体系坍塌的过程。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日渐式微，而视政治经济为竞争与零和游戏的观念逐渐兴起，与之相伴的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强烈鄙视。

尽管《大幻觉》出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安杰尔仍坚持己见——权力政治无法再保证繁荣，而和平有可能为创造财富提供更好的机会——直到他在1967年去世。由于英国即将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所以安杰尔有绝对的理由相信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便是在临终前。不过，如果活到今日，他或许就不会对自己的观念那么自信。毕竟，他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军事征服不再保证一国实现现代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形式，因为金融和信贷市场都需要和平。

安杰尔的论证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深信“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根植于各国内部，与政坛斗争相互交织”。尽管安杰尔意识到在德国有一股主战的思潮，英国也有浓厚的保护主义传统，但他认为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终将主导两国之间的任何对抗。但他高估了在那一刻最终到来时自由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的实力。在英国，当战争爆发时，大批此前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立刻收起自己的疑虑，发表了爱国主义声明。另一方面，在德国，众多知名的自由主义者从来就不反对战争，包括马克斯·韦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弗里德里希·诺曼（Friedrich Naumann）。这三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大战很可能“无法避免”。

安杰尔在1913年赴德国开展和平运动时发现了这一点。在此行之前，2000本《大幻觉》德译本被发给指定的德国教授和学生。安杰尔的德国赞助人认为，即便只有少量学生参加他的会议——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参加——德国的大学也至少会接触他的观点。但安杰尔及其赞助人发现，舆论氛围明显对他不利。在哥廷根大学，25名学生在安杰尔开始用英语发表演讲时离场，他们随后来到警察局，抗议以外语举行政治会议。在柏林，会议以骚乱收场，安杰尔抱怨一些教授唆使学生起哄。安杰尔此行以失败收场。在这样一个国家，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阳光下的地盘”，即便这个梦想最终成为史上最大的幻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尽管描述战争本身很容易，但理解和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绝非那么简单。历史学家不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德国，而是更愿意强调为1914年做铺垫的长期动态，例如经济和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在所有国家甚至是自由主义国家都肆意蔓延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这种信仰已经深入大众文化的骨髓；联盟体系和先发制人战略让大多数列强同时成为侵略者和受害者，但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是奥匈帝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决定发动战争。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德国人实际上从最开始就准备发

动战争，但他们肯定作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因为他们坚信，与未来相比，在1914年他们战胜俄国和法国的机会更大。战争在德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让他们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有助于发现它与未来的中美冲突的相似性，但仅靠实质性因素并不能将不同社会推向战争。社会像人一样，受到对世界如何运转或者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的推动。他们既受信仰驱使，也受激情支配。

安杰尔书名中的“大幻觉”也可以指代另一种幻觉，即我们固执地认为人类有能力使自己的行为保持理性，即便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果。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什么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并非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般理性。我们还非常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应对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困境。当然，自由主义世界观不会轻易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由于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相连，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也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

1921年安杰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的获奖者挪威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劳斯·朗厄[2]（Christian Lous Lange）在获奖感言中赞扬了安杰尔的这本书。让他尤其感到鼓舞人心的是“安杰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的，对‘人类的理性潜质’深信不疑且满怀热忱”。然而，安杰尔所说的理性基本上对人类的激情避而不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回顾欧洲复古的军国主义表现时打破常规，批评他的自由主义同僚们过于强调人类的需求，结果却忽视了人类的欲望。他强调，如果冲动和欲望是重要的，那么采取行动的欲望和出类拔萃的需要也是重要的：成功克服阻力的意义以及成功通常会赢得他人的尊敬。罗素将这一分析延伸至国家（的确，对那些无法在个人层面出类拔萃的人来说，从属于一个能够赢得尊重的国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自尊）。

罗素深受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的影响。在战争爆发前，詹姆斯认为人性中的好战情绪过于根深蒂固，这种情绪很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除非我们能找到比贸易回报更好的东西来替代民族荣誉。尽管贸易可以带来财富，但某些社会渴望得到的东西远不止财富一项。詹姆斯还说，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掩盖这个人们不愿面对的事实，因为欧洲已开始认识到战争的麻烦：

> 当前，文明社会的观点是一种奇妙的思想混合物。军事本能和理想从未减弱，但它们受到了理智的批判，这种自古以来的自由被大大限制。无数作家都在呈现兵家野蛮的一面。纯粹的掠夺和控制似乎不再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动机，必须找到借口将这些动机全部归于敌人。英格兰和我们美国，以及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在任何时候都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平”。一心想要战利品和荣耀的是德国和日本。

詹姆斯的批评不仅限于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道义战争》（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1910）——上述引文便摘自此书——中，詹姆斯还抨击了西方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他们试图用一些伪科学的术语为战争辩护。一个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撰写的《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1909）。这位将军认为国家有兴必有衰，在未来与日本的任何一次冲突中，美国都不大可能取胜，原因是美国的高傲自大、商业精神以及（不可避免的）女权主义。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德国作家所著的《战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ar）。这位作家认为，战争由上帝主宰（上帝可以借此评估人类在英雄品质、顽强意志、创造才能，以及——不可避免的——男子气概等方面是否有长进）。

这些被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称作“侵略借口”的东西在英格兰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样存在。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找到了为战争

辩护的理由——战争提供了一种既包容又排外的集体身份认同感。这些理由通过认定谁是“外人”来团结社会，而对“外人”可以随意欺侮、奚落或者诛灭。这些理由既制造仇恨又讨好仇恨——在培育和压制仇恨的同时又为仇恨披上一层科学的伪装。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个典型的例证，其影响甚至在伟大的议会制度评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著述中也有体现。他不仅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还反过来对达尔文创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产生了影响。白芝浩主张，“战争这种竞争性的考验”推动了进步，因为它改进了种族的“适应性”。三十年后类似的观点再次出现，彼得·查默斯·米切尔（Peter Chalmers Mitchell）将国家称作“一个正在形成的物种”，并视德国为英国和法国（一对“共栖动物”）的“生物学”天敌。这种观念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长。例如，一些美国人将日本人视为一个劣等民族，在珍珠港遭袭之前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严重威胁。在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小说《召唤》（The Call，1985）中，故事讲述者评论说，日本人因为袭击美国而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丑化自己，而是成为真正的人类。

事实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元叙事一样有说服力，后者认为各国将不得不遵守这种相互依存的对称关系的逻辑，因为这是市场的要求。然而，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并不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能证明战争合理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对战争的辩护，例如盖伊所说的“侵略借口”，而是这些辩护适用的论证框架。

詹姆斯的作品有其重要意义，因为他认识到鹰派与鸽派同样理性。他在职业生涯开始时（1878年的《理性情绪》）就曾主张理性不过是一种感觉或者情感。詹姆斯的作品仍被选入逻辑学的权威文集中，因为他的论证相当有说服力。有些信仰问题不是仅凭智慧就能解决的。詹姆斯承认，由于信仰可以伤害其他人（有时也伤害信仰者本人），所以信仰就必须尽可能理性，但他也坚持认为，信仰还应该充

满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意识到必须直接回应有关战争的争论，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想象力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像安杰尔这样的作家无法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观念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激情，而最重要的正是激情，并非观念：

> 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恐惧——我正要这么做，似乎它必将指向人类想象力的两处禁地，其一关乎审美，其二关乎道德。首先，人们不愿想象在未来人们可能会告别充满诱惑的军旅生活，各民族的命运不再通过武力来决定——这种方式犹如风驰电掣，惊心动魄之外也可能惨不忍睹，而只能通过“演变”来决定——这种方式旷日持久、乏味无趣；其次，人们不愿看到人类施展本领的最高舞台被关闭，人类优秀的军事天赋注定永久埋没，绝无发挥的可能。这两种不情愿像其他任何审美和道德方面的不情愿一样难以克制。在我看来，这两种不情愿必须得到倾听和尊重。你不能仅仅以战争的昂贵和恐怖来克制它们。恐怖会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当讨论如何将人性发挥至最大限度和最高程度时，讨论成本就显得不体面了。如此多的否定批判却丝毫没有说服力——和平主义没能从鹰派中策反任何人。

詹姆斯坚信，信仰永远和欲望以及需求的满足相关。战争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也几乎没有满足任何需求）。对德国人来说，它可以满足赢得更多尊重的需求。它可以暂时缓解具有严重危害的怨恨情绪。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詹姆斯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真实性都带有个人印记。现实如果在你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

现实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看待世界和理解生活的方式有多种。任何一种现实都不比另一种更根本，更不要说“真实”了。很多个世界在那里共处，有时并不安宁。这与现代人的理解是一致的，即现实受到语言、观念和符号，尤其是象征的影响。詹姆斯认为，要认定

某事是真实的、正确的或者现实的，就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对谁来说是真实的？真实的观念是一个社会能够从其自身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和证实的。此前的理论学家将真相视为坚持真理者的财产，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进程：“一种观念的真实性不是这种观念固有不变的属性。观念会后天具有真实性。它变得真实，被其他事件塑造成真实。其真实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即自证的过程。”

詹姆斯认为，有关真实的观念还解释了人类行为模式的迥异。有些人对失败的恐惧大于对争取成功的胆怯，因而倾向于谨慎行事。其他人对寻找生存的真实性或者意义更感兴趣，而不是如何避免判断失误，而还有些人甚至愿意（冒着个人风险）大胆地迈向未知之地。换句话说，有些人愿意承担风险，而其他人则不愿意。

在《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896）中，詹姆斯举了一个人爬山的例子。此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他只有跳跃深渊才能逃离险境。詹姆斯说，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具备成功跨越深渊的勇气。如果你怀疑并且不相信自己的跳跃能力，那么你就很可能坠入深渊。“拒绝相信自己，那你就真判断对了，因为你将彻底毁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那么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将拯救自己。”在所有情感之中，信念最为突出。

詹姆斯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然而，现代科学如今已经对大脑如何工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避险意识并不是在大脑中负责思考的区域产生的，而主要是在负责情感的区域产生的。感到危险并鲁莽行事也是一种“情感”。理性思考与避险毫无关系。真正理性的是人们在采取某项行动后常常试图论证风险的合理性，或者在事后让决策更合理。因为人脑不能“计算”我们与世界关系中的一切变量，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情感上走捷径。詹姆斯的大胆一跳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1914年，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要比判断保护主义的利弊复杂得

多。人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大国战争是非理性的（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重视防守胜于进攻的现代战争必将耗时耗力）。但如果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或者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那么理性就不会在争论中获胜。法国人参战时认为锐气和胆量足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很多德国人错误地认为英国人会保持中立，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对付俄国。英国人则幻想德国会出手干预，阻止奥地利人挑起另一场巴尔干战争（最大的幻觉）。

选择相信“谁”或“什么”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难题，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难题。而当问题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时，这种挑战性就更大了。例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或者核能等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人除了相信专家的观点别无选择。但专家们总是相互争执，有些像全球变暖一样的观点受到了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的科学推测的影响，并无真凭实据，你只能选择信与不信。在法国，军事专家在1914年时恰好相信进攻胜于防守，对国家锐气决定胜负的逻辑深信不疑。

当两种观点都可能正确的时候，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似乎也有道理。但詹姆斯补充说，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作出选择。如果一国对于战争的功用持不可知论的立场，而另一国不是，那么对于前者就可能是危险的，它甚至可能遭到攻击。英国在1914年选择参战是因为它认为不参战更危险。很多英国历史学家赞同这个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被视为“正义之战”，但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一战是不可避免的灾祸。从根本上说，战争双方并非在道德上无法区分。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有人主张英国应该接受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如果英国选择中立，那么这种前景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作为避免日后悲剧的合理代价，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很值得商榷，今人看来如此，当年志愿入伍或者随后被征召入伍的人看来也是如此。”

詹姆斯的论证本身就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而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且在今天美国人

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实用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詹姆斯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对现实有不同的文化构建，而美国人的构建是结果主义（即一个行为的道德高低应单纯以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是对是错（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詹姆斯本人认为战争是错的），每个社会都应该自问：参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战争的意义不取决于其根源，而在于其结果。

詹姆斯的批评者还在其他地方对他的论证提出挑战。例如，詹姆斯没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能为力时我们该做什么？乐观的态度或许可以帮助一个人跳跃深渊，但如果他脚步踉跄，跳跃失败，那么乐观并不能帮他免死。詹姆斯还忽视了内在价值的问题。认为真实性取决于需求的满足确实无可厚非，但这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满足何种需求，或者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最后，詹姆斯没有讨论人类需求的根源，它们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毫无疑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认为我们注定为生存而战是一回事，认为一国好战源于其文化DNA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人们尽可对詹姆斯的观点提出批评，但在很多地方他都是正确无误的。战争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正如布洛克所认为的，战争不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带来回报。尽管战争的结果是德国战败，但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结果也是很可能的。在开战最初的几个月，德国人几乎就要击败法国，而此时英国很容易选择完全不介入战争。如果英国置身之外，那么德国就会更早地击败俄国，从而以最小损失夺取胜利。德国没能如愿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打的算盘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不合理的。

詹姆斯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称的“可误论”的鼻祖。可误论是一种认识论领域的命题，主张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对一种观点给予盖棺定论式的肯定。其他可误论者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以及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其中，波普尔怀疑有关智识的一切必然性，哈耶克怀疑政府的必然性，西蒙认为一切理性都是“有限的”，而卡内曼和特韦尔斯基主张人类决策常常以非理性的启发法和偏见为基础。

俾斯麦也可以被称为可误论者，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与他之后的历任德国首相相反，俾斯麦认识到，在诸强之中，德国的实力远逊于英国或法国，一旦战败，德国将遭遇灭顶之灾。甚至是取胜的前景也让他忧心。正如一位外交官所写的，德国不得不为1870年的胜利付出普选权的代价，“如果再赢得一次战争，德国就要实行议会制度了”。在战争中获胜可能会释放平民主义的思潮和理想，而这些不是政府能控制的。

德国的劣势并不源于其经济，而是源于其宪法和政治制度。议会制度——尽管以普选权为基础——由于议会自身受到的限制而形同虚设。德国议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控制预算，但军事预算每五年才审批一次，因而削弱了议会的监督权。尽管议会能够对首相投不信任票，但它不能将首相免职。简而言之，德国勉强称得上是民主国家，但这种民主并不自由。这是“反动的现代主义”[3]的典型例子。

结果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数年间，德国的这一劣势是致命的，同样致命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德皇负责评估德国的作战计划和战争政策。虽然几乎有50个人与德皇有直接联系，但这些人之间没有讨论和协调的机制。甚至有关作战计划的信息都不能在总参谋部、战争部、海军部、海军总参谋部以及外交部之间共享。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这可能与冷战期间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相似，当时该部有权制订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计划，而无需咨询美国海军、陆军或者国务院，总统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在其政府内部发布有关作战计划的细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对

战争寄予希望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但自信一定能取得战争胜利或许就是了。詹姆斯想要论证的是，在黑暗中向前跳，指望运气或者全凭天意是完全“理性的”。非理性体现在知道或感觉这样的一跳会带来致命后果却仍不放弃。一部分德国人肯定意识到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公开的秘密备忘录显示，普鲁士陆军元帅冯莫尔特克（von Moltke）向德皇表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正如将军们公开表示的那样），而是很可能迁延日久，并最终耗尽所有大国的元气。同样“不合理的”还有德国海军在刚刚以“无法取胜”为由放弃海军军备竞赛的时候，决定制订与英军作战的计划。

1914年，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如此悲观，以至于他对儿子说没必要为自家庄园栽种榆树，因为30年后俄国人会把它们砍倒的（事实证明他这个预测相当准确——俄国人的确在30年后来了，而且又在此停留了50年）。每个人都可能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而大多数时候理性的人过着不合理的生活。如今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远胜于1914年时人们的理解，我们也远比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所说的“人类总是把事情搞砸”。

为什么理性行为体模型并不总适用

暂且不考虑我们选择相信哪一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解释，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领导人简直太乐观了。乐观是人类适应性特征的一种，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乐观有助于人类生存或繁衍后代。甚至有人表示，乐观这种适应性特征在人类采集狩猎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战争的演化中也能找到。如果战争是进化史中最重要的选择性压力之一，那么战争的长期存在很可能对我们的心理进化产生重大影响。

但乐观还会使人更愿意冒险，负面想法和情绪所产生的压抑可以

提高个体在完成给定任务时的表现，这也适用于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写的，“在战争中，勇气……是除了对时间、空间和军力的准确计算以外，另一种应该被给予重视的力量，因为只要有一方的胆量超过另一方，那么前者就会因为后者的怯懦而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说，如果一种积极的幻觉具有适应性，并且那些产生乐观幻觉的人往往取得成功，那么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产生这种幻觉是有好处的。误判可能是对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虚张声势进行权衡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自身无法准确判断形势。1914年的教训不是误判造成致命后果，而是如果战争通常能分出胜负，那么盲目的乐观和合理的乐观从定义上说都是真实的。

盲目乐观源于个体无法判断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人性的这个特征在今天与在1914年别无二致，尽管坚信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人有不同的意见。理性行为体模型在美国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其标准表述是这样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假定个体根据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作出旨在将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的选择。这个模型假定人类确实会努力保持理性——至少大部分时候如此，这种假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并非聪明绝顶，人类在确认自己的真正利益时困难重重。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前主席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未能说服美国国会监管期货衍生品市场。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相“当吃惊地”发现，金融机构和银行并没有理性地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它们向还款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人发放贷款）。这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所说的经济学家具有“无法计算的主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事务中“可计算的理性”的缺失。

即便我们更具智慧，社会心理学家也已断言我们的智慧相当受限。在20世纪50年代，包括赫伯特·西蒙以及哈佛商学院几位学者在

内的作家都开始指出，我们有限的计算能力和预测能力严重限制了我们作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是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论”的拥护者。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第一个提出，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其行为准则允许作出能够接受但并非最好的决定。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满意度原则”。由于人们无法以足够准确的方式评估一切结果，他们会满足于可获得的选项中最佳的一个。我们在找到接近满意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停止继续寻找。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么做，那么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或者展开最基本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因此，我们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经济学家基本接受西蒙的观点，但倾向于抵制卡内曼的观点。尽管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人类是有缺陷的这一观点，但他们很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缺陷的机器——我们不大善于判断什么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按照理性原则管理经济，因此他们常常假装政府确实在这样做。经济学家还倾向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他们会把任何经济体中常见的元素，如罢工、腐败和关税，描述为失常。理性选择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被强行套用这个模型（即便是明显的异常现象或“异样的”案例），以致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为之，但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丹·阿里利（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2008）就是一本认同这种做法的畅销书。但正如约翰·凯（John Kay）所说，如果人们真的是“可预测地”非理性，那么或许他们就并非真正的非理性。或许这个世界没有错，而是我们对理性的理解有误。当然，我们努力保持理性——我们受制于理智，但我们真的没有那么聪明。正因如此，我们的“理性”选择常常让我们损失惨重。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卡内曼被授予诺贝尔奖。然而，人们也很容易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忽视卡内曼的观点：你不可能把非理性纳入经济学计算机模型中。

理性的问题不仅局限于经济学。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止动机和时机那么简单。思想体系并非全球通用，文化也很重要。如詹姆斯所主张的，理性带有个人印记。理性行为体模型对于描述个人来说无能为力——换言之，理性行为体模型很难理解人类行为背后常常有高度个性化甚至另类的原因；描述人类是一项过于复杂的工作。例如，当分析政治抗议时，政治学家常常忽视民众的热情，或者对运动领袖的态度，或者作为抗议者对个人能力不足的感受，甚至还有参加某项超越个体自我的活动的愿望。这也适用于战争，战争的爆发常常是因为决策者陷入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倾向于偏爱支持某个观点或假设的信息）的陷阱。在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合著的《社会思想中的战争》（War in Social Thought，2012）一书中，两位作者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这样的社会学家提出批评，认为此二人把模型根植于理性行为，而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批评的理由还包括蒂利和曼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的社会进程，并且在历史已经证明的情况下仍不接受人们会为了战争而挑起战争这一事实。

用詹姆斯的话说，理性选择无法“测量现实的厚度”。经济学模型不适合描述人类的实际行为。人们最珍视的东西常常是他们不愿与他人交换的东西，像名声这样无法定价的东西。与1914年的世界不同，如今我们有可能在计算机模型中“测量现实”。但即便是抛开理性，单纯地考虑逻辑，人们仍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款无差错的计算机程序。原则上，一款计算机程序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不受日常现实浸染的“纯洁的思想”。然而，实际上错误会不停地出现，它们不可避免。

行为模型可能导致懈怠，因为它们诱导我们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件事，或者说适合我们的东西也一定适合别人。詹姆斯认为，人们作出的很多决定都源于信念，而不是论证。个体的看法是“被采

纳的信念”，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可能经常把它们曲解为“合逻辑的”。文化上的偏好，尤其是“相信的意愿”，或者拼一拼运气，例如詹姆斯的大胆一跳，都因一种自我感知而大大加强。如果理性带有个人印记，那么它很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感觉历史对其亏欠得更多些。对国家例外主义的信仰甚至可能鼓励冒险。安杰尔同时代的人还持有一种有关理性选择的前理论的说法，但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对现实的所有描述只不过是“满怀热情地肯定了我们对社会制度能够给我们提供支持的期望”。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安杰尔提出的论点对他自己来说是正确的，而作为一名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人，这种论点对他来说就加倍正确。

这并不是说关于战争为何在1914年爆发的实质性解释不准确，这些解释包括一种至今仍然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一战爆发是政治失误、杞人忧天、重大误判和非理性动机等若干行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模型仍然在人们理解战争时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但为所有这些解释奠定基础的其实是非理性本身：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的世界观。关注理性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行为，相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为。

结　论

类比是矛盾且危险的工具。历史学家常常引用英国主教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名言：“万物皆有特异之处，不可与他物混同。”历史是独特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律的，但它同时也遵循某些规律。如果历史完全没有规律，那么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杰克·贝蒂写道：“历史发展有时是意外的巧合导致的结果……特定领袖人物与特定环境的结合以及特定事件与其他事件的结合永远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作类比时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例外

的事件与大的模式同样重要。

其次，历史永远是在事后书写。历史的本质是后见之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教训的理解来绘制未来的地图，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也不见得比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准确多少，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我们需要询问作者来自哪里。他是否择优挑选？或者换一种比喻，留在剪辑室里的部分是不是比最终出现在影片中的部分更重要？为什么他一开始就选择1914年这个例子而不是其他例子？即便是客观公正的专家也往往会受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可得性启发法”的干扰：我们倾向于根据举例的难易程度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常是近在眼前和信手拈来的）。往最好的方向说，这种思考是懒惰的；往坏了说，这是学术欺诈。变奏曲常常和主旋律同样重要；噪音常常比信号更重要；我们有时应该更关注一个趋势中的可变性，而不是趋势本身。你可能预计会发生战争，但结果可能是和平。

从1914年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这样一个事实，列强中没有一个真正想要战争，但有一些大国为抓住机会作好了充分准备。它们未能控制住局势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相信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之死引起的夏季危机最终会点燃整个欧洲。因此，真正的解释是一种奇怪的乐观精神诱使欧洲政治精英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无论发生什么，和平都会永驻，而这种奇怪的乐观精神在德国人身上最明显，他们愿意不惜一切地发动一场他们终将取胜的战争。

就德国而言，所有常见的解释都有其意义——海军军备竞赛、该国的战略自闭症、军队的独立性以及民主问责机制的缺失。不过，尽管这些解释很重要，但它们全是次要的。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检验其中一些因素，试图探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之是否有相似之处。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中国可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与德意志帝国

和大英帝国不同，中国可能只寻求“对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进行渐进式的修正”，但这会使我们感到心安吗？

我们今天对自己所说的话与政治家们在1913年的自言自语并无差别。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观点，即全球化使战争不可想象的程度超过了1914年。各国市场进一步相互关联，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机制，还是作为改变国际现状的途径，都只会适得其反”。但这种说法可信是因为你选择相信它。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经济学家主张一致性是理性的本质，从数学角度看，利益最大化和作选择时的一致性应该被视为一回事。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人们希望使财富最大化，并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开战的决定与人类这些基本欲望是不一致的。但一致性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约翰·凯（John　Kay）写道，“每晚都在花园深处与仙女交谈体现了一致性，但这很难说是理性的。然而，如果说有一致性而无理性是可能的话，那么有理性而无一致性也同样可能。有时人们寻求得到一些并不一定相互兼容的东西——例如既想受人尊重，又想家财万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们就有可能要求别人给予尊重，即便这会对其财富状况构成威胁。德国要求获得尊重，这部分地导致了该国的外交孤立。”我们可能看到，中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如此，谢韬[4]（《与龙共存》的作者之一）认为，中国正处于即将和美国相撞的轨道上，因为中国正在追求两个互不兼容的目标。“如果你尊重我，那么你就不会挑战我；如果你挑战我，那么你显然不尊重我。”中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无法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各让一步才能赢得尊重。

凯的主张是不一致性也可以是相当理性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他引用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好

吧，我的确自相矛盾，/我博大之极，我包容万物。”不可能将一个国家锁定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中。正如詹姆斯所理解的，世界过于错综复杂，一致性不可能永久存在。整体看，各国的确更希望得到和平、创造财富，而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也是有情感的生物，尽管经济学模型重要，但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类之间的互动。

人们普遍对爆发另一场大国战争不以为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看重理性选择模型，并认定人们一贯理性行事。安纳托·利芬（Anatol Lieven）和约翰·赫尔斯曼（John Hulsman）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是应该对中国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还是只用大棒。他们声称答案很简单。美国不应该寻求使中国民主化，而是应该像小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5]在2005年时提出的那样，使其成为现有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可以“适应国际社会”，而且理智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遏制。中国并非一个全球性大国，目前还不是。它有自己的全球利益，但这不能被当作全球责任。的确，中国不愿分担这些责任，这一点日益成为美中关系的刺激因素。利芬和赫尔斯曼坚持认为，理智肯定会使中国相信，它不可能取代美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理智还应该决定应该依靠日本和越南来反对中国的这个企图。然而，至于美国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能“管理”好朝鲜，就像欧洲人在1913年是否相信德国人能管理好奥匈帝国，或者俄国能否管理好塞尔维亚一样，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利芬和赫尔斯曼坚信，“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两国爆发冲突可能带给任何一方的好处都无法弥补这种冲突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这样一场冲突很可能破坏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或许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并且还将浇灭中国崛起为伟大强国的希望。但他们对各国通过推理得知各自最大利益的能力过于乐观。他们自己也指出，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过度就是明显的失败。中国在推算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

诺厄·费尔德曼在《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Cool War：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2013）一书中也提出世界大战不再可能爆发的观点。他认为，美中两国都有太多害怕失去的东西。战争会直接摧毁两国的经济，对中国来说还会危及国内稳定。开战“完全是非理性的”。但仅仅因为某事是非理性的，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历史上不乏睿智的政府怀恶心行善事的例子，而当它们受到焦虑和恶魔的驱使时，则会怀恶心行恶事。人们很少怀善心行善事。能够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多得很（台湾就是一个），而无论两国的领导人多么思想开明，两国要想展开合作都将会面临很多的实际障碍。

费尔德曼至少在一点上很可能是正确的：他暗示美国例外主义可能是个麻烦。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美国政府还希望这个政权全盘崩溃。在中国领导层看来，与这样的一个政府进行政策磋商定会让人懊恼。正如费尔德曼所评论的，就相互信任和尊重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起点。但美国不大可能在近期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如果双方都不能从对方获得信任和尊重，那么两国就会处于相撞的轨道上。

李光耀曾在2013年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见解令人欣慰，且不容轻易否定，但战争并不总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引发战争的是意外、灾祸、计算失误以及像民族主义这样的激情。因此战争是不可预测的。的确，理智常常与战争毫无关系。

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却永远学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严刑拷打被加强型审讯取代，奴隶制被色情人口贩卖取代。战争也没有终结：它从我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但它仍在潜伏，等待着被‘祖先的声音’[6] 唤醒。”当我们援引进步这种观念时，我们是在将两个不同的传说混淆在一起：苏格拉底有关理智的传说和基督教有关救赎的传说。格雷写道：“如果结

论中的各种观点不一致，那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相信人类随着知识的增长会不断进步，但文明进步带来知识增长的观念实为一种信仰。他在论述的末尾提出了一个让人沮丧但基本上无法辩驳的结论：尽管人类的知识可以不断增长，但人类的理性却原地踏步。这也意味着，即便我们能正确“解读”某个历史类比，我们也未必一定能够受益匪浅。

当日本和中国在2012—2013年再次陷入外交争端时，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宣称，中国处在“拐点”上，可能迎来重大转变。之前十年辉煌的经济增长使中国越来越过度自信，与此同时它对自己的外交局面开始感到不满。中国一位学者在评价拜登的言论时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就不得不调整现有的体制，中国社会将不得不更加开放。他说，除此之外的另一种结果不会令人满意：中国可能希望重新制定国际体系的制度。这是一个严肃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1 后续版本皆弃用原书名，而改用如今广为人知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译注

2 实际上安杰尔是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朗厄为19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3 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1984年出版的《反动的现代主义——魏玛和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首次提出“反动的现代主义”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与进步，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和国家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体现。——译注

4　谢韬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其与美国学者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合著的作品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编注

5　指美国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编注

6　语出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创作于1797年的著名诗篇《忽必烈汗》，诗云“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地听到/祖先的声音在预言战争”。——译注

第2章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和大国冲突的逻辑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中华民国陪都重庆遭遇空袭时，美国作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一个防空洞中避难。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位中国官员的对话。尽管中国与美国结盟，对抗同一个敌人，但这两位官员讨论的并不是中日战争，而是未来的中美战争。他们把美国视为一个远比日本可怕的威胁，因为美国企图将一个远比它自己古老的世界美国化。

事实上，美国的崛起及其在全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亚洲民族主义在大众意识中描绘了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它还使亚洲社会重新发现了它们相互之间有何不同。正是在这方面，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它们的社会何以具有印度特色或中国特色。

尽管如拉铁摩尔所听到的，中国人心怀疑虑，并且此后中国明显兴起一股民族主义浪潮，但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是有亏欠的。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劝说他与日本达成协

议。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纳粹德国，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放手不管要明智得多，因为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卷入与日本的新冲突之前全力对抗第三帝国。这种建议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罗斯福拒绝放弃中国。在美国，当地教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作为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其《一个世界》（One World，1943）一书中对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辩护。美国人是当时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试图打破大英帝国、纳粹的欧洲要塞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等各种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寻求创建一个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它还期望中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根据二战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具有民主可塑性”。中国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反之亦然（尽管事实上根据一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调查，多达60%的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

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如果朱塞佩·赞加拉（Giuseppe Zangara）在1933年2月13日 [1] 成功刺杀罗斯福，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主义者、对国际主义毫无热情的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成为未来8年的美国总统，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将变得完全不同。美国会与日本达成协议，用中国的命运换取自身利益吗？毕竟与日本开战是迟早的事。当今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是由国家利益推动的，但它们也是由各国对未来的不同看法引燃的，后者在当今时代尤其正确。

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人们在研究历史和大国冲突背后的因素时，极少关注那些没能发生的战争。英国在1877年至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险些与俄国开战，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又险些与法国开战。在1870年之后英国没能与俄国或法国开战的最重要原因是就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协议——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称之为“交通规则”——相对而言，德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威胁要大得多。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对这些规

则的重视程度基本上决定了它是否会为了捍卫这些规则而开战；我还将展示崛起大国之所以愿意考虑发动战争，究竟是因为它怀疑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能否继续贯彻这些规则，还是它希望修改这些规则以追求自身利益。这也是大国冲突逻辑的一部分。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

1914年的大国冲突有一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这些变奏曲就包括势力均衡（其实质是法德争夺欧洲霸权）。但真正的冲突——用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术语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发生在英德之间。利斯卡将“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定义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企图改变国际体系时引发的冲突。

1914年的国际体系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取胜的部分结果。尽管自那时至1914年之间，英国的实力已开始衰落，在工业产值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赶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英国在金融服务、银行业和保险业领域遥遥领先其竞争对手。英国继续管理全球金融体系，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代。尽管全球大部分地方可能都已爆发革命，但英国的实力绝非仅仅仰仗其帝国疆土之广。在1914年之前这个世界的很多甚至大多数特征都源自英国，从蒸汽动力到追求进步和信奉进化理论，皆是如此。除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外，欧洲所有国家都采用了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选定的铁路轨距。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火车靠左侧行驶（至今如此），因为事实上铺设铁轨的是英国的工程师。英国人发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英语被确立为国际贸易的语言。英国还在传播自由主义观念——包括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所有大国最终都选择赋予其公民或臣民以选举权（俄国是唯一的例外，它

将成为20世纪唯一经历革命的大国，那将是它为自己的误判所付出的代价）。

尽管英美思想继续支撑着当今的国际秩序，但这套体系本身并非从未受到指摘。例如，将自由主义思想扩展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美国人称之为“自由干涉主义”）的做法一直以来并未得到热烈的响应。如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说，一旦我们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视野，那么一切就都能对接上了。经济自由主义（开放的市场）、民主化（开放的思想）和国家建设（开放的政府）看起来如此交织，以至于它们无法相互分离。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20世纪30年代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自由是“自由贸易的哲学附件”。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的第一块试验田。在伦敦，反对派指责自由党政府为自由贸易原则而非狭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将英国拖入战争，自由党政府则反驳称，自由贸易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有助于该国融入国际社会。当战争爆发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名特约记者写道，“他见证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原则，‘炽热钢铁的鼓吹者’如今是自由派而非保守派，这些鼓吹者预见了美国人后来所说的‘新世界秩序’。”这名记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第一次冷战（1871—1914）

1871年至1989年这段历史时期包含多个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当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带领美国参战时，他认为此战是为了反对一种观念，即“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德国本身。英国作家也持有这种看法，包括H·G·韦尔斯，他将这场战争视为

一项“卫生工程”。自由民主主义者20年后会发现他们又将与一种原则展开斗争，即法西斯主义，若干年后又会在冷战中与苏联共产主义交锋。实际上，欧洲自由主义大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最早爆发冷战的时间远远早于1914年。然而，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和苏联之间爆发的那场冷战不同，这场冷战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在1914年之前，马克斯·韦伯视英德战争为一场酝酿中的冷战，用两位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话说，这是一场“干燥的”或者“潜伏的”战争。这场冲突的根源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追溯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法国人看来，法国的战败表明德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法国存在根本差异。用路易·迪蒙（Louis Dumont）的话说，这“让法国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即人权并非政治的全部”。德国对人性的追求与法国并不一样。

这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是上文讨论的规范性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只是为实质性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背景。就英国来说，战争是若干更加直接的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殖民地冲突以及德国将击败法国甚至俄国从而称霸欧洲的前景。但英国之所以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担心由德国来操控和平将意味着什么，一种前景可能是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不再坚持欧洲外交体系的“自由”原则。

法国人怀有同样的忧虑。德国自由主义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1917年在苏黎世流亡时通过对比两份19世纪的政治宣言，对德国与法国针锋相对的世界观作了解释：

> 我最近比较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48年的《德国人民基本权利》（它们分别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兰克福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二者有惊人的差异：
>
> 1. 《人权宣言》包含（有关人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 《基本权利》绝无此类内容。
>
> 2. 《人权宣言》在普遍意义上确立了人民主权高于国家主权，只赋予国家监管宪法的消极权利。《基本权利》则不然，它没有在原则上设定国家应受何限制，甚至没有设定国家对国民的依赖程度。
>
> 3. 法国制宪会议规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安全、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有权反抗所有这些权利受到的压制）。宪法既由所有人担保，也由每一个个人担保。宪法使用“人类”一词（暗示包含下层阶级），所言之事皆针对“人类”。然而，《基本权利》只提及公民和臣民的权利，而没有提及“人”的权利。
>
> 4. ……要概括《基本权利》的特点，必须……
>
> 5. 不能忘记它制定于法国大革命的半个世纪之后，拥有这一时期的全部经验和德国古典主义的全部成果。尽管如此，在《基本权利》中找不到任何德国人性和德国哲学的踪迹。

之所以详细地引用这段论述，是因为它抓住了德国对英法两国代表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的挑战的本质：尽管英国在创建当代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法国也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留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那就是人权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人权都不是德国世界观的核心。与其说德国是世界主义国家，不如说它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强调社会基本单位的效忠胜于一切。根据德国的主流世界观，一国之民从社群中获取价值，通过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获取生命意义。德国的主流观念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社会属性且根植于文化。借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18）中的句子，“（一个德国人）如果将其忠诚献

给……被欧洲各国称为自由的东西……无异于要求他摧残自己的本性”。德国对于它希望用什么来取代现有国际秩序并没有具体的看法。德国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大国，是一个捣乱分子。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研究中发现，欧洲主要大国在一战前夕秉持的规范性行为准则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埃利亚斯说，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Henri Bergson）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最清晰的阐述。贝格松坚持认为，法国人在战争期间试图维护支配这个体系的规则，因为它们反映出法国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在提到道德准则时，贝格松问道：“这些准则是针对什么提出的：是对人类整体，还是对某人出生的国家？”“不强调这种区别的道德哲学就难以窥见真谛……当我们主张尊重他人生命和财产的义务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时，我们指的是什么社会？”贝格松认同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的观点。在后者看来，你出生在法国就意味着你是世界公民，人权就是你的立身之本。

然而，在任何战争过程中，社会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置于“人性”的需求之上。的确如此，埃利亚斯还说，各个国家和社会的日益民主化导致了相应的世界观民族化和民主主义情绪，社会的道德需求几乎成为在大众感受和情感中根深蒂固的、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紧急事项。正如埃利亚斯所说，规范并不总是善意和包容的。尽管规范可以让人们团结一致，但同样的过程还可以常常鼓励人们一致反对其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哪些国家已经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哪些国家还没有，答案很快就大白于天下。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德国的政策——这真的是政策——是抓捕大批人质并将他们成批屠杀，以此回应敌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很大程度上甚至从根本上就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政策就规模而论在西欧无出其右者。”德国对英军战俘的处置就足以说明问题。死于囚禁的英军战俘的官方数字仅略高于1.1万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被报告为失踪的战俘因充当奴隶劳工而累死。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英军战场死亡率为

4%。在英军战俘中，这一数字则为5.2%。德国处置战俘的政策被普遍视为以“战事所需”为名违反规范、置制度于不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至于英国人为什么能够在战争期间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埃利亚斯的理解就没有那么透彻了。他试图借用英国的“实用主义”和著名的“妥协精神”来解释。尽管这两种观念都不是英国所特有的，但它们都反映了英国的历史经验。如詹姆斯所说，真实性确实带有个体的印记。由于受到“木墙”[2]——如今是“无畏”级战列舰——的保护而免遭侵略，英国人具备道德说教的条件。公众期待英国的外交政策能够与他们和英国精英阶层在国内共同宣扬的那些原则保持一致。然而，英国人也可能是反自由的。例如，战争期间德国境内有75万人死于饥饿，其中很多人都是英国为确保德国将商船队交给协约国而实施封锁的受害者。封锁直到1919年夏天才结束，而几个月之前德国就已经投降了。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在继续实施封锁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的苦难大于停战之前。

然而，尽管英国并非矢志不渝地践行所谓的英国世界观，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对政治生活的渗透，以及中产阶级在制定英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发挥的更加积极的政治作用，都使英国有条件宣扬一种普世的道德观，使其“赢得叙事”。对于1915年之后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来说更是如此。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想象中的法国和英国的位置被美国取代。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认为，这套秩序本是由英国苦心经营的，而美国被拉进这套秩序之后，逐渐将保护这套秩序不受他国挑战视为自身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曾宣称，德意志帝国有一个英格兰的内核（或者说自由主义第五纵队），这个内核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毒害。1945年2月，在希特勒帝国的废墟之上从事写作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认为，德国拯救自己灵魂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这个

（如今是受美国人启发的）自由主义内核在未来的秩序中发出声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通过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来融入当代世界体系。到1960年，德国人就这样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从而限制了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选择，包括对其他自由主义大国发动战争的选择。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在勃兰登堡门重申了美国的价值观。他援引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是因人性而固有的权利”。奥巴马试图在演讲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796年康德说出这句话的多年以前，美国人就已经把这些内容写进了《独立宣言》。奥巴马在柏林对听众说：“我们不仅仅是美国公民或德国公民，我们还是世界公民。”

汉学家或许很难在1871—1945年期间反自由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之间找到共同点，而是更容易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另一场“冷战式的”对抗。只有当这个世界的结构过于僵硬、泥古不化时，“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才会起作用。如果世界的结构并非如此，那它就不会起作用。我们的叙述能够压倒一切判断力：我们可能被这种叙述背后的操控力蒙骗。叙事源于冲突的环境，与具体讨论哪个国家没有关系。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不过，美国是不是仍然致力于执行这些规则呢？在后苏联时代伊始，似乎国际秩序将越来越民主化。用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世界似乎已成为“一个轴辐系统”，任何事情都取决于美国。由于这种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已经消失，世界看起来已大不相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世界进

入了“后美国”时代，如果美国选择放弃作为“必不可少的”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出现“管理缺口”。最近一篇有关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当前所走的道路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它失去了“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即将把它的战略优势让与中国。

另一种解读当前美国政策的方法——这种方法似乎会被美国的“亚洲支点”战略证实——涉及区分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一位作家所说的“民主全球主义”——这是一项重塑外部环境以使其更易于接受民主价值观的规划。另一种观念是维护并在必要情况下强制执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是一个更为适度的目标。美国仍然认为后者符合全球公共利益。“亚洲支点”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持五角大楼所说的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通过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这些规则。

美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可以归功于它采取了需求模式，而非供给模式，这与19世纪的英国可谓异曲同工。当美国寻求维护这套体系，或者选择强制执行这些规则时，美国的政策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当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或者当它提供没有任何需求的服务时，结果就可想而知：美国很快就失去了国际合法性。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美国为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逐出科威特而组建的国际联军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但入侵行动本身却未能赢得安理会明确授权开战的决议。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案例（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和非常规引渡）中，美国拒绝接受外界对其行为的正当批评，结果严重损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正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美国政策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常常伴随着美国“豁免主义”，或者说美国坚决反对用它自己提出的规则束缚自己。当有可能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国际机构成立时，美国学者的反应中就会频频体现出这种“豁免主义”的观念。例如，历史学家穆尔豪斯·米勒（Moorhouse Millar）为

证明美国决定不加入国际联盟是正当之举时曾说：“当然，如果美国要致力于和平事业，那么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自身秉持的原则明确而充分地宣示于天下，而不是用这些原则去换取一种基于功利主义、作为权宜之计的国际安全。”20年后，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失望地说：“如果美国选择从属于联合国，那么它将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推卸给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可能并不理解其首要职责是履行与历史达成的契约。”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声音属于少数派。“美国优先”理论的信徒也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同一类国际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世界，而是因为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种宣称为这个世界代言的机构都是由美国设计的，并且仍然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启迪。

诚然，今日美国的期望值远低于“9·11”事件刚发生后的那段时期。在美国的政策讨论中，重点如今已放在“更高级的自由主义”上，这种观念在奉行自由主义原则与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的“适当考虑其他大国根植于历史的利益和志向”之间寻找平衡。美国外交决策层有充分的自信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并非只有新孤立主义者才知道保持谨慎的重要性。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话说，“在某个行为中，其他人使我们明白他们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对这些要求予以考虑，权利二字不过是这许多要求的抽象名称罢了。”康多莉扎·莱斯（Condoleezaa Rice）2006年曾表达过类似的态度，当时她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努力使世界从根本上更加安全。不完美，但会比原来好一些。”

这种理解内在地含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相信历史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内在地包含谨慎思维一样。美国在冷战中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相信自己与历史保持统一步调。我们的祖先曾说，“上帝最了解他自己”，同理，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常说“历史最了解它自己”。笔者出生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大约20年后，笔

者完成第一学位的学习时北越军队成功夺取西贡。当时，美国的命运似乎并不受历史眷顾。然而，那些给自己讲述这些故事的国家即便刚刚经历了战场上的失败，通常仍有足够的自信坚持到底。然而，自信也可能让一国高估自己的实力，“9·11”事件之后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保守派评论家曾说，当时的美国以“一种顽固到底、不容和解的态度展示自己的意志”。

今天的美国不再像过去那般坚定自信，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崛起致使很多美国人怀疑美国是否仍然引领着历史的潮流。如果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那么中国对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表现出的毫无兴趣能让美国公民和决策者感到些许宽慰吗？

在《面对与隐藏》（Confront and Conceal，2013）一书中，戴维·桑格（David Sanger）写道，“美国对世界而言仍然具有吸引力，这部分源于它所彰显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仍然表明它信奉自由主义原则。”这是典型的美国说法，但并不清楚它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如果它曾经是的话。中国是否像桑格所说的那样，将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抑制自己获取更大权力和财富的雄心，这个问题有待商榷。的确，中国频频批评这套体系缺乏“公正”和“和谐”，甚至还对将“儒家”规范引入国际政治生活表现出热情。一旦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采取针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政策，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某些特征将再次呈现。1902年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思想取得“世界霸权”，当战争最终爆发时，大批德国学者将之阐述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必将以“1914年的德国思想”战胜“1789年的西方思想”结束。尽管德意志帝国自己似乎并不知道它希望用什么来替代英国管理的这套国际体系，但很多德国人是知道的。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是这种情况，政府似乎支持这套体系，但很多知识分子则希望看到某种儒家“改革”。未来可能会发生一场类似的思想冲突，对历史优势的再一次争夺。就目前而言，世界仍然大体上对美国领导的这套国际体系感

到满意。例如，在《经济学人》发布的调查中，人口数量排在前150位的国家中只有26个被视为反对或对抗美国。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支持，而这种支持很可能会持续。但有必要指出，中国是这26个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

美国在衰落吗？

> 请放心，我年轻的朋友，一个国家可以毁掉的东西有很多。
>
> ——亚当·斯密

1990年9月11日，也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遭到袭击的11年前，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Bush）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平之路如此难觅，人类求之百世而不得，却经历千战之苦。今日，这一新世界即将破土而出。”

“基地”组织发动袭击之后，没人再向美国人许诺新世界秩序的来临。美国只是努力加固旧秩序，而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然而，在2008—2009年金融崩溃之后，很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在衰落，而外界认为他们看到了症状——一种丧亲之痛。对悲痛的正常回应首先要么是震惊，要么是拒绝接受。在这个伤心欲绝的阶段，伤心之人会有一种逝者健在的感觉，即便是在梦境中。下一个阶段是对失去亲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将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去寻找应该怪罪的人或者机构——就美国而言，这是指银行或新保守主义者，或者小布什，或者干脆是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在愤怒或沮丧阶段，悲痛被固定下来。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之人才会逐渐接受痛苦的现实。美国正在经历这些吗？美国人甘

心接受（或者无法接受）他们自己的“衰落”吗？

如果美国确实在衰落，那么它在维护国际体系的规则时就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很多人一直主张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衰落了，当时美国世纪似乎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逐渐走向终结。一位作家说，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落下帷幕的过程比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更快，而另一位作家则总结说，越南战争意味着美国“长大成人”，应该学会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普通”国家的现实。

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辩与当年没什么差别。例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书《美国，醒醒！》（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2012）让读者可以一窥该书副标题所说的“没落时代”。这本书为此详细描述了中产阶级被“挖空”、初级和中级教育的退步、创新领导者地位的丢失、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以及金钱对政治的腐蚀等多种问题。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松散》（The Unwinding，2013）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书将2008年的大衰退视为经济和道德双重衰退的标志：

> 堕落的盗贼统治正迅速衰败，两党都在为此出力——美国民众一边用食品券换取加工过的毒药为食，一边却在刷卡消费；低技能工人在就业结构上不再有任何价值，但他们过于愚蠢，并不知道那些过时的工作不会再有；纽约的银行正在榨干这个国家的最后几滴血，公司则不受任何国家利益的观念束缚，物权法体系一片混乱，全世界被债务淹没。

帕克善于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他的《松散》一书在分析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方面进行了诚恳而有趣的尝试。但此书传达的信息并非让人全无希望。“每一两代人都会遇到一次松散……每一次衰落都会带来复兴，每一次内向崩溃都会释放能量，每一次松散之后都会迎

来新的凝聚。”

对这种观点的宣传者来说，肯定有很多证据表明美国确实在衰落。美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善于创新。实际上，美国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要回溯至1940年之后美国工业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的时代，而中国正在迅速赶上。由美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的比重从1993—2003年的26%降至2004—2008年的21%。中国在已发表文章数量和同行评审科学期刊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

然而，经济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并非一回事，而这正是1870年以后英国的衰落与今天美国的衰落之间最大的不同。经济变化并不一定导致霸权易主。亚洲世纪并非已经到来，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创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大约14%。美国只有全世界6%的人口，但创造了全球20%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并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中国人的6倍。换言之，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有生产力，而当中国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这一点很可能不会改变。中国似乎无法继续像过去那样实现10%的增长率。中国也有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既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技能、善于创新的先进经济体竞争）。自1960年以来，只有13个国家成功避开了这个陷阱。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迅速失去优势，但由于落后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流失，中国尚未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美元或1.5万美元时，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就会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以之前的速度前进，那么它将在2015年或2018年抵达减速带。

还有必要考量一下美国的一些无形优势，其中很多源于作为建国基础的原则。尽管美国已经出现了社会不公和社会信任度下滑的严重迹象，但这个国家的社会架构与中国大不相同。这虽不能使美国显得例外，但确实使中国显得与众不同。两国在其他领域也相差悬殊。例

如，中国没有进入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的前列，而腐败问题是新兴市场在规模、平等性和深度等方面排名远远落后于发达市场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私人投资资金仍然源自西方世界（80万亿美元的养老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中的70%都源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尽管经历了全球衰退，但西方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仍优于“金砖国家”。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公司的股票上涨了6%，而新兴市场公司的股票却下跌了10%。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在规范性制度方面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法制、产权和反腐败法律。

美国还极其幸运，因为它还将从3D打印革命和页岩革命等新的技术发展中获益。经济学家常常提到“现时偏见”，或者说相对于既定的行为模式或者更长期的系统性趋势，人们倾向于夸大新进展或技术进步的影响。然而，事实可能会证明页岩革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开发页岩资源的条件好于其他任何国家，它在管理上面临的障碍要少得多。建设页岩气井的成本低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另外两个页岩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发布的报告。页岩油繁荣：美国的奇迹。强调了页岩革命的重要性。报告指出，美国石油产量已经大幅增加，而此前30年则是一路下滑。1995年，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巴肯油田蕴藏1.51亿桶可采石油。2008年，这一数字被上调至近40亿桶，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未来这个数字很可能会被继续上调。换句话说，我们仍有理由论证美国在物质层面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的确如此，页岩革命可能使人们对美国实力的物质基础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

因此，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言之尚早。还应指出，由于美国的基本劳动力正变得更廉价、更有生产力且更加灵活，美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包括计算机、发动机零部件、塑料和橡胶在内的一些产品领域，已接近制造商将生产活动迁回美国的拐点。

然而，很多美国人仍然对未来感到极度忧虑。这一点无人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更有先见之明。他说，属于美国的历史时刻不会以经济崩溃而终，不会以战争失败而亡，最有可能以能量耗竭而止。美国若果真衰落，必因其“志趣平庸”，其实力只会因“缺乏鸿鹄之志”而渐衰。雄心不再，激情难燃。社会无所追求。有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霸业不会以功成名就而收场，而是随着不可逆转的缓慢衰退，与梦想渐行渐远。

预言，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道德衰落的预言，极少变为现实。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写道，“成为未来主义者的最好方法就是等到明天，那时明天因成为今天而即刻被人忽视。”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写道，“尽管美国仍然有其例外之处，但它已不再是‘从建国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那个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欢乐、惊奇和迷茫的独一无二的异类’。”但美国很可能长期保持弹性。托克维尔将美国的民主视为一种政治信仰，这不单单指信仰民主本身的价值，还包括信仰更宏大的美国工程。他认为，权力不只是对物质情况的生硬测量。它还包括观念、志向和国家的视野。只有当美国不再信仰那些仍使其在他国眼中成为例外的因素时，美国才会失去领导世界的雄心。

存在性焦虑？

在西方世界，例外主义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当时希腊诗人福西尼德（Phocylides）写道：“一个希腊城邦胜过华而不实的尼尼微[3]。”柯勒律治也对中国历史发表过差不多的评论：欧洲一世纪胜过“中国一甲子”[4]。中国人历史上曾倾向于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首先自诩为“中央王国”——例外主义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特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我们都希望别人

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权力越大对别人要求的尊重就越多。

不过，说例外主义是一种虚构之物并不意味着它不正确，而是说它是人为设计或制造的。例外主义这种思想是编造出来的，像所有编造的说法一样，只有当它符合现实，或者符合人们普遍视为真实的情况时，它才有说服力。事物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表现方式基本决定了我们倾向于如何看待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虚构之说会逐渐失去说服力。

当然，只要我们坚持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国家层面的虚构就是必要的。即便它们是幻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幻觉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幻觉。弗洛伊德说，幻觉不同于错误，前提是它没有变成妄想，妄想过于荒谬，没有人会相信。

美国“例外主义”思想如今已失去了大部分光彩，这从一些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威廉·普法夫（Wiliam Pfaff）的《天定命运的反讽》（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2010）和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的《权力的界限：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2008）。按照巴切维奇的说法，例外主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避难所，这些人试图否认世界的真实状态。在这种思想的背后是一种愤怒，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已越来越明显，具体迹象包括收入停止增长或者不断下降、债台高筑以及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不断出现。一边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基本上一致认为应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另一边是可以实现这种抱负的手段。二者之间正出现一个巨大的鸿沟，这导致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处于特殊位置的信仰似乎日益难以维系。巴切维奇在重读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作品时，发现了这段写于1937年的话：

> 人类历史最可悲的一面在于，每一个文明都以最自命不凡的态度表达自己，都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将自己偏狭的价值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且在走向灭亡的衰败进程开启的那一刻宣称自己将万古长存。

21世纪各国的相互依存使人更难相信某一个国家是例外的，包括中国。当一国面临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都需要联合行动时，你就很难把这个国家视为例外。如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言，例外主义的极端形式是一国没有盟友，也毫无影响力，对于执行某套行动方案会面临哪些风险也一无所知。唯一能够长期存在的例外主义形式必以根植于虚构叙事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在这方面，美国可能仍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国家”。对美国的盟友来说，这一点或许最为重要。

虚构叙事使行为体能够编织有关它们是谁以及它们会如何演变的故事。这就是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美国本身就是观念的产物，并且在很多方面美国仍然是最后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当然在不断增强，但中国政策的最终目的和抱负远不如美国的清晰。只要美国坚信一种国家神话，它就仍将在集体想象中“占支配地位”。神话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今相信这个国家拥有“天定命运”的人已经找不到了，认为它是“自由的灯塔”的人也少于过去。但诸多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在很多人听来依然真切——美国是“山巅之城”。提到国家神话并非指责它子虚乌有，这只是意味着它被赋予象征意义，这种性质与它的实际情况或者人们对它的描述无关。正是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构成了现实。“现实”是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而我们所选择的想象结果常常是我们内心希望成为真实的东西。

美国的“现实”与小布什在2002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尊严提出的不可辩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论及尊严时，小布什是

在引入另一种虚构的现实，因为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尊严的重要性。我们总是先讲述一个故事，然后从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种意义，并将这种意义赋予历史：碰巧的是，美国人讲述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故事。这就是美国“信条”的核心——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最早推广了美国“信条”一说。米达尔写道，“尽管美国具有种族、宗教、伦理和地区多样性，但美国人持有同一种‘社会信仰和政治信条’。”不同的学者给信条下了不同的定义。米达尔自己称之为“人类个体的基本尊严”。

尊严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因为唯有人类坚持让其他人拥有尊严和自由——自由是能够实现尊严的条件。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只能在我们自己的人性中找到价值的来源。认为一国历史“有意义”等于能够把万事万物看成受目的论限制的对象，或者即便这不是人类的目标，也至少是人类的命运，它要么已经在历史中实现，要么必须在未来实现。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写：

> 每当我面对人类尊严受辱而高声反对的时候，每当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源自人类尊严的理由的时候，我都是在证明，我知道实现自我之人是何样之人，或者人性会提出何等要求。

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知道人类尊严应该提出哪些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才能是“不可辩驳的”，并且我们只能假定我们知道——不是通过分析那些历史记载，而是回到帮助我们为历史设定秩序、赋予历史形态和意义的传说上。毕竟，只有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来恢复生命。

记者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在参观埃利斯岛时曾有过这种感慨。埃利斯岛是纽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关闭期间，这里曾是一波又一波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通

道。如今它是一座博物馆。阿代尔在岛上的走廊里闲逛时，无意间为墙上的照片所震撼。在这些照片中，满脸困惑的中欧移民像牲口一样被集中成群；还有同样迷茫的儿童，他们的衣领上缝着随意分配的名签；匆忙打包的、中产阶级使用的手提箱与用绳子扎好的、已经磨损的纸箱堆积在一起。他略感不安地意识到，他曾经见过这一幕。然后他想起来他确实见过：他曾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看到过这一幕。“埃利斯岛是一个良性的奥斯维辛，一个倒转的大屠杀，一个积极的‘最终解决方案’。”问题是，一个因移民而改观的美国在例外程度上会不会不及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它在向世界其他地方发表意见时自信心会不会不及从前？

诚然，移民会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挑战，但它也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之源。由于出生率更高，移民可以确保美国生育率保持在2.0以上。根据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数据，美国人口到2050年将增加1亿人，从而确保该国不但将继续繁荣发展，还将走在债务曲线的前面，这一点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做到的。美国将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后工业经济体，而同时中国将步入最年迈国家之列。生育率预示着美国的文化生活将恢复活力，美国这个品牌将得到振兴。

查尔斯·默里在其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已经落在了其开国元勋的后面，这些开国元勋的伟大成就在于将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执政信条。没有哪个政府像随后两个世纪的美国政府那样限制自己的权力，但这项伟大成就不再适用于这个国家——社会契约在瓦解，为社会契约提供基础的社会信任也在崩溃。美国梦已经破灭：美国是特殊的，但不再是例外的。但默里的这种观点没有抓住要领。尽管有各种困难，但美国这块牌子仍在不断更新。迪安·艾奇逊抱怨说：“我们是一个19世纪的民族，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的思想。我们不是20世纪的民族。我们的观念继承自

过去。”20世纪20年代美国曾迎来一位著名的英国游客——作家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他当时已经得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结论。美国的终极考验将在本世纪末来到，届时“以18世纪语言表述的18世纪的理想将无法继续压制那些异端邪说”。

拉美裔美国人已经占到美国青少年的约五分之一。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移民的大量涌入很可能给美国带来巨大变化。借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就职演说中使用的词语，美国的确面临“自我改造”的挑战。克林顿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杜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国家层面的虚构叙事：他只有在这些表述否定生命，而不是肯定生命的时候才提出反对。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有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内在价值就是鼓励人有所作为。真实不是成功的原因，而是坚持某种信仰的结果。换句话说，杜威评判一切信仰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它们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杜威的观点在美国之外颇有影响，尤其是在日本。1919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讲座[5]时曾对校方的主持人说，日本人将不得不重新评价他们的传统，这样才能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他们的自我革新是否成功将取决于他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所有现代社会都会面临这种挑战，如今轮到了美国。1945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制度建设来维护国际体系，但毫无疑问，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美国人不会再尽心竭力地推广和捍卫这套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了。

对美国这块品牌的信仰甚至渗透到对美国现状的批评中——乔治·帕克的声音与英国人爱德华·卢斯的声音截然不同，后者所表达的失败主义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可能有明显的“欧洲”色彩。“美国性情”——借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说法——不只有移民的因素：它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十分典型的美国式活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坚持替全世界追求梦想的态度将会松懈，即便它的敌人

甚至一些盟友似乎这样认为。当然，总会有疲惫之态出现，但不存在任何证据证明美国自身有意放弃“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角色，更不要说允许其他任何国家挑战现有“交通规则”了。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对纠缠于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厌烦。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少管闲事”，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而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反对（这是该项民调自5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赞成美国管好自身事务的人比例最高的一次）。但这项民调还显示，美国人仍然希望捍卫当前国际体系的规范与制度，尤其是商业方面，并且多数美国人认为亚洲是美国的“事务”。的确，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历史很长，并且一直致力于建设亚洲的未来。美国在本质上——并且向来如此——是一个亚洲大国（尽管中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问题在于，中国也处在自我革新的进程中——尽管“中国梦”才提出不久。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相对切实的目标是，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极为远大，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一个十足的发达国家[6]。

不论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将远比今天自信和坚持己见。下一代领导人走向政治成熟的时期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未来民族主义可能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在当代，人类的集体认同尽管是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民族的。在后现代西方社会，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成熟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忠诚相互交叉，它们组成了人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基本结构，但中国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也不会如此，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正在步入民族国家成熟阶段的主要大国。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终点在哪里？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坚持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交

流，每一个社会都有话要说。但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特定的社会究竟想说些什么。社会话语可以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短语——“我是”。然而，这个短语还有很多变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或者“优等民族”，或者“世界头号大国”。在前现代，人类从民族、部落或种族的角度思考。在现代，主要的概念单位变成（并且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不过是动词“是”的最新表达方式。

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只有因具备某种属性而实现其价值时才能用“是”这个动词，例如“我是更强大的人”，或者“我是某种宗教教义的信徒”。我是更强大的人因为我所效忠的群体是强大的，我与众不同因为我崇拜一个与众不同的神。每一个人都能在他们从属的特定群体的实力中获得安全。我们仍然重视安全。

民族主义并非总是危险的，甚至并非总会带来麻烦。国家有时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部利益和狭隘思想，置身于人类整体历史之中，一国的历史既包含与邻国的冲突，也包含与邻国的合作。

鸦片战争和中国的历史权益

> 是啊，尽管时光于我们如此重要，
>
> 但我们却不应打开记忆的匣子。
>
> 那里收藏的每一个瞬间，
>
> 都记载着我们失去的一切……
>
>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一位英国作家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的美国之行

并未达到预期。他本将与一位华裔美国人结婚，女方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但他来到女方家中时，他立刻感觉到不舒服。对方有礼貌地欢迎他，但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热情。空气中隐约飘浮着一丝凉意，这凉意在那个难熬的夜晚似乎不断加重。最终，女方的父亲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与我女儿成婚之前是否愿意道歉？”他问：“为什么道歉？”答案让他吃惊：“为鸦片战争。”

记忆是有弹性的。人们之所以能记住历史，是因为在某一个特殊时点上历史需要向人们传递某些信息。这就是历史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去的事件被重塑，以至于它们被赋予一种事发之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就包括19世纪中国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

欧洲与中国的军事交战（包括最重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瓦解清王朝只起到了部分作用。实际上，清王朝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中国是一个由很多各不相同、常常相互竞争的部分组成的帝国。中国有丰富的民族多样性；确实如此，甚至清王朝都来自异域。企图脱离清朝统治的运动也时有发生，包括1850年至1870年间南方苗族人在湖南和贵州发动的起义，以及1862年至1873年间穆斯林在云南和新疆等地反抗中央政府的起义。反抗清王朝的叛乱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例如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其中很多运动远不止叛乱那么简单：一部分属于独立运动。

用拉金的话说，只关注短期历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用来强化一种具有深度误导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中国并非一直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是羸弱的（19世纪只不过是这些时期中的一个），在较长时期内，统治中国的王朝甚至不属于汉族（例如1271—1368年的元朝和1644—1911年的清朝）。西方进入中国历史后，打破了此前中国政治变革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一种存在已久的假定，即变革源于历史的往复循环。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信念或将被打破。现在，变革的发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线性的，并且只可能因为暴露于外部

世界而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利用中国衰落的机会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获取内河航行权、往来中国内地不受限制，所有这些都是以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相威胁而取得的。到1920年时，通商口岸总计达69个。通商口岸体系在将中国带入单一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随后的历史中，这套体系成为一种将权利、利益和特权相互交织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安排。在这一安排下，外国公民享有独立的税收和司法体系，在中国管辖范围内拥有豁免权。这套体系毫无国际色彩，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包括拥有他们自己的行政服务，例如邮政和海关，他们还有权在北京以及从北京到沿海的铁路沿线要地驻扎军队。

但中国向来过于庞大，难以分割、吞并或者占领，就像同一时期的非洲。显然，欧洲人认识到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它的悠久历史和统一文明让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殖民化成为不可思议之事。然而，这套不平等条约体系日益难以维持，因为中国已慢慢地融入国际体系之中。一位中国代表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京师大学堂等大学的国际法课程为中国人传授了国际体系具有契约性和平等性的观点——即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平等。的确，在国际联盟法庭体系建立之后，中国是第一个以主权平等为由申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不久之后陷入内战，之后又与日本进行了持久的战争，这套条约体系又得以存续了一段时期。

从外部入侵中国的不只是欧洲人。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震惊。1938年，W·H·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他们发现这座城市被巨大的墙壁包裹，高墙之外是一片片荒山野岭。他们写道，“西安闻起来有谋杀的味道。1926年，这座城市被地方军阀围困7个月之久。

到1938年时，它又遭到日本的轰炸。西安的这段经历就像是中国与20世纪不愉快接触的缩影。”在奥登颇负盛名的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1938）（写于他返回西方之后）中，有一行描写一名死去的日本士兵的诗句令人唏嘘：“他效命于远离文化中心之地。”人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中日战争 [7] 与纳粹眼中的苏德战争一样，都是种族战争。它不只是一场领土争端，也不是两个相邻大国一心要取代对方成为地区领导者的传统政治冲突。它更不会像一场打破地区力量平衡的斗争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两国社会陷入了一场生存冲突。日本人认为他们不是亚洲人而身在亚洲。为了解释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诸多糟粕。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技术上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他们是落后的人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清国奴”相当于英语中的“中国佬”。

所有国家都有选择性的记忆。卡尔·波普尔曾认为，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经历”。他的这番高见早在18世纪就有小说家提出过。这些小说家描写了他们的主人公——例如特里斯特拉姆·项狄（Tristram Shandy）和汤姆·琼斯（Tom Jones） [8] ——的“经历”。然而，即便历史总是存在争议，人们也应该避免使其退化成神话传说。如果所有历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色彩，那么人们就应该记住，虚构有助于发现和理解新事物。当人们不再有意识地将虚构视为想象之物的时候，虚构就退化成神话传说。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写道，“神话传说的前提是它能完整充分地解释事物的现状和过去。与通常是促变因素的虚构之辞相比，神话传说是稳定因素。就美国而言，有关例外主义的虚构之辞将帮助美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但对中国来说，有关民族屈辱的记忆或许就起不到那种建设性的作用。”

正如尼采所认识到的，一种观点的荒谬性并不能作为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唯一标准是这种观点能否促进或者维护生存。中国作家阎

连科2013年4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记忆缺失的话题。他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住自己过去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怨恨。”接下来的一章将解释，怨恨或许会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症结。尽管产生怨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向前看，或者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它堵住了通向未来的出口。

汉文化圈

在西方迫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国一直维护着一个非常成功的地区体系。它在7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如果中国寻求重新在本地区称雄并更改当地的“交通规则”，或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传统来重塑国际秩序并以此挑战美国，那么中国将几乎肯定处在与美国相撞的轨道上。

借用汉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话：“最开始，只有中国。”尽管严格意义上这句话并不正确，但这一描述抓住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地区重要性。在某些方面，中国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中国是东亚的“学校”，是万众瞩目之地，与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雅典不同，中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持续数个世纪。居于这套体系核心的是定期朝贡的行动，这类行动通常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经指定路线抵达都城。这一时期出现的最为人熟知的习俗之一是叩首（一连三次前额着地的跪拜）。叩首是一种礼仪，而儒家学者希望统治者以礼治国，礼仪又与秩序密切相关。儿童向父母叩首，父母向祖父母（和祖先）叩首，大臣向皇帝叩首，皇帝向上天叩首。儒家经典《大学》这样描述秩序的不可分割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叩首只是这套体系的末端。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文化影响并非有意识地将中

华文化推向边界之外的成果。相反，中国最关心的是边界以内的稳定。对中华文化的接纳似乎纯粹是自愿行为，学者将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称为“文献之邦”，即通过文本治理国家。例如，在14世纪初，朝鲜开始吸收和实践儒家思想，并将之制度化和内在化，这一过程持续500多年，几乎从未受到中国的鼓动。

这是一套地区体系，而非一套全球体系。仅有的一次突破东亚范围的尝试发生在15世纪早期，当时中国在开展大规模造船项目之后，向红海和印度洋派遣了七批远航队，直至造船项目很可能是出于财政原因被废弃。远航活动被取消了，甚至航海记录后来都在一次抵制科学的行动中被焚毁。到1500年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完全中断。未经专门批准而乘坐两个以上桅杆的船只出海乃是死罪。中国船只驶往欧洲要等到300年后——1851年赴伦敦参加万国工业博览会。

如果造船项目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人很有可能跨越太平洋抵达美洲——途经日本、太平洋北部抵达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并从那里前往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海岸。他们也可能选择低纬度的跨太平洋航线，事实上麦哲伦在1521年就采用了这条航线。他们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的接触不大可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出现强迫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不会有殖民社会，不会奴役本地人。如果郑和抵达美洲，那将给中国制造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挑战；在工业革命的几百年以前，中国将会接触一个前所未见的文明。跨太平洋贸易体系的建议将让中国见识到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和社会实践的差异性，那将扩大中国的文化视野。

汉文化圈与欧洲人在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差异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今天的国际秩序模仿的正是欧洲人最先为自己设计而后推广至全世界的“规范性制度”。汉文化圈是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这种体系假定，如果规则常常受到轻视或者有国家行为不端，那么这些破坏规则者将受到惩罚。尽管在国外对规则的执行力相对较弱，但欧洲国家在处理

彼此关系时已基本将这些规则内在化。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发自内心地不希望打破这些规则。这套体系包括派遣使节常驻他国，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特征。在17世纪中期之后，各国都认可主权不容侵犯，包括不应干涉他国内政。除极少数例外（瓜分波兰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各国承认他国的生存权。这套体系逐渐根深蒂固，到18世纪中期，欧洲人已将其视为国际通行的规则。

中国这套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则截然不同。这套体系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首要代理人中国是否足够强大，使之有能力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如“天命”）来扩大利益和行使权力。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完全取决于中心与外围的相对实力。当中心很强大时，朝贡使其更加强大；当中心虚弱时，外围地区就有实力施加影响，重塑甚至颠覆中心。

这套体系的“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副产品，因为它们不属于这套体系的基础结构。不仅如此，汉文化圈依赖软实力远多于硬实力。中国皇帝要求进贡，但他恩赐给进贡者的上等货品（丝绸）常常比他获得的贡品高贵得多。这正是朝贡活动的全部意义，因为它强化了中央王国的文化优越性，但它对中国文化势力范围之外的游牧民族就不起作用了，中亚大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贪得无厌、寄食他人、暴殄天物，在18世纪他们最终被驯服之前，中国人始终心神不宁。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刚刚被驯服，另一伙人在19世纪初又经海路而至。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英国人掠夺成性、残酷无情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很快知道，软实力对于一个文化上既不受媒介影响，也不受讯息影响[9]的民族来说毫无作用。

汉文化圈经受住了蒙古人的冲击，却没能挺过英国人这一关。基于规则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后者毁于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两极化和使战争破坏力远超从前的“火药革命”的双重夹击，与之类似，一套由发明火药的国家维持多个世纪的东亚地区秩序也很快土崩瓦解。1800年后欧洲人的工业化战争终

结了中国在东亚“对权力的垄断”，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作为地区霸主的合法性。

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认为，一切国际秩序都是规范性的。这些秩序通过提高对神圣和世俗两者的觉悟得以体现，并承认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体现在两者的基本结构上，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取决于各自对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恰当关系的本体论认识。汉文化圈依赖于“天命”。与之相反，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则以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政治神学为根基，后者宣扬权力既是现世的，又是精神的。教会拥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关照灵魂，同时也有一个由政府监管的公共范围，这个范围与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财产有关。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精通宗教法规之人开始设计一套包含个体固有权利的法律体系。15世纪的会议运动寻求限制教皇的权利，并向教会引入类似于代议制政府的制度。尽管失败了，但随后爆发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最终导致教会与政府之间更系统的分离，并产生了认定宗教纯属精神事务的世俗主义。欧洲国家制度对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的取代具体表现为一套由法律公约和规则构成的纯粹的世俗体系。

西方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念表面看来具有强调平等、尊重法律的性质，因为它们重视主权平等的观念，因而与中国的等级制度假定相比显得迥异，后者包括作为东亚秩序基础的朝贡体系。中国人最终被迫放弃了作为东亚外交特征的家长式道德主义，而接受通过去个性化的、正式的、合理化的国际法文本来处理外交关系。1871年日本在起草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个正式贸易条约时，保守派希望签署一份措辞笼统的协议，不必有明确的条文，因为这对于两个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友邦来说实无必要。日本外务省则坚持签署一份措辞清晰准确的欧洲式的条约，赋予日本它所希望扮演的角色，即东亚贸易权利的合法捍卫者。

任何秩序的瓦解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势力不过是乘虚而入。

真正破坏汉文化圈的不是商业冒险主义，而是其他行为规范和制度的挑战——太平天国就是如此。汉文化圈的最终崩溃伴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的动乱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混乱程度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不相上下。

汉文化圈不可能再恢复到它最初的样子，但旧观念极少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重温在帝国强盛、儒家文化上升时期为东亚带来数百年稳定的那套思想——即便他们不想再实践一次。一旦感到有人阻挠他们获得阳光下属于自己的地盘，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考虑其他选择——一套更加网络化的东亚关联系统。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大多数亚洲国家将反对美国为迫使它们选边站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几年都向中国靠近，这或许是因为它们认识到，边界和专属经济区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其势力范围就会继续扩大。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enevic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论调，他说中国正将西太平洋“芬兰化”。[10]

欧文·拉铁摩尔曾在1940年的作品中指出，中国的边界不断地变动。作为地理事实的线性边界从未得到确认：“在政治上被视为清晰边缘的国界随着历史的兴衰更替而持续扩展，最终变成一种相对宽阔而模糊的边缘，这条边缘意味着增长的最佳限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汉文化圈是一个基于不断变动的中心权力的体系。当中心强大时，其影响就会向外扩张。

中国和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体系的回弹力有多大？回答该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回弹力”一词的用法也极为不同。在工程领域，回弹力意味着像建筑物这样的结构受外力扰动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到基

线状态。在生态领域，它指一套生态系统避免彻底退化的能力。一个通用的定义是一套体系在情况发生剧烈变化时坚持核心目标、保持自身完整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一套体系能够迅速适应战略冲击，同时坚持核心目标不动摇。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目标是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适应中国崛起的能力。

大国冲突终结论根植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国际体系在面对挑战时有足够的回弹力，或者它能够不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与德国和日本（唯有这两个国家被威廉·詹姆斯 [11] 指责为“掠夺成性”）不同，当代国际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希望从战争中牟利，但这并非高枕无忧的理由。中国的崛起与1870年之后德国的崛起一样具有冲击力。同样的，美国也会感到难以适应自身的衰落。我们真能期待这两个国家会轻易地适应日益复杂、变动和互联的21世纪吗？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深受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的经典之作《原谅设计》（To Forgive Design，2012）的影响。这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每一次失败……都能为我们提供从其他任何途径可能都无法获得的知识”。“保持不败的最佳方式是更加彻底地理解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唯一途径。尽管彼得罗斯基的这本书主要关注重大工程事故，但它也讨论了人类作为工程师设计的社会体制（例如国际秩序），这些社会体制偶尔也会暴露出“论证、知识和效果上的缺陷”。

体制需要不断地改进，而彼得罗斯基认为，永不停歇的改进正是工程学的本质，因为不幸的是，人类制造的每一件东西都内含缺陷，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制造新产品，但他问道：“如果我们无法像过去一样求助于历史的话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对工程学而言已是不争的事实。工程师在预测某种事件——例如百年一遇的暴风雨——发生的可能性时，会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一个百分比，但长达1万年、气候稳定宜人的全新世已经结束，全球气温在上升。大气中的能量大幅增加，这加快了所有依赖这种能量的进程。为什么这对

工程学来说很重要？温暖的空气可以蓄积更多的水汽。我们已经使大气中的湿度提高了4%，干旱（因为热量使地表水蒸发）和洪涝（因为蒸发的水最终会变成雨）的危险都因此而增加。两者对我们现有建筑物的回弹力来说都是一场工程学噩梦。百年一遇的事件如今变成了50年一遇，而50年一遇的事件会变成25年一遇。

那么当前这套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际体系也有这种问题吗？所有体系都不得不根据权力分配的变化实时进行再平衡，但我们从未在和平时代见证过今天这般剧烈的变化。2003年，高盛公司预测中国将在2042年超过美国。几年之后，它将这一预期修正至2020年。这必然会引发诸多问题：美国是否将无力执行这些规则？美国是否将失去自信、失去它的存在确定性？中国是否希望挑战这套体系？

中国全盘接受当前规则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仍然有强烈的新教徒精神。中国不是一个喜欢劝别人改变信仰的国家，它可能永远不会产生美国那样的使命感。以中国的身份成为世界大国或许就足以实现其历史抱负。但中国国内的讨论却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军方的很多人现在公开表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这就留下一个必须填补的政治真空。像阎学通这样的学者将中国的衰落描述为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中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关乎领土、资源或市场，而是关乎规则的制定，并且阎学通认为中国亟须亲自制定全球规则，其他人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构筑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契机。哲学家赵汀阳写道，“这样的一套秩序将为主权、世界利益和世界权利提供担保，而不只是关注物质权利和利益。这套秩序有其独特的规范性，并以儒家思想为灵感。”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接班的准备，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对管理这套体系失去兴趣，那才值得担忧。一边是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改造国际体系，另一边是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这方面的准备，这两派在2006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论战，起因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王义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文章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我们如何防止美国过快衰落？"在沈丁立看来，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目标应该是改"造美国，使之更受限制且更愿与世界合作"。

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中国也有自己的抱负和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憧憬。在2013年夏季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安纳伯格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委员杨洁篪曾对这些抱负和憧憬作过表述。杨洁篪提出这两个最重要的全球大国应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种被中国人称为"合作共赢"的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将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基础上，应该摒弃过去的零和思维。

中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坚持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因为中国的志向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是霸权主义的，但其他亚洲国家不一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邻国来说，它们仍然不清楚中国的"王道"将与西方的霸道有何区别，就此而言，还有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皇道[12]，当时日本人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

中国将走向何方？

根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叶自成的观点，中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并不相同。再次爆发一场冷战的前景同样不值得期待，只有当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对抗和遏制的敌人时，这种前景才会出现。叶自成不愿展望中美开战的前景，但他对两国可能避免某种形式的摊牌也不抱有幻想。最佳选择应该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关系，兼具合作与对抗两种元素。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于美国更加亲密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两种关系可以充当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

在叶自成看来，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内政治改革的推进是中国避免与美国和邻国发生对抗的关键。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而政治改革将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眼中成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大国。这两个因素都将帮助中国更快、更有效地适应变化的形势，因而使其在重新设计当前国际体系方面更有话语权。1994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经常在人权问题上高谈阔论，如今这些说教已变得有失严谨。10年之内，中国的强大将使这些说教无关紧要。20年内，这些说教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但中国的强大会使这些说教毫无必要吗？中国是否会像叶自成所希望的一样发展出一套更具自身特色的民主？

民主很可能是对抗或者合作最终都无法避开的问题。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所说：“21世纪最大的悖论是这套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却由实际上最民主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维持着。”这就是美国的挑战：它能接受变革的必要性吗？但同样的，中国能接受政治改革的挑战吗？一些评论人士警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大国。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曾写道，“环境退化、网络战争和逃避历史事实使中国给外界留下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印象。分析人士也在问，中国是否在建设一个没有真正文化和道德标准的社会。这些问题如此频繁地出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深感不安，它们不知道这套仍在管理国际事务的规范性秩序将被何种新秩序取代。”尽管很多西方评论家对中国的改革承诺冷嘲热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可能并非绝对公平。毕竟，中国举行的选举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中国的100万个村庄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选民达6亿人）。根据萨塞克斯大学的罗伯特·贝内维克（Robert Benewick）进行的调查，这些选举的竞争性越来越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还出现了更多的独立候选人。根据一项长达6年、涵盖40个村庄的调查，公共服务开支在这一期间增长了20%，而“行政开支”则几乎减少了同样的幅度。

中国的任何民主进步都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儒家思想看来，权力应该有三个来源："天"（神圣或超验的合法性）、"地"（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得智慧的合法性）和"人"（民意的合法性）。从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民意一定位居其他两者之上。一国政府应该只有人民一个合法性来源吗？即便是西方哲学家也曾警告不要实行多数主义——多数人的独裁常常催生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学者也发出过类似的疑问：民众的短期利益是否应该位居社会的长期利益之上？

毫无疑问，中国人仍将继续渴望过上更加美好、更受尊重的生活，而民主似乎是生活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写道，"一切生命形式都存在于一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中。对哪种生命形式将存活下来的最准确预测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足感。"中国人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意程度可能高于美国人，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率先抵达了未来。中国的崛起或许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的确，布莱克本接下来还反驳了另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对民主的亲身体验就是人类进步的"实现"，或者说是进化三角形的顶点，或者其他所有人前进的"终点"。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极具黑格尔的色彩。它假定所有人对道德真理的接受能力是一样的，因为像民主这样的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道德真理并非显而易见地正确，布莱克本警告说，即便它们是正确的，对道德真理的普遍接受也并不会使一个大国在生活竞争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具有选择性优势。

毋庸置疑，一个更民主的中国将是巨大的进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而非"美国的"世纪。然而，中国式道路和"儒家浪潮"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缺乏根基，除了对过去的报复之外别无他物，那么结果也可能是胎死腹中。最终盛行的会是另一种西方的舶来品——民族主义。

如上文所述，叶自成对未来的看法自成一派且比较务实。这种看

法明显将一种对中国屈辱历史抱有的深度不满隐藏起来。叶自成希望中国可以获得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原则上这一点应该不难实现，因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机制易于融入却难以推翻。它们具备伊肯伯里所说的“机制内流动性”，即在现有机制中，成员国可以兴，也可以衰，但中国之志可能远大于此。自苏联垮台后，美国在施展权力时不受任何限制，但荒谬的是，导致当前这套世界秩序在几年前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自己，它险些破坏了由它一手创建起来的这套秩序的规则。尽管叶自成的观点相对温和，但他提出的大战略是维持现状，直至“不同力量的消长”最终对中国有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叶自成才能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但他可能是错误的，美国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也有可能不会按照预想的速度崛起。如果亚洲世纪不过是海市蜃楼，那么一旦中国的怨恨继续加深，结果会是怎样呢？

叶自成担心中国为重建国际体系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尽管中国是在1840年之后被强行拖入这套体系的。那么美国是否准备好改革金融体系，给予北京更大发言权呢？或者允许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充当一支“稳定力量”？叶自成更愿意接受的一种情况是美国并非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防范。不过，如果中国不只是希望增加自己的筹码，还希望改变国际体系呢？如果规则制定者失去权力，那么规则也就难以为继。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警察”——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如此描述1815年后的英国——最终被其全球责任压垮，接班的美国或许会重蹈覆辙。一切历史教训都表明，如果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美国就需要与中国分担责任；两国亟须就哪些“规则”（如果有的话）需要调整展开对话。

在缺乏此类对话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可能会逐渐被掏空，或者中国可能会逃避自己的管理责任。安德鲁·菲利普斯指出，国际秩序的衰落会产生大量风险，并可能导致巨大损失。最坏的前景是出现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没有霸权，只有一些地区大国，均势政治的运作缺乏19世纪那套可提供支撑的价值体系，结盟政策一天一变，只考虑短

期利益，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可能导致管理空缺。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或许无法提供给各国公民要求得到的多种国际公共产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支配这套体系同样会出问题（例如，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负责设置议程或维护规则）。中国对这套体系提出的一种批评是它以西方权力为中心，对已经发生的真正的权力重新分配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很多中国人还认为这套体系根本就是不公平和不和谐的。但如果一个世界不以西方有关“人权”和“民主”推广的议题为主题，那么这样的世界对于何为最好的公共产品、应该维护何种规范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理解。一套没有任何价值观的国际体系或许同样能阻止大国冲突，但事实证明它无法处理其他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好战的非政府行为体的袭击。

中美两国都面临双重挑战。一个挑战是在避免卷入冲突的同时继续参与竞争——大国向来如此。另一个挑战是共同努力让这套体系适应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权力的相对削弱。如果两国能够展开真正的战略对话，那么它们就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比现在美好一些。

文化冲击？

1943年，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新的“规范共识”，而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曼海姆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同一件事上，那就是提醒他的同行，民主应该具有“道德深度”，而考虑到在当今这套国际秩序下很多国家被剥夺了权利，曼海姆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尽管很多国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全球化也损害了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并且后者的数量在上升。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美国不应该为捍卫这些规则而与中国钩心

斗角；这两个大国应该为未来几十年、为所有国家制定这些规则。如果两国不能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陷入冲突。它们真的需要商定哪些价值观最重要，哪些价值观需要防止修正主义大国的破坏。曼海姆对他所在时代的民主国家的主要批评在于，这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价值观不够重视（毫无疑问，它们在这一点上不及那些极权主义政权）。

但尚不清楚像中美这样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大国能否通过合作实现这一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欧洲人》（The Europeans，1878）中的一个角色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由他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人看待生活的基本方式决定的。中美世界观存在差异。两国都形成了复杂的观察方式，它们会以此过滤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正如亨利·詹姆斯的兄长威廉所理解的，一切现实都“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受到集体经验的影响。或者像未来主义者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在《未来的足迹》（Footprints of the Future，2002）一书中所写的：“没人拥有真实。”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各自的世界观。

然而，尽管中美世界观差异如此明显，但我们在面对上述言论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在某一种文化中观察到的思考的一致性或许只不过是观察者与之保持距离的结果。在1947年，诺思罗普（F. S. C. Northrop）指出东西方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知识用符合逻辑的科学论述来表达，而东方的知识则具有这样的形式，即“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即刻理解的、自己身处其间的美学连续体上”。他还声称，西方知识“通过假设产生观念”，而东方知识“通过直觉产生观念”。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及中美世界观差异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基辛格称，美国人的思维倾向于针对特定的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分阶段不断接近某一主题，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过程。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国际争端要么源于误解，要么源于恶意，因而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劝导或者逼

迫。中国人的方法则更加去人性化，更有耐心。对美国人来说，善意和真诚是外交政策中的润滑剂。对中国人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外交活动中并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2003）一书中，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认为，东方人在观察和解读世界时习惯指出其中的模式和联系，而不去详究事物自身的真实（中国人称之为“势”，即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向，我将在下一章末尾讨论这一点）。他与京都大学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所作的研究认为，西方人关注个体需求，而东方人更关注背景与关系。对亚洲人来说，这个世界只能通过化零为整才可以被理解，它受集体而非个人控制。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一天时，一个6岁的美国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数是同龄中国孩子的3倍。在看到一张母亲与孩子争论的照片时，美国孩子往往会选边站，而中国孩子往往会认为双方都有正确的地方。

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的说法，当西方人被要求定义“自己”的时候，他们常常采用纯粹个人的视角，例如“我是高个子”这种表述，而亚洲人倾向于强调关系，例如“我比我妹妹高”。中国人更愿意在社会背景中观察自己。像尼斯比特一样，胡德也认为成长的过程会影响个体关注世界的方式。大脑的适应性使其能够对相关经验进行编码，甚至塑造语言的使用方式。例如，东西方的母亲对子女的说话方式就存在差别。西方母亲极有可能让子女关注一个玩具有哪些特征，而日本母亲更有可能让子女学会交换——先把一个玩具交给一个孩子，再要求孩子把玩具还回来。

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6年在东京举办一系列讲座时提到的一点。他认为，西方文化中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可以通过“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自主、已经完成构建过程的实体来解释。与之相对，日本人参照更大的团体、从外部构建“我”。“我”不是一个原生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

被塑造的实体。

如果中美两国共同打造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那么它们就必须考虑对方的生活哲学，而这是否可行人们并不清楚。尽管世界面临很多共同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但东西方应对这些问题时有极为不同的框架。下文将概括应对某个问题时制定框架的三种方式：

1. 单一文化内的狭窄视野。人们倾向于按照个人的体验对风险作出不同的评估，这被称为可得性启发法。人们倾向于将一个风险与另一个风险对比（借来作对比的通常是我们最近一次遇到的风险）。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某个事件会在人们的想象中变得十万火急（美国人相当自然地将“9·11”事件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作类比）。人们还受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通过体验行为的趋向来学习”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件事“很可能”而不是“可能”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自身经历决定的。所有这些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丹尼尔·卡内曼所说的“叙事性谬误”——人们偏爱故事胜于事实，并渴望将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压缩进同一个故事。马拉梅（Mallarmé）所说的“部落的方言”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发现。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尤其担忧的是，中国人有关国际政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囿于1840年之后的经历——遭受迫害。他引用了《瞭望》杂志2012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建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秩序”，这将使其能够持续主宰太平洋。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构东亚区域合作构架。换言之，这篇文章指责美国故意在中国及其邻国之间挑拨离间。布热津斯基还引用了另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的一段内容：美国“强化旧的军事同盟，破坏东亚和平的政治基础，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矛盾，构筑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篇文章认为，作为回应，中国应该与俄罗斯联手，防止美国全面控制欧亚大陆。与之类似，另一篇由《解放军报》刊登的文章[13]敦促中国丢掉“和平主义和

浪漫主义”，为与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作准备。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文章因使用现在时态而具有一种可信性，其措辞似乎是在描述现实而非一种可能性。它们在描述现在和未来两种情况时只采用单一时态（现在时态），这使读者（甚至某些专家）强化了这样一种幻觉，即未来可能发生之事已在今天发生。如果中国人普遍持有这种看法，后果将极其危险。

2. 确定基点　　。人们倾向于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虚构叙事的基点。西方常常将军事干预的基点设定为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但坚持赋予自身这些权利和自由（自由是获取权利的条件）的乃是我们自己。在谈论权利时，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虚构的现实秩序，而虚构是带有个人印记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拥有权利。我们总是先讲故事，然后赋予历史某种意义。人权的故事只不过碰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故事罢了，它以一种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认知为基础，即人类的天职就是在有生之年提炼和体验生命的精华——在今世，非来世。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讲述了另一番故事，而中国人的故事也与人类尊严有关。的确，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思考（希腊人的解释），而是因为人有能力过上道德的生活。

事实上，价值判断是自然选择带给我们的本能。一切社会都看重公平。人们努力纠正错误、维护自尊。我们都不喜欢背叛和不忠，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喜欢反社会的行为。我们欣赏的价值观都是亲社会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提倡相互合作。我们之所以有语言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一些人因为可以依靠和信任而受到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不值得我们信任而遭到鄙视。

3. 牵强附会　。根本没有客观上安全的世界这回事。我们是否感到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自己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当你改变观察事物的方式时，你观察的事物也常常随之改变。当唐纳德·拉姆斯菲

尔德（Donald　Rumsfeld）提到他们怀疑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盟军并非因为发现了这些武器存在的新证据而采取行动，盟军采取行动是因为它在审视已知证据时采用了新的视角——透过“9·11”事件这面棱镜。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坚称“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据不存在”，实际上证据显然不存在。这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突出案例。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年创造了认知失调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面临特殊问题的心理状态，例如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那段时期的表现。失调使我们在已经明显失败的时候误以为我们已经成功。

卡内曼认为，中美之间诚恳的对话将为更理性的决策创造条件。诚恳的对话绝不含有以上各项内容：视野狭窄、确定基点和过分（基于联想的）牵强附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差异程度如中美之大的两个国家而言，你能抱有的最大期待莫过于它们能找到一种培养更好的合作习惯的方法。如果两国懂得它们自身社会对规范性的幻想比对方的此类幻想还难识别，那么它们或许就能够减少决策失误。理性发出的声音与传统发出的高音相比常常几不可闻。就“判断哪里是雷区而言，观看别人蹚雷比你亲自去试要容易得多”。

但这样的对话能否展开令人质疑。由于起点不同，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抵达相近的终点。两国在战略平衡中相互对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两国要想持续繁荣，最低要求是和平共处，最高要求是相互合作，但两国都难免心生疑忌和焦虑。尽管它们看起来都承认战争打不起来（至少现在），但尚不清楚两国能否和平共处。面对一个希望中国政权更迭、认为除自身外其他任何政治模式都不合理的美国，中国愿意接受它并继续与之谈判吗？面对一个对本国历史有着屈辱的记忆、对自身未来充满信心的中国，美国愿意与之展开建设性的交往吗？两国都渴望和平，但共处要求达到最难以捉摸的状态：它要求两国首先要与自己和平相处。

结　论

以1914年作类比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战争释放的暴力很可能已经在战前世界的DNA中进行了编码——例如爱尔兰自治运动在英国国内引发的暴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以及工人对最低工资的要求。它还根植于俄国几乎不受压制的革命情绪，早在几年之前的1905年，这种革命情绪就已经十分高涨了。它还体现为德国军方和议会内心深处的敌意，体现为被赶入城市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上。这种暴力最深层的根源则是欧洲帝国主义。白种人曾经对他们此前征服的“次等民族”施以暴力，而欧洲帝国主义让他们有可能将同样的暴力施加到其他白种人身上。换句话说，1914年以前的世界很可能注定毁于其内部矛盾，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也可能爆发于当今世界的矛盾：令人目不忍视的社会不平等仍在加剧，持续不断的暴力破坏着非洲大部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环境，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重新抬头……这一切都会使舆论相信，战争并不像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遥不可及。

现实地讲，几乎无人相信中美这两个竞争对手能够合力重建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达成的那套体系。国际秩序没能实现从“国家思维”向“世界思维”的转变。中国对未来的展望仍严格局限在本地区范围之内，尽管很多中国作家憧憬着一个结成网络的世界——一个“关系网”。在这个次级权力体系中，中国可以与非洲和拉美的“次要”国家联合，减轻这些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华盛顿支配的机构的依赖。

随着资源稀缺和经济紧缩开始对各国社会造成影响，当前的世界秩序或许难以持续。零和经济可能产生一个竞争性的、容易陷入冲突的零和思维。去全球化的前景和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可能导致世界进一步分裂。然而，权力被重新分配并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共享也是有可能的，那或许标志着由“俱乐部管理”向“中心管

理”的真正的模式转变。这些不一定会使人质疑大国冲突的逻辑，但它们可能为大国冲突这套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一点可能决定是战还是和。但这一切要想在这套体系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从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到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等多位全球化批评者都认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被卷入这样一套地缘政治体系：各国除了自己的未来，其他声音一概不听。

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乃是我们人生旅途的常客。未来一词本身就是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没有一件事你确定知道或者确定去做”的概括。“去做”最重要。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未来。安东尼奥·格拉姆希（Antonio Gramsci）坚信，“预测”未来的唯一方法是与其他力量联合，劲往一处使，让未来符合我们的期望。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克服不确定性，但我们要想获得机会就别无他途。遗憾的是，没有人确定像中美这样两个相差极大的国家能否联合起来，代表世界其他国家作出这样的努力。

1 这起刺杀事件的准确日期为2月15日。——译注

2 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木制军舰在战斗中常常一字排开，以舷侧火力攻击敌方，这种阵型被称为“木墙”。随着钢铁军舰的出现以及现代海战不再以近距离火炮攻击为主，该词逐渐退出历史。——译注

3 尼尼微，新亚述帝国都城，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繁盛一时。——译注

4 这一说法的准确来源是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作品《洛克斯庄园》（Locksley Hall，1835），原句为“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译注

5 讲座内容后来结集为《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一书。——译注

6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底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注

7 作者此处指第二次中日战争，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译注

8 这两个人物分别出自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1759—1767）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弃儿汤姆·琼斯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1749）。——译注

9 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强调传播工具本身对人和社会的巨大影响。——译注

10 “芬兰化”指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的邻国。冷战时期，芬兰因忌惮苏联的威慑，而在外交与内政方面对其有所调整配合。——编注

11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2006年被美国《大西洋期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之一（第62位）。——编注

12 皇道，20世纪上半叶陆军的一个派别，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编注

13 这篇文章的准确出处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头版，标题为《中国怎样才能和平发展得更长久》。——译注

第3章　战略叙事和战略的逻辑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

在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的结尾，主要角色卡明斯将军（General Cummings）总结说，他不大可能参加下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为太平洋战争，卡明斯在这场战争中扬名。他认识到，未来属于年轻人，因为战争在不断地演变。以代理人战场和核武器为特征的冷战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他所想象的战争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事实上，核武器从未在冷战中使用，而这一点完全要归功于美国精心设计的一套成功的大战略。

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对大战略的目的作过最准确的概括。他主编的开创性著作《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43）是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全面剖析的论述之一。尽管厄尔并没有明确地将他的研究与他所处时代的苦难联系起来，但由于他写作的时间是1943年，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背景。厄尔认为，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将各国的政策与武力

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不必诉诸战争。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那么一个高明的大战略应该确保战争爆发时己方已胜券在握。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中国和美国当前都在根据它们对对方意图的解读来精心设计各自的大战略。奥巴马的“亚洲支点”战略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遏制战略，只不过名义上不那么说罢了，但美国政府自己却不这么看，它认为美国因专注于反恐战争而对亚洲投入不足，“亚洲支点”战略是对这一事实的迟来的矫正。中国则认为“支点”进一步证明美国在衰退。按照中国的视角，该战略是一个身处逆境之国的绝望之举，它趁着自己还有时间想要奋力一搏。它被视为一国在衰退之际仍然穷兵黩武的证据。一些中国战略思想家认为，美国构成的主要威胁是它的虚弱，这会带来他们所说的（在南海）“搅局”和不必要的“挑衅”（例如决定通过在澳大利亚轮换部署一支海军陆战队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

一切大国都有对自己的一番解释。大战略可以使它们理解自己的过去，并使当下的存在具有连贯性和重要性。然而，大国对自己讲述的某些故事总是比另一些故事更可信。一些故事讲得如此动听，其中一部分甚至符合现实。人类是一个讲故事的物种：考古学家将历史上的手工艺品拼凑起来就能讲述史前时期的故事；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就开始讲故事；企业高管为他们销售的产品编故事，这些产品经他们的推销似乎立刻就有了市场；律师们自从法院开始存在以来就在精心编造自己的辩词；最近，军队被告知胜败取决于是否能“赢得叙事”。正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将人们引向了冲突或者和平之路。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得出教训，只要你能把它找出

来。189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没有爆发战争，这其中的教训颇有启发性。英国能够设计出一套经得住时间考验，也可以说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战略。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美国可能效仿英国，直接将世界领袖的位置腾给中国。但这不会发生，因为英国在1890年之后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美国编不出来的。

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大国冲突逻辑的另一个方面——编织可信的战略叙事的必要性。另外，各国有必要理解，在缺乏有说服力的大战略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像1914年那样昏昏沉沉地陷入灾难。说到底，战略思维不过是社交智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它是指通过设计一系列选项达到知己知彼的能力。爱德华·勒特韦克所说的“战略自闭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意志帝国未能通过他国的视角来观察自己。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从未发生的战争：美国与英国

1913年5月，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与美国商谈庆祝两国缔结和平100周年的计划。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1815年结束 [1] 。在广场饭店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个英语世界默哀5分钟。唯有一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代表们抛出惊人之语，他说这两个国家是在谋划联合向德国开战。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国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说，两国都没有考虑发动战争。的确，所有国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都报以掌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然而，仅仅在18年前，英美两国还险些因为一场鲜为人知的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这起争端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也

就是今天的圭亚那之间。美国国务卿选择单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义门罗主义。“遥远的距离和3000英里的海洋意味着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联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违反现实的文章中，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对这样一场战争结果如何进行了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似乎掌控整个局势。他指出，美国东海岸几乎没有任何沿海火力点来保卫像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美国海军只有一艘一级战舰，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9艘一级战舰，22艘二级战舰和15艘装甲巡洋舰。当然，现实是英国几乎无法保卫加拿大。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英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使英国成为一个陆地面积实际上比美国还大的“天然的”美洲国家。在罗伯茨的设想中，美国人将拿下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迫使皇家海军从封锁海岸转为轰炸沿海城市。四颗高级炮弹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没有下令轰炸曼哈顿。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力削减到“可控的范围”。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不会遇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守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英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对加拿大的入侵将从大规模轰炸关键工业目标开始，此战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签署该计划的最高级别官员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通

过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这场冲突的规划，今天的专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北大西洋发生大型海战，尽管皇家海军可能获胜，但英国为了保持至关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断就必须割让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国人侵略波兰的几个月前，美国一份内部备忘录才得出结论，认为“在新形势下”这些战争计划根本不具有可执行性，但它们仍被存档以备未来之需。

公爵夫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国应该现实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国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国早在1871年就开始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与美国妥协。这些抱怨在解决阿拉斯加边界争端问题时再次出现，加拿大人认为，妥协方案过分有利于他们的邻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太平洋地区500万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保护”。在加勒比地区，1901年签署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标志着英国不再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美国实际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约束，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对海地和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

英国人就这样接受了现实——1900年之后不可能再与美国开战了。选择退让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开展了最早的趋势分析。英国人最先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英国记者W·T·斯特德（W. T.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人们常常将趋势提炼为某种反映时代语言的说法。几年以前，斯特德曾给莫利勋爵（Lord Morley）写信说，“英语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曾经承认的，“人类的重心已经移至此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像“英语世界”和“人类的重心”这样的词语就是战略叙事的一部分。当然，这两个社会都讲英语确实提供了帮助。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准确描绘了这种发生在20世纪某个特殊时刻的态度转变。他写道，“在1907年圣诞节期间，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经历了严冬的极端考验之后前往费城，去拜访自己的妹妹。当时第一批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美国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国土之大超出英国人的想象。”但卢卡奇也准确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另一种感受：“他们不但接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甚至没有因这种预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互态度开始发生明确的转变：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国人都将这块殖民地的建立视为美国的“基石”。1907年也是亲英派古德温·阿彻（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说法的一年（他的儿子1943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死于英国）。同样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发表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些美国人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时开始坚持自己的英国传统。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纤维含量正

变得越来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中曾对这个事实发出警告，而这本书也成为他对这个日后不会再踏足的国家发出的告别宣言。根据191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不能讲英语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担心这种“民族大杂烩”可能影响美国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东海岸美国人很容易与英国人产生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英美关系从未像英国人希望看到的那样紧密，但很多美国人确实对两国关系投入颇多——包括英国文化、语言、文学以及从一开始就有的英国“时尚”。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位作家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崇拜”。

卢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认，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文化上彻底地“英国化”，但对英国的动机仍保持怀疑。当伍德罗·威尔逊带领他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称英国为盟国，而用“伙伴国”代替。如果说两国之间还有某种合作关系，那一定是因为英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重新缔结关系，重新编织它们的共同命运，越走越近”。这种努力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久，这一时期乔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发表了《英美联合》（Anglo - American Union，1943），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发表了《此刻联合》（Union Now，1939），后者建议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组建联邦[2]。

英国人和美国人并非只是语言相近。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继承了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理性和可被经验证实的人生观。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对手提供灵感的“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物客观化、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

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简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退让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它与力量对比毫无关系，而与内在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英国面对的是更加危险的德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中讨论了英国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协的理由，爱德华·卡尔（E. H. Carr）的《20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Crisis，1939）一书曾对这个理由作过最有名的阐释。卡尔认为，绥靖政策对于使国际体系顺应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少。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但吉尔平评论说，仔细阅读卡尔的文字会发现，他本人并不主张英国放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卡尔更倾向于欧美结盟，甚至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者至少可以巩固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规则”。从这一分析中，吉尔平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向来把价值观置于和平之上，随时准备为维护国际体系规则而战。

本章开头提到，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表示，美国有望效仿英国，直接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国对美国的退让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这种退让或许并没有让英国加速失去这一地位，但也没有起到任何延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仍在谈论英语民族的联盟，当时，英国的政治资本已经消耗殆尽，这使他显得极为可怜。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个人都在争夺打造战后经济体系的权利，希望以此确保各自的国家在战

后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人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伦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大英帝国仍为英国出口提供贸易保护。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写道，“美国人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局势：当此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怀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由美国支配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还成功地迫使其他44个与会国接受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美国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是经济任务——阻止英国人（通过向大英帝国市场提供优惠）干扰美国以出口主导的战后复苏——而第二项是政治任务（通过组建负责管理战后欧洲的美苏“委员会”使英国陷入贫困）。幸运的是，冷战意味着英国人重新获得美国的重视。苏联人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也不会同意按照这套“规则”办事。杜鲁门后来重新将英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但他坚持要求英国偿还战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从而使英国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在设计故事结尾时总是纠结万分。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满浪漫色彩的最后一幕中，皮普和埃丝特拉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设定中，他们在街上相遇，闲谈几句之后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点是文学可以为读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能假装他们最心爱的角色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人们能够抱有的最高期望仅仅是生存。

在美国人看来，用英国失去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作类比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因为中美之间无法像美英之间那样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美国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国和英国成功避免战争这个事实至少反驳了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民主国家不会作战略思考，除非是在战争期间（那通常为时已晚）。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断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战略叙事

美国不大可能效仿英国，因为美国给自己讲述的故事与英国的故事结局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主要危险不在于美国给自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而在于它给自己讲述了太多的故事。

在《好战略，坏战略》（God Strategy Bad Strategy，2011）一书中，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主张一国在制定战略时应该寻找并利用两种力量之源。第一种是连贯性：将政策和行动协调起来有助于开发现有力量，并通过设计上的连贯性生成新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之源是重构竞争态势以使自己具备新优势的能力。英国人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在将德国确定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之后，英国人立即采用唯一可行的政策：向美国“让步”，以确保在战争爆发时——这是最坏的打算——美国仍保持中立。英国通过引入“英语国家联盟”、“同族兄弟”以及后来的“特殊关系”等概念重构了自己的战略叙事。就这样，英美之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它已经无法想象了。

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不测之事会越来越少。我们的选择性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避免和预防不测的方法，生活因此变得越来越“可测”。丹尼尔引用了尼古拉斯·马克斯韦尔（Nicholas Maxwell）对自由的定义：在“各种情况下获取价值的能力。”对英国人来说，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

不但被美国人取代，德国的崛起也迫使英国重新思考它对欧洲的投入。争端可以拿去仲裁，就像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时英国的经历一样。生活也总能找到不同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都可能改掉原有的思维习惯，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英国战略思维核心的均势思想。

然而，每一次行动几乎必然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解决一个问题常常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丹尼特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们总会给自己讲述一个不那么积极的故事。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对比过去200年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时指出，英国决定放弃均势战略，将头把交椅让给美国，这使它能够继续赢得战争，甚至在交出经济霸主地位后很久仍能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托马斯·布赖姆洛（Thomas Brimelow）在1946年时所说的那样，苏联知道英国还没有在比赛中出局；它即便不是最强大的对手，也很可能是最精明的那个。“最让苏联政府感到不安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让其他国家为我们而战……他们并非尊重我们，而是尊重我们结交盟友的能力。”这种夸耀并非毫无根据。亨利·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个政府像英国这样可以让我们与之如此开放地交往、如此自由地沟通，实际上，我们已经让英国人参与我们的内部讨论。”

但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承认的，21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经济基础远强于英国。一切迹象都表明，即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被中国取代，甚至被印度取代（尽管后一种情况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大可能发生），它仍将保持强盛。真正的挑战是政治性的：美国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西方伙伴（甚至德国也不可靠）来分担作为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责任；因此，美国没有真正的动机将第一的位置体面地让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满足的要求很可能远比当年的英国具有挑战性，现在也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调整自己并适应其他正在扩大影响力的大国，以及美国是否能够应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全球实力构

成”的新变动。“华盛顿能够真正地接受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观点的世界吗？它能够在一个它无法支配的世界中兴旺起来吗？”美国已经察觉出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中国的崛起，并且美国不准备抵制。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鲁梅尔特的观点，美国没能做到以一种可以被其他所有人理解的语言重构竞争态势。

美国现行政策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自1980年以来用多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中国，结果它对自己讲述了多个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故事。美国曾经强调中国构成的意识形态挑战，认为中国拒绝民主，实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拒绝接受人权问题上的规范性共识。

“9·11”事件后，中国成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但小布什政府在始于2001年的第一任期内却将这个国家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之一，这为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还谈到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政权更迭”。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华盛顿的口头禅是“巴格达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楼一位颇有影响的发言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入侵伊拉克是“为对付中国热身”。当美国人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后，他们又换了一个火药味没那么重的说法，甚至还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中国拯救了自己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美国依靠借款实现自己的全球野心。两国被绑在了一起，尽管它们对此深表不屑，但这确实对双方都有利。当2008年的经济危机威胁美国经济时，中国银监会被问到是否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一名官员回答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这就是华山一条路。”所有新兴市场都需要安全的流动资产来保护本国货币不受动荡的资本流动的冲击：时事越艰难，对可变现资产的需求就越大。尽管中国购买如此多的美国国债看起来不明智，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就成了一种违反常态的稳定。

然而，“中美国”一词暗含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实为一种对两国都不利的幻觉（这种幻觉鼓励美国人过度开支，促使中国对此习以为

常）。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外的市场，通过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财产进行投资来对冲美元。“大脱钩”或许已经开始。当2013年9月国会迫使政府关门长达数周、导致美国接近债务违约时，即将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中国人。在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1.3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建设“去美国化的世界”的必要性。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在抬头，像电信业巨头华为这样的中国跨国公司如今被禁止收购美国资产，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对美国大型石油企业优尼科的收购也被否决。在宣扬美国民族主义方面，一个尤其耸人听闻的例子是2012年夏季发行的电影《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以及这部电影发出的警告：“所有大国中唯有中国为消灭美国人作着系统性的准备。”在电影海报上，一把刻着“中国制造”的匕首插在一张美国地图的中央。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的保护主义倾向正在增强。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多边治理正变得越来越软弱。俄罗斯尽管身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却正在采取新的措施来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美国正在寻求创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与其盟友以及中国之外的伙伴之间的贸易。

2013年7月，《经济学人》对这种地区性贸易协定的扩散表达了严重忧虑，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经济正在分裂为若干部分。《经济学人》警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经济放缓可能会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各国应对这种局势的传统方法就是挑起冲突：

> 一个世纪以前，这个世界最后一个贸易融合的时代以一场战争宣告结束，并开启了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时代……世界能否巩固当前这个不同寻常的增长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大国是踏上一条通往更大程度

> 的全球合作的道路，还是失足、跌倒，或者最坏的情况——发动斗争。

“支点”战略是当前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并调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部署，此举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感到担忧。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成功入侵伊拉克的刺激，在那之前还有一系列被中国视为“挑衅”的行动，例如台海危机（1996）、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1999）和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

“支点”战略旨在矫正因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而造成的势力失衡。小布什政府对中亚的关注超过了亚太地区，导致美国专家抱怨这个时代成了“失去的十年”，这是在效仿丘吉尔的一个有名的言论：他曾将20世纪30年代描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美国正在重新联络自己的盟友，恢复联盟体系的活力，同时增强现有军事力量。美国将在日本部署F－35战斗机（2017），在关岛驻扎攻击型潜艇，到2020年，太平洋战区的舰艇数量将由50艘增至60艘[3]。这种再平衡是为了让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将继续维护秩序。因此，美国当前的政策是防范任何企图挑战航行自由的做法。自18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首次与巴巴里海盗交战以来，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目的十分明显：它想要留在西太平洋，继续做东亚地区的军事大国。然而，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无法满足一个真正的“支点”最基本的要求：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与重新强硬起来的俄罗斯达成某种共识（运用俾斯麦式的谋略——这种“大妥协”或许会从中国手中夺走一张关键的战略牌）。因此，这个“支点”能否实现既定目标还有待观察。

在冷战结束后的不同时期，美国曾先后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辟快速通道）、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伙伴以及

G2世界中的潜在全球伙伴。但对于两国在G2世界中合作的希望在2011年初开始破灭，当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东海和南海，变得越来越强硬。现在仍不清楚，这两个大国中哪一个甘愿在G2关系中扮演次要角色。两国都认识到它们互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两国都对这种竞争会走向何方感到担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将试着在某些问题上保留各自意见，而在其他问题上相互合作。

在中美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两国会建立伙伴关系。信任是要努力争取的。大国之间很少真正地相互信任，但一些大国能够找到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方法。关于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不同的观点相差极大。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评论家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开展一项“共同事业”，而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甚至建议以“中美共治”来管理管球经济。然而，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污染物排放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宣称，国际体系已经呈现两极化，这可能会促使这两个大国展开合作。然而，同样是这种动力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持久冲突，尤其是它们都极为看重各自的例外主义的时候。

从美国的角度看，重中之重是当前体系的规范性制度继续得到维护。正如奥巴马在2011年所声明的，尽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它希望确保中国崛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维护国际规范与制度，并巩固安全与和平。问题在于，美国越来越不相信中国有兴趣支持这些规范，更别提推广它们了。这种关切体现在2011年五角大楼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这份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详细描述了中国构成的威胁。国防部预测中国不会致力于加强当前的国际规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美国利益的威胁。在美国开始防范中国崛起的这25年间，美国对华战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对这个世界作了这样的假定：“战后秩序仍在缓慢瓦解，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世界很可

能回归均势政治。对于后者，英国在1900年之后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就已经弃之不用了。”

寻找大战略

美国的决策缺乏连贯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因缺乏连贯的战略叙事所引发的问题。加里·哈特（Gary　Hart）将连贯性定义为包含目的与方向的单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随机的——但不能是极端的——事件能够被解释、赋予意义并按要求予以应对”。如果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的政策在决策层面显然是不连贯的。

让人感到离奇的是，美国的确曾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制定了一项具有连贯性的战略。不连贯的问题只是在如今中国崛起之后才出现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认为遏制中国是可取的，甚至是可以做到的。相反，美国决定将政策调整为防范中国的崛起。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6）的话说就是，“我们寻求鼓励中国为其人民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我们也防范其他可能性”。在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国防部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防范未知事件”。如果不可预测之事如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长期因素——这与冷战时期有别——那么符合不可预测定义的事件就必须加以防范。美国尝试通过将中国嵌入现有安全架构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快速通道背后的逻辑。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或许不是盟友，但它们确实拥有共同利益。

防范政策的问题在于即便它能削减风险，但也无法消除风险。公司往往会防范那些影响核心业务的风险，例如货币波动。它们防范风险的目的是增强或者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同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公司竞争失败时，它们往往会停业；国家却很少停

业。无论防范政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谨慎的还是投机的（取决于这些政策是防范不利因素还是利用有利因素），对社会而言，其安全程度常常只取决于自己的感觉。

尽管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内部对于如何与崛起后的中国打交道莫衷一是。鲁梅尔特认为，美国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他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尽管美国善于表述自己的战略目标或子目标，但美国并不善于思考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连贯性”。当一个政府错把目标当成战略本身的时候，这个战略就变得不连贯。鲁梅尔特坚信，所谓战略目标的设定意味着应该明确知晓成功需要哪些条件，否则一个国家仅仅是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绩效目标而已。

奥巴马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10）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列出了相当模糊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培养强大和有能力的伙伴”、“加快适宜的[4]发展”和“增强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含糊不清。尽管报告自称具有战略考量，但有关中国的部分仅仅得出了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崛起并监督其崛起是否威胁国际规范的结论。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美国国防部仅作出了“密切关注”的决定。它希望“鼓励”北京通过减少不信任和增加两军对话来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至少从这份文件看来，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一致性。

如果没有对挑战进行足够准确的定义，那么你就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如果无法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那么你就不可能抵制一个低劣的战略或者改良一个良好的战略。一个良好的战略能够准确定义关键的战略挑战并确定应对这一挑战的最现实的方法。它提供了一条改善局面的明确道路。“低劣的战略”会设定异想天开的目标，只是简单地陈述或者重复理想的事态，而常常忽视这样一个恼人的事实：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有一个战略原则似乎确实赢得了广泛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个词已经成了流行语。由于没有一个受到一致认可的连贯的战略叙事，美国只能给自己讲述一个非常古老的、从古希腊人那里汲取灵感的故事。在此之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战略家的话）我们似乎应该多次落入过这一陷阱，这样一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实际上并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修昔底德陷阱

> 1914年世界大战突然降临时，我正在向贝利奥尔学院的本科生讲解修昔底德——在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经历与很久以前修昔底德在其世界中的经历毫无区别。
>
>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西方军事评论家提及修昔底德并非最近才有的事。毕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军事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政治学家。正如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所指出的，修昔底德在当代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中向来颇受欢迎，这从大量学术著作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战争与民主：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比研究》《霸权之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等。“9·11”事件后，汉森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独一无二的战争》（A War Like No Other，2006）。这本书告诉读者，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今人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军事教训：战争可能会动用恐怖和卑劣手段，被强行灌输民主的国家有时并非心甘情愿，民众对出兵海外的不满可能会导致国内动荡和文化动乱。汉森说：“如今反恐战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往回看，寻找各自的修昔

底德。”他说，考虑到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存在交战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开始寻找修昔底德了。

任何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经典著作的人都承认，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很少能应用到实际中。然而，尽管事实上经典著作常常被误解或者为了适应特殊情况而被滥用，但现代作家反复引用希腊人是有原因的——他们需要希腊人的归纳推理和真知灼见。尽管希腊人的观点能够并且已经按照现代科学语言进行重构，但希腊人最早观察到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至今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仍然非常重要。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8）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评论说，科学解释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复杂化为简单，而在于将不易理解的复杂替换为容易理解的复杂。但简单的好处在于它简洁明了，这就是人们在思考守成大国如何才能避免与崛起大国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

修昔底德陷阱——用社会科学术语说就是“安全困境”——似乎肯定适用于美国和中国的案例中。中国的能力和实力将会继续增强，这对于地区安全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预示着什么，这类问题将让美国感到紧张。只要美国继续留在东亚，中国就将越来越担心美国将下多大功夫限制中国的军事雄心。“这是野兽的本性……双方必须处理好这个困境，防止其恶化为公开的冲突”。

在2011年春季号《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上刊登的一篇有关未来各国实力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美国有时间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且能够避免落入陷阱的第二层——因为忧虑而反应过度。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奈在哈佛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同样将中国和美国描述成斯巴达和雅典。他认为，破坏系统平衡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的相对衰落。在这两者之中，中国的崛起或许破坏性更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小于西班牙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被修昔底德的魅力吸引的不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自从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宣称唯有阅读修昔底德才能理解大国竞争以来，高级军官都被鼓励认真对待这位希腊历史学家。自1972年以来，修昔底德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必读书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2012年5月表示，他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美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连军方都知道与政府保持口径了。

美军对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担心是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不断削弱。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美国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在20年内完全消失，或者至少被严重削弱。然而，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这两个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阻止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

尽管这份报告的作者宣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使它们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但他们也设想了三种结果相差极大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美国经济则遭遇自由落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防预算持续下滑。最终，美国不得不在2030年之前交出西太平洋的控制权，迫使日本单独与北京达成妥协。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大可能，但并非不可想象。美国不但没能抵制中国的崛起，反而让自己淘汰出局。守成大国不能或不愿维护自己的地位，崛起大国几乎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崛起。

第二种情况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国的增长遭遇困境，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没有缩小。今天存在的军事上的缺陷依然没有消除。美国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能量，帝国发动反击。美国做到了将国防开支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在这种情况下，守成大国仍然鹤立鸡群，而崛起大国像过早冲刺的运动员一样力量衰竭。报告认为，这种结果也不大可能出现——美国根本不具备甩掉中国的金融

手段或者技术能力。

第三种情况是，美国的地位继续被削弱，但这个国家也没有就此衰退。它仍然有能力竞争，就像恢复活力的日本那样。这种情况下，陷阱尚未搭建，但可能因为中国南海的一起事故或者外交冲突的升级而出现，但这两个大国都尽量避免战争。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控的。守成大国仍然保持一个微弱但重要的优势：崛起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内部凝聚力来冒过多的风险。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最大，但这些作者也承认，这种情况过于“不稳定”，无法作出确切的预测。

附庸国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程度，要受到我们所能掌握的比喻的限制。比喻不是对应，而是类比：它将某种经历转化为一种观念，从而把陌生的事物变为熟悉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思考中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它们能传达复杂的观念并按照某条既定的轴线传递我们的思想。例如，陷阱会以多种形式出现，落入陷阱常常是致命的，但仔细阅读修昔底德就会发现，我们讨论的这个陷阱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复杂。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不愿向对方开战，但他们各自的盟国让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导致这两个大国都试图夺取决定性的先发优势。两国作此决定是因为它们听从了各自的附庸国。当时，科西拉（一个没有盟国的城邦）正与斯巴达的盟国之一科林斯交战，只有当雅典援救科西拉时这场大战才正式开始。雅典人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听信了科西拉人所说的话：科西拉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打响。另一方面，科林斯人警告斯巴达，如果它不入侵阿提卡，那么它就会遭到雅典人的袭击。科林斯人对于斯巴达人没能认识到自身处

境的真实危险颇为鄙视。他们指责斯巴达人没有考虑“你们即将面对的雅典人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与你们有多么大的差异、多么根本的区别”。

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被各自的盟国拽入冲突吗？在《纽约时报》2013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两国或许不愿被拖入彼此之间的对抗，因为它们对于当前力量对比发生任何变动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后果都感到担忧。那么我们能期待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吗？就像1815年后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肯尼迪承认，未来或许会发生战争，但他认为这些战争很可能是局部的或者孤立的（就像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列强能够将战争各方与外界隔离一样）。但这要求中美两国展现出更大程度的自我克制：“两国需要确保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肯尼迪的观点与西方世界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中占主流地位的务实主义相一致。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继续对一套新的世界秩序抱有幻想。后果管理是国际安全永恒不变的原则。各国更愿对威胁这套体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开战，而不是那些有可能希望改变这套体系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之中没有一个是希望开战的。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是列强忽视了修昔底德有关加强对附庸国控制的警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俄国纵容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指责德国任凭维也纳对塞尔维亚展开报复——维也纳认为大公遇刺是塞尔维亚对它的“冒犯”。附庸国从来不像它们的保护国所认为的那样听话。附庸国往往将它们的保护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因为保护国会高估其盟国的战略重要性。这种关系常常造成误判的恶性循环，1914年俄罗斯—塞尔维亚联盟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之间就是如此。

这正是美国和中国需要避免的陷阱。作为维持“全球领导者”地位

的一部分努力，美国当前正寻求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当前环境非常适合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支点被很多国家视为亚洲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但美国不应对这些盟国抱有想当然的态度，因为它们在近期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时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选择。然而，与修昔底德讨论的城邦和1914年欧洲列强的附庸国不同，当前美国或中国的地区盟国中没有一个希望将它们的保护国卷入战争。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针锋相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者的世界观有别所致。中国和希腊思想史专家劳埃德（G. E. R. Lloyd）认为，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存在根本区别。希腊传统倾向于关注根本问题，可以接受极端的、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思想倾向于优先考虑实际意义以及如何使实用性举措产生最大效果。劳埃德主张，这一差别源自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希腊城邦时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付诸阙如。此外，希腊人在市场上或者公民大会上争辩，而中国的圣贤们在宫廷中争辩，这种环境对论证的辩术和对抗性要求较低。

美国采取的对抗态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的确，美国的大部分政策与其政治体系、文化和制度都是分不开的，这包括以辩论为特征、以陪审团为核心的司法体系，拥有议会制政体的两党体制，以及市场竞争的理念。最后一个例子是宗教。中国的宗教体系，例如佛教和道教，通常可以和平共处；它们在多个世纪以来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共存。美国则不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各种宗教信仰高度竞争的“市场”：300多个教派和团体为争夺信徒的注意力（通常还有金钱）而竞争，且每一家都宣称代表“真理”。换言之，对抗性是美国的默认编码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该地区另一个潜在的导火索当然就是台湾了。美国与台湾之间并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只是美国承诺一旦大陆对台发动袭击，美国将采取“适当行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对台湾发动的任何袭击必将遭

到强有力的常规军事反击。从长期看，北京首先要使美国的威慑失效，接下来要对美国的任何干预行动施加惩罚措施。

但很多台湾人的对抗态度并不如美国人那么强硬，一些台湾人甚至开始质疑与美国保持这种关系的得失。台湾问题可能会自行得到解决，台湾与大陆的交往越来越深，对大陆的投资如今占到台湾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83%。自2009年以来，台湾已经将很多高技术行业向大陆投资者开放。

然而，台湾的未来以及这块争议领土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都还不够明了。一位学者撰文称，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北京影响力扩大而华盛顿影响力缩小，考虑到台湾如今是美国海军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遏制的关键部分，这种此消彼长很可能会带来麻烦。随着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北京可能日益失去耐心。

如果朝鲜半岛或者台湾地区再次爆发危机，那完全可能导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战争。抵消这种可能性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因为环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略断层线。我们的确应该对意料之外的战争感到担忧，但别忘了本书讨论的是冲突的逻辑，而不是常常作为冲突起因的偶然事件。大国战争的爆发是有原因的，它们具备亚里士多德的三位一体论：前提条件、突发因素和触发因素。中美战争的前提条件极有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与试图取而代之者之间的竞争，突发因素很可能是中国试图破坏美国与其盟友/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触发因素则很可能是海上摩擦或者一方嚣张过了头。

这再次提出了社交智慧的问题。战略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多数时候我们与复杂系统的互动非常成功，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处置得当，并非因为我们真正理解它们。民众和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然后尽可能迅速地、富有想象力地应对大国的兴衰以及在很长时间里逐渐出现的新的威胁、风险和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挑战。我们这种无尽和

重复的互动证明我们并不清楚这套系统将发生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用社交智慧来引导自己，而为大战略奠定基础的正是社交智慧。有些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这一事实的领悟比西方人早得多。

智胜美国

> 中国思想认为，就大国实力而言，失衡本身就包含了恢复平衡的可能，不仅仅是可能，还是一种倾向。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就能影响已经在发挥作用的活跃力量，从而避免冲突，甚至达到理想的效果。
>
> ——《恢复力》（Resilience：Why Things Bounce Back，2012）

“心态”（或者说不同文化风格的推理）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各类文献中鲜有提及，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是西方和中国论述中固有的且常常不被人注意的部分。例如，在西方，那些在重重困难之下敢于冒险并取得成功的人常常能够赢得赞许。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台风》（Typhoon，1902）中的麦克惠尔船长。面对一个热带风暴，麦克惠尔并没有绕开它，而是驾驶船只直冲风暴眼并成功脱险。他后来考虑了另一种情况：假设我偏离航道，晚回来两天，他们会问我：“船长，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里了？”“我能怎么回答呢？”我会说：“为了躲避坏天气绕了些远。”他们会说：“那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天气。”我又不得不说：“不太清楚，我躲得非常远。”在西方，人们往往更愿意颂扬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而不是躲避风险的人。同理，很多西方人称赞亚历山大（Alexander）率军远征印度河流域并班师回国（尽管那次撤退是一场灾难），他们还称赞汉尼拔

（Hannibal）带领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尽管他在途中失去了大部分大象，而如果他沿海岸行进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人们传统上对这些冒险者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用孙子（Sun Tzi）的话说，他们就是“无知”的例子。孙子曾试图说明为什么迂回之道更可取。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更喜欢用“弯路”这个词。他写道，“大体而言，走弯路的人认识到复杂的目标往往没有精准的定义，这些目标的本质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能通过实验和发现来习得，走弯路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按照凯的说法，走弯路只是一个适应和发现的过程。那些用直接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有时无法处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可能比不用直接方法的人更脆弱。

中国思想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强调在处理事务时须认清背后的逻辑并顺应趋势。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Julien）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伟大“创意”。按照中国思想，战略的逻辑要求利用事态固有的倾向性。从孙子时代开始，中国的战略思想就一直强调顺应敌人运动轨迹的必要性，而不是与敌人硬碰硬地正面对抗。《孙子兵法》建议，不要在决战中与敌人对抗，而是要顺应事态发展趋势，这样在两军交战前胜负就已分晓。任何事情都源自内部发展，而内部发展的启动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伤亡。

孙子有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建议与西方战略思想强调尽早与敌人交战不同。任何一场战斗都存在风险，不可能成为决定整个战局走向的关键时刻。各方核心力量的碰撞永远都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在中国人看来，像勇气这样的人为因素不过是形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名士兵之所以勇敢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品德，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局面迫使他勇敢。正如孙子所写，良将“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中文里“势”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可能性或趋势，一种可以预

见或者处理的事态发展。顺势而为的国家将会胜利。中国采用这一战略的方式有很多：向美国的盟国施压，迫使它们与华盛顿保持距离；通过网络战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或者通过慷慨的经济援助在全球范围以智谋战胜美国。

1914年的德国试图摆脱由自己一手造成的战略残局（它实际上将自己包围了）。与德国不同，中国没有必要孤注一掷地打破在它眼中由美国盟国对它实施的包围。中国人认识到，要制定最好的战略，就必须对当前形势下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用朱利安的话来说，中国人倾向的不是避免对抗，而是完全消除对抗。

朱利安试图提供一个让我们“无中生有地展望未来思想”的视角。一些汉学家批评朱利安的观点，认为他在没有明确地定义和说明他的主要参考点（西方）的情况下就创造出“另一个”中国。其他批评者则坚信，对西方思想来说，弯路和迂回并不是陌生的概念。要想对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行对比，就必须首先按照各种思想传统自身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然而，尽管有这些批评，中国的战略逻辑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或者说至少它对迂回的偏爱远胜于西方思想。这很可能将是中国在设法对付美国最重要的地区盟国时所采用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尝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促使美国的盟国疏远华盛顿，直至事态发展趋势转向对自己有利之时。这又会导致美国日益被孤立的局面，那种局面与当前中国在亚洲的局面截然相反。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一个战略残局，在面临是发动战争还是在历史中靠边站的严峻选择时，它甚至会选择后者。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会步德意志帝国的后尘，把一切都押注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大胆一跳上。美国孤立主义的本性可能会再次凸显，中国最终可能真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日本和美国：独一无二的联盟？

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达成大妥协呢？休·怀特（Hugh　White）的《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2012）一书提出了这个观点。尽管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发起了挑战，但2012年8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每一个国家”。然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随即指出，太平洋也足够小，可以发生威胁和平的冲突。怀特建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个新秩序，使中国能够继续增强其实力和影响力，而美国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安全。怀特认为，如果这两个大国无法达成这样的妥协，那么一次小规模对抗就可能导致大国战争。他还建议美国应该趁自己的“衰落”还没有明显暴露，中国仍愿意寻求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时候，抓紧与中国达成一致。怀特认为，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认识到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它的盟国（甚至可能包括日本）或许会拒绝选边站。

怀特的主要担心在于，南海的领土争端，或者美国海军在黄海的演习，或者中日在东海的争吵都可能导致中美滑入一场战争。例如，2012年，日本参加的一场名为“铁拳”的军事演习导致中日紧张关系升级，并让人质疑日本是否逐渐放弃战后一直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那次军演包括从一个假想的入侵者手中夺回一座日本岛屿。然而，由于日本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意愿占领该国岛屿的国家，那场军演的目的显然指向了中国可能威胁日本主权这一前景。那次军演与以往历次军演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士兵请求美国海军和空中打击力量的支援，这支精英部队的领导人首次参与了军演的筹划工作，扮演了近乎平等的角色，而不是为美国打下手。在那以前，此类军演的挑衅性质不可想象。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美之间的海上竞争愈演愈烈，但两国现在都没有兴致展开直接的军事对抗。有关亚洲各国应该如何打交道的明确规则也尚未确立，但看起来中国正准备与日本进行一场持久的对抗。的

确，只要中国仍然坚信自己对战略逻辑的理解，那么它或许就有能力让日本脱离美国的怀抱。然而，从根本上说，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表明，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认为，日本的太阳在重新升起。尽管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但就此认为日本一蹶不振恐怕是愚蠢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又恢复了活力；日本正在制定一套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它启动的财政和结构改革项目放在几年之前还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地理因素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在日本人的想象中，中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地理因素让日本政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与这个巨大的邻国共处还是对抗。这常常导致日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请允许我举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美国伞兵部队认为他们俘虏了一名日本士兵，后来才发现他是一名朝鲜人。他的名字叫杨景勇（Yang Kyoungjong）。他曾被日本人强征入伍，后来被派往中国东北。在诺门罕战役中他被苏联红军俘虏（这场战役的失败让日本司令部相信不应在1941年对苏联开战）。后来他先是被押往一处劳改营，然后又被征入苏军。1943年初，他在哈尔科夫战役中被德国人俘虏。一年后，身穿德国军服的他被派往诺曼底，在那里他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他后来选择移民美国，一直活到1992年才去世。

就盟军胜利而言，关键不在于纳粹德国选择与大日本帝国结成轴心联盟，而在于诺曼底登陆期间日本人并没有与苏联人作战这样一个事实。这至今仍是一个缺乏战略远见的经典案例。更令人称奇的是，东京是在德军进攻莫斯科受挫之后才决定对美国宣战的。如果等到第二年再作决定就会明智得多，因为那时可以判断德军的进攻是否彻底失败。结果，到1942年1月德日签署以东经70度线划分各自作战范围的军事协议时，所谓全球轴心战略的观念已经烟消云散了。

地理因素影响国家命运，日本缺乏全球思维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历史和地理具有共生关系。我们理解精神和心智的最佳方式就是确定它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固定不变的地理因素并非总能影响变化无常的人为选择因素，但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对日本来说，地理因素似乎让这个国家染上了视野狭隘的顽疾。

日本常常依赖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来支撑自己的地区野心。最早是英国，那是在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对抗的时候。后来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以此抗衡美国。战后，美国帮助日本崛起成为冷战的胜利者之一，日本也依赖美国抗衡中国。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日本唯一的真正防御，但日本未来认为美国不再是可靠盟友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毕竟，尽管美国常常划定“红线”，但其他国家跨越红线时华盛顿并不总是采取行动。

尽管戴维·皮林对日本的未来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但这个国家正面临恶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1992年西摩·利普赛特（Seymour Lipset）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来几年，这个世界是对美国例外主义更感兴趣，还是对日本的独一无二更感兴趣？”在利普赛特提问的时代，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并在随后的20年里萎靡不振。尽管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但威胁日本经济前景的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依然没有消除。日本的核心困境既不是它的债务负担，也不是它持续贬值的货币，而是它失衡的人口状况。这个国家正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出生率不可逆转地下滑，人口不断老化，外来移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40%，而迅速老化的人口正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日本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0%。

日本的外国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也是最低的（1.7%），并且它还在浪费本国的人力资源。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日本经济中女性的就业人数提升至与男性相当的水平，那么日本就会新增800万劳动力，国民生产总值

（GDP）会提升15%。然而，当前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仍处于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尽管它也在上升。如果不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度改革，不对文化心态进行调整，那么很多日本女性仍然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离开工作岗位。

尽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从未摆脱狭隘主义。尽管它是一个大国，但它关注自身远胜于关注外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0万人之多，而日本学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托福考试成绩在亚洲倒数第二（比朝鲜还低）。自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之后，没有任何知名日本政治家担任过国际职务。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几乎找不到日本人的踪影，在日本的公司、大学、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中也几乎没有外国人担任长期职位。

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中国或许会测试美日关系的深度。尽管日本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团体可能主张与中国对抗，或者在中国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时鼓励日本予以军事应对，但日本选择对中国让步的可能性远大于继续挑衅中国的可能性，它希望与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

印度和规范之梦

就维护国际体系规范而言，印度可能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盟友。尽管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印度人说英语，但它仍是高等教育、媒体和商业使用的语言。的确，印度号称世界第二大（有人认为是最大）英语国家，“印度英语”——英语与印地语的混合体——如今可谓与英语平起平坐。

美印关系的潜台词在克林顿时代就已写好，当时美国号召达成一

个“民主协约”。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协约有可能替代联合国。这个观念后来在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的“民主联盟”（2008）设想中重现，这是一个包含100多个国家的共同体，其灵感来源于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阶段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然而，这两个想法都无果而终，因为它们都将被中国视为挑衅。

尽管有关美国与印度组建更紧密联盟的建议未能实现，但印度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性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国防部2012版《国防战略指针》（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认为，“与印度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两国也的确形成了某种密切的伙伴关系。它们定期开展双边军事演习，并在一系列防务问题上进行合作。最近几年，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安全框架的核心。

影响美印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两国都对巴基斯坦的未来感到担忧。在华盛顿看来，巴基斯坦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在2005年美国和印度就两国民用核合作达成一致后，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在拉瓦尔品第附近兴建了一处弹道导弹工厂。中国人还帮助巴基斯坦研发了“沙欣－1”导弹。中国人对瓜达尔港也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取得了管理权。瓜达尔港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战斗群的一处重要基地——如果中国决定（可能是2020年左右）在印度洋部署这样一支力量的话。

然而，美印关系的历史有些复杂。奥巴马曾公开表示，两国“有担任领导者的责任”，他还发声支持印度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这两个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印度曾竭力规避对伊朗的制裁机制，并且像巴西一样奋力抵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印度对美国的很多倡议以及自由主义议程并不热心，并且像所有“金砖国家”一样，印度对西方的统治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厌恶。印度和美国在有关阿富汗未来的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使人们想象中支撑两

国关系的共同价值观遭到进一步的质疑，人们还会发问，一旦与中国关系恶化，印度将获得多少支持？如果中国继续向中亚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将自己的海军力量直接投放到印度洋和海湾地区，那么中印之间必将爆发冲突。一旦中印之间出现危机，那么美国支持印度的可能性极大，实际上这与冷战时期经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颇为相似。

然而，历史上印度向来缺乏战略头脑，当代印度政治家是否能够制定出符合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的战略叙事仍值得怀疑。不仅如此，地区性对抗固然重要，但印度的内部脆弱性也很严重。在外部世界的游客看来，印度似乎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然而，三分之一的印度人没有电力供应，印度的成人识字率（65%）与马拉维相同。每年17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在幸存下来的儿童中，半数发育不良，因为印度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比厄立特里亚还严重。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数据，37%的印度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的贫困人口比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在印度，讲英语的政治阶层与普通选民之间在寿命、预期和行为上的差距比任何其他成熟民主国家都要大。

印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2013）中写道，“印度社会被各种矛盾撕裂着。”森援引安布罗斯·比耶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1911）中的解释，即耐心是“一种低级的绝望，却伪装成一种美德”。印度正面临自己的存在性危机，或许不愿意——甚至不能——在事态严重时顶住这个邻国的压力。如果再次爆发1962年那样的“战争”，那么中国或许会相当轻松地取胜；那或许足以遏制新德里在印度洋扮演大国角色的野心，还将使印度在推进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时战战兢兢。

中国、大战略和战略自闭症？

简单地说，中美两国不大可能被各自的盟友拖入冲突。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它们会因为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而发生冲突，就像过去200年间大部分的大国冲突那样。如果爆发此类冲突，那么美国或许不会拥有它希望的或者需要的盟友。话说回来，正如接下来一章将要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战争或许根本不需要盟友或者联盟。

2011年，一位中国学者暗示，中国没有一个大战略。其实很多西方人也持有这种观点。美国最具启发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甚至认为中国无法战略性地思考。根据他对“战略逻辑”的西方式理解，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漫无目的地最大化自己的实力，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外部的反应。

勒特韦克在《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2002）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战略的逻辑。该书认为，实力的增长会激起外部反应，最终延缓其增长。希望变得无比强大的国家往往只能强盛一时。他在距今更近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远比前作惊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向来没有进行战略性思考的必要，因为它与世界割裂得太久。它患有“战略自闭症”和“战略缺乏综合征”。它孤芳自赏，把一切问题归于美国，殊不知若自己处在美国的位置上也可能会那么做。它还坚持中国中心论，只能带着自己的眼镜看世界（勒特韦克还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中也存在这种问题）。结果，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基础。

然而，中国的行为中被勒特韦克批评的那些方面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意志帝国据说就患有“战略自闭症”。德国人常把被外界包围挂在嘴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它基本是自作自受。如果将德国人眼中的包围描述为其他国家对遏制的被动反

应或许更恰当些。实际上，德国把自己包在了大国的一致行动之外。

德国还缺乏社交智慧——德国也患有“战略缺乏综合征”。社交智慧是大战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国选择正确的敌人和正确的盟友，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所说，这可以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国家至少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社交智慧是战略思考的核心部分。要想具有社交智慧，一国必须具有原始同理心：把自己置于另一国处境之中的能力。同理心要求一个人理解其他人的所感和所思，它需要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同理心倾听”。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中，亚当·斯密写道，“一个人需要通过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之中，设身处地地体会受害者在‘最细小的情况’中可能遭受的每一丝烦恼，这甚至超出了一个人自身的经历。如果一个人并不希望获得对方的感受，那么这件事就很难办了。”社交智慧还要求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认知能力，包括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运作，以及这个社会的习俗和禁忌。它要求我们破解其密码，洞悉其规律。它使我们有机会创建成功的伙伴关系，从而在危机恶化之前将其化解。

这些特征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行为中付诸阙如。例如，德国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挑衅英国。它对1895年中日战争的结果进行干涉，这源于一种毫无根据的担心——如果它不干涉，英国就会在该地区获得新的利益。在19世纪90年代，刚果、苏丹、摩洛哥甚至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每一个战场都有德国人插手。1894年，英国外交大臣在写给驻柏林大使的信中说：“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会产生深远影响，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指望用这样的政策获得什么优势呢？”德国人在南非詹姆逊突袭事件（英国人试图撼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政府）上进一步惹怒了英国人——他们祝贺德兰士瓦总统在外部进攻之下维护了国家独立。正是这个举动促使英国大众传媒界第一次公开批评德国。

德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只算是序幕，日后它将犯下最严重的错

误——决定打造一支一流的海军，这个决定同时惹怒了英国政府和民众，其目的何在至今仍未有公论。发展德国海军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但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成本过于高昂。尽管德国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位居世界第二（244美元，而德国为184美元）。尽管德国经济规模更大，但到1914年时这种领先优势十分微弱（差额只有10亿美元）。与此对比的是，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但人均收入（377美元）全球最高，而且其经济规模也比排在后面的4个国家（包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大。1912年，德国人不得不中止了海军军备竞赛。然而，根据海军上将穆勒（Admiral Von Muller）的日记，就在叫停军备竞赛的同时，德国海军的首脑们却要求开战。穆勒出席了1912年12月的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是德国人第一次详细讨论与英国进行海上作战。

这是“战略自闭症”的明显案例。心理学家西蒙·巴伦 - 科恩（Simon Baron - Cohen）将自闭症患者描述为“脑盲”患者。他认为，要想对自闭症患者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就应该将他们对外人的感知能力和整体心智技能理解为弱于常人，而非完全缺失。因此，自闭症是一种情感缺陷，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国家就没有情感生活。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感像欲望和需求一样，对社会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情感是平衡与失衡、满足与不和的精神表现。它们不一定反映出外部世界真实的和谐或不和，但一定会反映出自身的不和，反映出内心深处的生命状态。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写道，“人们有理由好奇，情感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复杂物种的主要特征，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生命状态。情感不只是装饰品或者感情的附属物。它们能够并且经常地揭示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达马西奥强调：“如果说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同时揭示我们的渺小和伟大，那这种东西就是情感。”这种论断在讨论冲突时依然重要。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将情感视为未来战争爆发的最大导火索，它们取代了曾在20世纪引发多次战

争的政治信仰。

这方面文献论述较多的一种情感就是怨恨（resentment）或者法语中的“怨恨”（ressentiment）。尽管这个词常常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学文献中使用这个词的学者们往往对尼采的作品一笔带过。对这个词探讨最透彻的要数理查德·艾拉·休格曼（Richard Ira Sugarman）的《及时行恨——怨恨现象学》（Rancor Against Time：The Phenomenology of Ressentiment，1979）。这一概念被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用于描述期望落空，这是伸张正义的核心动力之一。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特别强调权力集中和权力缺失，尽管他在处理这个词的时候更喜欢用英语的“怨恨”。然而，法语“怨恨”的含义覆盖了从“尖刻”、“不快”到“愤恨”的各种语义，有时是这三个词的组合。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开始追求尊重、认可和权力均等——全都是具有情感和精神意义的词语。这三种愿望表明，德国希望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三种愿望适得其反，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危险性。当一个社会缺乏自信时，它不大可能对其他社会的成就表示尊重，反而会转向孤僻。过于关注自己往往会使自我过于膨胀，同时过于敏感。当一个国家变得自我封闭时，它就会认为自身才是真正重要的，外界的认可几乎毫无意义。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写的，当国家陷入不安全感和自我认可的循环之中时，它们常常会抱着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将此前的成就挥霍掉。德意志帝国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它总是在担心无法参与公平的竞争，因为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所以它必须坚持己见。它可以要求获得尊重，但它没有能力赢得尊重。德国决策者担心，德国如果做不到坚持己见，就会面临帝国首相所说的“挥刀自宫”的后果。

但怨恨也并非没有心理上的回报。对那些认为自己分到了一手烂

牌的人来说，怨恨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它还能使人忽略自身行为的后果。的确如此，正如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写的，当一个国家像1914年以前的德国那样无法实现梦想时，对于后果（例如一旦战败可能遭受的破坏或者毁灭）的思考不大可能阻止它抑制自己的冲动。正如神经科学家如今宣称的，人类处理要求获得尊重之类的"神圣价值"的大脑区域正是专门负责按规则行事的区域，而不是打功利主义算盘的区域。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也染有此疾。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局部大国"，这个国家仍然感到不够安全、困惑、失落、愤怒、不满足、自私、暴躁并且内心深处倍感孤独。尽管他没有提及"怨恨"这个词，但他似乎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概念。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大国，既无友邦，也无盟国"。尽管中国频繁表达它反对什么，但它在表达它渴望什么或者代表什么的时候却谦卑得多。沈大伟还指出了当代中国历史和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在2009年10月中国庆祝国庆节期间，他观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包括上万名迈着正步的士兵和搭载洲际弹道导弹的重型卡车，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强大，但也凸显了它的焦虑。一边是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另一边是深深的不安全感，两者的混合揭示了中国矛盾的本性。

勒特韦克对中国崛起的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他坚信，中国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它认为其他国家都暗藏动机，但它如果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也可能会有这些所谓的"动机"。它自感受到伤害，于是更加固执己见。但这真的是文化（或者说是心态）或者战略DNA的产物吗？或者它也很可能是历史的产物？毕竟中国现在才开始面对自身权力的本质，这些挑战考验的正是一个社会的社交智慧。

这些挑战中的第一项就是评估自己的实力。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对各国生活水平的排名）分别排在世界第120位和第121位。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处于厄瓜多尔和牙买加之间。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近期追赶上美国的前景十分渺茫。日本在1990年也达到了这个阶段，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陷入一场长达20年的衰退（然而，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当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0%）。在《蹒跚的巨人》（Stumbling Giant，2013）一书中，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将人口问题视为中国希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富强的最大单一障碍。中国甚至在2011年首次遭受劳动力短缺之苦。到2030年，年长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的数量比将达到4比3。比尔德森还认为，中国或许最终会栽在人口结构上。中美两国人口比例可能将从当前的4比1降至本世纪末的1.9比1。

应该记住的是当年人们对德国即将崛起也曾达成普遍共识。直到1945年，德国一直在科学领域领先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发动机、第一枚巡航导弹（V1）、第一枚弹道导弹（V2）以及第一架洲际轰炸机。它还非常接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德国一些最优秀的犹太人科学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爆发，那么德国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未来过于悲观，因而选择争取主动权，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中国面临的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将它的实力转化成影响力。中国相对缺乏文化实力。尽管它在国外开设了大约400所孔子学院，但几乎没有外国人梦想成为中国人，或者永久性地在中国工作。与德意志帝国的“英格兰内核”不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内核”。法国《世界报》主编在“9·11”事件后写道，“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尽管小布什政府将蠢事做尽，但这一点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代表着所有仍然需要它保护，或者说仍然在其保护罩内生存的国家。作家J·M·库

切（J. M. Coetze）写道，“由于美国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因此它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我的国家，是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人的国家。”

第三项挑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中国极难与他国分享权力，因为它此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它缺乏与盟国密切合作的历史经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一些建立多边机制的经历。它从未召集或者领导一个国际联盟。不仅如此，它（在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权力社交网络尽管一直在扩大，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尽管中国在逐步构建这些网络，但与美国和更广义的西方“想象的共同体”相比，这些网络还很“单薄”。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明昊的分析相当令人信服。中国距离让其他国家相信自己的“诚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将不得不学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立场，抑制他所说的“帝国式冲动”。但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对未来的焦虑的话，那么它们也需要展现出足够的社交智慧——尤其是同理心倾听。

不幸的是，中国所面对的大国拒绝放弃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处境的重要方面鲜有换位思考。前文述及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海军陆战队，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是怎样呢？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部队，并且在美国周边保留军事基地、在拉丁美洲组建联盟，那么美国会作何感受？如果中国宣布主导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要求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么美国又会作何感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主角，美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它很难想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面对外界的威胁，或者至少是包围会有何种感受。面对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本就无法换位思考，可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竟也丝毫不放在心上。

大战略是社交智慧的一种新质[5]，美国——至少在当前——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以及国际政治乱局中穿梭自如，这一点远胜中国。有时它可能愚钝（“丑陋的美国人”）或者天真（“沉静的美国人”），有时甚至粗野无礼，但它能迅速调整。这部分是因为它不得不满足如此多盟友的需求并且管理如此多的联盟——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话说，联盟就是手铐，它们不让你的手臂自由挥舞。联盟的社交质量就像个人关系的情感质量一样，取决于我们在与盟友或友邦互动方面投入多少时间。网络建设要求各方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确保互惠（抵制搭便车的行为）。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动用操纵、诱惑甚至含蓄的威胁等各种手段，这样才能确保各方坚守承诺，自己不被自己操纵（那将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这里需要的是战略头脑，而那些历史上参与过真正的同盟战争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下半叶的苏联不能计入此列）通常在设计战略时更有头脑。

中国军队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对战略的论述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它仍频繁地引用孙子。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写道：

> 除中国外，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略方针发起一项全国行动，并且他还深信其同僚能够领悟他引用典故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不断的文明，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其古老的历史以及经典的战略方针和治国之道如此地密不可分。

《孙子兵法》以及《武经七书》[6]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份认

同至关重要。解放军的各种手册中常常将4000年前的战争作为战略思考的教学案例。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战略文化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优于西方，而尊重这些凝聚古代中国战略智慧的作品正是持有这种信念的基础。然而，任何曾经尝试阅读《孙子兵法》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它不但多用警句，而且深奥晦涩。它的理解难度堪比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格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这本书受到了孙子之前的周朝军事思想的影响，而孙子相信他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不仅如此，为了减轻文本的晦涩程度，译书之人常常加入了对作者意图的解读，而这可能会产生误导。译者过于渴望使孙子的观念和论述变得更易于当代西方读者理解，这导致读者常常无法在准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理解孙子的观点。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能面临被忽视的风险。第一个原则是战争往往会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启动非理性的力量。第二个原则是战争绝对有必要从属于政治。如果这两点继续被忽视，那么中国绝对有高估自身力量的风险。

关于第一个原则，孙子的思想与克劳塞维茨有些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三位一体”：非理性力量，例如暴力的情感（包括仇恨）；不确定的力量，例如摩擦和“战争之雾”；以及理性，即战争从属于理智（被用作政策工具）。其中两个元素，即情感和理性，属于人类心智的内部力量；偶然性和可能性则属于外部力量。情感和理智都有关人类意图。偶然性和可能性则代表具体的事实——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上，但后者常常让这些意图无法实现。换句话说，战争是一套以人类维度主导的复杂体系。正是这个维度有一种摆脱政治控制的倾向。

孙子的观点与之大体相同。的确，中国的经典兵书对战争如何迅速启动非理性力量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与西方战略思想家相比，它们对理性能够控制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怀疑程度也要大得多。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摆脱政治控制的风险。

2012年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的规模程度让中国的领导层都感到惊讶。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经济学人》甚至开始猜测两国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

中国战争思想的第二个主要话题是国家有必要控制军队。问题在于，军方的很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文官政府则谨慎得多，不愿对历史发展进行猜测。有些官员认为，美国会反弹甚至复苏；其他人预计中国的增长会下滑，两国的差距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总之，他们希望控制美国，而不是与美国对峙。

中国的国防开支已经并且仍在大幅增加。2013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数十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0%）。这延续了自1989年以来国防开支维持两位数名义增长率的趋势。唯一的例外发生在2010年，那很可能是由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资金被用于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军事大发展的起步水平较低，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其国防开支大幅增长，以至于解放军获得的资金已经仅次于美国军队（但与美国军费的差距高达数千亿美元）。

中国认为自己只打防御性战争，但西方人可能并不这样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认为，对于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海军将付出多大代价，或者其他大国可能作何反应，中国军方的著述显然缺乏思考。民族主义言论常常对中国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作出极端化，甚至是非理性的评估，并且幻想着中国有能力通过开发自己的军事资源来应对美国的“威胁”。

结　论

本章之前曾提及鲁梅尔特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大战略都既需要一

个连贯的设计，又需要颇有眼光地重构竞争态势。就第一点而言，中国人对战略逻辑的理解有很好的连贯性，只不过他们尚未制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关于第二点，中国的军方和政治家有可能在执行不同的政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策划战争而言，美国军方也不是完全受政治操控。美国军队一直是一个“自变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随其规模变化而变化的应变量——即便未来美军的规模会缩小。的确如此，回顾近期历史，美军似乎多次下定决心打一场政治家们并不想要的战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61年来到国防部之后发现，这个最高军事指挥部固执己见、桀骜不驯。在一年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几位参谋长几乎独断专行，险些酿成大祸。今天的问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军事行动黯然落幕之后，很多军方领导人下定决心要为与中国开战作准备，希望扭转，或者至少延缓即将实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

尽管两国政界领导层都谈论和平与合作，但两国的国防部门想得更多的似乎是战争。值得关注的焦点是“空海一体”战略，美国的民选官员——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并没有对这一战略进行彻底的评估。

当前有关中美冲突的思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的想法高度相似。在大国冲突问题上的普遍懈怠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军队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的媒体常常发表一些号召告别“浪漫的和平主义”的论调，认为对中美战争的前景和可能性进行现实主义讨论已无必要。因此，明智的做法是追问这场战争将采取何种形式，一旦战争爆发，最终获胜的是美国还是中国。

1 实际上，和平协议在1814年就已经签署，而美国人在最后一

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则开启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政治生涯。——作者注

2 事实上，《此刻联合》一书建议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组建一个共同政府，并非只包括英美两国。——译注

3 此处作者引用资料有误。准确说法是，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到2020年，美军将在太平洋部署60%的军舰，而之前这一比例为50%。——译注

4 此处系作者笔误。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原文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可持续发展”，而非suitable development（适宜的发展）。——译注

5 新质（emergent property），生态学用语，概指事物突然涌现出来的性质。——编注

6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大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编注

第4章　战争及其多变的逻辑

《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预测任何战争的可能性通常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战争要么爆发，要么不爆发，一旦预测失误，那些末日预言家必感难堪。在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阶层基本持乐观态度。尽管英国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有一定的战争恐慌，但这些恐慌主要体现在畅销小说中。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大国战争的终结就像宗教和迷信的终结一样不可避免。《经济学人》甚至总结说，1904年英法协约“体现出的趋势正缓慢但确定无疑地消除世界各文明社会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乐观的氛围已经消失，空气中弥漫着悲观的味道。几乎从最开始就有人预见了纳粹构成的威胁。H·G·韦尔斯在他的小说《未来互联网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1933）中不仅预测将再次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甚至还指明了战争爆发的日期（他预测的是1940年，与现实差了一年），并且他确确实实成功地预测了最可能成为导火索的地区：但泽走廊。30多年后，美国记者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Harison Salisbury）出版了《即将爆发的中苏战争》（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1969）。他在书中预言，中苏即将发生碰撞，双方很可能已无法回头。问题不是是否会开战，而是何时开战。他并非完全判断错误。当时两国距离开战仅有一步之遥（据说苏联人甚至考虑对他们的昔日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多年以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 Munro）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1997）一书中也对未来中美交战作了设想。

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作者在预测未来时就处于一种有利位置——他们暂时还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嘲笑未来学家或未来主义者，而是告诉读者，他们的最大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战争自身多变的本性。

乍一看，H·G·韦尔斯似乎是个意外。在1902年，他预见到制空权的极端重要性，并想象了未来空中战场下方平民的命运。“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时时仰望，心中充满失落和不安。”他还设想人类会发明原子弹，还有“陆地机器”（即坦克）甚至潜射导弹（或者“远程航空鱼雷”）。然而，尽管他的预测令人印象深刻，某些部分也大体准确，但在其他方面，这些预测相当狭隘。在《未来互联网纾》中，韦尔斯笔下的太平洋战争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的放大版。他把坦克想象为移动火炮，相互投掷炮弹，直至一方获胜。甚至他所想象的原子弹也是从双翼飞机上扔下去的，而不是由远程轰炸机来发射。正如他后来承认的，他的小说《空中战争》中对未来的设想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已，是“一部荒诞的闹剧”。

同样的缺陷也能在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他的妻子梅雷迪思·勒巴德（Meredith Lebard）于1990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中找到。两位作者预测，美日两国将在20年内发生冲突，曾在1941年引发战争的地缘政治动力很快又会发挥作用。这种预测现在看来相当不合时宜。当然，它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引发的普遍恐惧，

这在当时的大量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就包括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Crichton）的惊悚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1992）。讽刺的是，该书出版时，日本已陷入衰退。该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抓住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引发了有关美国衰退的又一场全国大讨论。这些作者再一次让读者相信，未来的海战仍将采用大型舰队在太平洋作战的形式，就像美军与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交战那样。

高枕无忧的心态让西方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毫无准备，而认为大国战争如今已经过时的观念正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例证。即便这种观念可以被视为正确，但它仍将面临冲击。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不解决战争问题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战争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过去曾发生变化，而今仍在继续变化。正如我在其他作品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战争穷尽其进化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终结。

战争不断变化的特征

> 中国是否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构成军事威胁？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个答案或许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
> ——《展望未来》（Futurevision，2012）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战争一词让人误以为它是具体的，但一切具体事物只能用比喻来表述。就战争而言，克劳塞维茨简要描述了三个比喻：意志的冲突、决斗和摔跤比赛。决斗不一定导致流血（只要维护尊严即可，重要的是要为外界所知），摔跤通常根本就不会流血。即便是意志的冲突也可以采用非暴力形式。然

而，在克劳塞维茨及其信徒看来，流血才是战争的核心。

我们所界定的“正确”或“错误”并非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我们对事物的定义。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1808年之后给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带来麻烦的西班牙起义。当时的两位杰出军事思想家——亨利·若米尼（Antoine - Henri Jomini）和克劳塞维茨——在西班牙起义是否属于战争一事上存在分歧。若米尼认为这些起义者——历史上最早的“游击队员”[英语中的“游击战”（guerrilla）一词即源于此次斗争]——参与的是一场战争，但克劳塞维茨不这样认为。然而，萨拉戈萨的确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惨烈的巷战。起义者的战术只是造成这种分歧的部分原因。二人的分歧还涉及宗教是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在这起激烈的冲突中，启蒙运动与之前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迎面相撞。拿破仑曾宣称，“修士越多的国家越容易征服”，但历史学家今天在回顾西班牙的这场斗争时，倾向于将其视为1648年以来的第一场宗教战争。历史学家威廉·内皮尔（William Napier）将西班牙人不愿屈服的原因归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神父让他们相信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受到上帝的诅咒，“圣灵流出、奇迹、预言、圣物分配以及任命圣徒指挥军队等，这一切让爱国群众狂热不已”。在当代，正是宗教为城市中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如此多的人手，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或者犹太人，都是如此。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都是从有信仰的人群中招募而来的。

换言之，人们倾向于参考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来理解不同的现象，但只要是定义就存在争议。说三角形内角之和是180度只有在欧几里得体系内才是正确的（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就不是）。说苹果是被子植物只有以某些植物学分类规则为基础才是正确的。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战争一定是暴力的（动能的），尽管人们常常强调这一点，但它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笃信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称，一个定义只有在被证明有用时才是正确的，而只有当它正确时它才有用

（这里所说的正确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这是正确的唯一定义）。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对上述西班牙起义解读不一。在同一个文化内尚且常常会出现意见分歧，当不同文化对话时这些分歧只会更大。这可以解释西方读者为什么常常对《孙子兵法》感到困惑。孙子对战争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它反映出道教对世界的领悟。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强调未雨绸缪、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势”的理解——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现实。即便西方和中国对战争的理解无法用同一种尺度来衡量，就像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一样（只有在托勒密体系中，本轮和均轮[1]的概念才具有准确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无法比较。事实上，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托勒密通过本轮和均轮这两种概念来解释的宇宙天象。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就是哥白尼希望用另一套概念解释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成书两千年后仍被人阅读，以及为什么孙子的思想在今天仍能引发共鸣（尤其是在美国军人中，尽管这颇有讽刺意味）。这些思想在未来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共鸣，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争阶段——一个“凉战”和“密码战”的时代，战争手段是非动能的，包括胁迫和用最小代价将己方意志强加给对方。

即将与中国在海上开战？

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连续性和严重的不连续性并存。尽管战争是多变的，但它总能从历史中汲取灵感。旧的现实并不总是被新的现实取代。194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质疑世界是否真的在缩小。他批评1914年之前出版的那些进步主义书籍滥用一些套话，例如“消灭距离”和“边界的消失”。今天的世界正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尽管人们大谈特谈全球化，但地理仍然极其重要。要说明这一点，可

以参考一位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作品，这位思想家就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

斯派克曼的作品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不再被读者重视。今天之所以还有人阅读他的作品，通常是因为曾经有人读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遏制政策的提出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斯派克曼的写作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时很担心美国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会重拾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奉行的孤立主义的下策。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中国最终将成为亚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美国可能被迫承担防卫日本的责任。

斯派克曼主张一国之地理乃其制定政策之本，而非制定政策之因。他认为，地理会影响行为，而不是决定行为。地理给一国带来的机遇和限制对于政策和战略选择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点一直被当代地缘政治思想家科林·格雷（Colin Gray）反复提及。格雷断言，地理决定了各国本身以及它们所争夺的利益，并且各国永远会根据地理决定的条件来衡量自己的相对安全程度。地理也决定了政治话语，它甚至会影响身份认同。在地理的主导之下，几乎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国国土大小和资源禀赋对其政治凝聚力具有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这在其漫长历史中位居决定性要素之列。

斯派克曼的思想对于理解中美两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战略现实依然有重大意义。美国是海洋大国，中国是陆地大国。两国的最大差异在于它们对空间的理解不同：

> 海洋大国在不同的落脚点之间来去自如，以此占领大片空间。它尽可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存的政治关系。通常在自己的事实统治被默认许久之后，它才会确立自己的合法控制。陆地大国的扩张则是节奏缓慢、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地理特征迫使它一步一步地确定自己的控制，并维持部队的机动性。因此，陆地大国思考的是围绕一个核

> 心控制点的连续扩张的平面，而海洋大国则思考通过多个点及其连线控制大片区域。

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现实与斯派克曼的时代相差无几。中国人掌控了陆地区域。在中俄边界，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除非俄罗斯能够使其武装力量现代化，否则中国人的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即便俄罗斯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它在远东的势力可能依旧薄弱。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2] 已经是一座双语城市，懂汉语和懂俄语一样重要。中国对西伯利亚的渗透同样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在几乎掌控了整个东亚大陆。

中国有可能决定向内陆扩大战略纵深，而不是在海上与美国对峙。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并非西方独有，就像并非只有西方国家关注大战略一样。中国也在打造自己的地缘政治叙事。面对美国的支点计划，著名美国问题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王缉思提出“西进”——加强和深化中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影响。他敦促中国不忘自己陆权大国的根基，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向西发展破除美国的战略优势。“西进”不仅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这项国家战略的目的是推动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将对过于关注东亚的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的遗产）进行再“平衡”。这将涉及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中亚从闭塞内陆改造成四通八达之地，从而使该地区（以及中国）能够进入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市场和港口。

王缉思认为，在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瓶颈地区，海军力量对于保卫战略交通线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地区空间过窄、海水过浅，海军无用武之地并且很容易被水雷和反舰武器限制。他更倾向于利用中国自身的战略纵深，也就是内陆交通线——通往中亚和东南亚的陆上通道。一个世纪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欧亚地区是海洋大国力所不及之地，但铁路却可以进入这一地区，而铁路是一国权力的延伸。他认为铁路为具“有深远影响而又有

所局限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这使欧亚地区成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一些美国专家也大致认同这一观点。2013年，巴里·波森（Barry Posen）提出，美国已经无力承担没有终点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决定在从朝鲜半岛到中美洲的各个地区对抗共产主义。人们认定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推动了这一战略，但实际上凯南本人对这一战略是心有疑虑的。波森希望美国将一个没有必要、没有效率、扩张性的霸权主义战略替换成一个专注于阻止中国打破当前全球力量对比的战略。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欧亚地区站稳脚跟，那里是麦金德眼中的世界地缘政治轴心，因为任何大国只要掌控了这一地区，就掌控了世界上三个最发达且最具经济生产力的地区中的两个。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麦金德甚至预见中国最终将从这个全球大棋局上挤掉唯一的竞争者——俄罗斯。

战略纵深是一种物质实体。但即便稍稍翻阅一下麦金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感到欧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仅是由地理决定的，还是由那些可能利用这一地区的大国的生命力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在麦金德看来，铁路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而在当代，铁路更是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中国才下了很大力气在中亚和东南亚修建新的铁路网并扩建原有的铁路网。

战略纵深还是一种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创造出物质实体（延长铁路网和能源管道），这又对我们的选择起到反馈作用。因此，战略纵深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大国政治的永恒因素之一就是想象决定存在。如果竞争（借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著名类比）是意志的冲突，那么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迫使对方按照己方设定的条件来谈判。乔治·凯南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才敦促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缔结同盟，这样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冷战强调的不是在实战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确保这种优势对对手构成潜在的威胁。

按照中国的看法，欧亚牌为其提供了打破美国战略优势的机会，因为中国可以经亚洲中部和西北部的陆上通道抵达海湾地区和印度洋，从而彻底破除或者严重削弱美国作为海上霸主的优势地位。美国的优势体现在它能够控制世界主要海上商道，以霸主之尊维护海洋或者“全球公域”的秩序。美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连接东亚和中东的重要航线，这部分原因在于它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达成了海军准入协议。

借用另一位古典地缘政治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的话：

> 最能看出海洋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方法就是将其视为一种交通要道；再准确些，就是将其视为一片宽广的公域，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穿过这片公域，但其中一些路线走的人最多，这说明某些原因让人们选择这些路线而不是其他路线。

美国仍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咽喉要道（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最有条件将这些要道封锁）。就当前而言，美国还最有实力维护“现行交通规则”。像当年的英国海军一样，航行自由一直都是美国海军获得的一项重要授权。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时会引用艾尔·克劳（Sir Eyre Crowe）在1907年写下的著名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解释了为何第三方（甚至是英国的对手）无论多么不情愿，最后都会接受英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克劳大胆地提出，这些国家或许不喜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是任何潜在的海上霸主中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个。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国际警察维护着海上航道的秩序。就美国而言，这正是它的最大优势：需求政治而不是供给政治。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崛起大国常常试图挑战现有大国。中国人正在加强自己的海军建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人在

建造潜艇方面全球领先，几乎平均每年建造三艘潜艇。尽管这种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它，那就是中国正在从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海军——几乎全部依靠单独作战的战舰和仅具备基础无线电和数据通信协调能力的战机——向一个协调性强、具备离岸兵力投放能力的海军转变。中国甚至可能怀有更宏伟、更长期的雄心：不仅仅是让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处境艰难，最终还要迫使它退回珍珠港，而那里正是美国成为今天这个超级大国的起点。

空海一体战

美国与中国如果进行长期对抗将采取何种形式？美国海军拥有一个名为“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念。尽管过去这一战略常常被人提及，但现在军方非常谨慎，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语。它显然绝非一个作战理念那么简单，一些专家将其视为一项战术方案，而另一些专家则直言，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与美国对抗。

2011年11月，五角大楼在一篇充满专业术语的简报中宣布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实际上该办公室3个月前就成立了），但这篇简报没有对这一概念本身作出多少解释。然而，我们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足以得出一些结论。一旦中国在西太平洋向美国发出挑战，美国海军将努力承受住第一轮攻击，随后将对中国的战斗网络发起反击，压制中方远程打击系统，夺回主动权。美国海军因此有能力在一个拒止环境中重获战略霸权。

美国将需要日本海军的帮助——那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目的是控制中国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美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尤其是隐身技术，以及中国的网络战能力是否能继续提高，直到足以对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造成破坏。

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一书中，两位作者[3]提出，中国直接与美国对抗（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做法是化解美国的优势：阻止美国将航空母舰部署到台湾海峡，并且通过破坏其卫星能力让美军失明。这种更加间接的方式似乎正是中国当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上投入巨大，使用潜艇和路基导弹，包括东风－21导弹（该导弹目前射程只有800海里，但可以升级至1500海里）。美国方面则投入资金提升应对能力，希望其海军舰艇能够击落来袭导弹，最好是阻止这些导弹锁定目标。美国还计划使用更高级的潜艇对付中国部署在近海的潜艇，从而保护美国的海面舰队。中国人也将面临自己的问题，因为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所需要的很多侦察和武器平台都是由空军或第二炮兵部队部署的，并非海军所控制。这三个军种可能拥有不同的组织体系，这可能是一种优势，也可能是一种障碍，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军种之间的协调程度。

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宣称，空海一体战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各军种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本身”。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航空母舰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成为东风－21导弹的主要目标（也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目标，因为美国海军60%的兵力都被编入航母部队）。中程弹道导弹尽管不如反潜弹道导弹技术先进，但也可以将关岛的美国海军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导弹技术（相对于造船成本来说）是廉价的，而且中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此外，美国也很难摧毁路基导弹发射场。然而，要打击海上移动目标也没那么容易，远程侦察系统依靠超视距雷达系统，后者又依赖大量侦察卫星，而中国的此类卫星数量有限。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写道，“美国很可能希望通过网络战或其他非动能手段削弱中国的侦察能力，而不必打击其路基系统。为了降低本方军舰的目标特征，美国很可能会建造更小的平台，同时尝试通过部署潜水无人机或无人水下航行器来消除中国潜艇构成的威胁。”

与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非常相似的是，美国海军也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对手可以在海上对其构成明显威胁。但如今发生了变化，中国海军尽管远不如美国海军强大，但中国具有战略纵深的关键优势。为了对抗这一优势，美国海军正在部署新的濒海战斗舰，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务必取得在领海上的本地优势。

然而，如果更加仔细地审视一下空海一体战理念的细节，就会发现其中的危险——美国将不得不袭击中国的雷达站和路基导弹发射场，而这可能导致战争升级。远程隐身轰炸机和第五代战斗机以及巡航导弹将不得不瞄准中国的指挥中心、地对空导弹群和反舰弹道导弹发射场。网络攻击很可能会扩展到其他路基系统。的确，网络空间与有形物质（而不是虚拟）环境之间的互联性日益加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联网”或者“网络物理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这两个领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消失。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所有的陆基弹道导弹都由第二炮兵部队控制，因此只要打击东风-21导弹发射器就必然打击第二炮兵部队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还负责执行中国的核威慑。因此，这种打击与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就无法区分，被解读为后者也几乎是必然的事。

很多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以外的军事专家担心，美军后勤方面的虚弱意味着必须选择首先发动攻击的策略，如果美国等到遭受攻击后再反击，那么这场冲突迟早会升级到脱离政治控制的程度。空海一体战将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终在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在美国看来，这种战略的理想程度达不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型”。这种前景在计算机模拟中看似不错，但如果考虑政治现实的话就不是这样了。美国的盟友或许只有在战火燃烧到本土时才愿意入伙。一旦朝鲜进攻韩国，或者如果解放军攻打日本的指挥和控制中心，那么其他盟友是否愿意参与进来就值得怀疑。

即便是美国最早的地区盟友澳大利亚或许都不愿意卷入其中。各国都渴望留有回旋余地（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盟国将大国卷入战争，

而盟国有时会改变它们的效忠对象）。澳大利亚一些顶尖的防务专家高度怀疑参与这种不大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是否明智。如果美国从澳大利亚的基地发动空袭，甚至澳大利亚海军参与在马六甲、龙目岛或者巽他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深陷一场可能以动用核武器收场的冲突（例如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正是因为察觉到关岛容易遭受攻击，所以美国正在将塞班岛改造为一个备用的军事基地。美国空军不仅计划定期向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廷德尔派遣军机，还计划向新加坡的樟宜东空军基地、泰国的呵叻（Korat）和印度的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派遣军机。如果这些盟友感到这一战略对它们构成威胁，那么这些设施十年之后还能为美军所用吗？

空海一体战是一种作战理念。一切没有明确战略的作战理念都是灾难性的，就像德军的闪电战一样，在1940年对付法国时相当有效，但在第二年对付苏联时完全失效，只带来了一系列“失去的胜利”（战术上的成功没有带来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一个替代空海一体战的选择将是离岸控制，这是由T·X·黑姆斯（T. X. Hammes）提出的经典的封锁战略，它是指将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结合起来，通过租用商业平台使美国海军及其盟国能够拦截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油轮和超巴拿马型船，或者迫使这些船只绕道而行。在第一岛链以内将设定海上禁区，美国海军可以拦截、没收和出售可疑船只。

如你所料，黑姆斯对离岸控制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该战略不需要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打击，也不需要在第一岛链以外采取海上行动。中国经济仍然能够运转，但它很快就会失去全球竞争力，因为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开始将目光投向别处。美国对其盟国提出的要求要比空海一体战中提出的要求少得多，因为尽管一些盟国的海军或许会参与封锁行动，但离岸控制战略并不需要在盟国（澳大利亚除外）部署军队，中国也就无法威慑这些国家。中国对美军基地（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的基地）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可能把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冲突并使它们站在美国一边。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对日本实行反封锁、袭击驶往

日本的护航船队来扩大战争，但由此导致的战事升级是中国无法应对的。离岸控制战略还要求通过网络空间发动非常规打击（网络空间对于该战略的有效应用必不可少）。

离岸控制战略可能还具备一个优点，一个黑姆斯并未提及的优点。一旦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将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如果美国准备购买商品并且能够生产中国所提供的商品的替代品，那么美国在（规模显然大不如前的）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增加，假如这场对抗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收场，那么美国很可能保持住这部分增加的比重。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论证这项建议优于空海一体战，但如果未来海上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美国倾斜，那么这两项战略孰优孰劣就会发生变化。这需要采用美国军事专家们偏爱的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型：对成本、收益和升级的后果进行功利主义的计算。这个例子——回到了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显示了一个战略能够在完全符合理性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合理的。

黑姆斯假定封锁可能持续数月而不会对国际经济或者美国的法律和道德权威造成严重破坏。他的结论是，与直接攻击中国大陆或者其关键基础设施相比，封锁（这是称霸海洋300年来西方国家传统上优先考虑的战略）会让北京产生的怒火小一些。不幸的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政治家们让步的空间就越小。尽管封锁战略设计巧妙，但它显然也有很多缺点。未来几年，美国海军很可能会讨论与之相似的战略和作战理念。在所有军种中，美国海军在抵制即将到来的军费削减时毫无退路。它将面对中国的主要优势：战略纵深。然而，在另外两个领域不存在战略纵深的问题：太空和网络空间，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中美战争最有可能爆发。

从凉战到密码战：大国网络战的前景

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的《网络战争》（Cyber War，2010）描绘了中国对美国本土发动网络袭击的情节，中国启动了预先安装在美国电网中的“逻辑炸弹”。金融系统崩溃；美国上空的飞机无法降落；火车脱轨；城市陷入黑暗；化工厂排放毒气；核电站面临堆芯熔毁的严重危险。在具有同样末日色彩的未来展望中，《黑市》的作者写道，“中国若发动袭击可能会引发费城和休斯敦的大型炼油厂爆炸，纽约州和特拉华州的化工厂将释放大量致命的氯化物气体，弗吉尼亚州的空中运输系统也将彻底崩溃。因为世界如此依赖网络空间，所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恐惧。”这种前景确实相当可怕，因为网络袭击不但会影响到经济，而且会很快跨越“基础结构的边界”。它甚至会破坏政府的结构并导致社会崩溃。

这些前景让人似曾相识，由此可见恐惧对我们的长期影响。具体说来，这些恐惧可以追溯至冷战结束。1991年，安全专家温·斯瓦图（Winn Schwartau）发表了《终端受损》（Terminal Compromise，1991），这部小说预言会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那将是真正的人类灭亡：

> 其目标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信息……这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关键……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命脉……这个全球也是各国的战略优势正遭到袭击……如果没有信息，没有获取信息的机制，一个真正的电子图书馆，那么美国就将倒退30年。

这部小说深入挖掘了当时一种更为普遍的忧虑：美国即将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超越。小说的反派角色是一名日本公民，他希望对美国发动袭击，为他死在广岛的双亲复仇，同时减轻他作为核爆炸幸存者的屈辱感。他说：“我们或许在珍珠港事件后失败了，但我们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和录像机取得了胜利。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作者于“9·11”事件后再版的小说《珍珠港.com》（Pearl Harbor Dot

Com，2002）中，这场袭击代表着“对美国发动的……终极网络战争”。两部小说都提醒美国人，他们遭到的最具毁灭性的袭击并不来自中东，而是来自东亚，类似的袭击或许有一天还会从那里发动。唯一不同的是，最可能充当袭击者的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

1997年，一场代号为“合法接球员”的美国网络安全演习模拟了网络战争的情景，这是美国最早开展的此类演习之一。演习中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而是朝鲜。在演习中，朝鲜侵入了美国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系统。在两周时间内，美国安全局扮演的“红军”不仅成功袭击了美军前线指挥和控制系统，还即将袭击美国本土的电网。来自政府的消息人士用“不寒而栗”一词形容演习的结果。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说，三天之后五角大楼才有人意识到计算机系统遭到了袭击。尽管人们大多认为这次演习及时地敲响了警钟，但批评者抱怨因为演习属于保密性质，公众无法讨论朝鲜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具备这些能力，甚至是否有能力掌握它们。没过多久美国人就发现，的确有人具备这些能力：在仅仅一年之后的一次袭击中（也就是那起被美国政府称为“月光之谜”的袭击），五角大楼、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其他部门的机密情报被窃取。直到2000年，政府官员才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了这个漏洞。也就是说，黑客活动持续两年之久竟无人察觉。

一份由克里斯托弗·布朗克（Christopher Bronk）撰写的报告也讨论了这一前景。在该报告所设想的未来，一个强大的中国试图将新加坡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向南海上的一艘新加坡导弹护卫舰发动袭击之前，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目的是削弱和扰乱美国及其盟国的通信能力。中国的网络作战部队进入了美国军方、政府和企业的网络。当针对新加坡的常规打击开始时，美国陆军发现他们的通信能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关键的军方网络和服务器遭到了毁灭性的拒绝服务攻击，严重限制了美国陆军调动常规作战部队的努力。55天后，这场冲突以中美两国海军对峙收场，战争的风险在最后一刻才被消除。新加坡保住了独立，但仅此而已。整个过程印证了我昔日

的同事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所说的新加坡的“例外主义”——不是指它的经济成就（的确成绩斐然），而是指它独一无二的“脆弱性”。

当然，在这次冲突中，没有一方“获胜”，战事也没有升级。双方都退后一步，继续以其他方式展开竞争。但在布朗克的假想中有一些值得担忧的现象，它们表明战争本身可能在不断演化。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开始很久以后其中一方才认识到战争爆发。黑客在侵入一个系统后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之摧毁。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代码行弄乱，这样就能使这些系统丧失准确性和可靠性，甚至完全无法响应。这种方法还算不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例如珍珠港事件），但或许比之有效得多，因为它更难被察觉、预防或修复。美国或许会因为担心中国发动空袭而命令本国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紧急起飞。但如果失去了电子工具，每一架战斗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就会变成一个手动操作的漫长过程，那景象仿佛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布朗克的设想中，中国的秘密武器是一串神出鬼没的计算机代码，不仅能够改写自己的主机代码，还能够利用主机代码以不受限制的全新方式袭击主机。换句话说，这场网络战争爆发很久以后美国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个人计算机、无线电网络、卫星接收器、控制系统和战场通信设备都会失灵，美国人只能依赖一些专用的高端卫星通信信道与日本和夏威夷的战场指挥官取得联系。当这场战争最终进入“动能”阶段、中国摧毁一些美国卫星时，这些通信手段也会被破坏，因为卫星被毁将破坏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通信卫星信号。无论事态如何升级，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布朗克的设想中并未出现用电磁脉冲武器袭击通信网络的情景，取而代之的是用僵尸网络袭击全球光纤系统。

布朗克写道，“最有可能的是，即便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发动网络袭击的政策，但网络冲突终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冲突。有关网络冲突的唯一确定性在于，它永远不会以我们所预料的方式展开。”然

而，布朗克仍谨慎乐观地表示，一旦网络战争爆发，不大可能出现电网被关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情况。换句话说，他也像某些学者一样，认为此类威胁被夸大了。

很多人都表示国家之间的网络战争不大可能在近期爆发，然而，网络空间的本质不能不让人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正如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所言，网络空间的麻烦之处在于它难以控制和理解。它不与任何可以从外部检查的物理结构保持一致。我们或许已经创造了它，但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创造的究竟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那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基本上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的猜测可以弥补我们的无知。第一篇主张网络战争可能会爆发的论文是近20年前由兰德公司发表的。这篇论文确信，袭击敌方计算机系统可以起到一种“战略效果”。从那时起，网络战争的倡导者开始编造出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新词，包括“网络安全”、“网络权力”和“网络战略”。或许最有误导性的是“网络珍珠港”的概念，这是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类比，因为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这场袭击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

很多技术爱好者不但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领悟一项战略，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钻研军事史。用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的话说，战略要求“对平凡之事有深刻理解”：

> （日本）企图在战争首日即定胜负，这不仅相当于轮盘赌赌徒孤注一掷，还相当于将一整部《源氏物语》压缩成一首俳句。此等任务实难完成。即便美军航空母舰全部停泊在港，它们也不可能在这片浅海中被彻底击沉以致无法修复。美军舰队总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元气。

当前有关网络战争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与空中力量（第三维度）刚出现时的讨论相似，当时有专家认为，第三维度能够并且即将不受

其他军种和维度的影响，独立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后果。换言之，仅凭空中力量就可以取得胜利。然而，无论盟军轰炸机对德国和日本的城市如何狂轰滥炸，甚至对汉堡和东京投掷燃烧弹，但盟军绝不是单靠空中力量就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未来某一时刻，网络战争同样会成为一种常规战争。

网络战争不但可能发生，甚至还可能像冷战一样危险。微软公司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认为，由于人们很难将网络袭击的责任归咎于某个单一的个体或国家，这意味着与传统战争相比，网络战争更可能偷偷摸摸和鬼鬼祟祟地发动。由于无法追究责任，那些在现实中被各国认为过于挑衅的行为更有可能在网络中出现。追责之难会刺激人们更加地不计后果，还会导致谷歌公司所说的“密码战”，即在“真实”世界中与贸易和外交冲突同时进行的虚拟竞争，而不是冷战或“凉战”。然而，密码战仍然具有冷战的某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间谍活动的核心作用，包括用蠕虫、键盘记录软件和基于位置的跟踪取代20世纪50年代的卧底和秘密情报投放点。另一个类似冷战的特征是使用代理人冲突，即转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第三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极难归咎于某个单独的行为体，因此，网络袭击不会像导弹一样在身后留下一道烟痕。

有些人士对网络战争这一概念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非暴力的数字袭击不应被理解为新型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网络战争的概念代表着对暴力这一概念本身的冲击。以网络空间为媒介的暴力在物理形态、感情色彩以及最根本的象征意义上都逊于以传统方式施加的暴力。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汤姆·里德（Thomas Rid）也认为暴力是定义战争的核心要素。由此可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定义战争的关键。历史上从来没有无人负责的战争行为。

表达此种怀疑态度的并非只有里德自己。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也认为，要给网络袭击下定义，就必须扩大战争的维度。

多萝西·丹宁（Dorothy Denning）也坚信，网络袭击永远无法达到使用武装力量才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推翻一国政府、占领土地或者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但即便两个热核大国交战，这些目标很可能依然无法实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把推翻另一个大国的政府列为现实目标（尽管战败国的政府很可能随后从内部瓦解）。伤亡人数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正如一位美国将军在1991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所说的，“我们无法再执行类似轰炸德累斯顿的任务了”。如果这对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来说都适用，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未来的任何大国战争。

为了适应网络战争构成的威胁，我们或许需要更新一下对军事史的理解。批评者过于看重暴力在克劳塞维茨战争思想中的地位。战争并不总是暴力的。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成功的指挥官总是努力避免战争。即便是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对他的赫赫战功赞叹不已——也曾在乌尔姆战役（1805）中凭计谋战胜了麦克将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后者缴械投降。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1st Duke of Marlborough）——堪称英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也能凭计谋而不是武力战胜法国人，成功绕过“至高无上”防线（保护巴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审视了大量网络袭击后，北约赞助的一个专家小组得出结论称，“所谓动武并不需要立即造成物理后果”。一个例子就是病毒或者计算机代码能够关闭航空母舰上的弹射系统。这或许并不会摧毁某架战斗机或者航母本身，但它仍然可以使这个价值150亿美元的平台沦为鸡肋。

像菲利普·迈林格（Phillip Meilinger）所说，海上封锁就是以最低程度的暴力发动战争的一个明显例子：

> 战争的本质变幻不定。现代世界的战争仍然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不一定是暴力的或血腥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战争的基本形式或许是步兵之间的血腥战斗，但

> 现在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了。传统的海战以及今天的网络行动可能同样具有强烈的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们既不暴力，也不血腥。

太空中可能也是如此，摧毁卫星不会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然而这样的袭击将使敌人失明，使其失去最重要的优势——制信息权。

外太空战争

1961年，美国为组建新的“北极星”战略部队而成功摧毁了本国第一颗成像侦察卫星。自那时起，太空就已经被军事化。目前各国还没有在太空部署武器。然而，正如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首次驾驶飞机后不久空军时代就来临一样，太空部队的时代也为时不远。毕竟，从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次试飞到各国开始用轰炸机轰炸城市只用了14年时间。

太空力量很适合拿来与20世纪早期的空中力量作类比。它通过提供导航、通信和情报服务而起到辅助作用，恰如空中力量最初被用来确认炮弹的落点和作为骑兵之外的另一种侦察手段。真正的太空战争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空军上将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Schriever）呼吁抢占“太空优势”。这一时期此类言论受到了压制，目的是避免与苏联展开太空军备竞赛。然而，美国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与中国展开这种竞赛。把战火烧到太空将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新的作战条件、新的战争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新的战争思想。

科林·格雷（Colin Gray）曾在20世纪末总结说，太空力量缺乏战略理论。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太空力量仍在等待属于它的克劳塞维茨。为了填补这块空白，作为当今世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顶级学者，格雷在他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现代战略。（Modern

Strategy，1999）中尝试将克氏的观点应用于太空。

格雷认为，在常规战争中指挥官都想占领“高地”，而太空就是“高地”的现代版本。无论是出于侦察目的，还是出于海陆军通信目的，使用卫星的太空技术都提供了终极优势。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卫星技术成为“力量倍增器”，这使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将“沙漠风暴”描述为史上第一场卫星战争。卫星技术没能应用于核威慑，反而在常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泽维尔·帕斯科（Xavier Pasco）称之为“对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改写”。那次军事行动也让中国军方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即美国已经开始稳步推进新型军事技术的运用。

帕斯科认为，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充当战术力量倍增器的太空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安全保障，催生了今人所说的网络中心战争。军方地球观测卫星具备更高的（几何和光谱）分辨率和更宏大的视野，通过相互联网形成真正的太空体系。太空力量使美国在作战时机、作战速度、部队协调性、兵力调遣和火力综合运用等各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1991年，太空力量帮助美国在对抗萨达姆的军队时占得先机，而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期间，太空力量则为美国提供了“全谱控制权”。此时，人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任何国家要想保卫自己，就必须阻止敌人动用太空力量。一位中国评论人士曾指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才在2007年测试了它的第一个反卫星系统。

太空军事化很可能无法避免。2009年，中国的一位空军将领称，中国应建设一支符合空天时代发展需要的空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利益。当然，中国的太空利益本质上具有纯粹的防御性质。美国只要拥有制太空权，就仍然可以考虑实施一个类似空海一体战的、有一定成功概率的战略。然而，只要是太空军备竞赛，中国就不大可能接受落后于美国的情况。这样说或许为时已晚。据太空评论网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解放军很多出版物的论述基础都是他们坚信太空军事化

不可避免。凯文·波尔彼得（Kevin Pollpeter）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估后指出："中国人认为不仅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同样不可避免。随着对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争夺日益成为战争的新焦点，太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

随着中国不断在太空项目上取得进展，《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1967）很可能失去效力。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站，它还在研发重型大推力太空火箭。作为中国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35颗中国卫星不久将进入地球轨道，而北斗导航系统将提供与全球定位系统（GPS）一样的地理定位服务（包括军事功能）。美国对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十分担心，以至于它在2011年的《国家太空安全战略》（National Space Security Strategy，2011）报告中警告，它将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以至于康多莉扎·赖斯专门就两国紧张关系升级的前景（实际上就是太空军备竞赛）向中国发出警告。

并非所有太空空间都能为军事目的服务，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太空战争将是何种形态。大气层上空60～300英里的近地轨道是情报卫星的理想工作区域，这些卫星在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们相对接近地球，能够拍摄高分辨率的照片。大气层上空300～22000英里的中地球轨道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的工作区域。地球静止轨道是最重要的区域，因为这条轨道上的卫星最不容易受到袭击，通信系统和导弹预警系统也正是以这个轨道为基础。

美国在这三种轨道上都有卫星。美国军舰依赖近地轨道卫星对敌舰进行侦察，而无人机操纵者同样依靠这些卫星获取情报。美军还依赖时距导航系统（NAVSTAR），这是一个目前包括32颗导航卫星的卫星系统，没有它就无法引导精确制导武器和操纵无人机。美国还拥有重要的外太空优势，包括6颗用于察觉核打击的预警卫星。所有这些轨道都会出现在未来的中美战争中，无论这种战争是局限于太空，

还是采取利用太空优势的常规战争形式。

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杰弗里·福登（Geoffrey Forden）曾发表过一段引人入胜的剧本：

> 当又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北京的酒吧和俱乐部开始了营业，而在亚洲上空，美国的一颗预警卫星发现，一枚发射自中国西部荒漠的导弹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令人警惕的烟痕。随后，警报声响彻整个五角大楼。近来中美关系一直紧张，因为两国为如何解决最近一次台湾危机而争执不下。中国在太空中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举动：过去两天中国向外太空发射了四艘宇宙飞船，其中三艘是在刚刚过去的6个小时内发射的。幸运的是，美国的一颗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即将在几分钟内抵达中国的第二个发射场，这样美国就能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对可疑发射场拍照的任务指令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这颗代号为“水晶 - 3”的卫星失控了。几分钟内，美国太空司令部报告说，四颗NAVSTAR/GPS卫星——用于引导美国无人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已停止传送信号。中国对美国发动的太空战争已经打响。

在福登的剧本中，中美太空战争并不会让美国大伤元气。他认为，即使中国的所有反卫星导弹都击中各自目标，甚至美国人在很早就获得袭击证据的情况下仍不作出应对，这种袭击也不大可能导致美国瘫痪，因为美国仍然拥有足够的太空优势发动常规反击。

中国人将在战争首日摧毁9颗美国卫星，但他们要想在发动袭击前保守秘密并不容易。他们至少需要36台移动发射装置（每个目标要配备两枚或者更多的导弹），而这些装置需要提前数周部署在全国各地。美国人会观察到这种部署。即便是在建筑物内组装的导弹也需要一枚一枚地移至发射台上。中国携带外太空反卫星导弹的“长征”火箭

需要在发动袭击的四天之前发射，并且停留在距地面200英里高度的轨道上，等待其他导弹就位——这是即将发动袭击的明显信号。其他导弹将不得不在发动主要攻击的6个小时前发射。

即便美国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要秘密进行战前准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不可能摧毁美国的全部军用通信卫星、导弹预警卫星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侦察卫星。美国还有商业后备力量——由商业运营者所有或运营的卫星，以及近地轨道上的民用和军用通信卫星。美国或许是军事行动最依赖太空的国家。但它也是最不容易被击垮的国家，因为它的太空资源多得惊人。

福登在这个剧本中还考虑了其他可供中国选择的策略。例如，中国可以选择袭击导航卫星，使美国失去对于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来说必不可少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系统。如果导航卫星被毁，那么美国空军就将被迫在白天执行任务，而且要执行一些如今由无人机负责的危险任务，但中国人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中国人在最初几天发射的导弹不足以严重削弱美国的能力。他们当然可以选择袭击通信卫星，因为这将使美军需要的带宽大幅缩小，但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带宽保存下来，何况还有曾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得到广泛应用的民用卫星。中国可以尝试摧毁美国的预警卫星，但那同样有风险，因为美国依靠这些卫星侦察核打击，所以中国的行动可能挑起一场核战争。中国人还可以选择打击近地轨道上的卫星，这些卫星常常三两一组，距离较近，它们能将美军战舰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传播至别处。在中国人看来，这个战略选项最有吸引力。然而，美国可以通过改变剩余卫星的绕行速度予以应对，这样中国就几乎不可能瞄准它们了。福登总结说，与珍珠港袭击很相似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在太空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使美国在战术层面遭受重挫，但这不会导致美国在战略层面无法挽回，美国人仍然有能力继续作战。

尽管如此，福登也承认，中美之间的太空战争仍将造成灾难性的

后果。虽然在袭击开始后第一个小时内仅仅有9颗卫星被毁，但这将导致近地轨道卫星最密集的区域出现近两万块直径超过4英寸的碎片。一段时间后，这些碎片将先聚后散，导致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撞击，最终使这片空间无法利用。无论是民航班机，还是日常信用卡交易，这个世界赖以运转的很多系统都将被关闭。

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纸上谈兵。太空武器过于昂贵，或许毫无必要。袭击地面卫星接收站或者使用高空核爆同样可以摧毁卫星。还可以干扰卫星的上行线路和下行线路。对激光发射台发动常规打击或许更有效。至于通过太空地雷发动袭击，美国完全可以依靠卫星系统的数量来应对，美国的很多卫星系统功能相同，损失一套系统未必就是损失惨重。

然而，基于美国霸权的太空现状或许不会持续太久。正是这种前景促使埃弗里特·多尔曼（Everet　Dolman）建议美国应该退出《外层空间条约》，在太空中部署武器，并控制近地轨道。美国接下来应该通过使用天基激光或其他动能武器，阻止其他国家在太空中部署武器，以达到确保太空商业开发自由的目的——就像英国皇家海军曾通过剿灭海盗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一样。在此基础上，多尔曼主张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力量确保一个安全的太空环境（包括消除太空碎片的威胁）。

多尔曼宣称，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事实上还可能降低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控制了近地轨道，那么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太空战争。美国若想阻止其他国家部署武器，只需将这些武器击落即可。一旦某场危机恶化，美国还能够摧毁任何路基反卫星设施。如果美国采纳这套行动方案，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将把它视为一种“军事讹诈”，那将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彼此更加不信任。然而，正如多尔曼主张的，这个结果很可能好于两国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那种竞赛几乎必然会失控。

考虑到这种军备竞赛的潜在后果，这两个大国避免直接在太空中对抗就显得很重要。1962年美国在太平洋约翰斯顿岛上空250英里处引爆了一枚140万吨当量的核弹，由此产生的电磁脉冲大大超出预期，而且更糟的是，核爆产生的人造辐射带导致近地轨道上三分之一的卫星瘫痪。所以，即便是有限度的太空战争也会导致毁灭性结果，而且后续影响还将持续很久。福登建议美国应该寻求制定太空行为准则并充当准则的守护者。这样既可以确定新的“交通规则”，同时又能劝服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等所有向太空进发的国家同意禁止使用所谓的“动能拦截弹”，这种武器造成的破坏是最严重的。

赢得中美战争是怎样一种前景？

前文所述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和美国拥有的军事手段非常有限，现有选项没有任何吸引力，尤其是在两国爆发一场有限度的核战争的情况下（考虑到空海一体战理念或者太空中的反卫星攻击，这种核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之所以有人相信这两个大国显然“不大可能”发生战争，核因素正是关键的原因。中美两国都认为它们的核武器能够保证双方永远不会开战。

然而，尽管中美两国可以采用的军事手段毫无吸引力，但应该指出1914年各国可以采用的手段同样不怎么诱人。从政治角度看，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中美两国爆发海战，但这很快就会升级。外太空战争则会给各方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样就剩下最后一种前景——网络战争，但由于中美都有核武器加身，网络战争显然会把两国引入未知之境。两国可能都预计对方会疏忽大意，这种做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官们的做法如出一辙。那些外交官们认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决定性地改变军力平衡，使之倾向于发动打击的一方，结果他们不但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本书避免作出预测，而是描述了一些供读者自己探讨的故事。用一位知名未来学家的话说，向未来学习需要“再认识”。通过探讨战争的蛮荒海岸，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更好地审视当下，从而能够以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这就是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试图在《打赢下一场战争》（Winning the Next War，1994）中讨论的内容。该书宣称，战争形态不断演化所造成的挑战之一就是我们需要确定有效性的新衡量标准（或者测量方法）。如果对于胜利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那么“战争似乎不大可能在战后带来回报”。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问道，“如果网络力量——控制和操纵与现实世界日益融合的网络空间的能力——不只是力量倍增器，而是一种新型的力量和影响力，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胜利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非传统冲突形式的涌现不仅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而且迫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彻底审视武力、暴力和致命三者的关系”。“武力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尤其是在暴力意味着致命的前提下”。若果真如此，那自然意味着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评估“胜利”的定义。

在最近发生的冲突中，胜利的本质令人困惑，正是这种困惑迫使我们对这个词本身重新进行定义。一位学者提出有必要区分胜利和战略中动用武力的结果，另一位学者对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层面可能（通常很难）取得的总体成果进行了区分。威廉·马特尔（William Martel）对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参加过的战争最为关切，在这些战争中，尽管美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它在战后阶段迷失了方向。《麦克白》（Macbeth）中的女巫说：“当输掉和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输赢在这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莎士比亚使用了“和”这个关键的词，而不是输“或”赢。麦克白的故事就是如此，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他在战场胜利之时就是他人格崩溃之始。正如他在这部戏的末尾所认识到的，他的一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失去和平的、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的胜利者又何止麦克白一人？

除了空海一体战理念的支持者，美军大部分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战争的形式和内容如此丰富多变，足以推翻任何单一的定义，战争的政治结果同样如此。胜利的标志不再是投降仪式或者胜利阅兵，更不能是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样的战犯审判。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即便是地区性的反恐战争胜利也不再被大众知晓。大型战役不会再被镜头捕获。硫磺岛或者冲绳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的经典照片也不会再有。真正的故事都发生在幕后，例如安全部队为预防任何“9·11”级别的暴行而拦截恐怖分子的通信，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未来的国家间战争中。

政治暴力具有传递信息的本质，这正是理解武力何以直接产生政治结果的关键。用埃米尔·辛普森（Emile Simpson）的话说，战争为军队决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武力不过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辛普森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是，在当代冲突中，政治行为体日益绕过战术层面的军事对抗（或者说战争），而选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部署力量，包括恐怖主义、叛乱活动以及瓦济里斯坦上空的无人机袭击行动——这些都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其目的在于利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按照自己的条件赢得战争胜利。

能够使美国暂时陷入瘫痪的网络袭击必将传递出某种意图。它同时还会造成一种挑战——是否选择让局势升级。在休·怀特的书中，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也是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总统一开始会疏忽大意，拒绝使战事升级。然而，任何攻击都会招来反击，与是否动用核武器无关。五角大楼认为怀特设想的前景挑衅色彩太重，因此当罗伯特·盖茨访问堪培拉时，五角大楼将怀特从嘉宾名单中抹掉了。想象一下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发生在太空，那会破坏美国侦察全世界核导弹（以及其他目标）的能力。任何战争的本质都是摧毁对方的意志，而不是能力，因为前者可以免去或者减少武装冲突。然而，马丁·范克里韦尔德认为，一切技术创新，无论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都不会

改变冲突的本质。战争永远“事关人心”。

中国人向来明白运气和偶然是战争的关键。《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1 在托勒密体系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中心，七颗行星各自在不同距离的轨道上绕地球旋转。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托勒密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编注

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城市名称的俄语本意为“东方统治者”或“征服东方”。——编注

3 即乔良（国防大学教授）和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编注

结　论

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　“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 战争是个危险的地方。[1]
>
> ——小布什

大国战争不再爆发了吗？

关于为何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备受推崇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给出了几种解释。该书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战争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平克承认，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断言，在今天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同样的断言出现在《华盛顿季刊》刊登的一篇文章上：《战神的退位——我们所知道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这篇文章认为，国家间战争如今已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典型的国际冲突事实上已经从现代世界消失。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战争的数

量一直在稳定下降。1700年至1815年间爆发了9~11场大国战争，1815年至1930年间爆发了2~6场大国战争，而从1930年至今只爆发了两三场这样的战争。

无论这些数字看起来多么令人欣慰，只要想到20世纪两场大国战争给全世界造成的浩劫，我们就绝不能心生懈怠。大国战争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但这些战争的破坏力显然更强了：在43年的和平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3700万人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它的两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夺去1.5亿人的生命，甚至更多。尽管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未来两三个大国判断失误的情况并非不可想象。例如，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距离爆发核战争仅有一步之遥，而两国似乎没有从那次险情中吸取任何教训。2008年孟买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度海军意图封锁卡拉奇港。只有在美国向新德里施压，要求它避免与巴基斯坦对抗之后，印度海军的计划才算是被劝阻了。

如果爆发中美战争，那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即便以死亡人数而论可能排不到首位，但它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这场战争至少有一部分发生在太空的情况下。任何一场大国战争都比上一场惨烈，英国人常常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世界大战”（Great War），但这个词语此前专门用来指代拿破仑战争（这场战争共造成200万人死亡，其中1812年入侵沙俄的一次军事行动就造成8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大可能是最惨烈的最后一次大国战争。如果过去（1914—1918）并没有重复过去的过去，那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意外呢？

上文所述并非是为了否认战争日益衰退的吸引力，事实上各个大国仍在相互竞争。随着历史的演进，贸易在创造财富方面要有效得多。战争代价太高，早已不被人看好，它的频率越来越低也不止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在国家间战争被宣布“过时”之前，两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还是值得警惕。

第一个事实是统计数据不是故事的全部。从统计上的关联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是愚蠢之举。20世纪大国战争次数较少并不意味着未来会越来越少。

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趋向的世界》（A World of Propensities，1990）中所写：

> 如果条件不变，那么统计数据的均值倾向于不变，这种倾向是我们这个宇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我认为，这只能用趋向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除了一般的可能性外，还存在加权可能性，它们是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趋势或趋向：它们不同程度地内含于各种可能性中，就像保持统计数据不变的某种力量。

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找到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加权可能性”。世界不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种“因果机器”，它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结果的世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定这些“加权可能性”会导致何种结果，但我们仍然能够利用波普尔所说的“客观可能性理论”。某些结果比其他结果更可能出现。最终，这些“加权可能性”限制了能够发生的事件的数量，决定了哪些事件一定会发生，并有可能确定其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正是这个虽然有限但仍很重要的方面值得我们讨论。

在此基础上似乎可以非常合理地推断大国战争不大可能再次发生，但1913年的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坚信这种观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一些本应爆发的冲突最终没能爆发，但历史学家一定会争辩说，像19世纪90年代俄英战争这种虚张之事只能以独属于该事件本身的理由来解释。显然，大国战争越来越罕见，一个原因可能是当代世界日益错综复杂。战争的成本上升了，而回报却下降了，但复杂性不会否定大国冲突的逻辑，它不过是让这种逻辑更加复杂罢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尽管合作为各大国带来的好处前所未有，而冲突带来的好处大不如前，但竞争仍然是本质——“非敌非友”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常见表述。合作能提高效率并最终产生更多回报。的确，大国能够通过合力避免战争而大幅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遗憾的是，战争的消失并不是“幂定律”的结果。

幂定律是指两个实体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幂定律在科学中尤其常见。热力学系统中的相变与某些性质呈现幂律分布有关，例如一个系统中的临界指数。人们认为幂定律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取决于某个物理系统的具体情况，而只取决于它的维度）。幂定律关系在物理学中无处不在，这部分源于维度束缚，而在一套复杂的体系中，幂定律则被认为是特定随机过程的标志（随机场就是一个例子）。在市场中，幂定律在三个条件都具备时才会发生作用：多样性（很多不同的产品在出售）、不平等（某些产品的质量更好）和网络化效应（例如口碑和时尚往往会放大差异、推广高质量产品）。简而言之，成功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就大国战争而言，（趋向于和平的）幂定律将在社会和经济复杂性削减战争回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大国会因为成本而打消参战的念头，这种情况持续越久，就越难以“想象”战争是有用的。一旦战争的功用遭到质疑，那么它的道德性也一定会遭到质疑。用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话说，德法两国如今“在人类学上”已经无法相互开战了。

但幂定律同样复杂，幂定律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们是分形的（无论你拉到多么远的距离观察，它们看起来仍然像幂定律）。数学家将其描述为“多重尺度上的自相似性”。有关大国战争越来越少的漫长故事是由很多短故事组成的，每一个短故事都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市场从未如此复杂（一个例子就是安杰尔提到的债券市场），社会也变得多元化（各国的本质特征在弱化；某些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变得日益离

散；未来可能连国家都不存在了，何谈战争），但这种形势下真正的外部因素反而是战争本身，战争有惊人的韧性。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战争就像疾病，它显示出变异的能力，当人们努力控制它或者消除它的时候，它变异的速度反而最快。战争永远不会从政治中消失，除非我们能消灭战争爆发的原因。”不幸的是，大国冲突的首要原因从未改变，那就是竞争。

我们是一个天生爱好竞争的物种，而大国因利害重大之故，争胜之心尤甚。然而，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有必要对争强好胜和竞争进行区分。竞争是各物种的天性：让我们能够一起生活的那些品质正是竞争的源头。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密切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亲族或者部落——来获得安全，这些形式将“内部人”与“外部人”分开。正是这种对群体性和社会凝聚力的倾向使我们既想与他人竞争，又对他人极度恐惧。

争强好胜则截然不同，正如霍布斯所说，它是某种形式的争吵。争强好胜之人甚至会为鸡毛蒜皮之事而争个没完。战争常常与身份有关——大国希望维持自己的身份；小国与大国结盟，以此获得身份。在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受辱于他国仍然是很危险的。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对新现实主义强调实质性因素的做法提出挑战，他更认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名声、身份和地位的看重。的确，与现实主义的期待相反，勒博认为在他调查的94场战争中，追求安全只是其中19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与之相对，对地位的追求是62场战争的首要或至少是次要动机。另有11场战争与报复行为有关——这同样是地位的体现（尤其是一国的可信度受到威胁时，就像“9·11”事件后的美国）。一句话，“精神”因素是多个世纪以来战争爆发的首要原因。

争强好胜有其自身逻辑，没有哪套统计数据能够做到不遗毫发或者言之甚明。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因为世界即将进入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竞争的最危险阶段。国际体系的韧性可能会面临与

1914年同样严峻的考验。

回到1914

历史学家常说过去之事会影响未来。但我们需要思考另一种情况：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如何影响我们当前的行为。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当乏味的例子。他指出，砍伐圣诞树不会“导致”圣诞节。对圣诞节的预期却“导致”这些树被砍伐。导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的不只是昨天发生的事，还包括我们对自身行为会给明天带来何种结果的预期。在这种意义上，未来像过去一样影响当下。

但我们反复回溯的是过去，类比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能够看到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多么脆弱、不稳定、转瞬即逝。最好的结果是，类比能让我们思考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会将我们引向何处。换句话说，类比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实现不同结果的难题。

美国学者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将历史类比称作“肤浅之人的分析”。然而，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正是理解为何历史可能重演的能力才将“肤浅的类比”与有理有据的分析区别开来。贬低历史类比意味着没能理解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或者至少是我们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多年以前，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研究出了一种模板，它能够让历史为决策者所用。在研究像1914年这样的危机时，他们建议我们应该确定哪些是我们知道的，哪些是我们不确定的，以及哪些是我们推测的。那么，关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知道哪些呢？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决策者明白1914年的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他们非常希望避免重蹈覆辙。第一次

世界大战仍然是当代大国冲突的原始版本。所有人都不想要战争，但不是所有人都尽心竭力地避免战争。很多历史学家现在相信，战争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家认为它太不可能爆发。

但我们还知道，中国崛起的背景不同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与德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或许只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的修改，而且它肯定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中国与俄罗斯也不一样，俄罗斯对当前的秩序不满意，却没有力量挑战它，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作出改变，但它（至少在目前）颇为满足，能够适应美国的领导。尽管美国或许处于相对衰退的过程中，但与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实力地位要强大得多。即便美国将要削减5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它的军事实力也远强于1913年的英国。将“支点”转向亚洲或许很像英国当年将“支点”转向欧洲（当时英国在与美国和日本敲定协议后将加勒比和远东地区的战舰召回）。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像德国一样满怀仇恨，至于是否像德国那样对未来感到悲观就更不清楚了（德国人无法摆脱的心结是，他们认为未来属于美国和俄国这样的“陆地强国”）。同样，由于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可能有谁会真正地鼓吹战争的积极意义，或者认为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颇有声势，但他们仍是少数派。

1909年，安杰尔四处宣扬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即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已经使大国战争变得过时，而今天我们仍不时地听到类似的言论。在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参与大国冲突的动机已经被国际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本质削弱了。一项研究发现，大国战争与战前和战后时期贸易减少之间存在关联。考虑到今天相互依赖的贸易网络，战争根本打不起来。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同样认为，与1913年的国际经济相比，今天全球化生产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考虑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公司内交易和国际分包的日渐普及，一件产品很可能是由多个国家生产的，而不是一国生产，因此，战争的吸引力下降

了。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公司内交易的水平并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的28.7%和从中国全部进口的13.7%属于公司内交易，这两个数字都明显低于47.8%和27.7%的全球平均水平。

如果我们注定要不停地猜测未来，那么我们也注定要回顾过去。当我们试图理解中美关系可能如何演变时，最恰当的历史类比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战略思想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着迷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容易想到那些处于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冲突中的各方。政治学家会对此提出质疑，他们会指出，各国参战的原因是他们误会了彼此的意图，或者他们因为疏忽而误打误撞地卷入战争。有抱负的大国希望获取的东西可能超出了现有大国愿意分享的范围，或者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被证明无法维护这套规则，而崛起大国既无意志也无意愿承担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理性，这常常促使它们对战争与和平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达尔文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就是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而自然选择的目的是获取直接关乎生存的信息。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误很可能是我们这套生存技法中对环境适应不良的部分，但我们似乎无法摆脱它们，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宣扬和平的好处，我们就必须理解战争的吸引力。像诺曼·安杰尔那样的信仰体系（今天的信徒远多于当年）并不像熔岩灯里的蜡滴一样因其自身属性而成形和流动。错误的观点本应沉入海底，却仍可能浮出水面。正确的观点则可能因其倡导者的懈怠而沦为牺牲品。

掌握未来

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的看法林林总总。像郑必坚这样的学者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德意志帝国以及1945年之后美苏两国所走的道路，而且会一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因为这一逻辑根植于西方思想，而非中华文明。同样的，王赓武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秩序最有力的支持者”，它希望通过用多极世界取代美国支配的世界来进一步巩固这套秩序。也有学者认为，战争可能是“中国世纪的促成因素”。同样的，坚定的现实主义思想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宣称，中国根本不可能和平崛起——毕竟，战争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本书主张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也不会像很多专家表示的那样不大可能发生。对于专家或者任何对预测未来冲突感兴趣的人（尤其是面临削减军费开支的军方人士）给出的建议，我们必须保持谨慎。

如果这个世界认同本书勾勒出的这套逻辑，那么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中国和美国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持续作出理性决策的能力，也不要相信自己明白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这两个大国应该就各自的价值观努力展开建设性的文化交流，同时要求对方为如何解读这些价值观负责。两国应该避免海上军备竞赛，并采取措施防止太空军事化，它们还需要意识到网络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战争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至少在战争初期如此。这些步骤都不会要求两国以非零和的方式重构二者的竞争关系。

然而，人们必须不断地讨论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历史浪潮云谲波诡，能够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人们还必须记住，大国战争过时论所体现的这种普遍懈怠正是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中美两国继续相信战争实在是“不大可能”的，没必要认真对待，那么不仅是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最终都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小布什在总统任期内的很多讲话并不符合英语语法或者语言习惯，常被美国民众传为笑谈，此句就是一例，小布什的英语原话为“War is a dangerous place”。——译注